文化生活译丛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思考与回忆

——俾斯麦回忆录（第二卷）

Otto von Bismarck

[德] 奥托·冯·俾斯麦 著

杨德友 同鸿印等 译



Gedanken und Erinnerungen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 2006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中文简体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思考与回忆：俾斯麦回忆录／(德) 俾斯麦著；杨德友，同鸿印等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2
(文化生活译丛)
ISBN 7-108-02351-2

Ⅰ.思… Ⅱ.①俾…②杨… Ⅲ.俾斯麦，O.(1815～1898)-回忆录 Ⅳ.K835.167=4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22595 号

俾斯麦 (Otto von Bismarck，1815–1898)，19世纪后半叶德国杰出的政治家和外交家。出身于容克世家，1862年任普鲁士首相后，主张以武力统一德意志，宣称“德意志的未来不在于普鲁士的自由主义，而在于强权”，“只有通过铁和血才能达到目的”。在历经普丹、普奥和普法战争之后，于1871年成功统一了德意志，并出任帝国首相。1890年去职，潜心写作回忆录《思考与回忆》。

Bismarck

GEDANKEN UND ERINNERUNGEN

J.G.Cotta's che Buchhandlung Nachfolger,

Stuttgart und Berlin 1924

根据苏联国家社会经济出版社莫斯科 1940 年俄译本和德国科塔图书公司

斯图加特和柏林 1924 年德文本新版并参照英译本翻译、校订

第二卷

目　录

第十九章　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 …… 1

（一）在处理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问题上同罗·冯·德尔·哥尔茨伯爵的意见分歧　俾斯麦给哥尔茨的信　（二）内阁会议关于丹麦问题应取的态度　解决的可能性　社会舆论提出的解决办法行不通　自由派对德意志各邦政府和威廉国王的影响　社会舆论中的奥古斯腾堡意向　《周报》党最后生存标志　（三）签订加施泰因条约时的困难　俾斯麦致国王的信　自从占领劳恩堡以来国王在心理上的变化　进步党在基尔港和普鲁士海军问题上的否定立场　俾斯麦1865年6月1日的演说　德国各政党由于党派之间的仇恨而缺乏爱国精神　一个真正德意志的思想　在政治和宗教中的德意志党派精神　俾斯麦被封为伯爵　（四）对1866年以后一个时期的回顾　普鲁士的不利状态　和普拉滕伯爵磋商有关汉诺威的弗里德里卡公主同阿尔布雷希特亲王儿子的婚事　汉诺威的军备　同库尔黑森的弗里德里希·威廉亲王的会谈　奥古斯滕堡王储拒绝二月条件　韦尔芬党人的臆造　王储给俾斯麦的信　国王就奥古斯滕堡一事给俾斯麦的信　王储1864年2月26日的备忘录　1864年6月1日同王储的谈话　维也纳和约　1865年二月条件　（五）北海—波罗的海运河的意义　毛奇反对开凿运河　运河对军事上保障德国海岸的重要意义　将运河延伸到威悉河口、亚德湾和埃姆斯将会有什么价值　赫尔果兰岛

第二十章　尼科尔斯堡 …… 29

（一）同在赖兴贝格的大本营在一起　军人因俾斯麦干预他们管辖的事务而对他不满　凯尼希格勒茨战役后法国的干涉　国王模棱的拖延答复　毛奇关于与奥地利交战之外可能同法国开战的见解　俾斯麦主张放弃对奥地利领地的领土要求而同奥地利媾和　法国军队同南德军队建立联盟的危险　俾斯麦建议国王向匈牙利民族性发出呼吁　（二）黑山军事会议　俾斯麦建议不向佛罗里德斯多夫一线进攻而在普累斯堡渡过多瑙河　总参谋部勉强服从　从外交上考虑强加给奥地利的媾和条件的限度　主管部门政策和国家政策相互矛盾　（三）和平条件的最初方案　国王不断增加的要求　他要求归还弗兰科尼亚的诸侯领土　反对获得巴伐利亚和奥地利领土的理由是什么？　卡罗利伊拒绝割让任何领土并要求以萨克森的领土完整作为签订和约的必要条件　停战　在布卢美瑙的战斗　（四）同卡罗利伊和贝内代蒂谈判预备和约的条件　面对军人影响的困难局面　俾斯麦为未来的形势负责任　7月23日的军事会议　哭泣和痉挛　致国王的备忘录　向国王的报告　国王的意见　他对于俾斯麦的抵抗感到激动　俾斯麦的情绪（自杀的念头）　王储调解　国王的眉批　（五）南德意志的全权代表在尼科尔斯堡　冯·万布勒先生　由于荷兰王后对法国的偏爱，斯图加特宫廷的亲法关系　她的反对奥地利的意识　万布勒在尼科尔斯堡受到拒绝，柏林对他的接待

第二十一章　北德意志联邦 …… 45

（一）战后普鲁士的国内形势　如果普鲁士越过美因河一线，对法战争是不可避免的　拿破仑第三回忆莱茵联邦的旧梦　他对南德民族意识的错误见解　俾斯麦推迟同法国交战的理由　通过豁免责任法的请求消除冲突　同意大利结盟的不可靠性　在奥地利战争时期意大利政策的趋向　法—奥—意三国同盟的可能性　俄国由于普鲁士壮大而不安　英国政策的柏拉图式的立场　（二）对国外形势的考虑结果影响俾斯麦的国内政策　进步党政治家的局限性　国王讨厌皇帝称号　（三）作为达到民族目的的手段

的普选制　俾斯麦对普选制的评价　秘密选举有利于野心勃勃的领袖们对民众的统治并使有学识的人不能获得应有的影响　有产者对野心家的优势有利于国家安全　野心家的优势地位容易在旧国家的崩溃之后导致独裁、暴力统治及绝对专制制度的恢复　在君主制国家内批评的必要性　作为批评工具的新闻自由和国会　保守党政策的任务　（四）保守派内部的反动企图和它在布拉格的代表　修改宪法的提议　插曲：建议缔结普—俄同盟，以便在1863年解决内部冲突和德国问题　俾斯麦评价俄国的提议　在普鲁士和俄国对奥地利和法国的战争取得胜利的情况下，事态可能的发展趋向　俾斯麦的复信草稿　国王拒绝俄国的提议　（五）国王在1886年面对保守派急躁激烈分子的反动建议犹豫不决　具有反动意义的决议会带来什么后果？　对普鲁士宪法的批评　国王反对豁免责任法的请求　国王对俾斯麦的意见让步　（六）兼并——即使不是绝对必要的，但是为了普鲁士各部分领土的连接终究是需要的　独立自主的汉诺威是同在普鲁士领导下实现德国统一不相容的　拒绝乔治五世的信　俾斯麦劝国王放弃分割汉诺威和库尔黑森的意图　国王从父辈继承下来的对拿骚的憎恶　同南德各邦签订的和约　冯·万布勒先生代表符腾堡同普鲁士订立和约和同盟　罗根巴赫关于牺牲巴伐利亚以扩大巴登领土的提议　俾斯麦拒绝这些提议　遭受肢解的巴伐利亚会成为奥地利和法国的同盟者　（七）韦尔芬军团，它的建立和解散　（八）俾斯麦在休假中　同萨克森谈判　萨克森国王约翰和阿尔伯特的忠贞立场　同奥地利结盟对巴伐利亚和萨克森的强大压力　奥地利的德国人在国会中的过火行为使德意志民族成分的权威受到威胁

第二十二章　埃姆斯电报 …… 67

西班牙内阁决定主张列奥波特·冯·霍亨索伦王储登上西班牙王位　根据国际法“霍亨索伦”这一姓氏不能成为法国干涉西班牙选择国王的自由的借口　俾斯麦未料到普鲁士同法国在霍亨索伦亲王候选资格问题上会发生

意见分歧　俾斯麦谈论在亲王被选为西班牙国王后对法国承担的义务　俾斯麦对西班牙王位继承问题的看法　俾斯麦从霍亨索伦的当选中期望得到与其说是政治上的好处，不如说是经济上的好处　西班牙面对法国干涉的消极态度　王宫中的会议　俾斯麦给普里姆的信　法国通过伪造使西班牙问题变成普鲁士问题　亲王的候选只是霍亨索伦家族的问题　法国政治家对德意志的民族精神估计不足　法国政策中教皇权力至上主义的倾向　由于选择西班牙国王问题而引起的法国对普鲁士的威胁是国际上的厚颜无耻事件　格腊蒙—奥利维耶内阁的态度加强了法国责望的凌辱性质　普鲁士胆怯了　俾斯麦离开瓦尔辛　对埃姆斯来的消息的印象　王储拒绝王位的消息增强了俾斯麦离职的决心　去埃姆斯之行的任务　和罗昂的谈话　从宪法角度看国王同贝内代蒂的谈判是不妥的　王后在同法国保持和平的意义上对国王施加的影响　罗昂和毛奇在俾斯麦处共进午餐（1870 年 7 月 13 日）　收到阿贝肯的电报　同毛奇讨论德国备战情况　接受法国的挑战，即使面对南德意志各邦，也是民族感情的要求　编辑“埃姆斯电报”　电报产生影响的原因　俾斯麦的注解　毛奇和罗昂对压缩了的电文的印象　对毛奇的评论　他渴求斗争之心有时使人不快　政治家可不可以挑起几乎可以确定的战争

第二十三章　凡尔赛 …… 80

（一）“半神半人”对俾斯麦的不满　俾斯麦听到冯·波德皮尔斯基将军同罗昂关于采取措施不让俾斯麦参加军事会议的谈话　部门之间的敌对给领导工作带来的损失　俾斯麦在凡尔赛受到军人的抵制　军事领导和外交在战争中的任务　它们共同合作的必要性　作为俾斯麦情报来源的大本营的“第二梯队”　（二）巴黎面临的局势　君王夫人的人道主义的影响有利于巴黎人　俾斯麦担心中立国进行干涉　博伊斯特伯爵为使中立国集体调停所作的努力　俾斯麦从中得到什么样的警告　意大利国王对拿破仑和法国的友好态度，意大利共和党人的反法情绪　俄国的情绪　哥尔查科夫对

俾斯麦和普鲁士的恶意　他的虚荣心　哥尔查科夫在柏林会议上　俄国对会议结果感到愤怒　作为电报起草人的哥尔查科夫　作为俄国宫廷调解人的库图佐夫伯爵和亚历山大大公　围而不克，战事停滞　俾斯麦担心最后失败　（三）德国人在巴黎城下的危险处境　缺乏攻城重炮和机动车辆　由于付出代价而产生的疑虑　大本营中妇人（英国）的“人道”精神的影响　（四）在扩大北德意志联邦时国王接受皇帝称号是政治上的需要　国王威廉一世的反对态度及其原因　王储起初讨厌皇帝称号　王储的政治幻想　俾斯麦同王储的会谈　王储的日记及其被格夫肯公布　霍尔施泰因伯爵把俾斯麦的信转交给巴伐利亚国王　巴伐利亚国王致威廉国王的信　在皇帝称号——德国的皇帝还是德意志皇帝的措辞上的困难　称帝那天俾斯麦所受的冷落

第二十四章　文化斗争 …… 104

（一）列多霍夫斯基伯爵和莱纳绍兹红衣主教在凡尔赛　教皇拒绝为促进媾和对法国宗教界施加影响　意大利的互相矛盾的派别　普鲁士偏袒教皇引起的影响　俾斯麦由于普鲁士关于教会在国家中的地位的条文列入帝国宪法同冯·凯特勒主教谈判　新的天主教派别（中央党）的形成　中央党面对教皇的力量　（二）文化斗争中的波兰方面　由于宗教事务部“天主教司”的作用波兰民族性的进步　作为拉德齐维尔家族机关的“天主教司”　俾斯麦力图说服国王以教皇使节代替天主教司　天主教司的撤销　（三）俾斯麦参与颁布《五月法》　法尔克的立法在法学上的错误　法尔克退职的原因　（四）《五月法》中不必要的和必要的东西　法尔克的继任者冯·普特卡默尔　各部官员的习惯使文化斗争的解决遇到困难　皇帝反对同罗马媾和　自由思想党的背离；它同中央党结盟使文化斗争失去希望　给国家带来的明确结果　国家与教会之间的临时性和平　（五）维克多·艾曼努尔国王访问柏林　镶钻石的鼻烟壶　画像与雪花石膏花瓶　（六）摩·冯·布兰肯堡　俾斯麦与民法上的婚姻

第二十五章　同保守党人决裂…… 120

（一）关于汉诺威省基金的辩论　保守党在众议院和贵族院的反对立场　笼络选票的手段　保守党人要求俾斯麦加入他们的集团　罗昂1868年2月19日和25日关于必须改组保守党的信　（二）俾斯麦在保守党中的对手和他们敌对的原因　同侪对授予侯爵称号的嫉妒　俾斯麦本人对侯爵称号是怎样想的　保守党人对学校监督法令所持的反对立场　俾斯麦的讲话摘录　保守党同俾斯麦决裂　决裂的政治后果　如果问题涉及面对外国长久地保证已取得的成绩，那么党派问题无关紧要　（三）保守党人的敌意由于俾斯麦接近民族自由党而加深　容克在罗昂处集会　哈·阿尔宁伯爵　冯·卡普里维先生　所谓的俾斯麦对军队的敌意为事实所驳斥　（四）《十字报》向俾斯麦宣战　诽谤浪潮　在党派精神影响下的法院判决　（五）党派斗争中像在关于宗教问题中的争论一样粗野　《十字报》的诽谤和它的共谋者宣言派　同老朋友决裂对俾斯麦神经的影响　一个正直的大臣的责任感　（六）民族自由党人对俾斯麦同保守党人的斗争漠不关心　党派的局限性　议会的头目和他们对党派成员的控制　保守党人的较大的惰性，攻击现存制度的政党的勤奋　宫廷的《帝国之钟报》

第二十六章　阴谋 …… 138

（一）哈里·阿尔宁伯爵　他的青年时代　被任命为驻巴黎大使　他的出任有利于正统派　他推翻俾斯麦的企图遭到失败　英国宫廷对阿尔宁的评价　阿尔宁企图同俾斯麦恢复以往的关系　《施佩纳报》对俾斯麦的新闻攻击　阿尔宁伯爵关于同“无误的”教皇进行斗争的建议　对阿尔宁进行法律诉讼的目的和动机　外交界的看法　《帝国之钟报》同阿尔宁伯爵的关系　（二）罗马教廷期望法国取得胜利　欧仁尼皇后袒护法国政策中的好战倾向与她忠于教皇之间的联系　法国王权的复辟是对和平的威胁　作为反对俾斯麦的同盟者阿尔宁和贡陶·比隆　福音教派中和宫廷中人士对

天主教本质的钦佩　“任何一个混账小子都是新教徒”　奥古斯塔皇后对天主教教义的偏爱　充任皇后私人秘书的法国秘密代理人（热拉尔）　1875年的贡陶·哥尔查科夫滑稽剧　哥尔查科夫的虚荣心和他对从前“门生”的嫉妒　作为所谓的和平天使和法国保护者的哥尔查科夫　亚历山大二世皇帝看透了哥尔查科夫　俾斯麦厌弃无端挑起的战争　德意志帝国创建的和平性质　哥尔查科夫对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书信的影响　俾斯麦1875年8月13日致皇帝的信　（三）弗里德里希·楚·欧伦堡伯爵的行政改革　邦议会职务的官僚化　邦议会的今昔　就鲁道夫·冯·卞尼格先进入内阁问题同他进行谈判　民族自由党对共同管理政府的过分要求　中止同卞尼格先的谈判　作为消息传播者的欧伦堡伯爵　皇帝对于俾斯麦的“专擅”感到愤怒　冯·卞尼格先明确地拒绝　民族自由党领袖们的笨拙　《施陶芬堡团第109号》　皇帝厌弃卞尼格先的原因　民族自由党在内阁中的同盟者　1878年6月5日的枢密院会议　“使之走投无路”一语的来源　民族自由党人在宫廷中的联系，冯·施托什将军是他们的同盟者　（四）博托·楚·欧伦堡伯爵　蒂德曼、欧伦堡、俾斯麦之间的意见分歧　俾斯麦给蒂德曼的信　欧伦堡伯爵给俾斯麦的信　俾斯麦的回信　皇帝的梦　皇帝同俾斯麦的通信　俾斯麦同欧伦堡的意见分歧对俾斯麦健康的有害影响　患荨麻疹　耗尽精力的首席大臣的地位　七十年代初俾斯麦体力衰退　主持普鲁士内阁的职权交给罗昂　《帝国之钟报》集团的阴谋使俾斯麦沮丧　政府中的同僚缺乏诚意　俾斯麦有组织地被排挤出政治领导事务之外　对“格莱斯顿式内阁”的思考　由于国王和王储的思想方法，这个考虑不能实现　同德尔布吕克的决裂　重病（施文宁格）　（五）副国务秘书冯·格鲁纳　他被任命进入宫廷内阁并在未经责任大臣副署的情况下被任命为实际的枢密顾问　俾斯麦给枢密顾问蒂德曼的信　俾斯麦给冯·毕洛夫大臣的信　格鲁纳的任命没有在《国家公报》上公布

第二十七章　内阁各部 …… 177

俾斯麦对各部所持的克制态度　他的责难只是为了维护整体的公共利益、反对特殊利益、防止超越规则　尽管俾斯麦采取了克制态度，为什么人们在离职时感到如释重负　教育部反对由法律规定每个教区出资接济学校的数额　财政部顾问反对俾斯麦提出的税收改革的依据　农业部反对为预防牲畜病疫而禁牲畜进口　俾斯麦同帝国金库的良好关系　帝国金库归普鲁士财政大臣管辖　俾斯麦同帝国邮局的关系　冯·斯蒂凡先生

第二十八章　柏林会议 …… 182

（一）受亚历山大二世的委托，冯·韦尔德尔将军询问在发生俄—奥战争时德国将采取什么立场　选择的形式不寻常　普鲁士全权军事代表在俄国宫廷的地位　他不通过外交部而同皇帝直接联系　哥尔查科夫在这一询问中所追求的目的　俾斯麦的拖延答复　他关于召回韦尔德尔的提议遭到威廉皇帝的拒绝。俄国大使馆再次探询　俾斯麦的答复　它的影响　俄国同奥地利的接近　赖希施塔特协定的签订　（二）巴尔干出征的目的　建立依附于俄国的保加利亚　这一打算的失败　居心叵测的虚构　俄国关于召开会议的提议　哥尔查科夫不顾沙皇的意愿参加了柏林会议　相互对立的舒瓦洛夫和哥尔查科夫　俄国政策和英国政策的虚伪性　报界和国会的轻易受骗　俄国抱怨德国在履行柏林条约时采取的立场　哥尔查科夫居心叵测　指责德国对俄国的“柏拉图式的爱情”　俄国要求德国代表全部赞同俄国的一切愿望　沙皇给威廉皇帝信中的战争威胁　哥尔查科夫在沙皇信件中起了作用的证据　俾斯麦不赞成威廉皇帝的亚历山大罗沃之行　（三）彼得·舒瓦洛夫伯爵建议缔结德—俄攻守同盟　俾斯麦给舒瓦洛夫的信　舒瓦洛夫的回信　同俄国的任何同盟的个人关系性质　驻柏林宫廷的俄国代表不怀好意的报告可能引起沙皇的不满　外交使节单人听闻的报告无助于整个政策　俾斯麦拒绝在俄国和奥地利之间进行“选择”

第二十九章　三国同盟 …… 198

（一）“三皇同盟”的目的：维护君主制度　1872 年三国皇帝在柏林会晤　1875 年哥尔查科夫公爵破坏了与之结合在一起的希望　作为先发制人的战争的反对者俾斯麦　1875 年德国进攻法国可能造成的影响　俄国官方人士对德国强大地位的不满　哥尔查科夫政策的敌视德国的性质　（二）同盟的噩梦　法国、奥地利和俄国结盟的可能性和危险　不可预测的英国立场　德国面临同俄国或同奥地利结盟的抉择　对同奥地利结盟的疑虑　（三）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信迫使做出决定　德—奥同盟在德国颇得人心　从国际法传统看同奥地利的结盟　（四）俾斯麦同安德拉西伯爵在加施泰因会晤并达成缔结反对俄国进攻的防御同盟的临时协定　俾斯麦给巴伐利亚国王的信　巴伐利亚国王的回信和俾斯麦的答复　（五）俾斯麦在从加施泰因到维也纳的旅途中所受到的接待　结盟受到奥地利的德意志人的欢迎　威廉皇帝厌恶同奥地利结盟　同俄国结盟的不可靠性　条约的效能（过去和现在）　俾斯麦通过提出内阁危机问题促使皇帝同意结盟　威廉皇帝对俄国皇帝的骑士情感　（六）俾斯麦关于使德奥同盟列入两国立法这一设想的动机　大国间所有条约的稳定性都是有条件的　德国在同奥地利十分友好的情况下不应切断自己通向彼得堡的道路　德国在奥地利和俄国的互相竞争的欲望中间的调解人角色　（七）德奥同盟使德国在反对法国时没有保护　德国和俄国之间没有引起争端的问题　俄国伪造舆论　德国同俄国的良好关系给同奥地利的结盟带来更大的保障　德国同俄国疏远会使奥地利提高对盟国的要求　德—奥条约的非进攻性质　奥地利未来发展的不可靠性　在法国恢复君主制度的情况下奥地利同法国接近的可能性　德国面对奥地利同盟国采取的有远见的政策的任务　个人不满不应规定我们的对俄国政策　只有民族利益才应决定一切　（八）亚历山大三世对俾斯麦和平政策的信赖　他对俾斯麦 1889 年是否继续担任宰相有怀疑　在国家之间签订条约时事态仅限于目前状况而已　时刻警惕！

第三十章　俄国未来的政策 …… 224

（一）俄国当前克制的原因　俄国对德国发动战争缺乏理由　西部集结军队的可能的目的　在保证土耳其的欧洲领土的状况下俄国力图封锁博斯普鲁斯海峡　这个企图可能成功　德国的利益在于把俄国人固定在君士坦丁堡　在这种情况下奥地利政策的任务　如果俄国向博斯普鲁斯海峡推进，德国偏袒奥地利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德国政策的任务不应当是以经济上的施舍来助长友好国家的贪欲　德国必须在不涉及民族的直接利益的所有问题上持克制态度　德国的优越之处：它在东方没有直接的利益；德国的不利之处：中心地位　维护和平仍然是德国最重要的利益　德意志统一后俾斯麦的理想　俄国的“解放政策”在巴尔干半岛的完全破产　“被解放”民族的忘恩负义　俄国政策的当前目标：由俄国封锁黑海

第三十一章　枢密院 …… 234

枢密院在1852年重新积极活动的目的　由内阁拟定的法律草案的不完善性　管辖各个部门的大臣的分立主义　在内阁会议上各主管大臣的互相体谅　议会讨论并不无条件地攻击内阁的拙劣的法律草案　议会大多数成员的工作惰性和党派领袖的党派盲目性　帝国国会讨论的轻率性的一个纪念碑　枢密院和作为咨议机构的国民经济会议　行业顾问和国会议员对其他非行业的参与意见的嫉妒　枢密院会议的良好印象

第三十二章　威廉一世皇帝 …… 238

（一）诺比林谋刺事件对皇帝健康状况的有利影响　皇帝最后一次生病和逝世　（二）普鲁士威廉亲王的军事素养　他对冯·格尔拉赫将军的态度　谁是虔信派　亲王不熟悉国家制度，特别是地主对农民的态度　（三）“摄政王”在处理国事时的勤勉和认真　他的人类的理智　坚持遵循传统　威廉一世的分立主义　他在职责和荣誉道路上的无畏精神　同新

纪元的大臣们决裂的原因　（四）奥古斯塔亲王妃和皇后对政府政策持原则性的反对立场　作为皇后的咨询大臣的冯·施莱尼茨先生　宫廷内阁关于政治的正式报告　他同代理人德鲁恩·德·路易斯和《帝国之钟报》党的联系　“我们温文尔雅的帝国宰相今天可真是不文雅”　皇帝处于皇后的影响之下　作为所有反对派的核心的奥古斯塔皇后　威廉一世的帝王责任感同家庭安宁之间的冲突　（五）威廉一世的“国王的高尚气度”　他摆脱了任何虚荣心　他害怕公正的批评　他对朋友以及政敌的正义感　威廉一世是在王位的正人君子　在争论中表现暴躁　俾斯麦同威廉一世的个人关系　（六）威廉一世的讲演和声明，他的语调热情是由于他待人亲切　以忠诚报答忠诚　国王与大臣，主人与仆人　1885 年 4 月 1 日的庆典　俾斯麦的忠君思想　（七）威廉一世给俾斯麦的信　奥古斯塔皇后给俾斯麦的最后一封信

第三十三章　弗里德里希三世皇帝…… 262

俾斯麦同弗里德里希—威廉王储和王储妃的关系　1887 年所谓的王储放弃统治以有利于他的儿子的说法　俾斯麦干预医生对病人的治理　从国家法上讨论德国皇帝和普鲁士国王在同议会机构的权力相冲突时的权力　帝国宰相要为政府的整个活动负多大责任？　帝国宰相只是作为联邦会议的一个成员有出席国会的权利　考虑另外分配重心的必要性　高估了国会的爱国精神，低估了对王朝的忠诚　我们的前途由于党派精神和党派领袖们的无能而受到损害　中央党敌视帝国的性质　弗里德里希三世皇帝给俾斯麦的信

注　释 …… 269

第十九章　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

3

(一)

从1855年[1]起担任过驻雅典、君士坦丁堡和彼得堡公使的罗伯特·冯·德尔·哥尔茨伯爵，被委任为我在巴黎的继任者。我的期望——官职会使他受到约束，由写作活动转入公务活动会使他较为讲求实际，头脑也会清醒些，而且委任他以当时最重要的普鲁士外交官职，会满足他的虚荣心——并未立即达到，也未完全达到。1863年末，我迫不得已和他通信争辩，遗憾的是这些信件没有完全保留我处；我只保存了他12月22日来信的片断，而这封信即成为这一段信函往来的直接起因。我回信的副本短少信文开头。即使如此，这封回信由于描述了当时的形势，并阐明了由此引起的事态发展，仍有其价值。

柏林，1863年12月24日

……至于丹麦事件[2]，国王有两位外交大臣，即：一位担任极其重要职务的人在当前具有决定意义的问题上直接在国王面前维护一项与内阁政策相反的政策，这是不可行的。不能再加剧我们国家机器中本来就已过分的摩擦了。对于任何

针对我的异议，如果是出自您这样的有资格的对手的话，我是能够忍受的。但是，在这个事件上，从公务上说，我不能同任何人分担国王顾问的职能。而且如果国王陛下要求我做此类事情的话，那我就只好辞职。这一点，我在读您最近的一份报告时业已上奏国王。国王陛下认为我的观点是理所当然的，因而我只能坚持这一观点。谁也没有要求这些报告仅
4 仅反映内阁大臣的观点，但是您的报告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报告，而是具有内阁大臣的建议的性质。这些报告向国王推荐一种与他本人同全体内阁成员商定的并奉行了四个星期的政策相对立的政策。但是，对于这一决定的——如果不说是敌意的——说得好些是尖锐的批评，已经不是一位公使的报告，而是另一项内阁纲领了。毫无疑问，这种对立的观点，没有益处，只能带来危害，因为这些观点会招致犹豫不决，而我认为，任何政策都比动摇不定的政策为好。

您认为，“普鲁士政策的一个本身极其简单的问题”被丹麦事件扬起的尘土以及对这一事件的模糊认识弄得灰暗变色，对这一见解我完全予以驳回。问题在于我们是一个大国还是德意志邦联中的一个邦？我们应该作为前者由君主治理呢，还是像作为后者而必然出现的那样，由教授、地方法院法官和小城镇的空谈者治理？我们从四十年代起就追逐“在德国中”这一令人喜好的幻影，使我们失去了我们在德国和在欧洲的地位。如果我们被认为可以加以引导的潮流所左右，那么我们便无从恢复这种地位；我们只有坚决地依靠自己的力量，首先是一个大国，然后是邦联中的一个国家，才能恢复那种地位。奥地利为了损害我们，一贯认为这对她来

说始终是正确的，而且，如果它本来就同某些欧洲国家有联盟关系的话，则它也不会为了扮演同情德意志的喜剧而脱离这种联盟。如果在它看来我们走得太远了，那么它装作似乎还可以一道走一些时候，特别是可以这样写上。但是，占其居民百分之二十的德意志人归根到底不能迫使奥地利违背自身的利益而和我们一道走。只要我们放弃在欧洲的地位，它就会在适当时机脱离我们，并且懂得找到它的获得欧洲地位的方针。您觉得，对普鲁士来说，施梅林政策[3]的相对物似乎是理想，但他的政策使奥地利崩溃。您春季曾十分强烈反对过的我们的政策，在波兰事件上经受住了考验，而施梅林政策却给奥地利带来了痛苦的果实。奥地利在采取改革尝试[4]两个月之后感到高兴的是，人们不再谈及此事和向自己过去的朋友发出了雷同于我们的照会，并且同我们一道威胁性地向自己的宠儿——邦联议会的多数派声明，它将不让以多数票来取胜。这难道不正是我们能取得的最完全的胜利吗？我们曾十二年之久徒劳地致力于瓦解布雷根茨同盟[5]，今 5
年夏天，我们达到了这个目的。奥地利接受了它去年10月曾公开嘲笑过的我们的纲领。它试图与普鲁士结成同盟，代替符茨堡[6]同盟，接受了我们的援助。如果我们今天拒绝它，那就是我们推倒内阁。由柏林这样地 en gros et en de'tail（在整体上和细节上）领导维也纳的政策，还未曾有过。此外，法国在试探我们；弗略里想要的比国王所企望的还多；在伦敦和彼得堡，我们的意见具有它二十年来失去了的重量；而这是在您向我预言由于我们的波兰政策我们会陷于危险的孤立之后的八个月。如果我们现在背弃各大国，投入受

联合会民主派束缚的各小邦的政策怀抱之中，那么，这便会是把君主制度推入对内对外极度可悲的境地。我们将会是被推动者，而不是推动者；我们将会依靠一些我们不能控制并且必然敌视我们的因素，但是这些因素会使我们无条件地服从它们。您相信，在“德国的公众舆论”、议院、报界等方面潜藏着某种支持并帮助我们的联盟政策或领导权政策的力量。我认为这是严重误解，是幻想的产物。我们的力量不能来自议院政策和报刊政策，而只能来自军事上的大国政策。我们的力量并不充裕，不能把它浪费在错误的方面、连篇废话和奥古斯滕堡身上。您夸大了整个丹麦问题，使您感到迷惑的是：这个问题成了民主派的总的战斗号召，而民主派控制着报刊和联合会的言论，并使这种本身平常的问题突出出来。十二个月以前流传过两年服役期限[7]问题，八个月以前流传过波兰问题[8]，现在流传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问题。您自己夏天是怎样估计欧洲形势的？您曾为我们担忧过各种各样的危险，您在基青根没有隐瞒您关于我们的政策不适用的意见。难道随着丹麦国王的逝世，这些危险突然消失了吗？难道站在普福尔滕、科堡[9]和奥古斯滕堡一边，依靠运动党[10]中的空谈者和骗子，我们现在便突然强大起来，足以向所有四大国表示傲慢不恭了吗？难道这些大国突然变得心肠善良或者软弱无力，以至我们可以大胆投入任何困难场合，而不必担心它们的什么了吗？

6 您把我们不要帝国宪法而能实现加格恩的纲领[11]称之为一种“神奇的”政策。我不明白，当我们必须和符茨堡人联合起来，依赖他们的支持来战胜欧洲的时候，我们怎么能够

做到这一点呢？或者是各邦政府真诚地拥护我们，则斗争的成果就是在德国增加一个关心自己的新的主权而在邦联中投票反对普鲁士的大公[12]，即又一个符茨堡人；或者是我们不得不（这种可能性更大）通过帝国宪法抽掉我们各盟邦脚下的根基，同时仍然指望他们的忠诚。正如人们所相信的，如果这不能成功的话，我们就会丢脸；如果这得以成功的话，我们就与帝国宪法联盟。

您讲到有七千万人口和一百万军队的紧密团结对抗欧洲的邦国集合体[13]，因而期望奥地利在生死关头忍受使普鲁士获取领导权的政策，但是不能过分信任在七千万人口中拥有三千五百万人口的这个邦国[14]。我也不过分信任这个邦国，但是我认为现在让奥地利和我们站在一起是适宜的；是否到了分道扬镳的时刻和由谁肇始，我们将看一看。您问道，究竟什么时候我们应在世界上进行战争，改组军队干什么用？您自己的报告给我们叙述了法国需要在春天进行战争；此外，还叙述了在加里西亚爆发革命的前景。俄国准备好比它在波兰的需要量多的二十万兵力，它是没有钱来进行空想性质的战备的，因而不得不推测俄国是在准备战争。我预料会发生与革命相结合的战争。您又说，对我们根本不存在战争的威胁。我不能将此说法同您最近三个月来的报告统一起来。我决不害怕战争，恰恰相反。我对革命分子和保守党人，像对任何陈词滥调一样，都冷漠置之。也许您很快就会确信，战争也列入我的计划。我只是认为，您的导致战争的道路，从政治家的角度来看是错误的。如果您在此情况下，与普福尔滕、博伊斯特、达尔维克[15]以及我们的其他形形色

色的敌人站在一起的话，那么对我来说您所代表的一方诚然既不是革命的，也不是保守的，但是对普鲁士来说也不是正确的。如果伦敦和巴黎的啤酒馆狂热受到赞赏，我将为此而
7 高兴，这正合乎我的心意。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因此对这种狂热表示敬佩，在斗争中它决不会给我们一发子弹和几枚铜币。如果您把伦敦条约称之为革命的条约；那么在维也纳签订的条约[16]则要更加革命十倍，而对许多诸侯、等级和邦国则是十倍的不公平了。欧洲的法律正是由欧洲的条约所创立的。然而如果对这些条约用道德和正义的标尺来加以衡量，那么所有这些条约大概都应该废除掉。

如果您在这里处于我的地位的话，我相信，您很快就会确信，您向我建议的那种政策不可能实现，尽管您认为它是极其“爱国主义的”，竟使您为了这种政策而拒绝友谊。因此我只能说：批评是容易的。在群众的赞美声中指摘政府，特别是指摘不得不捅了几个马蜂窝的政府，并不困难。如果结果证实政府的行动正确，指责就会中止；如果政府在人类智慧和意志所不能支配的事情中遭到失败，那么有人就有了及时预言政府误入歧途的荣誉。我很珍惜您的政治上的见识，但我也不认为自己是个傻瓜；我情愿听您说这是自我欺骗。如果我告诉您，两个星期以来我是按照您在第×号报告中提出的建议行事的，也许我的爱国主义和我的判断能力在您的心目中提高了。如果我们在法兰克福促成奥地利召集霍尔施坦各阶层开会，那我是费了不少精力的；我们必须首先在国内一切顺利。继承问题将根据我们的一致意见在邦联议会审核，虽然顾虑到英国我们并不投票赞同此事。我对叙多夫[17]

没有下过指令，他是不适于执行微妙的指令的。

也许随后还会出现同您的纲领相距不远的一些其他方面的事态。但是，当您在政治上已向我宣战和相当坦率地说出了反对也就是废除当前的内阁及其政策的意图之后，我还能随意对您道出我内心的思想吗？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只能根据您给我的几封书信的内容进行判断，而对于各种谣言和人们转达给我的有关您针对我而发的口头和书面意见则不予理睬。为了不使国家利益受到损害，我作为大臣毕竟有义务对我们驻巴黎的大使毫无保留并公开彻底地说明我的政策。任何人处于我的地位都应当去克服同诸位大臣和顾问们、在官廷里、同秘密势力、 8
议院、报界及外国官廷的摩擦，不能通过大臣与公使间的竞争取代我所主管的部门的纪律和我不得不以通信讨论的方式谋求恢复外交事务人员的必要统一而增加摩擦。我很少像今天，圣诞节的前夕，当所有官员都已休假的时候写得这样多。而且，除了给您之外，给别人是连这封信的四分之一的篇幅也不会写的。我这样做是因为我不愿意以公务的方式并通过官厅以您报告中的那种高傲语气来给您写信。我不指望能说服您，但是我信赖您个人的任职经验和您的公正精神。因而，我认为，您会同意我的主张：在一个时期只可以奉行一种政策，而且应当是内阁与国王之间意见一致的政策。如果您试图反对此种政策并推翻内阁，那么您就应当在这里、在议院和报界率领反对派进行这种活动，但是您目前的职位不能这样做。于是我不得不遵守您的原则：在爱国精神和友谊之间发生冲突时，还是服从于爱国精神。但是我可以向您保证：我的爱国精神具有如此强烈的和纯洁的性质，以至与爱国精神相比较

友谊显得相形见绌，虽然如此友谊也依然是很真挚的[18]。

（二）

在丹麦问题上可以达到的分阶段解决办法，每一阶段同各公国的现状相比意味着一种进步，这种分阶段的办法中，我认为各公国并入普鲁士是它们的顶点。这一点，我曾在弗里德里希七世[19]逝世后立即举行的一次枢密院会议上讲过。我提醒国王，所有他最近的前任，甚至其兄也不例外，都为国家扩大了领地：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获得了霍亨索伦和亚德地区；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获得了莱茵省；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获得了波兰；弗里德里希二世获得了西里西亚；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获得了前波美拉尼亚；大选帝侯获得了后波美拉尼亚、马格得堡、明登等地。我劝他效法先帝。我的发言没有写入记录。当我向当时做记录的枢密顾问科斯滕诺布尔探询原因时，他说国王认为，如果我的发言不写入记录，这更合我的心意。看来，国王陛下认为，我是在早餐时在巴克斯神[20]酒兴的影响下说出此话的，如果不再提及此事，我将会感到高兴。然而我却坚持要写入记录，并获得成
9 功。当我说话时，王储向天举起双手，好像怀疑我是否神志健全，而我的同僚们则保持沉默。

如果不可能达到最高目标，那么，尽管有奥古斯滕堡家族[21]的全部逊位诏书，在通过事后签署的二月条件[22]的主要部分、军事协定、基尔港作为联邦港、北海和波罗的海之间开凿运河等这些普鲁士和德意志民族的利益得到保证的条件下，我们也赞同确立

这个王朝和建立一个新的中等邦国。

根据当时的欧洲局势和国王的意志，即使普鲁士不遭到包括奥地利在内的所有大国的孤立这一点也达不到的话，那么便会产生一个问题：通过何种途径（不论是以君主国的形式还是以其他形式）才可以达到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各公国状况的暂时解决办法。从最初起，我就坚持着眼于兼并，又没有忽略其他的逐步解决办法。我绝对地认为必须避免的局势就是在社会舆论中被我们的敌人当作纲领提出来的那种局势：即普鲁士为了建立一个新的大公国，率领报纸、协会、义勇军和除奥地利以外的各盟邦进行斗争和战争，而对各盟邦政府是否会不顾危险将这一事业进行到底却又没有把握。加之，沿这一方向发展的社会舆论和路德维希·冯·格尔拉赫院长[23]对英国将会给遭到孤立的普鲁士以援助又都怀着一种天真的信念。如果我们愿意为合作付出所需求的代价，那么取得法国人的合作要比取得英国人的合作容易得多。我毫不动摇地深信：普鲁士如果仅仅依靠武器和1848年当时的各盟友，依靠社会舆论、邦议会、协会、义勇军和具有当时装备水平的数量不多的军队，就要着手进行毫无希望的事业，那它在大国中，其中包括英国，找到的只能是敌人。如果一位大臣重新回到1848、1849、1850年的错误政策，我便认为他是骗子和叛徒，因为这不可避免地会导致新的奥尔缪茨协定[24]。但是只要奥地利和我们在一起，其他大国结成联盟反对我们的可能性便消失了。

虽然德国的统一不可能通过邦议会的决议、报纸和射击游艺会达到，那么自由主义毕竟对各邦君主行使了一种压力，并使他们更加倾向于做出有利于帝国的让步。各宫廷的情绪动摇不定，他们一方面不顾自由派的压力，希望以分立主义和专制的分离政 10

策巩固各邦君主的地位；另一方面又担心和平会受到国内或国外力量的破坏。没有一个德意志的政府让人对它的德意志的思想方法发生怀疑；但是，在如何缔造德意志未来的问题上，则无论各个政府或是各个政党的见解都不一致。如果说威廉皇帝在起初受自己夫人的影响而走上的开始新纪元[25]的那条道路会达到这样的地步，即促使他作为摄政王，后来又作为国王去做为了达到统一所需要的事情——同邦联断绝关系并利用普鲁士军队为德意志的事业服务，这是不可思议的。但是，从另一方面说，如果说他预先没有实施自由主义方针的尝试和企图，从而也没有承担相应的义务，那么要使他走向导致丹麦战争、从而也导致波希米亚战争[26]的道路，这也是不可思议的。如果自由派的经历不曾使得君主感到需要在自由派中间保持一定的声望，那也许就不能阻止他参加法兰克福各邦君主大会（1863 年）。这一需要在奥尔缪茨协定之前，他是不曾有过的，但从那时起，这一需要便成为力图在德国政治领域寻求满足并为他那普鲁士荣誉感所遭受的创伤寻求治疗这种要求的一种自然心理的结果了。霍尔施坦问题、丹麦问题、杜佩尔和阿尔森[27]、同奥地利的决裂以及在战场上解决德国问题[28]：这一系列带有冒险性的步骤，如果没有新纪元给他造成的困难地位，他也许是不会采取的。

当然，在 1864 年，国王为了解脱在自由化的夫人影响下而同这一阵营发生联系的束缚，花费了很多精力。由于未曾研究王位继承权这种错综复杂的法律问题，他仍认为："我对霍尔施坦没有任何权利。"我的意见是：奥古斯滕堡家族对公国份地和绍姆堡份地[29]现在没有、过去也从未有过这样的权利，并有两次（在 1721 年和 1852 年）他们都拒绝了王室的那部分份地；丹麦在邦联议

会[30]中通常是和普鲁士一起投票表决；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大公由于担心普鲁士的优势，将跟着奥地利走。所有这些意见都没有产生任何作用。即使说获得这些濒临两大海的省份和我在1863年12月枢密院会议[31]上的历史回顾，对国王的王朝感情不无影响，那么，另一方面对他发生作用的还有一种思虑，即国王想 11
到：如果他放弃奥古斯滕堡，就将遭到自己的夫人、王储夫妇、各王朝和所有他认为是制造当时德国社会舆论的人们的反对。

有教养的德国中等阶层的社会舆论无疑是对奥古斯滕堡有利的，这里表现出丧失判断能力，这种无能使得以前把波兰主义、后来又把人为地为巴滕贝格的保加利亚而欢欣鼓舞[32]当作德意志的民族利益。在这两种有某些相似的情况下，报刊的所作所为都产生了可悲的效果，而公众的愚昧一如往常，总是接受报纸的影响。批评政府的倾向，在1864年已达到这句话的程度："不，我不满意这新任的市长。"[33]我不知道，今天是否还有人认为，在两公国获得解放后，再由这些公国组成一个在邦联议会有表决权的和具有惧怕普鲁士而与普鲁士的敌人站在一起的自然意向的大公国，是明智的。但是，当时普鲁士获得诸公国，被所有那些从1848年起就扮演为民族思想代表者的人们视为一种邪恶。我对所谓社会舆论，也就是说对演说家和报刊的叫嚣从来也不是特别尊重的。至于外交政策，在上文中可以对比的两种情况下，我则更加予以轻视。国王顽固地坚持同普鲁士力求民族统一这种夙愿相矛盾的奥地利—法兰克福—奥古斯滕堡的纲领，这种顽固态度表明，由于夫人和野心勃勃的贝特曼·霍尔维克党[34]的影响，国王的见解直到此时期受到流行的自由主义的渗透是何等强烈。从逻辑上来对国王论证这一政策是不可能的。对这一政策的内容不经过任何分析，他就从以前的王位

继承人的批评态度和以哥尔茨、普尔塔勒斯等人为代表的王后顾问们的立场出发，将这一政策当作旧自由主义的属性接受下来。我稍微提前一些，将代表《周报》党[35]最后的动向的贝特曼·霍尔维克于1866年6月15日向国王上书的主要段落摘引如下：

陛下始终担心和回避的事情，一切有识之士所预见的事情，即我们同奥地利的严重冲突将被法国利用，以牺牲德国
12 而扩大它自己的领土（在哪里？）*，这一点现在全世界从路易·拿破仑的直言不讳的纲领[36]中可以看得一清二楚……放弃诸公国而取得莱茵河沿岸的全部土地——这对他来说可能是一件不坏的交易，因为他从前所要求的“les petites rectifications des frontieres”（“稍许改动边界”），显然是不能使他心满意足的。而他是欧洲万能的统治者！……对我们这一政策的倡导者，我并未怀有敌意。我很乐意回忆起1848年我曾和他齐心协力地支持过国王。在1862年3月，我曾建议陛下选择一位有保守派经历的舵手，他应具有足够的荣誉感、胆略和机智，以便使得国家这艘航船能避开航程中的暗礁。如果我相信冯·俾斯麦先生将缜密与始终如一的思考和行动同这些品质结合起来的话，我便会提出他来。缺乏这些品质，对青年人说来已经难以谅解，而对治国的成年人来说，则于国家就有极大的危险。事实上，俾斯麦伯爵的行动一开始就矛盾百出。……他很久以来就是俄法同盟的坚决捍卫者，可是他却把为了普鲁士的利益而援助俄国镇压波兰起义和必然要

* 俾斯麦在页边的批语。

使两国同他疏远的政治方案结合起来。当1863年丹麦国王逝世，一种对政治家来说如此幸运的任务落在他身上时，他却轻视了使普鲁士在一致奋起斗争的德意志占据首领地位（在决议中），[①]而在普鲁士领导下统一德国又正是他的目的。他还宁可和根本反对这一计划的奥地利结盟，为的是在后来又和奥地利成为不共戴天的仇敌。陛下赏识的和当时可向之获得一切的冯·奥古斯滕堡亲王，俾斯麦伯爵对他却很冷淡，其目的就是为了此后不久在伦敦代表会议[37]上通过伯恩施托尔夫伯爵的嘴来宣布他是有权利者。然后他通过维也纳和约[38]使普鲁士承担只有同奥地利取得谅解*才能对被解放的各公国的命运做出最后决定的义务，并且他允许在和约中公然宣布采取旨在“兼并”的措施……

很多人认为，这些和类似这些经常导致相反结果的包含着内在矛盾的措施，是由于考虑不周而造成的错误。另外一些人觉得，这些措施是一个志在冒险并将一切混为一谈的人为了享用偶然获取的猎物而采取的步骤，或者是一个在每次败局后提高 13
赌注并最终喊声“va banque”（“输光”）的赌徒的做法。

凡此种种都很恶劣。但在我看来，更恶劣的是，俾斯麦伯爵的这种行径已使他自己同国王的思想和目的发生矛盾，并且极其巧妙地、一步一步地把国王引向截然相反的目标，直到不可能返回的地步。而按我的意见，大臣的第一位的职责在于充当国王的忠实谋士，想尽一切办法实现他的意图，

① 俾斯麦增补的话。——德文本注

* 为什么不说：他使奥地利承担只有同普鲁士取得谅解才能……？

而首要的是，要在世人的心目中使国王的形象保持纯洁无瑕。陛下的坦率、公正和侠义精神是世所公认的，博得了普遍的尊敬和信赖。但俾斯麦伯爵却使陛下对本国所讲的金玉良言不能产生任何作用，因为它们不被相信；他并使得同其他强国取得任何谅解都变为不可能，因为这种谅解的第一个先决条件——信任——由于阴谋政策而遭到破坏……现在还没有听到枪声，还可以在一种条件下达成谅解。不要停止军备，而且如果需要的话，要加倍地搞好军备，以便胜利地还击企图消灭我们的敌人，或者从混乱的局面中体面地找到出路。但是只要此人还在陛下身边，并得到您的完全信赖，从而使陛下失去所有其他强国的信任，则任何谅解都是不可能的……①

（三）

当国王收到此信时，由于1865年8月14日至20日签订的加施泰因条约[39]，他已摆脱了信中反复提及的论据的干扰。下面引述我向陛下上奏的一封信，它说明了在关于这个条约的谈判期间，我还需要同哪些困难作斗争，需要保持何等的谨慎态度。

加施泰因，1865年8月1日

最为仁慈的国王与君主：

一种或许是出于对陛下神圣职务的利益的过分关心才促

① 威廉国王在1866年7月在尼科尔斯堡才公开了这封信；他的答复的开头说："在尼科尔斯堡我才公开您的信，答复的地点和日期或许已足以回答了！"——德文本注

使我回顾陛下刚刚恩示予我的通知，这恭请陛下加以宽恕。如果奥古斯滕堡阵营知道了即使只是对诸公国的管辖权加以瓜分，那么这种想法也会在外交界和报界引起最强烈的风暴；因为人们从中可看到彻底瓜分的开端，而且毋庸置疑 14
的是，对奥古斯滕堡来说，那些只能由普鲁士管理的国土将会失掉。我和陛下一起认为，王后陛下会对这些消息严守秘密；但是如果从科布伦茨[40]方面由于信赖亲族关系，向维多利亚王后[41]、王储和王储妃走漏的风声传至魏玛或巴登[42]，那么我答应布洛姆伯爵[43]保守秘密的许诺未得实现，单单这一事实即会引起弗朗茨·约瑟夫皇帝的不信任并会导致谈判的破裂。但是随着这一谈判的破裂，几乎必不可免地会招致同奥地利的战争。如果我确信战争的必要性出自事物的本性和君王的天职，如果确信陛下怀着别样的情感和更为自由的勇气决心同奥地利作战，而不是认为由于某种隐情，即过早地宣扬拟议中的解决办法，阻止了皇帝同意最后的为陛下可以接受的出路，那么陛下就愿将我的这种信念不仅看作是我对陛下神圣职责的关心，而且看作是我对皇上您个人的忠诚。也许我的忧虑是愚蠢的，即使有道理而陛下您不屑一顾的话，那么我就会认为这是上帝在引导着陛下的心灵，我将同样愉快地履行我的职责。但为了安慰良心，伏祈陛下垂察，是否令我拍电使来自萨尔斯堡[44]的信使折回原地。内阁的邮务可作为表面的借口，而明天我可差遣另一信使替换该信使或仍遣原信使及时出发。现将我给韦尔特尔[45]的有关同布洛姆伯爵谈判事宜的电报副本呈奏陛下，我敬仰陛下宏恩，倘若陛下不赞同我的考虑，伏祈将其视作不仅为了尽职，而

且为了陛下圣愿如意而效忠的真诚努力。

永远无上崇敬陛下的

冯·俾斯麦

在标有-|-的边页上国王写道：

同意。我之所以提到此事，是因为在最近二十四小时内没有再次提及，而且我认为在实际上已经分割并占领之后，此事已无须再作考虑。我告知王后是想做好准备，以便将来由行政分割而一步一步地向占领过渡。其实，我本可以晚一些时候，在财产分割实际进行之时，再述说此事。对分割一事我总不太相信，因为奥地利既然在自己多次声言中极其袒护奥古斯滕堡并反对的确是单方面的合并之后，对此是必然要猛烈反对的。

威·1./8.65

命令信使将全部信件送回，包括给王后的信件在内，这会是可靠的。因为我派他立即将给王后的信件在波茨坦车站寄出，看来他由此会急忙把这一信件单独地由从萨尔斯堡来的邮车寄出的。①

① 附言是国王亲手用铅笔写的。——德文本注

在签订加施泰因条约和占领劳恩堡——威廉国王时代帝国扩张的第一个领地——之后，据我观察，在他的情绪中可以看出心理上的变化。他开始在夺取领土中寻找兴味，虽然他主要地仍是满足于在同奥地利和平友好的情况下扩大领土，如基尔港，军事占领什列斯维希和开凿通过霍尔施坦的运河权等。

我认为，国王陛下对拥有基尔港，看得比重新获得的拉策堡[46]美丽如画的四郊及其湖泊更为重要。德国海军和作为建立海军的基地的基尔港，从1848年起就是一种能激起无比热情的思想，此种热情一直激发并加强着统一德国的愿望。但是，当时议会中我的政敌对我的仇恨要比对德国海军的兴趣更为强烈。我觉得当时进步党宁愿看到普鲁士重新获得对基尔港的权利，从而对我们未来的海上威力所寄予的希望操在拍卖者汉尼拔·费舍[47]的手中，而不是在俾斯麦内阁[48]手中。由于德国人的希望破灭，有权控告和指责政府比起在实现这些希望的道路上所取得的进步来更能给议员们带来满足。这里我摘引我在1865年6月1日关于海军紧急拨款讲话中的几处内容：

> 近二十年来，大概没有一个问题像海军问题这样引起了德国社会舆论如此一致的关注。我们曾亲眼目睹了各种联合 16
> 会、报刊、各邦议会是怎样对这一事件表示了自己的同情，此种同情还证实在几笔巨款的募集上。人们指责政府和保守党在这方面行动迟缓和吝啬；自由党在这里表现出特别的积极性。因而我们认为，我们目前的法律草案会给你们带来极大的愉快……
>
> 我没有料到委员会的报告对于拍卖德国海军舰只的汉尼拔·费舍做了间接的辩解。这次德国海军之丧失，是因为在德

国方面的（无论是在最高执政当局中，还是在下级机构里）党派之争胜过共同的意识。我希望，我们将不会是注定这样的命运。其次，我觉得有些吃惊的是在报告中给予技术如此重要的位置。我并不怀疑，你们当中有许多人比我更懂得航海事业，而且比我在海上航行的机会多。但是，先生们，你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却并不是这样的；而我应当说，决不会提出自己对海军的技术细节的见解，来作为我表决的依据和否决海军草案的理由。所以，我现在可以不忙于驳斥你们反对意见中的有关部分……你们怀疑我是否能获得基尔港，这更直接涉及我主管的部门。我们在各公国拥有的不止是基尔港，我们同奥地利一起在各公国中拥有充分的主权。我不知道有谁能剥夺我们的这一抵当品，就这一抵当品的价值而言，它是大大地超过我们所追求的目标的。除了一次对普鲁士来说不幸的战争之外。但是如果注意到这种可能性，那么我们也就的确可能失去任何一个位于我们占领地的海港。我们的占领地确实是和奥地利共有的。然而它是这样一种占领，要放弃它我们便有权提出我们的条件。基尔港将来转归普鲁士单独所有，就是这样的条件之一，同时也是必须的条件之一。不满足这一条件，我们就不放弃这一占领……

只要没有一个向政府提出要求的先生能向我们证明，有一种比从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九世那里转到我们手中的权力更好的权力时，那么在我们手中和在奥地利手中的权力就是不可侵犯的以及享有充分主权的，面对这些权利，只要我们
17 不失去耐心，而是冷静地等待，是否有人会包围其中居住有普鲁士人的杜佩尔，那么我就看不出，怎么能够妨碍我们的条件得到最终的满足……

如果您们仍然怀疑实现我们的意图的可能性，那么我在委员会已经推荐了一种办法：请您们对借款加以限制，使所需款项只能在基尔港确实归我们所有时才给以提供，并且请您们说："没有基尔港，就没有钱！"我相信除了那些有幸现在受国王陛下信任的人之外，你们对其他大臣是不会拒绝这样一种条件的。

国民对国王的贤明非常信赖，会这样说：如果国家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实行两年兵役制）遭到灭亡或蒙受损失，国王是不会容忍的。正由于过去的传说，他们对宪法的意义估计不足。我相信，对国王的贤明的信赖是不会欺骗他们的；但是我毕竟不能否认：当我看到面对二十年来社会舆论所关注的重大的民族问题，以普鲁士的人才济济和爱国主义而闻名于欧洲的议会，除了软弱无力的否定立场之外一筹莫展，这真给我造成一种痛苦的印象。先生们，这既不是你们借以从王权那里夺取权柄的武器，也不是一种保障我们的立宪机构得到所需要的那种巩固和进一步发展的手段。

有关海军的预算遭到了拒绝。

回顾这种局势，可以看到令人悲痛的证据，即：在我们这里各个政党在党派仇恨的道路上达到了何等欺诈和完全丧失爱国主义的程度。即使类似的事情在某地也发生过，但是我不知道有任何一个国家像我国这样，共同的民族情感和对共同祖国的热爱只给猖獗的党派贪欲造成如此微弱的障碍。普卢塔克借恺撒之口说的那句真伪可疑的话，即宁在山村当老大，不去罗马当老二[49]，总是给我造成一种真正德意志观念的印象。我们之中有过多的人在社会生活中正是这样思考并且寻找一个小山村，如果在地理上找

不到，便要找一个他们可以当老大的党，要不就是一个派别或集团。这种可以随意称之为利己主义或者独立自主的气质，在整个德国历史中，从最初的历代皇帝时期[50]发动暴乱的各个公爵开始，
18 到无数直属帝国的邦君、帝国城市、帝国农村、修道院和骑士[51]为止都得到证实，这种情况造成了帝国的软弱无力，无以自卫。现在这种倾向在分裂民族的党派制度中较之在法律或王朝的分裂状态中表现得更为强烈。各种党派间的区别与其说是在于各自的纲领和原则，还不如说是在于各自的像雇佣兵队长[52]一样的政党首脑，他们竭力从议员和钻营的新闻记者中为自己招募尽可能多的追随者，而这些人又指望着和自己的一位首领或几位首领一齐上台执政。本来会迫使议会中的党团互相斗争和敌视的原则性的纲领性的区别，不到足以解释他们为什么要进行他们认为需要的那种相互间的狂热斗争，从而把保守党人和自由保守党人[53]推入不同的阵营的强烈程度。即使在保守党中大概也有许多人感到不赞同《十字报》[54]以及接近该报的人们的观点。然而连他们的领袖和副领袖也难于确定其纲领中的原则界限和令人信服地把它表达出来，而当询问他们区别各种不同信仰和派别的标志时，当问到如果他们不竭力同离经叛道者的任何偏向作斗争，会有什么危险威胁着拯救他们的灵魂时，他们就像宗教狂热分子那样（不仅像俗人那样）通常总是设法摆脱必要的回答或者不予回答。这些政党已经发展到不仅仅按照经济利益而各自结合起来，它们为党派的敌对着的领袖的利益和按照个别人物的意愿和野心而进行斗争。问题不在于原则分歧，而在于是矶法派还是保罗派[55]。

下面国王的一封信就是对加施泰因条约的纪念。

柏林，1865 年 9 月 15 日

今日就要采取占领劳恩堡公国的行动——这是我治国的成果，同时又是靠您巨大而杰出的洞察力和谋略才得以实现的。从我委任您领导政府以来的四年中，普鲁士获得了与其历史相称的地位，这一地位将会给它带来幸福而光荣的未来。为了对于您的崇高业绩（对此我曾多次有机会向您表示谢意）公开地表示谢忱，我特封您为世袭伯爵。这一嘉奖将永远证明我对您有益于祖 19
国的活动给予高度的评价。

您的诚挚的国王

威廉

（四）

柏林和维也纳之间的谈判以及从加施泰因协定之后到战争开始以前普鲁士和德意志各邦之间的谈判，已在文件[56]中公布。

在南德意志，同普鲁士的争论和斗争部分地让位于德意志的爱国情感。在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所有愿望未遂的人都开始顺从新的秩序。只有韦尔芬党人[57]关于 1866 年事件还在不知厌倦地进行笔战。

在维也纳大会上，作为对普鲁士奋发图强和作出成就的一种报酬而使普鲁士承受的那种不利状态[58]，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方能维持，即如果我们能够对在七年战争时期[59]产生的位于君主国两部分之间的旧联盟诸邦确有把握的话。我曾经努力争取汉诺威和同我甚为友好的普拉滕伯爵[60]这样做，并可以指望最少也能缔结中立协

定，因为1866年1月21日普拉滕伯爵和我在柏林商谈了汉诺威的弗里德里卡公主与我们年轻的阿尔布雷希特亲王的婚事。我们已得到了两个宫廷对婚事的同意，还需要做的就是安排两位年轻的主人会面并确定相互所得的印象。

但是还在三月或是四月份，汉诺威在破绽百出的借口下开始宣布要征集后备兵。这是由于乔治国王受到了影响，特别是国王的异母兄弟、奥地利将军佐尔姆斯亲王的影响。他到汉诺威对国王夸大奥地利的军事力量，说奥地利的军队中有八十万人完全做好了战争准备，从而使这位国王的情绪发生了变化。我从汉诺威的秘密材料中获悉，他还建议至少可以获得明登州[61]来扩张领土。我正式询问汉诺威为何加强军备，得到的回答是：根据经济上的理由，秋季演习将要在春季进行。这种说法颇为可笑！

还在6月14日我在柏林就与库尔里森的王储弗里德里希·威
20 廉亲王进行过会谈，并建议他乘专车到卡塞尔[62]，无论是通过对选帝侯的影响，还是不涉及他，来保证库尔黑森或者至少是他的军队的中立，亲王拒绝在普通列车按时开出之前出发。我向他说明，这会误事的，会来不及防止普鲁士和黑森之间的战争以及保证选帝侯国的继续存在。如果奥地利取胜，他总会推诿于vis major（不可抗拒的力量），甚至会由于自己的中立态度而获取普鲁士的一部分领土；但是如果在他拒绝中立后我们获得了胜利，那么选帝侯就会不再继续存在。黑森国的王位是抵得上一趟专车的。“我们这辈子总还会见面的，奥地利的八十万精锐部队也会说出自己的话的。”——说完这句话，亲王就结束了会谈。尽管国王于7月6日从霍尔齐茨、7月8日从帕尔杜比策用最友好的语调向选帝侯建议与普鲁士结盟和从敌对阵营召回自己的军队，但是这个建议并无成效。

奥古斯滕堡储君亲王由于拒绝了所谓的二月条件，也就失去了良好的时机。在一些韦尔芬党人[63]中不久前流传这样一种说法：散播这种说法的人声称从亲王处获悉，在谒见威廉国王时亲王答应对所提出的要求一定让步，而国王则答应封他为公爵，并在第二天由首相正式办妥。还说什么第二天我到了亲王那儿对他说，现在马车正等着我，我应该马上到比阿利茨[64]见拿破仑皇帝；还建议亲王在柏林留下一个全权代表。第二天亲王在柏林的报纸上读到说他已拒绝了普鲁士的建议的报道，感到异常惊诧。

无论在基本内容上，还是在细节上，这都是一种拙劣的捏造。和储君亲王进行的谈判已由济贝尔[65]根据文件加以说明。根据我的回忆和我手头留存的文件，对此我可以做些补充。国王从来没有同储君亲王达成任何协议，我从来没有去过储君亲王家里，也从来没有对他提到过比阿利茨或者拿破仑的名。1864 年 10 月 1 日我去巴登，而 5 日又从那儿到了比阿利茨。1865 年 9 月 30 日我是直接到那里的，而 1863 年我根本未到过比阿利茨。我和储君亲王会谈过两次。他的下面的一封信涉及到我们的第一次谈话（1863年 11 月 18 日）：

阁下，由于《十字报》(12 月 3 日）第 282 期中一篇文章 21
的缘故，请允许我向您说几句话。这篇文章我是后来才见到的。在这篇文章中顺便提到，说什么我向一个议员说，“冯·俾斯麦先生不是我的朋友”。我不能十分准确地把我那时说过的原话再说一遍，因为那是在交谈中随便说出的。非常可能的是，因为阁下对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事件的现状的政治观点和我不一致，我最近一次在柏林停留时已坦率地向您亲自述说过我对此所感到的遗憾。但是我完全肯定，我没有

说过报纸上引用的那句话，因为把政治与个人私事分开始终是我的立身的严格的规则。所以我对报纸上出现这样的报道坦率地表示遗憾。

我越是必须承认阁下的忠诚的态度，我越是感到有责任向您作出上述这样的声明。您在柏林忠诚地向我公开说明，您个人虽然确信我的权利[①]和赞同我试图应用这一权利的正义性，可是考虑到普鲁士所承担的责任和整个世界的局势，您不能给予我任何许诺。

余不赘述。

哥达，63 年 12 月 11 日

弗里德里希

1864 年 1 月 16 日国王陛下写信给我：

我的儿子昨天晚上还到我这里来转达了奥古斯滕堡储君亲王请我接受由萨姆韦尔[66]先生交来的他写给我的一封信的请求，并问我是否愿意为此出席他的晚宴，在晚宴上我可以完全不引人注意地在一个僻静的房间里和极为令人尊敬的萨姆韦尔会面。我因为没有看到亲王的信，便谢绝这样做。为此我让儿

① 这里从储君亲王方面来说难道不存在一种误解吗？俾斯麦公爵从未确信储君的权利，也一再正式表示过这一点。因为他本人同储君亲王的父亲商议一致同意 1852 年 12 月 30 日的条约，亲王的父亲声明奥古斯滕堡家族放弃在丹麦的财产、承认在继承权事务中丹麦所采取的一切制度以换取对条约缔约者双方有约束力的协定规定的一笔金额，这样他不可能承认储君亲王的权利。——德文本注

子把这封信给我送来。信送来了，我把它随信附上。这封信除了在信的末尾问我能否给予极为令人尊敬的萨姆韦尔某种希望外，没有什么迷惑人的内容。也许您在明天能够准备好回信，以便使我能够把它送给极为令人尊敬的萨姆韦尔。即使我愿意化名在我儿子那里见他，我也不能给予他任何其他希望，除了将来（应为：已经）在协议中[67]规定的希望以外，即希望在胜利之后将能看到，应当给未来奠定什么样的新基础，以及关于继承问题必须等待美因河上的法兰克福作出决议。

威

又1月18日国王的信中说：　22

我告诉您，我终究还是拿定主意在我儿子那里和萨姆韦尔会见了六到十分钟，我儿子也在场。我和他谈话时完全本着已拟就的答案的精神，不过更为冷淡和非常严肃而已。首先我向他明确地指出，亲王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也不应该侵犯什列斯维希。详情面谈。

威

在1864年2月26日的备忘录中王储说明了普鲁士以事实为根据的下列要求：伦茨堡应成为邦联的堡垒[68]，基尔港应成为普鲁士的海军基地，应参加关税同盟[69]，在两海之间应开凿运河，还应有与普鲁士的军事协定和海军协定。他希望亲王将会热心赞同。

1864 年 5 月 28 日普鲁士的全权代表在伦敦会议上声明德意志各邦都要求把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变为由奥古斯滕堡储君亲王行使主权的独立国家以后，我于 1864 年 6 月 1 日与奥古斯滕堡亲王在我家里举行了会谈，从晚上九点一直继续到十二点，以便确定我能否向国王建议支持他当候选人。会谈主要围绕着 2 月 26 日备忘录中由王储拟定的几点进行。国王陛下期望储君亲王乐于同意这些要求，对此我没有得到证实。奥古斯滕堡亲王声明的实质已由济贝尔根据文件[70]加以阐述。他特别激烈地反对让出领土来修筑防御工事。他认为，这只要一平方英里就足够了。我只能得出结论：我们的要求已遭拒绝，进一步谈判徒劳无益。亲王在分别时说："可能我们还会见面的"，就似乎暗示了这一点。——不是以两年后黑森的弗里德里希亲王说同样这句话时的那种威胁口吻，而是流露了他的犹豫不决。我再一次看到储君亲王是在色当战役[71]结束后的第二天，他身穿巴伐利亚将军制服。

与丹麦的和约于 1864 年 10 月 30 日签订之后，定出了若干条款，依据这些条款我们认为建立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这个新邦国不会威胁普鲁士和德意志的利益。1865 年 2 月 22 日将这些条款通知了维也纳。它们和王储建议的条款是一致的。

23

（五）

经过长时期的犹豫，我要求批准的计划之一，即：从北海到波罗的海的运河[72]现在[73]正在实现。为了那时候只有在普鲁士的名义下才能发展的德意志海军力量的利益，我，其实不止我一个人，重视开凿这条运河和占有、巩固它的两个出海口。通过横穿

隔开两海的地段，以集中海上的战斗力的可能性这一要求（由于1848年的几乎近于病态的海军狂热的作用）还很为强烈，但是当我们获得自由支配这块领土时，这种要求暂时缓和了一点。我力图重新唤起对这件事的兴趣，却遭到了国防委员会的反对。国防委员会的主席是王储，而实际领导人则是毛奇伯爵[74]。他以国会成员的资格于1873年6月23日宣称，运河只能在夏季使用，其军事价值令人怀疑；宁可用开凿运河所需的四千万至五千万塔勒建设第二支舰队。用来反对我争取国王作出决定的理由之所以起了作用，与其说是在于它的物质的内容，还不如说是因为军界在国王陛下面前享有的那种巨大威信。这些理由的主要论点可以归结为：像开凿运河这样花费浩大的工程，为了在战争时期加以保护，需要我们抽调很大数量的军队，这就不可能无损于军队。一旦丹麦加入敌国的登陆部队，我们就不得不装备有六万人之众的部队来保卫运河。对此我表示异议。我指出，即使没有运河，我们也必需保卫基尔港及其设施，保卫汉堡，保卫从汉堡至柏林的通道。在其他纷繁事务的重压之下，还由于七十年代我在各方面不得不进行的斗争，我不能花费时间和精力去克服那些被提到的官厅在皇帝面前进行的反抗。事情只好束之高阁。我把这一障碍更多地归咎于军方的妒忌。我在1866年、1870年[75]以及以后的几年不得不与他们作斗争，这比任何其他斗争都更使我忧虑苦恼。

为了争取皇帝赞同，我放在第一位的不是贸易政策方面的利益，而是他比较容易理解的军事方面的考虑。荷兰海军具有的有利条件就是甚至它最大的舰船都能在分布于内地的运河中通 24
行。对于我们来说，在运河交通方面的类似需要更为迫切，这是由于丹麦半岛的存在和我们的海军舰只分散在彼此隔绝的两个海

的缘故。如果我们的全部海军有可能从基尔港、易北河河口，或是在运河延长的情况下从亚德湾出击，而又使封锁我们海岸的敌人不能预先得知情况，那么敌人就不得不在两个海的每一个海上都设置和我们全部海军相等的分舰队。根据这些理由和其他理由，我认为为了保卫我们的海岸，开凿运河比把开凿运河的经费用于修建防御工事和增加舰只更为有益，因为我们没有无限的资源来用于配备官兵。我曾力图使运河由易北河下游向西延伸，直到使威悉河河口、亚德湾、如有可能还有埃姆斯河河口，都能成为出击的门户，使封锁我们的敌人被迫要对它们加以注意。运河向西延伸，较之穿越霍尔施坦山脊花费要少，因为那儿线路平坦，而且还可以绕过位于威悉河与易北河河口之间的地岬附近的高原沙地[76]。

考虑到预料中的法国的封锁的威胁，到目前为止对我们有利的是英国的中立掩护着赫尔果兰岛。法国的分舰队在那儿不可能有煤站，而是为了满足煤的需要，它或者不得不在一定的不大长的时间内返回法国港口，或者是让大量的运输船只来往行驶。如果我们想要阻止法国人于战时在这个岛上站稳脚跟，那么我们现在[77]就要用自己的力量保卫这块岩礁。

是什么理由在1885年左右使国防委员会的反对有所缓和，我还不清楚；也许毛奇伯爵这时确信，他从前一心向往的德—丹联盟是不能实现的。

第二十章　尼科尔斯堡

33

(一)

1866 年 6 月 30 日晚，国王陛下同大本营[1]一起驾临赖兴贝格[2]。这个拥有两万八千居民的城市收容了一千八百名奥地利俘虏，然而守卫这个城市的却只有五百名用老式骑枪武装起来的普鲁士勤务兵。在离城仅仅几英里的地方，驻扎着萨克森人的骑兵队。一夜之间他们就可以到达赖兴贝格，捕获连同国王在内的大本营的全体人员。关于我们驻屯在赖兴贝格的消息，因为公布了电报而已尽人皆知。我奏请国王对此予以注意，随即命令这些勤务兵一个一个地、隐蔽地进入国王驻跸的王宫。军人们对我的这一干预很敏感。为了向他们表明，我关心的不是我的安全，我便离开国王陛下命我前去的王宫，而移居城中。此事便埋下了军人们对我不满的种子，这种不满出于职责范围的嫉妒心，并与我个人在国王驾前的地位有关；这种不满在出征期间和在对法战争期间有增无已。

凯尼希格勒茨战役[3]之后的形势是：接受奥地利首次提出和平谈判的试探不仅是可能的，而且由于法国的干预看来是势在必行

的。法国的干预始见于7月4日夜发往霍日茨（Horricz）*[4]致国王陛下的一封电报，路易·拿破仑在电文中告知国王，弗朗茨·约瑟夫皇帝已将威尼斯[5]割让给他，并请他从中调解。国王的武器所取得的辉煌胜利迫使拿破仑改变了他的迄今为止的观望态度。我们的胜利招来了干预，在此之前拿破仑一直在期待我们的
34 失败和求援。就我们方面而言，如果通过冯·埃策尔将军的配合和通过借助于未受损伤的骑兵猛打溃逃的敌军来充分利用凯尼希格勒茨战役的胜利，那么在我们方面和国王当时都主张对和平条件持节制态度的情况下，派到普鲁士大本营的加布伦茨将军[6]也许不仅会促成停战协定，而且会促成未来和约的基础达成协议。这种节制态度当时毕竟要求从奥地利谋取多于可用的东西，又想使所有迄今的邦联成员国在受到损失和缩小的情况下，仍然作我们未来的盟友[7]。按照我的建议，国王陛下对拿破仑皇帝的回答是拖延的，但还是拒绝任何没有和平保障的停战。

后来，我在尼科尔斯堡[8]曾问冯·毛奇将军，一旦法国进行军事入侵，他有何对策。他的回答是：在易北河一线对奥地利采取防御态势，同时进行对法战争。

这种专家意见更加促使我下决心建议国王陛下在保障奥地利领土完整的基础上缔结和约。我的主张是：一旦法国进行入侵，我们必须或者在适当的条件下立即同奥地利缔结和约，若有可能就结成联盟，以进攻法国；或者对奥地利采取快速攻势，同时激发匈牙利境内甚至波希米亚境内的冲突[9]，以使奥地利完全瘫痪，直至这时我们应对法国（而不是如毛奇所说那样对奥地利）采取

---

* 总参谋部是这样写的，读作霍日茨（Horsitz）。

防御态势。我确信：如毛奇所说，他想要首先和迅速进行的对法战争并非那么容易；虽然法国的进攻力量不强，但历史经验证明，它在本国国土进行防御时却能很快组织足够力量使战事延长，以至如果我们进入法国领土作战而背后又与奥地利和南德相敌对，那么我们或许在易北河一线就不能胜利地抵御奥地利。这种前景迫使我力争签订和约。

如果法国参战，当时大约只有六万甚至为数更少的法国士兵能够迅速投入德国领土上的战斗。可是对于南德意志的邦联军队的这一补充，却足以建立起可能是在法国最高司令领导下的统一 35
的、强有力的领导。停战时单单巴伐利亚军队已达十万之众，加上其他可调动的德意志军队[10]（本身都是素质良好的勇敢士兵），以及六万法国人，共计二十万人，会一扫往日怯懦而分裂的指挥作风，在法国统一和坚强的指挥下，从西南方向一齐进攻我们。如果不削弱面对维也纳的兵力，我们便不能以相当的兵力从柏林方向与这一支军队对垒。美因茨已被巴伐利亚将军莱希贝格伯爵指挥下的邦联军队占领；如果法国人已到那里，那么要再把他们赶走，是要付出艰巨斗争的代价的。

在法国干预的压力下，当时还不能忽视能否在外交领域来抵抗这种干预，于是我便决定建议国王向匈牙利的民族性呼吁。如上所说，如果拿破仑参战，而俄国的立场仍然暧昧，特别是如果霍乱病在我们军队中继续蔓延，那么我们的处境就会变得非常困难，以至我们将不得不拿起不仅在德国境内、而且在匈牙利和波希米亚境内开展民族运动这种所能提供的任何武器，以免遭到失败。

（二）

7月12日在黑山行军宿营地召开了军事会议，或如军人们所喜欢称呼的将军报告会。为简洁易懂起见，我使用罗昂* 也用的前一种说法，虽然毛奇元帅在1881年3月9日转给特赖奇克教授的一篇文章中曾指出，在两次战争中从未召开过军事会议。1866年我总是尽可能应召出席国王主持下举行的这些会议。它起初是定期举行的，后来则间隔时间较长。那一天讨论了继续向维也纳进军的路线问题，我迟到了一会儿，国王详细说明，现在涉及的
36 问题是要攻占佛罗里特斯多夫战线[11]的工事，以便向维也纳逼近。根据这些工事的情况，必须把重炮从马格德堡** 运来，而这需要两周的运输时间。缺口突破之后，就要强攻占领这些工事，而且预计要伤亡约两千人。国王询问我对这个问题的意见。我的第一个想法是，为了免于更为接近无疑存在的至少是法国的干预的危险***，我们不能失去两周的时间。我表示了我的忧虑，我说："为了不使法国的仲裁获得危险的优势，我们不能观望等待而失去两周的时间。"我提出一个问题：是否必须突击佛罗里达斯多夫的工事，我们能否绕道而行。左转25度可以取道普累斯堡[12]，从这里渡过多瑙河困难较少。在这种情况下，奥地利人或者可能在多瑙

---

* 见1871年2月7日致他的夫人的信（《言行录》，1⁴，297）。

** 总参谋部的报告书第484页在7月14日记载："发往德累斯顿的电报命令麦尔顿斯上校准备好运往那里的50门重炮（当然尚未运去），以便一俟接到有关命令，就能立即将这些重炮沿铁路线运走。伦登堡一带的铁路已被破坏，因此责成冯·兴德尔辛将军于上述地点准备全部运输工具"。

*** 这一形势类似1870年巴黎城下的情景。

河以南对他们不利的东方战线作战，或者可能预先就退到匈牙利。然后维也纳便可不流血而夺取。国王要来了地图，发表了支持这项建议的意见。我感到，采纳这项建议颇为勉强，但还是实行了。

根据总参谋部报告书第522页记载，7月19日大本营才发出下面的命令：

> 国王陛下意欲将军队集结于罗斯巴赫背后的阵地……在此阵地上军队首先应当能够迎击可能来自佛罗里达斯多夫的约十五万之众的敌人的进攻，然后军队应当从此阵地上或者侦察和进攻佛罗里达斯多夫的工事，或者尽速向普累斯堡方向进军，而留下一个军团监视维也纳……两支军队应朝沃尔克斯多夫和德意志—瓦格拉姆方向的罗斯巴赫派出先遣队和侦察部队。同时随着这一向前推进，应力图以迅速袭击的办法占领普累斯堡，并确保必要时能从那里渡过多瑙河。

在我看来，最重要的是在我们和奥地利今后的关系中，只要 37
无损于我们的德意志政策，就尽可能防止给奥地利造成备感受辱的回忆。普鲁士军队胜利地进入敌国首都，这当然会给我们的将士留下令人愉快的回忆；但从我们的政策来看这并无必要；这就像把任何一块历来属于奥地利的领土割给我们一样使奥地利的自尊心蒙受损伤，这对我们并非绝对需要，而只会给我们以后的相互关系增添困难。那时我已经确信无疑，这次战争所获得的成果必须用此后的战争来加以捍卫，就像弗里德里希大帝在更为激烈

的七年战争的烽火中捍卫头两次西里西亚战争所获得的战果一样[13]。按照历史发展的结果，在对奥地利战争之后，接踵而来的必然是对法国的战争。即使我们因拿破仑皇帝的中立而允诺给他所企望得到的一笔不大的补偿[14]，也是如此。至于俄国，一旦明了德意志民族的发展将使我们的力量怎样增长时，它会作出什么样的反应，尚难断言。今后捍卫既得成果的战争将如何发生，也无法预见。但是无论如何，至为重要的是：我们是否给对方留下了无法和解的情绪，是否给他们的自尊心带来了无法医治的创伤。这种考虑就是我宁可避免而不实行拿破仑式凯旋进入维也纳[15]这一政策的依据。在我们当时所处的情况下，胜利后不提出能从敌人身上索取多少东西，而只追求政治上所需要的东西，这从政治上看是恰当的。我认为，军界对我的态度的不满乃是军人的本位主义政策的表现，我不能允许它对国家政策及其未来的发展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三）

当关键问题在于对拿破仑7月4日的电报表态时，国王便拟定了一份和约条件：在普鲁士领导下改革邦联；获得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奥地利的西里西亚、波希米亚边境地区、佛里斯兰东部；同我们敌对的汉诺威、库尔黑森、迈宁根和拿骚的君王需由其继承人取代[16]。不久又产生了其他的愿望，一部分出自国
38 王本人，一部分来源于别人的影响。国王想要吞并萨克森、汉诺威及黑森的部分领土，尤其是想把安斯巴赫和拜罗伊特[17]重新收归自己家族。收复法兰克尼亚各诸侯国领地同国王强烈的、合理的

家族情感是合拍的。

我记得在三十年代我参加的最初的一次宫廷庆宴、即在他还是威廉亲王时的寓所举行的化妆舞会上，我看见他身穿弗里德里希一世选帝侯的服装。选择这种式样与众不同的服装是为了表现家族的情感和出身，而且也许很少有人穿上这种衣服能比当时年约三十七岁的威廉亲王更显得自然和合适，他身着这种服式时的容貌始终留在我的脑海之中。在弗里德里希三世皇帝身上，那种强烈的王朝家族情感的印记表现得似乎更为明显，但是，毫无疑问，国王在1866年放弃安斯巴赫和拜罗伊特比放弃奥地利的西里西亚、德意志的波希米亚和萨克森的部分领土更为困难。我衡量从奥地利和巴伐利亚获取领土一事的标准，是在发生战争及普鲁士官厅和军队撤走时，当地居民是否仍然忠于普鲁士国王，是否会服从他的命令。我获得的印象是，这些地方的居民已经习惯于巴伐利亚和奥地利的生活环境，在思想意识上不会迎合霍亨索伦家族的志向。

纽伦堡以南和以东的勃兰登堡边疆诸侯的古代部族领地，即使连同首府纽伦堡成为普鲁士的一个省，在发生战争时也未必能够成为不动用军队、只靠居民对王朝的忠诚来保护的普鲁士的一部分领土。在这一地区处于普鲁士统治的短暂时期内，尽管哈尔登贝格治理有方[18]，这种忠诚却没有深深扎根，后来在巴伐利亚时代已被遗忘殆尽，以致不能通过宗教生活中偶尔发生、瞬息即逝的那些事件在人们心目中唤起这种忠诚。即使巴伐利亚的新教徒们的感情有时受了损伤，那么由此而激起的愤懑情绪从来没有以怀念普鲁士的形式表现出来。此外，即使在这种限制之后，从阿尔卑斯山到上普法尔茨的巴伐利亚部族，由于王国的支离破碎而

甚感痛苦，总是不得不把他们视作一种难以和解的、其固有力量
39 对未来统一构成危险的因素。然而，在尼科尔斯堡我未能使国王接受我的关于应该缔结和约的见解。因此我不得不让在7月24日到达那里的冯·德尔·普福尔滕先生空手而回，并满足于批评他在战争前夕的态度。他不敢完全放弃奥地利的支持，虽然只要可能没有风险他也乐于摆脱维也纳的影响；但这位正直的、知识渊博的、而政治上不熟练的德国教授[19]没有莱茵联邦[20]的薄弱意志，也不缅怀在1806至1814年间受法国保护的各德意志小邦所处的地位。

像对于法兰克尼亚各诸侯国那样，我对于奥地利的西里西亚也向国王提出了同样的考虑（西里西亚是那些最忠于皇帝的省份之一，而且这个省的绝大部分居民是斯拉夫人）。按照弗里德里希·卡尔亲王[21]的恳求，国王希望保留波希米亚的地区——赖兴贝格、埃格尔塔尔、卡尔斯巴德，作为萨克森山麓前的屏障。我对此也提出了同样的考虑。过了一些时候，卡罗利伊[22]断然拒绝在领土问题上作任何割让，甚至对我向他提到的面积虽小然而为了我们的铁路方面的利益应加占有的布劳瑙[23]地区作出领土上的转让，他也加以拒绝。只要坚持下去会拖延和约的签订和加剧法国干预的危险，我就宁可连这要求也放弃。

国王希望保持西萨克森、莱比锡、茨维考和海姆尼茨以便同拜罗伊特建立联系，这种愿望与卡罗利伊的声明发生了冲突。卡罗利伊的声明说，他必须坚持萨克森的领土完整作为和约条件中的完全必要的条款。在对待同盟者当中的这种区别，原因就在于与萨克森国王的私人关系以及萨克森军队在凯尼希格勒茨战役之后的行动，这支军队在撤退时组成了一个最坚定的、最有战斗力

的作战单位。其他的德意志军队虽然勇敢地参加了战斗，但因为他们投入战斗较晚，因而事实上没有取得战果，因此，在维也纳盛行一种无根据的看法，同盟者例如巴伐利亚和符腾堡没有给予充分的支持。

总参谋部报告书中在6月21日载：

> 会谈已在尼科尔斯堡进行多日，其直接目的乃是签订为期五天的停战协定。首先应当为外交活动赢得时间*。目前普鲁士军队已进入马赫菲尔特[24]，一场新的灾难即将来临。

40

我曾问毛奇，他是否认为我们在普累斯堡所采取的行动是危险的，还是不必担忧的。迄今为止，我们的声誉未曾受到玷污。如果可以有把握地指望一种有利的结局，那么我们就应当进行这次战役，并让停战晚半天开始；胜利自然会加强我们在谈判中的地位。否则还是放弃这一行动为好。他回答说，他认为结局是可疑的，这一行动是冒险，但是在战争中一切都是危险的。这一意见就使我不得不向国王陛下建议商讨停战：应于22日，星期日中午停止敌对行动，至27日午前不得恢复。冯·弗兰泽茨基将军于22日晨7时半接到当日停战的消息，并受命采取相应的行动。因而由他指挥的布卢美瑙[25]近郊的会战应于12点中止。

---

* 但是，面临法国的干预，外交活动比起军事指挥来更应珍惜时间。

（四）

与此同时，我同卡罗利伊和贝内代蒂在会议中研究商谈实现和平的条件。由于我们的军事警察在部队移动时的迟钝，贝内代蒂竟得以在7月11日夜来到茨维陶[26]，并突然出现在我的卧榻之前。贝内代蒂声明主张拿破仑政策的基本路线[27]，即以保持美因河一线为南部边境线作为前提，普鲁士最多只增加北德意志的四百万人，这将不会招致法国的干预。毫无疑问，他希望成立南德意志联邦，以作为法国的附庸。奥地利退出了德意志邦联，准备在保证萨克森领土完整的条件下，承认国王在北德意志采取的一切措施。这些条件包括了我们所想要的一切，即在德国的行动自由。

根据上述一切考虑，我毅然决定把接受奥地利建议的和约变为内阁的重大问题。处境是困难的；所有的将军都不愿意中断我
41 们一直进行着的胜利进军，而在那些日子里，相比之下，国王往往更乐意接受军人们的影响，而不是接受我的影响。我是在大本营里唯一负有政治责任的大臣，我必须对形势形成一种意见和作出决定，而且对于事后的结果我不能把责任推诿于不管是内阁集体的决议抑或是上级的命令。未来的状况会是怎样，受未来的状况左右的世间的评论又将是如何，我和任何他人一样，无法预料。但是，在所有在场人士之中只有我依法有责任提出、阐述和坚持自己的主张[28]。我的这种主张是经过对我们在德国当中的未来地位以及我们同奥地利的关系的周密思考之后才形成的，所以我准备对此负责，并准备在国王面前坚持这一主张。我知道在总

参谋部里人们称我为“兵营里的奎士登贝格[29]”，把我比之为华伦斯坦的宫廷军事顾问，这种谀词并未使我感到宽慰。

7月23日在国王主持下召开了军事会议，会上应当作出决定：是否根据已提出的条件缔结和约抑或把战争继续下去。由于我身患病痛，因而这次会议只得在我的房间里进行。当时我是唯一穿军服的文职官员。我阐述了自己的主张，即必须依照奥地利提出的条件缔结和约。但是国王赞同占大多数的军人的意见，而使我陷于孤立境地。我的神经忍受不了日夜煎熬着我的那种印象，我默默地站了起来，走进了隔壁的我的卧室，在那里我不禁抽搐地恸哭起来。这时，我听见隔壁房里的军事会议散了。于是我便着手书面陈述我认为有利于缔结和约的一些论据并请求国王说，如果他不愿意听取我认真负责地提出的建议，要继续战争，那么就解除我的大臣职务。第二天，我便带着这一文件[30]去做口头陈述。在接待厅我遇见了两位陆军上校，他们是来报告军队中霍乱蔓延情况的，在他们的将士中能够服役的几乎不到半数*。这些可怕的数字使我决意要把同意奥地利的条件变为重大的内阁问题。除了政治方面的忧虑之外，我还担心，如果战场转入匈牙利，就我所了解的这个国 42
家的情况来看，疾病很快就会变得不可收拾。那里的气候，特别是在八月份，真是可怕，缺水问题极为严重，占数平方英里耕地的那些村庄相距很远，而且盛产李子和香瓜。我联想到，1792年我们在香槟的征战就是前车之鉴，那时迫使我们撤退[31]的不是法国人，而是痢疾。

---

* 在出征过程中死于瘟疫的有6427人。(如与战场上的伤亡人数相比，这个数字在当时是有重大分量的，因为那时阵亡人数才只有4450人。参看冯·莱托夫·弗尔贝克的《1866年战争史》第2卷第685页。)

我借助于我的文件，向国王阐述了我反对继续战争的政治上和军事上的理由。

我们应当避免使奥地利遭受严重创伤，避免不必要地给它留下长期的痛苦，致使其切望复仇。更好的办法是，我们必须保留与我们今天的敌人重新友好的可能性，无论如何要把奥地利这个国家看作是欧洲棋盘上的一个子，而同它恢复良好关系就是我们应该公开拿在手中的一着先手棋。假如奥地利遭受严重损失，那么它可能成为法国和我们任何一个敌国的盟友，而为了向普鲁士复仇它甚至会不惜牺牲自己的反俄利益[32]。

另一方面，如果奥地利君主国为匈牙利人和斯拉夫人的起义所破坏，或者它长期陷于依附地位，那么我就不能想像组成奥地利君主国的那些领土的能为我们所接受的将来[33]状况。用什么来填补奥地利君主国至今占有的从蒂罗尔到布科维纳的欧洲这一广大地区呢？在这个地区的新结构，就其本质来说，在一个长期内也许只能是革命的。德意志—奥地利，无论作为整体或是部分，我们都不需要。我们不可能通过获得像奥地利的西里西亚那样的省份或几块波希米亚土地来加强普鲁士国家，因而，奥地利的德意志部分不可能同普鲁士合并，柏林不可能像操纵自己的附庸一样地操纵维也纳。

如果战争继续下去，那么匈牙利就有可能变为战场。如果我们在普累斯堡渡过多瑙河，奥地利的军队就守不住维也纳，但它也很难向南退却，因为在那里它会处于普鲁士军队和意大利军队之间，而且奥军只要向意大利接近，就会激起意大利人已经消沉的、被路易·拿破仑压抑下去的斗志。奥军会向东退却，并在匈
43 牙利境内继续抵抗，即使仅仅把希望寄托于预料中的法国的干预

和通过法国促使意大利平静下来。此外根据我对匈牙利的了解，就单纯军事观点来看，我也认为在那里继续作战是徒劳无益的事，我们在那里所能获得的成就与先前取得的胜利不能相比，因而降低我们的威望——姑且完全不论拖延战争会为法国的干预打开道路。我们应当在法国赢得时间进一步对奥地利开展外交活动之前，尽快缔结和约。

国王没有对这一切提出异议，但他对提出的条件[34]表示不能令人满意，却又不明确说出自己的要求。只有一点是清楚的，即从7月4日起他的要求提高了。他说，主犯如若得不到惩罚，那么我们便可以宽恕所有的从犯了。他坚持要奥地利割让上述领土。我回答说：我们应当履行的不是法官的职责，而是执行德国的政策；奥地利反对我们的斗争，并不比我们反对奥地利的斗争更应受到惩罚；我们的任务是创造在普鲁士国王领导下的德意志民族的统一或者为之开辟道路。

在谈到德意志各邦时，国王谈了通过蚕食敌国领地而获得领土的各种情况。我重申了我的意见：我们不应从事报复性的制裁，而应执行政策；我希望在未来的德意志的邦联关系方面避免出现那种被割裂的诸侯领地，这些领地的王朝和居民由于人类的弱点容易唤起靠外来的帮助收回原来是他们的属地的愿望。这些同盟者是不可靠的。如果因为想补偿萨克森而要求巴伐利亚割让如符腾堡或者纽伦堡的地方，那么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此外这是一种同国王陛下对安斯巴赫的王朝方面的偏爱相抵触的计划。同样，我还必须反对旨在扩大巴登大公国、吞并巴伐利亚的普法尔茨以及在美因河下游地区进行扩张的计划。同时把巴伐利亚的阿沙芬堡地区视作适合于对黑森·达姆施塔特因确立美因河

为界而损失了上黑森的一种补偿。后来在柏林只谈判了所有这些计划中关于把美因河右岸的巴伐利亚领地（包括拜罗伊特城）移交普鲁士这项要求，于是产生了一个要讨论的问题，即边界线是北面的红美因河，还是南面的白美因河。在我看来，军人方面滋
44 长的不愿中止胜利进军的情绪在国王陛下身上已占优势。根据我的见解，我必须抵制国王陛下主张利用军事上的胜利和要继续胜利进军的意图，这使国王异常激动，致使我们之间的谈话不可能再继续下去。我的印象是我的解释已被拒绝，于是我走出房间，打算恳求国王允许我作为一个军官回我的团队去。我回到自己的房间时情绪极坏，一个念头油然而生，觉得不如从四层楼打开的窗口跳下去。我听到有人开门，我也没有转过身去，虽然我猜测是王储进来了，我通过走廊时从他的房门口经过。我觉得他把手放在我的肩膀上，并且说："你知道，我曾经是反对战争的，您则认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并要为此承担责任。如果您现在确信目的已经达到，现在应当缔结和约，那么我愿助您一臂之力，在我的父亲面前支持您的意见。"随后他去见国王，约摸半小时后他回来了，依然是那样平静和友好，但他说："事情好不容易，我的父亲总算是同意了。"他表示同意的话可见于我最近递交的一份呈文上的页边空白处用铅笔所作的眉批中，其内容大概如下："在我的首相在敌人面前弃我不顾而我又不能替代他之后，我便同我的儿子讨论了这个问题，因为我的儿子附和首相的意见，所以我不得不痛苦地在我军取得如此辉煌胜利之后去尝苦果，接受如此可耻的和约。"——虽然现在我没有这个文件，我相信我是准确地复述了原文的；其意思无论如何与上面陈述相符，尽管措词生硬，但这意味着使我愉快地摆脱了难以忍受的紧张状态。国王同意承认

这样做在政治上是必要的，对国王的这种赞同态度我感到很满意，而不介意他表示同意的那种不亲切的方式。那时，国王的思想中军事上的印象占据优势，使迄今已取得的如此辉煌胜利的进军继续下去的要求，也许胜过了政治上与外交上的考虑。

既然我必须继续履行我的职责，于是为了得到我认为为维护祖国利益所必须的一切，我就不得不惹得我的年迈的君王内心十 45
分激动，而王储转交给我的上述国王亲笔批注，是给我留下的对国王这种激动的回忆的唯一见证。甚至现在，这件事以及其他类似的往事给我留下的无非是使我痛楚地回忆起我不得已才使我所爱戴的像他那样的君王伤心不已的印象。

(五)

同奥地利签订临时协定之后①，符腾堡、巴登和达姆斯塔特的全权代表来了。我最初拒绝接见符腾堡的大臣冯·万布勒，因为他比普福尔滕更使我们感到恼火。在政治上他比普福尔滕更圆滑，但是他很少思索德意志民族事业。战争爆发时他的心情表现在“Vae victis!”（“战败者该死!”）[35]一语中。这种心情的产生是由于斯图加特[36]同法国的关系，特别是由于出身符腾堡公主[37]的荷兰王后的偏爱。

我在法兰克福[38]时，曾蒙王后关注，她鼓励我的抗奥政策。在其公使冯·舍尔夫家里，她对我故意惹人注目地待以优礼，而对待奥地利首席公使普罗克斯男爵的态度则几近失礼，并

① 7月26日签订临时协定，8月23日签订布拉格和约。——德文本注

以此来表示自己的反奥情绪，这正是路易·拿破仑希望与普鲁士结成同盟以反对奥地利并已策划意大利战争[39]的时候。究竟荷兰王后的政策当时仅仅是由对拿破仑法国的偏爱所决定的呢？还是仅仅出于参与一般政治活动的不平静的需要，因而在普奥争端中促使她采取明确立场，公然冷落我的奥地利同行，却予我以特别优待呢？对这一问题，姑且不做定论。无论如何，1866 年后我在最为激烈的政敌中遇到的是这位以往对我非常优遇的王后，这些政敌反对我遵循的预见到 1870 年的决裂的政策。1867 年在法国的一些官方声明中我们第一次被怀疑对荷兰抱有野心，比如鲁艾大臣[40]在反对梯也尔的演说中（1867 年 3 月 18 日）指出，法国不能容忍我们向须德海[41]推进。法国人未必能够独自发现须德海，而且如果没有别人的帮助，法国报刊也未必能够正确地拼写出这个
46 地名来；倒是可以猜想，有关这一水域的想法，是由荷兰根据法国的怀疑而提出来的。连德鲁安·德·路易斯[42]先生的荷兰出身也不足以使我相信，他的同行如此精通法国境外的地理。

我认为符腾堡的政策属于莱茵联邦的范畴，因而起先决定不在尼科尔斯堡接见冯·万布勒先生。经我们的近卫军团司令官的兄弟、符腾堡的弗里德里希亲王和对我们怀有特别好意的女大公爵海伦娜的斡旋而举行的会谈，也未取得政治上的成果。只是后来在柏林我才同冯·万布勒进行了谈判。他对任何一种形势造成的种种政治影响甚为敏感，这使他成为我有可能与之签订联盟条约的第一位南德意志的大臣，而条约的性质早已众所周知。①

① 1866 年 8 月 13 日签订了与符腾堡的联盟条约，8 月 17 日签订了与巴登的条约，8 月 22 日签订了与巴伐利亚的条约。——德文本注

第二十一章　北德意志联邦

50

(一)

在柏林我表面忙于处理普鲁士同新合并来的各省[1] 以及同其他北德意志各邦的关系，内里我忙于分析各大国的情绪，估量它们可能采取的立场。对我和或许对任何人来说，我们国内的形势具有过渡的和未成熟的性质。普鲁士的扩大和即将进行的有关北德意志联邦[2] 及其宪法的谈判所产生的影响导致我们国内形势的发展颇不稳定，正如由于战争中止后欧洲的局势使我们同德意志的和非德意志的外邦的关系出现过不稳定的状态一样。我深信，在我们民族的进一步发展——无论是增强内部抑或是向美因河彼岸扩展——的道路上，都不可避免地不得不要同法国打仗，因此我们在对内政策和对外政策中无论如何也应看到这种可能性。路易·拿破仑不仅不把普鲁士在北德意志的某些扩张看作是对法国的危险，而且看作是反对德国统一和民族发展的手段；他认为，德国的非普鲁士的部分到时候会更为强烈地感到需要法国的保护。他怀有莱茵联邦的旧梦，想阻止德国朝着完整统一的方向发展。他相信他能够办到，因为他不了解当时的民族情绪，而他判断形势的依据则是他自己在南德意志上学时的回忆[3] 以及仅仅以

内阁大臣们的和分散的王室的意向为基础的外交情报。我相信，这种意向的力量会消失。我认为：一个完整的德国只是时间问
51 题，而北德意志联邦只是解决这一问题的第一阶段；但是，不允许过早地向法国可能还有俄国的敌视态度、奥地利对1866年的复仇要求以及国王的普鲁士王朝分立主义挑战。我毫不怀疑在德国的统一机构建立之前，将不得不进行一场德—法战争。我当时的想法是：要把这场战争推迟到普鲁士兵役制[4]不仅在汉诺威、黑森、霍尔施坦得到实施，而且如我当时在同南德意志各邦建立联系[5]之后所希望的那样在这些邦也都得到实施，使我军得到增强的时候。考虑到法国人在克里木战争[6]中和在意大利[7]的成功，我过高估计了同法国交战的危险。我曾对法国能够达到的军队的数量，指挥军队的制度、组织和熟练都设想得要比1870年所证实的要高明。法国老兵的勇敢精神、高涨的民族感情和受损害的虚荣心的增强已充分显示出来，就同我对于德国入侵法国时所作过的估计一样，这时我回忆起1814年和1792年事件[8]以及上世纪初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9]时外国军队入侵时所引起的总是如汤浇蚁穴般的现象。我从来没有把同法国交战看得轻而易举，姑且完全不顾法国能找到复仇心切的奥地利和要求势力均衡的俄国做盟友。我要把这场战争推迟到我们的兵役制和军训制度推行于国内所有非老普鲁士地区[10]之时的打算，显然是理所当然的，而这个目的在发生卢森堡问题[11]的1867年并没有接近于达到。战争每推迟一年，我们的军队就增加十多万名训练有素的士兵[12]。面对国王在豁免责任法[13]问题上和在普鲁士邦议会中的宪法问题上，我处于一种压力之下，即需要向外国表明全民族是同心同德的，我们不存在也不面临由内部形势造成什么困境；当无法预料在法国反对

我们的战争中谁会是它的盟友时，尤其需要这样。1866 年之后不久法国同奥地利在萨尔茨堡[14]和其他地方的谈判与接近的尝试，在冯·博伊斯特领导下可能是富于成效的，委任这位心怀不满的萨克森大臣来领导维也纳的政策[15]一事本身就足以说明，奥地利的政策会走上复仇的道路。

52

1866 年我们既然都已目睹意大利对拿破仑处处顺从，所以只要法国的压力仍然存在，意大利的态度就难以忖度。1866 年春，我和果沃内将军在柏林举行了会谈[16]。当时我表示希望，请他询问他的政府，我们是否可以指望意大利会不顾拿破仑的不满而信守条约。果沃内闻后惶恐不已。他说，这一询问要在当天电告巴黎并请求指示“应如何答复?”根据意大利在战争期间的态度，我不能把意大利的舆论算作可靠支柱，这不仅由于维克多·艾曼努尔对路易·拿破仑的私人友谊，而且由于按加里波第以意大利社会舆论名义宣布的同情态度。不仅我担心，而且欧洲舆论也认为，意大利同法国和奥地利结成联盟[17]也非绝无可能。

面对这样一种联盟很难期待得到俄国的积极支持。在克里木战争期间，我得以促成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18]做出对俄国显示友好的决定，这博得了亚历山大皇帝对我的赞赏，而且他对我的信任在我做驻彼得堡公使[19]时更进一步增长。但是皇帝对威廉国王的友好情谊，以及 1863 年[20]波兰问题上对我国政策的感激之情所起的作用，已开始被那时在哥尔查科夫领导下的内阁中产生的怀疑普鲁士日益强大对俄国会有什么好处所冲消。如果德鲁安·德·路易斯给菲兹图姆·冯·埃克施泰特伯爵* 的通报属实，那

---

* 《伦敦、加施泰因和萨多瓦》，斯图加特，1890，第 248 页。

就是说哥尔查科夫在1866年7月曾请求拿破仑皇帝共同抗议反对废除德意志邦联，但是遭到了拒绝。虽然亚历山大皇帝最初感到惊异，可是在曼托伊费尔[21]奉命去彼得堡之后，却又全部地并不问详情地赞同了尼科尔斯堡初步协议的条件。从克里木战争以来主宰俄国“社会”的舆论的对奥地利的仇恨，由于奥地利的失败而得到满足；但是这种情绪和俄国的利益是矛盾的，因为俄国的利益和沙皇在德国的影响有关系，也和法国对德国的威胁有关系。

诚然，我认为，在对付法国为反对我们而可能结成的联盟的
53 斗争中，我们可望得到俄国的支持，但是只有在我们不幸遭到失败时才有这种可能，因为由于这种失败才会接近现实地出现一个问题，即：俄国能否容忍得胜的法奥联盟在自己的波兰边境上与自己为邻。假如不是同梵蒂冈敌对的意大利王国[22]而是同罗马教廷本身这个与两个天主教大国联盟的第三成员国成为邻国，这样的邻国造成的不便要更为严重。然而，在由于普鲁士的失败造成的这种危险来临之前，我认为情况很可能是：假如数量上占优势的联盟给我们1866年的酒掺进一些水去，那么俄国不一定不欣然作壁上观，至少也不会去阻拦。

我们不可以期望英国积极支持我们反对拿破仑皇帝，虽然英国的政策是需要一个兵力雄厚而又友好的大陆强国，在皮特父子执政时期这种需要有利于普鲁士，后来有利于奥地利[23]，在帕麦斯顿执政时期到西班牙两件婚事之前，而后又在克拉伦登执政时期有利于法国[24]。英国政策要求的或是和法国同心协力，或是有一个对抗心怀敌意的法国的强大盟友。英国会同意以一个更强大的德意志—普鲁士取代奥地利，而且在1866年秋那种形势下，我们完全可以指望英国柏拉图式的友好态度和训诫式的报纸文章；但

是英国这种理论上的同情很难凝聚成为海上和陆上的积极支持。1870年事件证明，我对英国的估计是正确的。在伦敦，他们不顾我们的不悦，热心于承担代表法国在北德意志的利益，而且在战时，他们又从未为了我国的利益而承担过危及他们同法国友谊的风险；情况恰恰相反。

(二)

事情主要受到外交政策方面的这些考虑的影响：我决定使国内每一步棋的安排都取决于我国力量的坚固是否由此得到增强还是削弱的印象。我自忖：我们当前的主要目标是在对外关系上的独立自主和安全可靠，为此目的不仅需要真正消除国内的分裂，而且必需在国内外避免造成任何分裂的迹象；如果我们只有不依赖外国才能在国内发展中自由行动，然后我们能够建立起自由的 54
或者反动的制度，就像它显得是公正的和合乎目的的那样；我们的全部内政问题，可以推迟到从外部得到实现民族目标的保证之时再去解决。如果我们首先对外获得了作为一个伟大民族独立生存的自由，我不怀疑有可能给予王权必要的力量来调整我们国内的时钟。在此之前，我准备根据需要来支付反对派的敲诈勒索，以便能够首先向天平秤盘上投入我们的全部力量和在外交上的这种统一力量的外表以及在必要时可以发动革命民族运动以反对我们的敌人的可能。

在邦议会的一次委员会会议上，看来掌握了极右派意图的进步党曾向我提出质询：政府是否准备在新省份实施普鲁士宪法。含糊其辞的回答可能会引起或复活各立宪政党的不信任。我

深信，一般就不该提出政府是否忠于宪法的怀疑来阻碍德国问题的发展。政府和反对派之间每个新的纷争都会增强由外国所期待的反对民族重新形成的外部反抗。我试图使反对派及其演说家们相信：目前他们应当把内部宪政问题推到第二位；德意志民族只有先联合起来，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调整自己的内部关系；我们目前的任务是为我们民族创造这种条件。但是，这些设想却因遇到了反对派演说家们的狭隘的、小城市的党派政策而归于失败。在他们挑起的辩论中，民族目标提得过分突出，这不仅是对外国而言，而且是对国王而言，当时国王关注普鲁士的强盛远远超过关注德意志的合乎宪法的统一。在这方面他并没有沽名钓誉的打算。还在1870年他就把皇帝称号轻蔑地称为“化了装的陆军少校”，对此我回答说，根据宪法，陛下已享有这一地位的一切权限，而且“皇帝”称号只具有向外界的批准权，在一定程度上好似授命指挥一个团的军官明确地被任命为指挥官一样。直接以普
55 鲁士世袭国王身份，而不是以选出的和通过宪法产生的皇帝身份行使权力，更能迎合王朝情感，就像指挥一个团的亲王不顾被称为上校先生、而愿意被称为亲王殿下，一个身为尉官的伯爵不愿被称为少尉先生、而愿意被称为伯爵先生一样。如果我想保持国王的信任，我就必须注意到他的这些特点，而没有国王及其信任，我的德国政策就根本行不通。

(三)

考虑到在反对外国的优势力量的斗争中，在极端紧急而不得已的场合下也可以采取革命手段的必要性，我已经在1866年6月

10 日的通电[25]中毫不犹豫地把自由派当时最大的权术——普选制扔到炒锅里，以打消君主制的外国伸手掠取我们民族的荷包蛋的企图。我从不怀疑，一旦德国人民看清现在的普选制是一种有害的制度，他们就会有足够的智慧和力量甩掉它。如果德国人民不能做到这点，那么我的一句老话：只有坐在鞍子上，才能学会骑马[26]，成了一种错误。采用普选制是反对奥地利和其他外国的斗争中的武器，是争取德国统一的斗争中武器，同时又是在反对联盟的斗争中采取最后手段的一种威胁。在这生死攸关的斗争中，无法细究使用的是什么武器，用来摧毁的是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唯一的顾问首先是斗争的成果，挽救对外的独立自主。在签订和约之后必须消除和弥补由此所造成的损失。此外，至今我还认为，只要废除秘密投票[27]，那么普选制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上都是公正的，特别是因为秘密投票就其性质而言是和日耳曼血统中的最优秀的特性相矛盾的。人的实际生活所带来的影响和依赖性，是上帝赐予的现实，我们不能也不应该置之不闻。如果人们不让它们转移到政治生活领域，并把相信每个人的神秘的理解力作为政治生活的基础，那么人们就会处于国法与人类生活现实之 56
间的矛盾之中。在实践上这种矛盾会导致常见的冲突，最终会导致爆炸；在理论上这种矛盾只有在社会民主党的狂妄行为的轨道上方可解决。狂妄之能够得到同情，是基于这样的事实：广大民众的理解力十分迟钝和不成熟，机敏而有野心的领导人的雄辩，利用民众自己的欲望，使他们投入罗网。

与此形成明显对照的是有教养人士的作用。假如选举以公开方式进行，就像普鲁士邦议会那样，那么这种作用就会更大些。知识较多的阶级的较大的选择自由总以保存资财作为物质基

础；致力于产业的其他动机同样合法，然而对国家的安全和不断发展而言，代表资财的人占优势则更为有益。国家事务如掌握在贪婪之辈、爱好革新者和善于欺骗无判断力的民众的演说家手中，这样的国家就必然会更加动荡不定。这不能不给像国家统一体这样巨大的集体带来严重损害。伟大的民族在其生存和发展的过程中都是属于沉重的集体，这种集体只能谨慎地前进，因为在它们奔向未来不熟悉的道路上并没有铺设平坦的铁轨。任何一种巨大的国家共同体，如果没有来自有产者的物质的或精神的谨慎和有抑制作用的影响，那么就会像第一次法国革命[28]那样飞速发展，以致使国家这辆车被颠得粉碎。由于长期的渗透，由于人多势众，贪婪之辈就会取得决定性的优势地位。为了这些民众本身的利益，希望这种渗透避免造成危机四伏的急速发展和国家这辆大车的碎裂。但是，如果这种事态竟然发生，那么历史的演变将在较短的时期内回到专制、暴力统治、绝对君权上去，因为民众最终是会顺从一种制度的。即使他们以前不认识这一点，最后也会在亲身体会各种论据的作用之下，一再理解这一点，而且自愿牺牲合理的、应予保持的那种程度的自由，换取独裁专制和皇权制度的秩序；而这种程度的自由，现正是欧洲各国社会所不难采纳的。

57 假如我们德国也被卷入这种法国式的演变的旋涡中去，我认为这是极大的不幸，对于未来的安全是重大的损害。假如国王和他的官员不同于他人，而是以超人的智慧和非凡的英明来秉公执政，那么绝对专制制度就会是欧洲国家政体的理想制度。最英明最善意的绝对君权统治者都患有对自己才智估计过高、容易听从宠臣的甜言蜜语和影响这类人类弱点与不足，更不要说受合法的

和非法的女人的影响了。君主制和最好的君王也需要批评，以免由于见解主观而危害社会，在他濒临迷途的危险时，批评之针砭能帮他走上坦途。约瑟夫二世就是一个足资警戒的先例[29]。

批评只能通过自由的报刊和现代意义上的议会来进行。这两种纠正手段由于滥用，其作用可能大为减色，甚至完全丧失。防止这种现象发生是保护性政策的一个任务，而没有议会和报刊的辩驳，这个任务就不能完成。政治上的机警和眼力就是要确定在这一斗争中应遵循的分寸，以便既不妨碍国家所需的对政府的监督，又不使这种监督变为统治。

如果君主充分具有这种眼力，那么这对他的国家来说是一种幸运，自然，就像人类的一切幸运一样不过是一时的幸运。宪法生活中应当规定有可能让具备相应特性的大臣来执政，也应当有可能保持能满足这一要求的大臣，而不顾偶然的多数派的表决，也不顾皇室和宫廷党[30]的影响。在人类尚未臻于完美的情况下一般所能达到的限度内，这个目标在威廉一世执政时接近于达到了。

（四）

我们来到柏林[31]之后，邦议会随即开幕了，国王的讲话已在布拉格讨论过。去布拉格的有保守党议员，该党成员在宪法冲突[32]中曾一度减少到十一名，但在7月3日的选举中，在凯尼希格勒茨之前的最初几次胜利的影响下，又增加到一百多人。假如选 58
举是在决定性战役之后几天进行的话，那么结果对政府会更有利些。然而，由于国内群情激昂，就连这样的结果也不仅给予保守

派的、而且给予反动派的企图以成功的希望。由于君主制的扩大及战争爆发时议会的形势，由于反对派领袖们的拙劣、野心和固执，那些力图恢复绝对专制制度或者哪怕是等级代表制度[33]的人就有了一个连结点以便中止和修改普鲁士宪法。普鲁士宪法不能被剪裁得去适合扩大了的普鲁士，更不能被剪裁得去适合插入将来的德国宪法。宪法章程本身就有一款（第118款）[34]，是在制订宪法时的民族情绪影响下产生的，它摘自1848年草案。这一款规定普鲁士宪法必须服从新制订的德意志的合法的宪法。这样就出现了一种机会：保持形式上的合法的外貌，而彻底变更宪法和冲突时的多数派统治议会的企图，这就是极右派和他们派往布拉格去的议员们真实意图的背景。

另一种机会，即随着解决德国问题，同时解决内部冲突，也在1863年摆在国王面前，当时适值波兰起义和用于法兰克福各邦君主会议的袭击企图，而亚历山大皇帝在手书中热烈地主张普—俄联盟[35]之时。这个有好几页写得密密麻麻但字迹清秀的皇帝手书思虑广阔，言词激昂，不同于他惯有文笔，不禁使人想起哈姆雷特的话：

> 是在心里忍受那无情命运的
> 横飞逆来的打击更可贵呢，
> 还是面对着海洋一般无边艰难，操起武器，
> 用反抗来把他们消灭呢？[36]

只要把这几行从犹疑不定的语言译成肯定的语言就行了。不管是西方国家的还是奥地利—波兰的欺诈都早已使皇帝厌倦，所

以他决定为摆脱这种欺诈而拔剑出鞘；他向与国王的友谊和共同利益呼吁，要求国王在所谓广义理解同年 2 月阿尔文斯累本协定的意义上采取联合行动。国王一方面难于拒绝这位近亲[37]和挚 59
友，另一方面也不愿把一场大战的灾难加在他的国土上，使国家和王朝面临这样一种战争的危险。他倾向于参加法兰克福各邦君主会议的心情，欲与各古老诸侯家族团结一致的心愿，使他不能迎合这位外甥兼挚友的呼吁和沿袭普—俄朝廷传统，因为这会导致同德意志邦联及全部德意志诸侯家族的关系破裂。在我的持续了数天之久的报告中，我避免强调事物对我们内政有重大意义的一面，因为我并不认为正是联合俄国来对奥地利和 1866 年我们与之交战过的全部对手开战就能有助于完成我们的民族任务。通过战争来克服内部困难正是法国的政策中通常使用的手段；而在德国，只有当一场有关的战争能够顺应民族发展时，这种手段才会有效。为此，这一战争首先应该排除俄国参加，因为俄国参战一事依然遭到舆论的指摘，尽管这种指摘是不明智的。实现德国的统一必须依靠本民族的力量，没有外来干涉。此外，自从国王有了准备公开而无诡诈地捍卫他的政策的大臣以来，对国王在我进入内阁直到决定退位时发生影响的内部冲突，在很大程度上已丧失了左右国王的抉择的力量。从此他确信，如果事态演变到爆发革命的地步，那么王权会显得更为强大；因为王后和新纪元时代的大臣们的恫吓已不起作用。与之相反我在历次报告中也没有隐瞒我对德—俄联盟的军事力量，特别是在初次进攻时的军事力量的看法。

三个东方大国的地理位置是这样：其中任何一国，只要遭到其他两国进攻，就会在战略上处于不利地位，即使它在西欧有英

国或者法国为同盟国。特别不利的是奥地利，在俄—德进攻时将会孤立无援。俄国对付奥地利和德国，困难最小。但是俄国于战争初期在两个德意志大国联合向布格河挺进时也会处于困境。在奥地利反对与其为邻的两个帝国的斗争中，由于地理位置和种族
60 形成的原因，处境特别不利，因为能造成力量平衡的法国的援助很难及时到来。假如奥地利一开始就被德—俄联盟所击败，假如敌对的联盟被三个皇帝巧妙签订的和约所拆散或者由于奥地利的失败而有所削弱，那么德—俄的优势就会成为决定性的。假如德—俄联盟一开始就很牢固，在各大国军队的良好的指挥能力和勇敢精神不分上下的前提下，则该联盟之所以强大，其原因就在于这两大国各自领土的状况。但是，对战争取胜的一切预计和信念本身是不可靠的，如果所依靠的力量不是一个统一体，而是以联盟为基础，那就更不可靠了。

在我起草的比亚历山大皇帝的信还长的回信中强调指出：由于地理条件和法国人对莱茵地区的贪求，联合起来反对西方国家的战争最终必然会变成普—法战争；普—俄首先发动战争会恶化我们在德国的处境；远离战场的俄国所遭到的战祸会轻得多，相反普鲁士在物质上则不仅要供应自己的军队，而且也得供应俄国的军队。这样，俄国的政策就处在杠杆的长臂一边（如果我的记忆力不欺骗我的话，当时我用的就是这个比喻），即使我们胜利了，俄国也会像在维也纳会议上那样和以更大的权威规定我们的媾和条件，就像在 1859 年，奥地利可能向我们提出同法国媾和的条件那样，假如当时我们参加了反对法国和意大利的战争。我已不记得我的论据的原文，虽然几天前因为澄清与俄国政策有关的问题时我还浏览过原文并且还对当时我竟能够字迹工整地亲笔写

就为国王披阅的如此之长的信文草稿而感到满意；而这样的手工劳作大概未必特别有益于我在加施泰因的疗养。虽然国王不像我那样用德意志的一民族的观点来观察这一问题，可也无意联合俄国以强制手段来消除奥地利政策和邦议会多数派的傲慢态度以及两者对普鲁士王权的轻侮态度。假如他接受了俄国的建议，那么凭着我们动员军队之迅速，凭着俄国在波兰之兵力，利用奥地利 61
当时军事力量的虚弱，我们或许在法国给予奥地利有效援助之前就能打败奥地利（不论欲望未得满足的意大利给予援助与否）。假如确有把握：这一侵袭的后果会是在保全奥地利的条件下的三皇同盟[38]，那么我对形势的估计或许可以说是不准确的。但是，因为俄国和奥地利在东方的利益上有分歧，所以那种把握并不存在。欲使取得胜利的普—俄联盟对奥地利采取宽容态度，就像1866年以来普鲁士为了未来重新和好的可能性所做的那样，几乎不可能，也不符合俄国的政策。因此，我担心在我们获得胜利的情况下，我们同俄国在关于奥地利未来命运的问题上会不一致；俄国本身在反对法国的进一步成功的情况下，也不愿放弃使普鲁士保持成为自己西部边境上一个经常需要援助的地位；绝不可能指望俄国对在普鲁士霸权的意义下的民族政策予以支持。提尔西特、埃尔富特、奥尔缪茨[39]事件以及其他历史事件的回忆说明：遗迹令人生畏[40]。简言之，在维也纳讨论诸如波兰和萨克森[41]的未来的问题、德国是否应当不依赖于俄国的决定而保护自己不受法国的侵犯、斯特拉斯堡是否应成为联邦的城堡[42]等问题之前，我不信任哥尔查科夫的政策——我们不能指望像1813年亚历山大一世给予我们的那种保证。对于如此多种多样的考虑，我必须加以权衡，做出关于向国王提出的建议的决定，拟出向

他呈交的方案草稿。我不怀疑，终有一天我们的档案会将这些事件公诸于众，除非可以证实我的政治活动的文献[43]在这期间已被销毁。

这个考验对君主来说是巨大的，他的立场不仅在法兰克福各邦君主会议的民族问题上，而且也在从英、法、奥三大同盟国方面来的波兰问题上，遭到进步党的猛烈攻击和奥地利外交的压力。

1863 年，国王作为一位君主和普鲁士人，并没有让自己受到严重损伤的感情左右其政治上的考虑，这一事实证明，他的民族荣誉感和政治上健全的理智是何等强烈。

62

（五）

1866 年，国王对应否依靠自己的力量击败议会的反抗，并且防止其卷土重来的问题，不是一下子就十分清楚的，还说了反对这样做的重要理由。在可以预见的未来的斗争中，搁置和修改宪法以及凌辱邦议会反对派，都会成为德国和奥地利所有不满 1866 年成果的人反对普鲁士的有效武器。人们不得不准备在这时期对抗议会和报刊，在普鲁士实行德意志其他各邦都反对的政府体制。我们不得已采取的反对报刊的措施，在德绍[44]将不会起作用，而奥地利和南德意志在这时期却会因取得在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阵地上普鲁士所遗弃的领导地位而获得报偿。在普鲁士本身，民族党将会同情政府的敌人。在修正了的普鲁士的疆界之内，我们可能在国家法制方面加强王权，但总还是存在着怀有强烈的不同意见的本地人士，而新合并的各省内的反对派则将会同

他们结合起来。然后我们也许进行一场普鲁士征服性战争，但是普鲁士民族政策的纽带则可能会被割断。通过统一为德意志民族创造一种适合本民族历史重要性的生存条件的可能性，这种愿望就构成了为进行德意志的“兄弟阋墙之战”[45]辩护的主要论据。假如德意志各族之间的斗争只是为了加强分离主义的普鲁士邦国而持续下去，那么这种兄弟阋墙之战的再度发生将是难免的。

我不认为绝对专制主义是在德国能够长期存在或取得成功的统治方式。如果不算从比利时词句转译来的几条[46]，普鲁士宪法在基本原则上是合理的。它具有三个要素——国王和两院，其中任何一方都可以用自己的否决权阻止对合法的现状进行任意的改变。立法权的正确分配正在于此。立法机构如果不受报刊和议会的公开批评，那它误入歧途的危险就会增加。国王的绝对专制主义如同议会多数派的绝对专制主义一样是不可取的，对合法现状的任何改变都须经过国王和议会同意这一要求是合适的，我们没有必要对普鲁士宪法作重大的修改。用这个宪法就 63
可以治国，假如我们在1866年修改了它，那么推行德意志政策的道路便会阻塞不通。胜利之前我是从未谈到过“豁免责任法”的，现在，胜利之后，国王能够宽宏大量地提出豁免责任法并和反对派的一部分讲和（不是和人民讲和，因为和人民的和睦关系，正像战争过程所表明的那样，从未遭到破裂），因为这一部分人与其说由于党派政治的理由还不如说由于民族的理由而对政府有所误解。

我的想法和论据大致如此。在从布拉格到柏林（8月4日）的许多小时的旅途上，我试图以这些想法和论据来消除障碍，而

给国王造成这些障碍的是由于他自己的看法，但更重要的是由于其他人的影响，特别是保守派代表团的影响。从国家法律观点看，国王陛下认为要求豁免责任就显得是承认业已造成的非法行动*。由于我认为准许豁免责任不过是承认一种事实，即政府和它的合法首脑在现实情况下做得对；要求规定豁免责任正是要求得到这种承认。我徒劳地试图消除这种语言上和法律上的错误。任何立宪体制的实践以及它给政府规定的活动范围总是表明，宪法并不能给政府指出在各种情况下必须遵循的途径。国王依然坚持自己对豁免责任法的否定态度，而我则觉得不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语言上，必须给议会中的反对者架一座金桥；他们之中至多只有那些后来成立了自由思想党[47]的人才心怀恶意，其他人不过是盲从而已。为了建立普鲁士的内部和平，依靠坚固的普鲁士基地继续推行国王的德意志政策，这是必需的。在火车包厢里我同国王和王储[48]进行了长时间的紧张谈话，因为这种谈话必须始终以小心谨慎的方式进行。诚然，王储并没有支持我，但他至少以自己生动的面部表情流露出完全同意我的意见，这就增强了我反驳他的父王的勇气。

64 通过我在尼科尔斯堡和其他大臣的书信往来，拟订了为国王陛下所赞同的御前讲话草稿，除有关豁免责任法的字句外。最后国王对此也勉强同意了。这样，8 月 5 日邦议会就开幕了，国王在开幕词中郑重宣布，各地议员应当追认没有经过国家预算法而采取的政府措施。让我们用语中听些吧！

---

* 罗昂在其《回忆录》中的说法（《德意志评论》1891 年第一卷第 133 页；单行版II[4] 第 482 页）："无论如何对于俾斯麦的同意起决定作用的是：他清楚地知道他的君王的和解观点"，是错误的。

(六)

我们当前的任务就是调整我们与之交战过的德意志各邦的关系。我们本来可以不要为普鲁士并吞领土，而根据联邦宪法[49]的规定为此要求补偿。但是国王陛下像对旧邦联议会[50]一样对宪法条款的实效不大相信，坚持扩张普鲁士的领土，目的在于填补西部各省和东部各省间的空隙，以便在民族的新生早晚遭到失败时，保证普鲁士的领土连成整体。可见，并吞汉诺威和库尔黑森[51]就是为了在一切可能条件下建立君主国两部分之间的牢固联系。我们这两部分领土间的关税来往的困难，以及汉诺威在最近一次战争[52]中的立场，又一次清楚地表明，必须把北方全部领土完全集中统一管辖。我们不能让自己在未来同奥地利或其他国家的战争中再次受到背后一个或两个敌军精锐军团[53]的威胁。由于国王乔治五世[54]明显地夸大了对自己的以及对自己朝廷的使命的理解，因而对局势可能偏偏正是这样发展的担心就更为加剧了。人们并不是每天都能够防止住这类危险情况，但是事件如能使政治家有可能做到这一点而他却又不利用这些事件，这样的政治家就负有更大的责任，因为国际公法的政策和德意志民族作为一个民族整体的生存的权利，不能从私法原则角度去判断。汉诺威国王派自己的副官前往尼科尔斯堡给国王送去一封信。我请求国王陛下不要接受，因为我们必须着眼于政治而不应感情用事，因为汉 65
诺威的具有国际公法权限的独立自主，即在每一具体情况下根据自己君主的判断来出兵反对或支持普鲁士，是与实现德意志统一不相容的。仅有牢固的条约，而无处于领导地位的君主的王朝权

力作为保证，它就永远不足以保障德意志民族在帝国中的和平与统一。

我说服了国王放弃同汉诺威和黑森在分割这两个邦并同作为剩余部分的国土的君主的原来统治者结盟的基础上进行谈判的想法。假如选帝侯能保住富尔达和哈瑙[55]、乔治五世占有卡伦贝格和吕内堡，同时有希望获得不伦瑞克遗产权[56]，那么不论汉诺威人和黑森人，还是这两位君主，都不会满意地参加北德意志联邦。这个计划会给我们招来一些心怀不满的盟友，他们为了重新获得失去了的东西会去搞类似莱茵联邦那样的集团。

拿骚[57]紧邻科布伦茨[58]，却对奥地利表示了无条件的忠顺，这是一种危险的现象，特别是在法—奥可能结成联盟的情况下，而这种结盟的可怕前景在克里木战争以及1863年波兰骚乱中已经显示出来。国王陛下对拿骚的反感是从父亲那里继承下来的。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常常旅经公国，但从不去看望公爵。公爵的代表团在莱茵联邦时期在普鲁士特别不受欢迎，所以威廉一世国王利用从前拿骚臣民[59]的代表团的激烈抗议而反对向公爵让步。代表团的口头禅是："请您在公爵和他的猎军面前保护我们吧。"

同萨克森和南德意志各邦签订的仍然是和约。冯·万布勒先生像准备打仗一样表现得激情满怀，并且是我们第一个与之达成协议[60]的人。因为符腾堡占据着普鲁士的霍亨索伦[61]，所以问题也就涉及到现在是否要像国王希望的那样，把矛头对准符腾堡，并要求以符腾堡为代价来扩大霍亨索伦。不管是对普鲁士，还是对我们民族的未来，我都看不到这样做有什么好处，一般说来我不认为报复原则是我们政策的理性基础。甚至在我们的感情遭到损伤的情况下，我们的政策也不应由自己之不满而应由客观的深思

熟虑来指导。正因为万布勒对我们犯有一些外交过失记在账上，所以他成了我有益的谈判者。我同意忘掉过去，就同符腾堡结成 66
了联盟（8 月 13 日），从而为同其他邦国结盟铺平了道路。

我不知道，罗根巴赫[62]是否是根据巴登大公的委托行事，他在和平谈判时曾向我表示说，巴伐利亚由于它的面积巨大而成了德国统一事业的障碍，假如使它的面积变小一些，它就会很容易地加入德国未来的新结构中；因此值得推荐的是以扩大巴登领土，把普法尔茨归并给巴登，使巴登与普鲁士直接毗邻的办法在南德意志建立较好的均势；同时，根据普鲁士收回王朝世袭土地安斯巴赫和拜罗伊特的愿望以及同符腾堡的关系，还应注意到其他变化。我不仅不同意这一建议，而且从一开始就拒绝了。即使我单从实用的角度来看这个建议，它也暴露出缺乏对未来的远见和被巴登王朝政策弄昏暗了的政治目光。即使把普法尔茨让给巴登，但是迫使巴伐利亚违背自己的意志而加入它所不赞同的帝国制度，其困难也会依然如故。而且，普法尔茨人是否情愿把巴伐利亚籍改为巴登籍，还是大成问题的。在人们一度谈论用阿沙芬堡附近的巴伐利亚土地作为酬报换取黑森在美因河[63]以北地区的时候，我就从阿沙芬堡接到许多抗议书；这些地区的居民虽然笃信天主教，但其抗议书的主要内容则说：如果签名者不能再是巴伐利亚人，那么他们宁愿做普鲁士人，而使他们由巴伐利亚人改做黑森人，这是他们不能接受的。看来，他们受到了考虑自己国君所属等级和联邦议会的投票制度（在联邦议会中巴伐利亚的等级高于黑森）的束缚。所以，我在法兰克福时一个普鲁士后备兵对一个小邦的后备兵说的同样意思的话我至今记忆犹新："你别吭声啦，我连个国王也没有。"我不认为改变南德意志的国界就是朝

着全国统一迈出了一步。

缩小巴伐利亚北方领土是符合国王当时想重占安斯巴赫和拜
67 罗伊特从前全部领土的愿望的。但就是这个计划，尽管它多么使我那敬爱的君主称心如意，却和巴登计划一样很不符合我的政治见解，因而我进行了有效的抵制[64]。1866 年秋天还不可能预见到以后奥地利会采取什么立场。法国已对我们产生嫉妒，谁也不如我更了解，我们在波希米亚的成功使拿破仑多么失望。拿破仑估计奥地利肯定会攻打我们，而我们将不得不求他居中调停。假如在因我们的胜利而必然激怒维也纳的情况下法国改正错误及其后果的努力获得了成效，那么在某些德意志宫廷面前必将出现一个问题：它们是否要再次和奥地利一起发动反对我们的类似的第二次西里西亚战争。巴伐利亚和萨克森接受这种诱惑，是可能的，而根据罗根巴赫的设想被切割的巴伐利亚会联合奥地利反对我们以图报复，也许是必然的。

（七）

这种联合，其规模之大或许会超过在法国的庇护下很快同我们处于敌对状态的韦尔芬军团[65]。如果不算个别腐败分子，1870 年韦尔芬军团再未露面[66]这一事实，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得悉在汉诺威准备妥协的人员中，有人详细地告诉我有关准备的情况，并且建议，只要保证给他们相当于以前的汉诺威职位的薪水，他们便粉碎其全部阴谋勾当。根据当时合法地截获的信件，我担心，在反对韦尔芬分子的行动的斗争中我们可能被迫采取镇压手段，而且面对战争危险，这种镇压手段可能是残酷的。不要忘记，根

据法国军队伟大的过去，如果不尽量排除可能使我们处境恶化的情况，那么我们当时就没有十分的把握去战胜法国。所以，我同和我建立了密切联系的谈判者谈妥，如果他们实践了自己的诺言，他们的愿望是可以实现的。我指出的条件是这个问题，我们不会被迫枪杀参加反击德军的汉诺威同胞。果然，国内没发生任何骚动，而在战争爆发后，水、陆两路去法国的韦尔芬分子寥寥无几，只限于个别声名狼藉的人。依据汉诺威军队在战争中的态 68
度，很难设想韦尔芬分子在国内的暴动会达到相当规模。至少只要我们对法国的进攻在胜利地进行，这就是不可能。假如我们打败了，被追赶，经过汉诺威回来，那么会是什么情况，姑且不谈。然而，一种预防政策应当也考虑到这些可能性。不管怎样，在战争的强制形势下，我决然建议国王采取国家自卫本能所应采取的一切坚决还击行动。但是，即使仅仅个别严酷的和可能是流血的惩罚势在必行，然而对德国同胞的暴力行动（不管战争的危险在何种程度上证实这种暴力行动是必不可少的）都会成为几代人和解的障碍和受人谴责的借口。所以，我认为及时防止这种可能出现的事态是重要的。

(八)

去年冬季期间和不愿打仗的国王的斗争，出征期间和一伙眼前只看见奥地利而忽视欧洲其他列强的军人的斗争，以及和国王先是关于签订和约、后来是关于豁免责任法进行的斗争，使我精疲力尽，以至我需要安宁和休息。9 月 26 日我先到卡尔斯堡一个堂兄弟俾斯麦·博伦伯爵那里，10 月 6 日又去普特布斯，在那里

的旅馆中我得了重病。普特布斯侯爵和侯爵夫人殷切好客地在位于烧毁的宫殿旁的一座完好无损的亭子中接待了我。第一次发病痊愈后，我又能通过与萨维尼通信来主持政务了。作为联邦议会最后一个普鲁士公使，他是包括最重要的德国政策在内的管理科的当然继承人。他主持同萨克森谈判直到结束，而在我起程之前谈判尚未成功。谈判的结果是公开合法的，即众所周知的，我不必评论[67]。由于冯·施托什将军的斡旋，根据国王陛下的个人决定，萨克森的军事独立性后来得到了扩大，比协定规定的要大得多。

69 就能保持现存的普—奥友好而言，萨克森最后两位国王[68]的巧妙而公正的政策可以为这些让步辩护。普鲁士和奥地利 1879 年订立的紧密同盟给巴伐利亚和萨克森的沉重压力越大，在奥地利的德国人——贵族和老百姓就懂得爱护他们同哈布斯堡王朝的关系。这一事实只能用历史的和宗教的传统、人类本性和特别是君王传统来加以解释。奥地利的德国人在议会中的过火行为，他们对王朝政策的最终影响，向着这一方向势有减弱德意志的—民族的因素的作用，而且不仅仅是在奥地利。议会党派的空谈主义错误通常对那些耍政治手腕的女人和传教士的企图有利。

第二十二章　埃姆斯电报

77

1870 年 7 月 2 日西班牙内阁作出决定，由王储列奥波特·冯·霍亨索伦继承王位[1]。这样，这件仅在形式上纯属西班牙的事务，却从国际法方面第一次引起了后来导致战争的问题。法国正难于从国际法上找到借口来干涉西班牙王位选择的自由。但是自从巴黎想同普鲁士打仗以来，霍亨索伦这个姓氏便成为故意寻衅的借口了，虽然这个姓氏本身比起其他任何德意志姓氏来，对法国并不具有更大的威胁。相反，无论在西班牙还是在德国，人们可以认为，列奥波特亲王由于本人和家族的种种关系，在巴黎将比其他许多德意志亲王更易成为一位受欢迎的人。我记得，色当战役之后的那天夜里我和几位军官在昏暗中乘马随国王巡视完色当周围地区之后，在赴顿舍里时路上有人向我提出一些询问（我已记不起究竟是哪个随员），我谈到了这次战争的准备情况，并提到我曾认为列奥波特亲王决不会成为拿破仑皇帝在西班牙的一位不受欢迎的邻居，他会取道巴黎前往马德里，以便对法兰西帝国的政策取得感性认识，这是他得以在西班牙执政的先决条件之一。我说：比起希望建立类似查理五世[2] 那样的西班牙—德国的和反法兰西的实体来，我们更有理由担心西班牙与法兰西两个王室之间建立更为密切的谅解；西班牙的国王所推行的只能是西班牙的政策，而亲王继承了这个国家的王位之后，就会成为一个西

班牙人了。使我吃惊的是，在我后面从黑暗中听到了冯·霍亨索伦亲王的厉声反驳，我绝没料到他竟在场；亲王对有人假定他对法国怀有好感这一点表示了激烈的抗议。对于一个德国军官和霍亨索伦家族的亲王来说，在色当战役的战场上提出这一抗议是很自然的，于是我只得回答说，亲王作为西班牙的国王只能依据西班牙的利益行事，而特别是为了巩固新王室首先要求谨慎地对待位于比利牛斯山脉的强大邻国，这是符合西班牙的利益的。我请
78 求亲王宽恕我在他面前所发表的议论，虽然我不知道他在场。

这个预先说明的插曲提供了我关于整个问题的见解。我认为这个问题是西班牙的事务，而不是德国的事务，虽然我也许乐于看到，霍亨索伦这个德国姓氏在有效地代表了西班牙的君主政体，虽然我也绝不会忘记从维护我们利益的角度去权衡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这是在别的国家发生任何一个类似重要的事件时，外交大臣都有责任这样行事的。一个出身德国人的西班牙国王所能给我们带来的有利关系，我所考虑的首先与其说是政治上的，还不如说是经济上的。为了西班牙的利益，我期待亲王本人及其亲属能促进安宁与团结，并且我没有丝毫理由去嫉妒西班牙人获得这种成果。就地理位置和政治需要而言，西班牙都应属于那些没有理由奉行反德政策的少数国家之列。此外，在经济方面，无论是从生产上讲还是从消费上讲，西班牙也是一个很适于同德国发展贸易关系的国家。假如在西班牙政府中有对我们友好的人士，那是一个有利条件，除非担心法国会表示不满，那么从德国政策所担负的各种任务来看，便没有任何理由立即弃绝这一有利条件。假如西班牙在其发展过程中重新获得比迄今出现过的更为强大的力量，那么西班牙外交对我们友好这一事实，在和平时期

是有益处的；但我难以把握的是：当可以预见的德法战争迟早来临之际，西班牙国王（即使他怀有最好的意愿）是否能够通过向法国发动进攻或示威以证实他的德国人的同情心。由于德国各邦 79
君主的赞同而引起的战争[3] 开始后，西班牙的立场已证明我的疑虑的正确性。骑士风度的熙得[4] 会要求法国就它干涉西班牙选择国王的自由一事说明理由，并且不允许外国人来保护西班牙的独立。这个以前在海洋和大陆上曾十分强大的民族，现在却不能控制古巴的与之有族亲关系的居民[5]，那又怎能指望它出于对我们的友爱而去进攻像法国这样的一个大国呢？任何一届西班牙政府，尤其是一位外国人的国王，没有在国内掌握过由于对德国的友爱而派遣哪怕是一个团队的兵力开赴比利牛斯山脉去的权力。从政治上讲，我对这整个问题采取不经心的态度。安东侯爵想通过和平途径达到所追求的目的比我强烈。罗马尼亚国王陛下的回忆录中对内阁参与解决这个问题的各项细节叙述得不确切，其中谈到在宫中召开的内阁—枢密院会议，并无其事。安东侯爵作为国王的客人住在宫中，曾经宴请过国王和几位大臣。我很难相信在宴席上曾就西班牙问题进行过讨论[6]。如果冯·格腊蒙公爵* 力图证明我对西班牙的建议未持反对态度的话，我认为没有理由去反驳他。公爵听到有人议论我给普里姆元帅的信件，其确切词句我已记不得了；如果是我亲自写的，写些什么我也记不清了，那么我也不会将霍亨索伦家族的候选说成是“绝妙的事情”，我并不习惯用这种词句。说我认为这件事情在原则上和在和平时期是“有利的”，而不是在某一特定时刻，这是正确的。同时我毫不怀疑，在

---

* 格腊蒙：《战前的法国和普鲁士》巴黎 E.邓迪出版社 1872 年版第 21 页。

法国宫廷中很受欢迎的缪拉特一家的子孙[7]将会保证对法国具有善意。

法国的干涉最初是使用于西班牙的事务，不是普鲁士的事务；由于拿破仑的政策这个问题变成普鲁士问题，这种政策的错误是一种国际上不合法的和挑衅性的错误；拿破仑政策的错误向我表明，法国准备抓住任何对它有用的借口蓄意同我们争吵的时刻已经到来。我把法国的干预首先看作是对西班牙的一种损害，
80 因而也是对西班牙的一种侮辱，我期待西班牙为了自己的尊严会对这种侵犯给予反抗。后来事态发生变化，法国就像侵犯西班牙的独立那样，用战争来威胁我们，此后有好几天我曾期待，随着法国对我们宣战，西班牙也会对法国宣战。我没有料到，当德国人为了西班牙的独立及其自由选择国王的权利而同法国作殊死搏斗时，像西班牙这样一个自豪的民族，竟然准备好武器在比利牛斯山脉后边作壁上观。西班牙的自尊感在加罗林群岛问题[8]上显得如此敏感，可是在1870年却简单地抛弃了我们。也许在这两种情况中，各共和主义政党的同情和国际联系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对法国关于西班牙王位候选人的问题提出的最初的无理由的追究，7月4日我国外交部门根据事实情况含糊其辞地回答说，内阁对此一无所知。这种说法是准确的，因为国王陛下把列奥波特亲王同意当选的问题仅仅看成是家族事务，与普鲁士或北德意志联邦没有什么关系，涉及的仅仅是元帅同德国军官的个人关系问题，是霍亨索伦家族（不是普鲁士王国）的首领同具有霍亨索伦姓氏的人的个人关系问题。

可是在法国人们在寻找尽可能不带有民族的—德意志的色彩的战争借口，而且相信从王朝方面在霍亨索伦姓氏的西班牙王位觊觎者的事件上可以找到战争借口。人们没有用诚实和内行的态

度检验这一战争借口可靠性，其根本原因大概是过高地估计了法国的军事优势和过低估计了德意志的民族精神。随着法国的宣战而高涨起来的德意志的一民族的精神，犹如一股冲破了闸门的洪流，使法国政治家们震惊。他们在回忆莱茵联邦的旧梦中生活、思考和行动，个别的西德意志大臣[9]的立场和教皇权力至上论者的势力[10]滋养了这种回忆。这些势力希望：法国胜利，由法兰克人来实现上帝事业[11]，并依靠同天主教奥地利的联盟，会容易地在德国继续推行梵蒂冈[12]的政策。他们的教皇权力至上论者的倾向促 81
使在德国推行法国的政策，而不利于在意大利推行法国的政策，因为与意大利结成同盟最终由于法国拒绝让出罗马[13]而失败。由于相信法国武器的优良而提出的战争借口可以说是牵强附会的，可是人们并未如人所料地认为西班牙应对反对法国的国王选举负责，却认为应对此负责的是德意志亲王和普鲁士国王，而这位德意志亲王并没有拒绝通过提出一位所需要的和预见在巴黎可以被看作受欢迎的人，来帮助满足根据西班牙的愿望的西班牙的需要，而这位普鲁士国王与这件事的关系只不过是涉及到了他的姓氏和他的德国人身份而已。法国内阁竟然允许自己要求普鲁士政界解释同意这一选择的理由这一事实，而且是用法国报界称之为公开威胁的方式，从国际观点来看，这一事实确是厚颜无耻已极，所以我认为，我们对此一步也不能退让。不仅由于法国报刊的威胁性的挑衅，而且由于议会讨论和格腊蒙·奥利维耶内阁对这些声明所持的态度，更加深了法国要求的侮辱性质。格腊蒙7月6日在立法院[14]会议上的声明如下：

我们并不认为，对邻国人民的权利的尊重可以使我们有义

> 务容忍另一大国委派自己的一位亲王来继承查理五世的王位。……我们深信，这种情况不会发生。如果情况不是这样，那么我们就会懂得……毫不动摇和毫不示弱地履行自己的职责。

这一声明确是一种国际上的官方的武力威胁。普鲁士胆怯了这句话在报纸上成为对于7月6日和7日具有重大意义的国会讨论结果的评论，从我的观点来看，这使任何让步都与我们民族的尊严感绝不相容。

我决定7月12日离开瓦尔辛到埃姆斯[15]去，为的是向陛下请求召开国会[16]，发布动员令。当经过武索夫时，我的朋友、年迈的牧师穆勒特站在牧师住宅门前向我友好地致意。我从敞篷马车上以避挡和冲刺的剑式动作作答，他就明白：我认为要进行战争了。当我进入我在柏林的住宅的庭院，还没有下车时，就接到了电报，从中可以看出，国王在法国议会和报刊的威胁和侮辱之
82 后，仍在与贝内代蒂继续进行谈判，而不是冷漠矜持地让他去和他的大臣们交涉。同毛奇和罗昂共进午餐时，从驻巴黎的大使馆送来的报告说，霍亨索伦亲王已拒绝作王位候选人，以免法国用来威胁我们的战争发生[17]。我的第一个考虑是辞职，因为我在这一切以前发生的侮辱性的挑衅之后，把这种被强迫作出的让步看作是侮辱德国，我又不愿为此承担官方的责任。由于被迫退却而损伤了民族自尊感的印象对我如此强烈，以致我决定向埃姆斯报告要求辞职。我认为我们在法国及其傲慢的宣告面前所受的这种屈辱比我们在奥尔缪茨所受的屈辱更为可耻。为那次屈辱提出的辩护理由一直是前段时期恶劣的历史发展状况和我们缺乏战争准备。我设想，法国对亲王放弃继承王位一事感到满意。它觉得一

种战争威胁，即使从国际关系上看它带有侮辱和嘲弄的形式，并且把握利用反对普鲁士的战争借口的机会，就足以迫使普鲁士即使在一种有理的事情上作出让步；它还觉得，北德意志联邦本身不具有足够的力量来抵制法国的贪欲，以保卫自己的民族尊严和独立。我感到十分沮丧，因为我看不到有什么办法，只要不愚蠢地卷入这类冲突和人为地制造这类冲突，就能消除那种给我们民族的地位带来的严重的损失。而这种损失我担心起因于懦弱政策。当时我的确认为战争是必需的，想保持尊严就不可能躲避战争。我给在瓦尔辛的我家的人发去电报，要他们不要收拾行装动身，过几天我就要回到那里去。此刻我又相信和平。但是，因为我不愿代表那种由此可以换取和平的那种立场，所以我放弃去埃姆斯的旅行，请欧伦堡伯爵去那里向陛下报告我的意见。我同军政大臣罗昂谈了同样的看法：我们要懂得挨了法国的一记耳光，由于退让而使我们自己陷入唯有发动战争才能雪耻的境地，而这样我们又会显得是挑衅者。现在我的处境不堪忍受，这是因为国王在矿泉水治疗期间在法国进行威胁的压力下一连四天接见法国大使，并在没有通明事务的臣下的协助下听任外国代表厚颜无耻的劝诱。 83

国王由于喜好亲自和独自地处理国事，结果陷入了我不可能赞成的境况。依照我的意见，国王陛下在埃姆斯本该拒绝与其地位不相等的法国谈判者的任何要求；而且应该把他打发到柏林的官厅去，如果认为谈判有利，则官厅应通过在埃姆斯提出报告或通过书面奏章请国王决定。尽管国王通常严格尊重职权范围之间的关系，但是由于他过于喜好亲自处理（虽然不是决定）重大问题，致使他不能正确地利用一种防护来避开以有目的的方式对他提出的强求、不便回答的问题和期望。虽然国王非常理解自己的

崇高地位，却没有立即摆脱贝内代蒂的强求，这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咎于皇后从邻近的科布伦茨施加的影响。国王已达七十三岁高龄，爱好和平，不愿让1866年的荣誉再遭受一场新斗争的风险。但当他摆脱妇人的影响时，弗里德里希大帝继承人和普鲁士军官的荣誉感在他身上就始终占上风。国王对妇人所持的骑士般的感情以及他那君主对待王后（特别是对待自己的王后）的感情，使他对自己的夫人的强求的抵制受到削弱，而他的夫人具有妇人那种可以谅解的怯懦和缺乏民族感情。有人告诉我，在国王由埃姆斯动身去柏林之前，奥古斯塔王后噙着眼泪恳求丈夫防止战争，要求记住耶拿和提尔西特[18]。我认为这段叙述是可信的，使人潸然泪下。

我不顾罗昂的责备，仍决意辞职。我在13日邀请罗昂和毛奇，和我三人一起共进便餐，席间我对他们说明了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两人都十分懊丧，并间接地责备我说，我只顾自己地利用与他们比较起来较大的有利条件辞职而去，他们就不容易这么做。我认为，我不能为了政策而牺牲自己的荣誉感；而他们两人因为是职业军人，没有抉择的自由，所以可以不需要持有与负责任的外交大臣同样的观点。正当我们交谈之际，我得到报告说，从埃姆斯来了密电，有枢密顾问阿贝肯的签字，正在翻译
84 中。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密电大约有二百个字码。在我得到了密电译文后，从中看出，电文是阿贝肯依照国王陛下的旨意拟就并签字的，在我给客人念完电报之后，他们的沮丧情绪如此之沉重，以致他们再也无心于酒食。在再次检查这一电文时我的注意力停留在国王陛下授权的一个委托上，即立即把贝内代蒂的新要求和对这新要求的拒绝通知我们的公使并在报刊上公布。于是我

向毛奇提了几个问题：他对我们武装部队的装备抱有多大的信心；在战争危险突然降临时，部队需要多少准备时间。他答道，如果战争应当进行，那么他认为期望推迟战争的爆发对我们不利；即使开初我们的力量还不足以能够立即掩护我们莱茵河左岸的全部领土以反对法国的入侵，但是我们的战备会很快超过法国，然而再往后拖延，我们这种优势就会遭到削弱；所以他认为，迅速爆发战争比延缓战争在全局上对我们更为有利。

按照我的见解，面对法国的态度，我们的民族自尊感正迫使我们去从事战争，如果我们不能估计这种情感的要求，那么我们势必要失去 1866 年我们在完成民族发展道路上所取得的一切优势。因为 1866 年军事上的胜利而在美因河以南地区高涨起来的像表现在南部诸邦准备联合起来那样的德意志的民族感也将不可避免地再次冷却下来。在南德诸邦，除了分立主义和忠于各邦王朝的感情之外，德意志精神也活跃地存在着，在 1866 年以前，这种精神由于宣扬奥地利领导下的完整的德意志这种虚构而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这种政治觉悟。这部分地是由于南德意志诸邦对老帝国[19]的偏爱，部分地是由于南德意志诸邦相信老帝国的军事力量超过普鲁士。在一系列事件证明这种估计纯属谬误之后，奥地利便在签订和约时使南德意志诸邦陷于孤立无援的境地，正是这种孤立无援才成了达成政治上的大马士革[20]的原因，而此种政治上的大马士革处在万布勒[21]所说的战败者该死和愿意同普鲁士缔结攻守同盟之间。这是对于由普鲁士发展起来的日耳曼人的力量的信赖，是坚定果断的政策的吸引力，当这种政策获得成就后，在理智和诚实的范围内发生作用时，普鲁士赢得了这种荣誉。假如在民族尊严的问题上，在人民中间流传的来自法国的侮辱——“普 85

鲁士胆怯了”是有事实根据的话，那么这种荣誉就将一去不复返，至少也会长期消失。

出于心理上的见解，1864 年丹麦战争期间根据政治上的理由，我希望不是老普鲁士营，而是迄今尚未有机会在普鲁士的领导下表现其英勇精神的威斯特法里亚营[22]作为先头部队；而对于弗里德里希·卡尔亲王违背我的心愿行事，我深感遗憾；出于同样的见解我确信，我们祖国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由于不同朝代、不同种族在感情和生活习惯上的差别而形成的南北方之间的鸿沟，只能通过反抗数百年来对我国进行侵略的邻国的全民族战争来有效地填平。我记得，确实在 1813 年到 1815 年的短期内，从莱比锡和哈瑙到贝尔·阿里扬斯，反法的共同的胜利的斗争[23]已使委身于人的莱茵联邦的政策同从维也纳会议到美因兹调查委员会[24]时期民族的德意志的精神的高涨之间的对立有可能得到消除，这在当时都带有施泰因[25]、哥雷斯[26]、雅恩[27]和瓦特堡[28]直至桑德的暴行的标记。从萨克森人在来比锡战役中[29]的转变，到参加在英国人指挥下的贝尔·阿里扬斯的战役[30]止，共同的浴血奋战凝炼成一种觉悟，在这种觉悟面前，人们对于莱茵联邦的缅怀消失了。历史中断了向这个方向的发展，这是由于忧虑过分急切的民族愿望会打乱现存的国家机构。

这种回顾加强了我的信念，而关于南德意志诸邦的政治设想稍作变动也可应用于我们同汉诺威、黑森和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31]的居民之间的相互关系。二十年后[32]的今天，不仅霍尔施坦人，而且汉撒人[33]都在满意地回忆着自己子弟们在七十年代的英雄行动，这就足以证明这个观点是正确的。所有这些考虑，自觉的和不自觉的，都加强了我的这种感觉：只有牺牲我们普鲁士的荣

誉和民族对这种荣誉的信赖，才可能避免战争。

抱着这种想法，我就使用国王通过阿贝肯赋予我的公布电报内容的权力，当着两位席上客人的面，通过删节，压缩了电文，既没添加一词，也没改动词句，使其措词如下：

> 在西班牙王国政府将霍亨索伦亲王放弃继承王位的消息 86
> 正式通知法兰西帝国政府之后，法国大使在埃姆斯向国王陛下又提出了要求，授权他向巴黎发电说，如果霍亨索伦家族重提自己的王位继承权，国王陛下有义务在将来永不予以同意。此后国王陛下拒绝再次接见法国大使，让值班副官告诉大使，国王陛下已不再有其他事情通告大使了。[34]

与原稿本会产生的作用相比，埃姆斯电报删节稿所产生的作用是不同的，这不是由于强硬的措词，而是由于使这一公告显得是最后的声明这一形式，而由阿贝肯拟就的电文则会显得仅仅是悬而未决和要在柏林继续下去的谈判的片断报道。

我向两位客人念完这段经过浓缩的电文后，毛奇说："语调变了，原先的听起来好像是退兵号，现在的就像是迎战的号角。"我说明道："如果为了执行皇上的嘱托，我立即把这项对电文既无改动又未增添任何内容的文稿送给报界并电告我们的全部使团的话，那么在午夜之前就将传遍巴黎，在那里不但由于内容，而且由于传播方式，将造成高卢公牛看到红布那样的印象。假如我们不愿充当不战而败的角色，我们就必须去打击。但效果主要将取决于我们和别人对战争起因的印象；我们是被侵略者这点是重要的，而高卢人的傲慢和容易暴怒则有助于我们做到这点，只要我

们在欧洲面前（就我们不用国会这个传声筒而可能做的而言）宣布：面对法国的公开威胁，我们无所畏惧就行了。”

我的这番说明使这两位将军的情绪变得欢快起来，他们流露出的高兴真令我惊异。他们突然又有了食欲，又吃又喝，兴致勃勃地谈论起来。罗昂说道：“老天爷还活着，他不会让我们蒙受耻辱。”毛奇则一反其冷静容忍的常态，以高兴的目光望着天花板，抛掉了他那说话时惯常的庄重态度，拍着胸脯说道：“假如我还能在这样的战争中率领我们的军队，那么即使战争之后魔鬼马上亲
87 自把我这副‘老骨头’收去也行。”当时他显得比后来更为衰弱，令人怀疑他能否经受得了征途的辛劳。

不仅在这次事件，而且在爆发波希米亚战争之前的日子里，我就发现他在实践中表现其军事战略上的倾向和才能的要求甚为强烈。在上述两个场合中，我这位为国王服务的军界同僚，一改他那素日的枯燥和沉默的习惯，变得愉快而活跃起来，甚至可说是兴高采烈。1866 年 6 月的一个夜里，我邀请他来我这里，以便确定能否提前二十四小时出兵，他给了我肯定的回答，并因战斗提前而激动和愉快。他迈着灵活的步子离开我妻子的客厅，在门口又转回身来，以严肃的语调向我问道：“您知道萨克森人毁掉[35]了德累斯顿的桥梁吗?”看到我显露出惊愕和遗憾的表情时，他又说：“但是是用水，因为有尘土”。像我们这样的同事之间开这种并无恶意的玩笑真是绝无仅有的。在上述两个场合中，面对占据重要地位的人们的可以说明和有理由的厌恶，他的好战、他的乐于会战，对实现我认为是必要的政策确是强有力的支持。可是在 1867 年的卢森堡问题上、在 1875 年以及后来考虑是否需要在敌人作好充分准备之前，应该发动一场迟早要降临到我们头上的预防

性战争时，他那好战的精神则使我感到为难。不仅在卢森堡时期，而且在后来的二十年间，我始终同那种对此给予肯定的理论作斗争，我确信，哪怕是辉煌胜利的战争，也只有当它们是被强加在头上的时候，才能对此承担责任；人们不能预卜天意，按照自己的打算去干扰历史的发展。在军队总参谋部内不仅那些奋发有为的年轻军官，而且连那些久经沙场的战略家都要求他们所指挥的部队的勇敢善战和他们自己的领导才干能得到实际应用，以期名垂青史，这是自然的。假如军队没有这种尚武精神，那是应当感到遗憾的；但是根据各国人民需要和平的合理要求而将这种尚武精神保持在适当范围之内，这乃是一个国家政界的而非军界的领导人的职责。在卢森堡问题期间，在由哥尔查科夫和法国于1875年虚构的危机期间和直到最近时期，总参谋部及其长官们总 88
是被迷惑以致危害到和平，这一事实的原因在于制度的必不可免的精神；我不能否定这种精神，只不过是由于皇帝的政策缺乏眼力和不能抗拒狭隘的和不符合宪法精神的影响，这种精神在这样的君王统治下才变成了危险的东西。

92

第二十三章　凡　尔　赛

(一)

军界高级人士从对奥战争中产生的对我的不满一直持续到整个对法战争期间，怀有这种不满的不是毛奇和罗昂，而是当时被称为“半神半人”的总参谋部的高级军官们。在行军途中，我和我的官员们在各方面，包括给养和宿营等，都明显地觉察到了这一点。如果不是毛奇伯爵以始终不渝的通情达理的礼仪予以纠正，则这种不满还会更强烈。罗昂在行军途中作为我的朋友和同事无法给我协助，相反，在凡尔赛他最终还需要我的帮助，以便在辅佐国王的近臣中间维护他对军事问题的观点。

在动身前往科隆时我已通过一个偶然情况得知，在战争开始时便已预谋不让我参加军事会议。这是我从无意中听到的冯·波德皮尔斯基将军同罗昂的一次谈话中得悉这一计划的；因为他们的谈话是在相邻的车厢里进行的，而车厢的隔板在我们头上有一大段是通的。前者高声说话以表示他的满意，大意是：“这么说，这次已经设法使类似的事情在我们这里不再重演了。”在火车开动前，我所听到的谈话足以使我明白，与将军所说的“这次”相对比的“当时”，是指波希米亚战争期间我参加的军事会议，特别是

指把向维也纳的进军路线改为向普累斯堡进军。

由这些谈话所描述的预谋我很快就在实际中感觉到了：不仅不像1866年那样请我参加军事会议，而且一切军事措施和意图照例都对我保密。存在于我们官场中的部门间的敌对状态的结果使公务遭到了十分明显的危害，以致为红十字会事务而留在大本营 93
的埃贝哈德·施托尔贝格伯爵出于我和他（遗憾的是这位爱国者过早地去世了）的友好情谊，请国王注意到不应容忍排除国王的负责任的政治顾问参加会议。根据伯爵的证言，国王陛下曾对此回答道："波希米亚战争期间，他通常都被吸收参加军事会议，而且他往往是力排众议，抓住要害；无怪乎其他将军们甚为恼火，因而希望只由他们自己讨论本部门事务。"施托尔贝格伯爵不仅对我、而且对其他人都证实这是国王的原话。1866年国王赋予我的声望无论如何都是和军事传统相抵触的，因为当时人们对首相只是根据出征时他所穿的那身骑兵团队参谋军官的军服来分等级的。因而在1870年，用现在的话来说，我便受到了军方的抵制。

可以把总参谋部用之于我身上的并应列入军事学的那种理论简述为：只有当军事指挥部认定关闭雅努斯神殿[1]的时候到来了，外交大臣才能重新取得发言权，那么雅努斯神的两面脸本身便包括了对作战国政府的警告——眼光不仅应看到战场，而且还应看其他方面。军事指挥部的任务是消灭敌对的武装力量；战争的目的是要在符合国家政策的条件下争得和平。确立和限定战争应达到的各种目的，以及向君王提出与此有关的建议——所有这一切在战争期间如同在战前一样，现在是、将来也仍然是一项政治任务，而完成此项任务的方式不能不影响到战争进行的方式。后者的途径和手段总是取决于：人们是否多少想达到最终要达到的结

果？人们是否要求割地还是放弃这种割地？人们是否要求获得抵押品和为期多久？

在这方面作用更为严重的问题是：其他的强国是否和出于何种动机可能打算先通过外交途径、必要时采用战争手段去帮助我们的敌人？指望在外国宫廷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主张这种干涉的人其企图是什么？如果事情闹到必须召开会议或者代表大会，那么各种党派将如何组合？是否存在由于中立国的干涉导致新的战争的危险？可是举例说，为了判断究竟什么时候是把战争引导到和平的正确时
94 机，这既要求军界不需要熟悉的对欧洲状况的了解，又要求军界所不了解的情报。1866 年在尼科尔斯堡举行的谈判证明，战争与和平的问题即使在战时也应属于主管政策的责任大臣的职责范围，而不能由军事技术方面的领导来决定。可是主管大臣也只有随时了解战争进行的形势和意图，才可能向国王提出最恰当的建议。

第五章已经提到关于分割俄国的计划，《周报》党曾怀有此种计划，本生在给曼托伊费尔大臣的意见书中[2] 以纯粹童稚般的直率阐述了这个计划。假定出现了当时不可能出现的情况，即成功地使国王赞成这种乌托邦，又进一步假定普鲁士军队同它可能的同盟者得以一起胜利地向前挺进，那么就是在那时也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大堆问题，即：我们是否值得希望进一步得到波兰的领土和居民？像必须消除在西方由斯特拉斯堡和魏森堡防线给南德意志施加的压力一样，是否必须把会议桌上的波兰[3] 的向前突出的边界，即俄国军队的出发点，再向东、再远离柏林方向移动呢？华沙在波兰人手中比在俄国人手中，对我们来说，是否会更不利呢？所有这一切纯系政治问题。对这些问题的决定会对确定作战的方向、特性和范围发生一种完全理所当然的影响，因此，在君主听

取的各种建议方面必然存在外交和战略之间的相互作用。对于这谁会加以否认呢？

虽然在凡尔赛我已受到约束，不能参与决定军事问题，但是作为一个身居领导地位的大臣，对于在政治上正确地利用军事形势和外交形势负有责任；而由于军事形势是否应建议采取某些政治步骤以及是否应建议拒绝其他强国的某种过分要求等问题上，根据宪法规定，我又是国王的负责的顾问。我尽可能努力收集为判断政治形势所必需的军事情报，为此与未任职的显要人士保持着亲密的联系，他们在大本营里组织了一个“第二梯队”，并在后备员旅馆[4]集合。因为这些爵爷们了解的军事情况和军事计划比 95
负责外交的大臣多得多，有时给我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情报，他们以为，这些情报对我当然不是什么秘密。在大本营的英国记者罗素对大本营的意图和事态的了解通常比我更为灵通，对我来说他是一个有用的情报来源。

(二)

在军事委员会里只有罗昂是代表我的观点的，即：如果我们不想让各中立国及其代表会议进行干涉的话，我们就应该赶快结束战争。他主张有使用重炮攻击巴黎的必要，而不同意上层社会女士们认为比较人道的饥饿围困法。由于我们对巴黎的给养情况一无所知，我们就无法估计这种饥饿围困究竟需要多久时间*。围城

---

* 9月22日毛奇给他的兄弟阿道夫写信说，他希望在十月底到克莱骚去猎取兔子。(毛奇《全集》第4卷第178页)

军队在占领土地上没有前进一步，有时甚至还向后退；特别是当人们很久不知道南方军队和布尔巴基的部队的停留情况下，就不能满有把握地估计各省的事态。有一段时间人们不知道，布尔巴基的军队是否在破坏我们与德国取得联系的交通线，或者是否通过海路已到达塞纳河下游。我们在巴黎城下每月要损失大约两千人，而不能从被围者手中夺取寸土，无谓地拖延时间，而在这期间我们的军队不得不承受各种变幻莫测的厄运：有战争中的不能预见的不幸事件，有类似1866年在维也纳城下突然发生霍乱这样的疾病。迟迟不采取果断行动引起我的强烈不安，这种不安在于政治领域，即在于担心中立国会进行干涉。战争越延长，越需考虑到一种可能：某一强国因潜在的妒意和不稳固的同情，会不会由于我们的成就而感到不安，倡议进行外交干涉？这是否又会引起某些强国甚至所有强国的赞同？虽然在梯也尔先生十月出去周游时“未能发现欧洲”[5]，但是小小的一点推动都可以在任何一个
96 中立国的宫廷中（甚至在美国，由于共和主义者的同情）导致发现这种潜在的可能性，而由于在他的倡议中又是以探索欧洲均势的前景或以保护巴黎要塞免遭重围的伪善为基础，这种推动又可能会由一国政府传给另一国政府。如果面对巴黎的变化不定的前景，在以“巴黎城下无变化”[6]的说法为标志的几个月里，当时敌对分子和不怀好意的、不诚实的朋友（对我们来说，在任何一个宫廷中都不乏这种人）能使其余各大国之间达成协议或者至少是其中两国之间达成协议，向我们提出警告或者假装出于人类之爱提出问题，那么谁也不能知道这样的最初的发动将会多么迅速地发展成为各中立强国的起初只是外交上的共同立场。1870年8月间，民族自由党的国会议员在互相通信中说：“任何外来的和平调

停都应该无条件地加以拒绝”，但是他们没有告诉我，如果不迅速占领巴黎的话，如何能避免这一点。

博伊斯特伯爵自己力求证明，他如何“诚恳地、虽然是无成效地”努力求得“各中立国的集体的调停”*。他回忆道，在9月28日他便向伦敦又在10月12日向彼得堡这两地的奥地利大使下达了指示，要他们赞成这种主张，即只有集体行动才可指望有效。过了两个月他让人转告哥尔查科夫公爵说：“进行干涉的时机可能已经来到。”他重复了10月13日（对我们来说这是关键的时刻——麦茨投降[7]前两个星期）发给柏林文普芬伯爵并由他在那里宣读的电报**。在这份电报中他涉及到我的一份备忘录，我在10月初就通过这份备忘录提请注意，拥有二百万居民的巴黎要进行反抗，直至生活资料枯竭为止，这将会引起什么样的后果。他完全正确地指出，我的目的在于解脱普鲁士政府对此应负的责任。

“根据前面所说的情况，”他继续说：“我不能压制我的忧虑之感：如果各中立国对于面临空前浩劫的危险漠然置之，将来在历史的判决面前一部分责任将落在它们身上。因此，在和您的会 97
谈中，涉及这一事件时，我不得不请求阁下允许公开表示我们的遗憾：虽然普鲁士王国政府如上述备忘录所表明的那样预感到灾难可能发生，但却断然表示拒绝第三国的任何调解活动……奥匈帝国抱怨各中立国在如此严峻的时刻不作任何调停和平的活动并非是出于对自身利益的关怀。但是它又不可能像圣彼得堡政府不久前所做的那样，同意和建议与此无关的欧洲进行绝对的节

---

* 《四分之三世纪的回忆》斯图加特1887年第2部分第361页、395页及下页。

** 引人惊异的是，文普芬伯爵宣读了这个指令；指令只是指示他，在一种特定情况下他才应按此指令的精神发表意见。

制。相反，奥匈帝国政府认为自己有责任声明：它仍然相信欧洲的共同利益，并认为通过各中立国公正的斡旋而导致和平，比继续屠杀几十万人的生命要好。”

关于此种“公正的调停”会是什么样子，博伊斯特伯爵毫不怀疑，那将是“降低胜利者的要求，减轻压在失败者身上的情感上的痛苦”[8]。像博伊斯特伯爵这样一位熟悉法国历史和法兰西民族性格的人未必相信：如果各中立国迫使我们同意降低要求，法国人在对我们的关系上由于遭到失败而受的痛苦的感觉就会少一些。

一种干涉只能包含这种倾向：通过会议来瓜分我们德国人的胜利果实。这一使我日夜不安的危险在我心中产生了迅速缔结和约的要求，以避免各中立国的干涉来实现和平。在占领巴黎之前，这是不可能实现的，鉴于法国首都传统上起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一点可以预料。只要巴黎还在坚持，就不能设想图尔和波尔多[9]以及各省的领导阶层会放弃对转机的希望，这种转机也许是指望像在利津战役[10]中得势那样的新的群众武装起义，或者指望终于“发现了欧洲”，或者指望各大宫廷里萦绕于德国人、尤其是妇人头脑中的那些英国和西方国家的“人道、文明”这类普遍流行的口号的一线朦胧微光，——那么那些主要是从法国、而不是从德国的报道中了解法国的形势的外国宫廷，就可能在缔结和约时
98 给法国人以帮助。因此，我的任务主要是在各中立国达成协议来对缔结和约施加它们的影响之前，就同法国签订条约，正如同1866年我们必须在法国能有效地干预南德意志之前就同奥地利缔结和约一样。

如果法国人在维尔特、斯皮歇恩、马尔斯·拉·土尔[11]取胜，或者我们没有取得如此辉煌的胜利，那么人们就会自然地

问，在维也纳和佛罗伦萨[12]会做出什么决定。在上述战役进行期间，有许多意大利共和党人来访问我，他们深信维克多·艾曼努尔国王有帮助拿破仑皇帝的意图，并且主张同这种倾向进行斗争，因为他们担心据认为是国王的这一意图如果实施，将会使意大利更加依赖于法国，这对他们的民族感情来说是一种耻辱。早在1868年和1869年，我就从意大利方面而且不仅仅是从共和党人听到一些类似的反法议论，这些议论明显地流露出意大利人不满意法国对于意大利的最高权威。在当时如同在后来一样，当我军向法国进攻时，我在洪堡（普法尔茨）答复这些意大利人说：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任何证据说明意大利国王为了同拿破仑友谊而进攻普鲁士；如果我主动提出断交，这就势必成为意大利敌视我们的借口和辩护，这是违背我的政治良心的。如果维克多·艾曼努尔主动提出断交，那么那些不赞成这种政策的意大利人的共和主义倾向并不会妨碍我向国王、我的君主，建议用金钱和武器来支持那些想得到这些东西的意大利不满分子。

我认为，战争本身是一件十分严峻和危险的事，所以在不仅把我们民族的未来、而且也把我们国家的存亡作孤注一掷的斗争中，当事态处于危难的转折关头，就不能以为自己有权拒绝任何一种帮助。这正如1866年在拿破仑7月4日的电报的干涉之后，我没有在匈牙利起义军的援助面前表现畏缩一样，如果事关防止失败和保卫我们的民族独立，我也会认为意大利共和党人的援助是可取的。意大利国王和博伊斯特伯爵的游移不定曾因我们最初的辉煌胜利而消失，但是它可能由于巴黎城下的僵持状态而极为轻易地复苏，因为我们不能在像英国这样重要的国家的领导集团 99
中得到多少可以信赖的、其中包括只愿以外交方式表示的同情。

在俄国，亚历山大二世皇帝的个人感情，不仅是对他舅舅[13]的友好感情，而且还有他对法国的反感，给我们提供了一种保障，这种保障自然可能由于哥尔查科夫公爵的法国化的虚荣心和他同我的竞争所削弱。因此，局势提供了一种可能，使我们在黑海问题上向俄国证明我们的情谊，这是命运的眷顾。就像由于玛丽亚王后与俄国的亲戚关系所引起的俄国宫廷对废止汉诺威王朝[14]而产生的不满情绪，由于1866年对俄罗斯王朝的奥尔登堡的亲族[15]在领土和财政问题上作了让步而得到抵消一样，在1870年出现了不仅是向王朝、而且也是向俄罗斯帝国效劳的可能性，这涉及那些在政治上不明智的、因而也是不可能持久的规定，这些规定限制了俄罗斯帝国在它的黑海沿岸地区的独立性。这是巴黎条约[16]最笨拙的一些规定，因为不可能长期禁止一个拥有成亿人口的民族对自己的海岸行使理所当然的主权。外国在俄国领土上长期行使这种地役权[17]，对于一个伟大民族来说，是不堪忍受的屈辱。但对我们来说，这是培植我们同俄国关系的一个把柄。

当我试探哥尔查科夫公爵对这一问题的意向时，他对我的主动行动只是勉强地表示赞同。他的个人恶感超越了他对俄国承担的责任感。他不想求得我们的任何情谊，而是同德国疏远，去赚取法国的感激。我需要十分正直的、始终对我们友善的、当时身为俄国全权军事代表的库图佐夫伯爵给以协助，以便使我的建议能在彼得堡发生效力。如果根据我同哥尔查科夫公爵持续了几十年的关系来设想：在他心目中他同我的个人竞争比俄国的利益更为重要，那么未必能说我对他的看法是不公正的，因为他的虚荣心和他对我的嫉妒心胜过了他的爱国精神。

最能说明哥尔查科夫这种病态的虚荣心的是1876年5月他在

柏林逗留期间和我谈话中的一些意见。他谈及感到疲倦并想退休，这时他说："只要我没有在欧洲主持过哪怕是一次微不足道的 100
会议，我就不能上天去见圣彼得。"随即我请他主持当时正在举行的一次外交会议，不过这次会议只是半官方性质的，他便前往主持。听着他那作为主席所作的冗长演说，我感到百无聊赖，便用铅笔写道：夸夸其谈，夸夸其，夸夸，夸。坐在我旁边的奥多·罗素勋爵，从我手中抽走了这张纸，收藏起来。

当时他还声称："如果我退休，我就不愿像一盏冒烟的油灯那样熄灭，而要像一颗明星那样陨落。"根据他的这番表白，1878年他最后一次在柏林会议上充任的角色并未使他称心如意，是毫不奇怪的。皇帝任命出席这次会议的首席全权代表不是他，而是舒瓦洛夫，因此，只有舒瓦洛夫，而不是哥尔查科夫，才拥有俄国的发言权。

哥尔查科夫几乎是强使皇帝同意任命他为出席这次会议的成员，这是由于在俄国对待那些有功勋的高级官员所采取的传统礼遇，才使他如愿以偿。在会议上他还企图尽可能地按《莫斯科日报》[18]的精神来维护自己的声望，避免承担俄国所做的让步的后果，他借口身体不适，不参加面临作出让步的会议。与此同时，他却有意地让人们在他那坐落于菩提树下大街寓所第一层的窗口看到他是健康的。他希望将来有可能使俄国的"社会"相信，在俄国让步的问题上他是没有罪责的：真是一种牺牲国家利益的不足取的利己主义。

此外，俄国所缔结的和约，即使算不上是自从对土耳其的历次战争以来所签订的最有利的条约，那也是自这次会议以来最有利的和约之一。俄国直接占领的是在小亚细亚的巴统、卡尔斯等

地。但是，如果俄国确实认为它的利益在于把信仰东正教的巴尔干国家从土耳其的统治下解放出来，那么在这一方面的结果便是希腊基督教的因素向前发展了一大步和大大地削弱了土耳其的统
101 治。圣斯蒂凡诺和约[19]中由伊格纳季耶夫提出的最初的和约条件和会议结果之间，在政治上的差别是微不足道的，如南保加利亚轻而易举地背离和它并入北保加利亚所证明的那样。即使此事没有发生，俄国战后总的成就仅就会议决议的后果而言，也比过去的成就更为辉煌。

俄国通过把保加利亚授予当时俄国皇后的侄子巴滕贝格亲王，从而把它交到了不可靠的人的手中，事态的这种发展在柏林会议上是不可能预见到的。巴滕贝格亲王是为保加利亚选定的俄国候选人，鉴于他是皇室的近亲，就可假定这种关系是会持久而牢固的。亚历山大三世皇帝把他表兄弟背离的原因只是简单地解释为他的波兰出身。在他表兄弟的行为使他大失所望时，他的第一声喊叫便是："波兰人母亲"[20]。

正像俄国报刊那样，在对外关系方面人民是不了解的，而对这种报刊又可以容易地施加压力，于是违背真理和理性的各种现象就可能发生，俄国对柏林会议的结果感到愤懑便是此类现象之一。由于对过去的同侪（德意志帝国的宰相）满怀愤恨和嫉妒的刺激，并得到了法国同党和他们的法国亲族（万诺夫斯基、奥勃鲁切夫）的支持，哥尔查科夫的全部声势足够使以《莫斯科日报》为首的新闻界制造假相，对德国在柏林会议上似乎不恪守信用而使俄国遭受损失一事表示愤懑。当时在柏林会议上俄国所提出的要求没有一项会不为德国所力求通过，为此有时甚至不顾英国首相[21]有病在身，卧床不起，而采取强硬态度。他们并不对此

表示感激，而是在那位厌世的、但一直病态地追求虚荣的哥尔查科夫公爵以及莫斯科新闻界的领导下，继续使俄德两国进一步疏远起来，并认为这符合俄国的政策。这对这两个相邻的伟大帝国的任何一方的利益都是绝无必要的。我们之间没有互相嫉妒之事，彼此也无需从对方攫取为己所用之物。损害我们两国关系的，只是像哥尔查科夫之流的以及同法国联姻的身居高位的军人们的那种个人情绪，或者还有像在七年战争前夕因弗里德里希大王对俄国女皇[22]的嘲讽而引起的那种君主之间的不和。因此，两 102
国君主之间的个人关系对维系相邻两大帝国的和平有重大的意义。和平遭到破坏的原因只可能是有影响的政治家的个人情感，而决不会是利害冲突。

哥尔查科夫在内阁中的下属评论他说："他照着墨水瓶顾影自怜。"这和蓓蒂娜·冯·阿尼姆评论她的表弟、有名的萨维尼时说的话相似，蓓蒂娜说："他不照着水沟欣赏一下自己的影子是决不跨过它的。"哥尔查科夫的大部分电报，尤其是那些内容最公正的电报，都不是他自己，而是若米尼起草的。若米尼是一位才思敏捷的编辑，是亚历山大皇帝征招来为俄国服务的一位瑞士将军的儿子。哥尔查科夫口授的电报中，更多的是华丽的辞藻，而若米尼所写的电文却比较朴实。哥尔查科夫口授时，习惯于摆好一定的姿势，说上一句开场白："请写吧！"如果这位秘书善窥人意，他就会每逢遇上特别流利的长句时，必然向自己的上司投去赞赏的一瞥，而后者对此则极为敏感。哥尔查科夫对俄语、德语、法语都同样精通。

库图佐夫伯爵是一位诚实的军人，没有个人的虚荣心。最初，由于名望重大，他曾在彼得堡以近卫骑兵军官的资格身居要

位，但是他没有得到尼古拉皇帝的善待。在彼得堡有人告诉我说，有一天，尼古拉皇帝在队列前对他喊道："库图佐夫，你不会骑马，我把你调到步兵去。"库图佐夫从此就退伍了，到克里米亚战争时他才重新服役，担任一个无足轻重的职位。在亚历山大二世执政时，他仍旧留在部队里，终于被任命为驻柏林的全权军事代表。在那里，他以耿直和善良赢得了许多朋友。在对法战争时期，他作为普鲁士国王的俄国侍从武官陪伴着我们，可能多少是由于尼古拉皇帝对他的骑术所作的不公正的评价的影响，他骑马走完了行军的全程，每天 50 至 70 俄里，而国王和他的侍从们却一路以车代步。最能说明库图佐夫的善良和他在伍斯特豪森[23]打猎时表现的风度的是，库图佐夫偶然在国王面前说，他的祖先出身于普鲁士—立陶宛地区，去俄国时名字叫库图，对此，弗里
103 茨·欧伦堡伯爵以他那种说俏皮话的方式说道："这么说，你是到俄国才捞到了佐夫（'Soff'，醉酒）这个词尾的啰。"接着便是一片欢笑，库图佐夫也跟大家一起真心地乐了起来。

除了这位老兵的严谨负责的报告，萨克森大公[24]定期给亚历山大皇帝的亲笔书信提供了直接向沙皇传送真实消息的又一途径。大公过去和现在都一贯对我十分友好，他在彼得堡维护着两国政府之间的良好关系。

由于围攻旷日持久，欧洲可能进行干涉，这是使我感到焦急不安的根源。处于我们在巴黎所面临的这种形势[25]，无论是最好的指挥，还是最大的勇敢，都不能排除战局的变化；任何一种偶然事件，都可能造成这种战局的变化。被围困的军队在数量上很强大，各省武装力量的人数和驻地难以控制，我军阵地处在这两者之间，就为出现各种偶然事件提供了广泛的余地，即使我们在

巴黎城下，在法国西部、北部和东部的军队能够避免瘟疫的侵袭。这一异常严寒的冬季所造成的艰难困苦对德国军队的健康状况将影响到何等程度这个问题，也无法预料。在此种种情况下，我的忧惧并不算过分。当时我彻夜不眠，痛苦地担心在取得如此重大的成就之后，由于在对进攻巴黎采取进一步的措施上优柔寡断和迟疑不决而可能使我们的政治利益蒙受巨大的损失。在相邻两个民族的百年来的古老的斗争中的世界历史性的结局处于危若累卵的境地，而迫在眉睫的危险是，这场斗争会被毫无历史理由的个人影响、主要是妇人们的影响引入歧途。这些影响之发生作用不是由于政治上的考虑，而是由于由英国输入的有关人道和文明的陈词滥调在德国人心目中迄今所引起的情感上的反响。还在克里木战争时期就从英国传来了一种对人们的情绪不无影响的说教，根据这一说教，为了“拯救文明”我们不得不为土耳其人而拿起武器。只要人们愿意，一些决定性的问题可以被当作纯军事性的问题来处理，并以此为借口剥夺我参与解决这些问题的权力；然而一切外交前景最终都取决于这些问题的解决。而如果对法战争的结局对于德国好处不多的话，那么尽管这场宏伟的战争捷报频传，激情高涨，但对我们民族的统一来说却不会起到作 104
用。我从不怀疑，在建立德意志帝国之前，必须取得对法战争的胜利[26]，而如果我们这次不能完全赢得胜利，那么我们的完全统一没有预先的保障，而预计还会发生新的战争。

(三)

不能设想，从纯军事观点来看，其他将军会有不同于罗昂的

见解。处于数量上超过我们的被围军队和法国各省武装力量之间的我军阵地，在战略上受到威胁；如果不把它作为发动进一步攻势的基地来使用，就难以指望守住它。在凡尔赛的军界人士[27]，要求结束这种状况的热切并不亚于国内因僵持而引起的焦虑。甚至不必估计发生疾病和由于不能预见的不幸或犯错误而遭到打击这种可能性，就会不由自主地得出使我不安的想法并给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由于在巴黎城下表面上的无所作为和我们态度的软弱，我们的威望以及由于我们初期获得的迅速而巨大胜利而对各中立国宫廷在政治上所产生的印象是否会烟消云散？锤炼出持久的统一的那种奔放热情之火能否保持下去？

由于我军表现了一种不能总是作为战略考虑依据的英勇顽强的精神，所以在奥尔良和第戎两省[28]的战役仍然以我方的胜利而结束。我们数量较少的军队不顾风雪严寒以及给养和弹药的不足战胜了数量上占优势的法国军队，全赖于士气高涨，而任何一种意外事故都会使这种士气遭受挫伤。只要想到这一点，任何一位不是完全靠乐观的推测来作战的统帅都必然会深信，我们应当竭尽全力，千方百计地强攻巴黎，以便尽快结束我们这一不稳定的处境。

但是，为了加紧进攻，我们没有得到的命令并缺乏重型攻城炮，这同 1866 年 7 月在佛罗里特斯多夫战线所遇到的情况一样。大炮的运送赶不上我军胜利前进的步伐；我们的铁路运输设
105 施不足，有些地方铁路中断，或者如在朗尼[29]那样完全不能使用，以致不能完成这一任务。

利用现有的全部铁路车站，本来无论如何会以比这种状况快得多的速度把重炮和射击所必需的大量的重型炮弹运送上去。但

是正如官员们向我报告的：有约1500辆的车皮被调去给巴黎人运送食品，以便在他们投降以后迅速得到给养，因而这1500辆车皮不能运送军火。后来巴黎人拒绝接受装在这些车上的猪油，在我离开法国以后，冯·施托什将军向驾临菲列拉的国王陛下建议改变我们关于德军供应的国家合同，因此，这些猪油就转给了军队，而军队怀着不满食用了这些储存过久的食品。

因为手头没有足够的炮弹，不可能进行有效的、不停顿的炮击，所以在机车车辆缺乏的情况下，就需要大量马匹作为牲口和与此相应的数百万开支。我不理解，既然这是战争目的的需要，怎么能对我们是否使用这几百万块钱而犹豫不决呢？不久前因劳累过度而疲惫不堪的罗昂，有一次他告诉我说，人们问过他，他是否准备在不久的将来把大炮运送上去，因此人们现在把责任推到了他的肩上，这时我感到事情已经前进了一大步；而他对此事的可能性表示怀疑。我请求他立即接受这一向他提出的任务，并表示，如果他打算购买据说为运送大炮所必须的约4000匹马，我准备把所需的任何数目的款项拨到联邦金库[30]中去。罗昂下达了相应的指令，于是对蒙特·阿韦龙[31]的炮击开始了，这在我们军营内人们曾以急不可耐的心情期待着，因而它受到人们热烈欢呼。这是事态转折的结果，这一转折基本上归功于罗昂。在帮助他运送和使用大炮一事中，克拉夫特·霍亨洛埃亲王真是竭尽全力了。

如果有人问，将军们能够拿出什么来反对罗昂的观点，那就很难找出拖延至年终才采取措施的实际理由[32]。不管从军事观点还是从政治观点来看，拖延是荒谬的和危险的，其原因并不在于我们军队指挥部的优柔寡断，这一点从迅速而果断地指导战争直 106

至逼近巴黎的行动中便可加以断言。巴黎虽然已经设防，并且是敌人最强大的堡垒，但不允许像对任何别的要塞一样加以攻击。这种观点是从英国经过柏林的曲折途径传到我们军营里来的，同时还夹杂着什么“文明的麦加城”[33]之说，以及其他在英国社会舆论的骗人隐语中流行的和在利用人道感情上颇为见效的说法。英国期待着所有其他大国都表现出这种人道感情，但它对待自己的敌人却并不总是如此人道。伦敦在我们的领导阶层那里主张的想法是，只应当用饥饿、而不允许用大炮迫使巴黎投降。这种办法是否较为人道，可以争论；甚至假如饥饿没有为放纵野蛮的无政府主义作了准备，巴黎公社的恐怖行径是否会爆发，也是可以争论的。当英国施加有利于人道主义的饥饿围困法的影响时，起作用的究竟只是一种单纯的多愁善感，还是也有政治上的企图呢？这一问题姑且不论。不论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英国都没有任何实际必要来防止我们或者法国免受战争的损失和削弱。无论如何，在占领巴黎和结束军事行动方面，拖延耽搁给我们增加了这样一种危险，即我们的胜利成果可能受到损害。根据来自柏林的可靠情报可以觉察到，我们的军事行动的停止不动在专家人士中引起了忧虑和不满，人们指摘奥古斯塔王后通过宣扬人道精神的信件对自己的至尊的丈夫施加影响[34]。当我向国王暗示了这类消息时，引起了他的一阵震怒，不是因为这些传闻毫无根据，而是因为他要向任何一个敢于对王后表示不满的人施以严厉的威吓。

在战争指导中，某些转变的主动一般不是国王做出的，而是由总参谋部或者作为最高统帅的王储做出的。这些人士受了英国观点的影响，如果这些观点以友好的形式发生作用，那么从人情

来说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王储的妃子、毛奇的已故妻子、总参谋部长官并在以后晋升为元帅的布鲁门塔尔伯爵的妻子以及在总参谋部中影响仅次于他的军官冯·哥特贝格的妻子，都是英国人。

由于1891年在《德意志评论》上发表了罗昂伯爵的一些文件，有关拖延向巴黎进攻的原因成了时事评论的题目，而了解情况的人对此都有意保持沉默。在所有反驳罗昂的叙述的评论中，都回避了柏林和英国的影响，对于800辆、据另一些消息则说1500辆车皮装着给巴黎人的粮食几个星期停着不动这一事实也同样缄口不言。除了报纸上的一篇匿名文章外，全都避而不谈军事指挥部是否及时关心过攻城炮的运送问题。我写过几篇札记刊登在《德意志评论》上，这是在这里涉及的几期《德意志评论》出版之前写的，我认为没有任何理由需要对这些札记作某些修改。 107

（四）

在扩大北德意志联邦时，由国王接受皇帝称号是政治上的需要，因为在人们的记忆中，往昔年代这个在法律上的意义比现在大、而实际意义却比现在小[35]的称号构成了一种促进统一和集中的因素。我确信，对我们的立法机关施加要求巩固联合的这种压力的普鲁士代表者，越是力图避免那种危险的、然而却是德意志过去历史所固有的、在其他王朝心目中突出自己优越性的意图，那么这种压力就应该越持久。威廉国王并不是没有此类倾向，他之所以不愿接受皇帝称号是与他要求人们承认他那个世袭的普鲁士王权比皇帝称号享有更大的威望这一需要不是没有关系的。在他看来，皇位是一种现代的委任职务，这一职务的权威弗里德里希

大王就反对过，它也曾使大选帝侯[36]受到压抑。他在前几次讨论时说："我要这个美妙的头衔干什么?"我对此回答说："可是您，陛下，并不想永远保留中性的'首领地位'呀!'首领地位'一词不过包含着抽象概念，然而在'皇帝'一词中却意味着巨大的权力。"

最初，在战争进程对我们有利时，我的确立皇帝称号的意向并未一贯得到王储的赞同，我的这种意向绝不是出于普鲁士王朝的虚荣心，而只是出于它有利于促进民族统一的信念。王储殿下从一位他所言听计从的政治幻想家那里采纳了这样一种思想：由查理大帝复兴起来的"罗马"帝国的遗产是德国的不幸，因为这是一种外国的对于民族有害的思想。不管这从历史上看是多么令人信服，亲王的谋士们[37]所认定的德国人的"国王"称号是防止类
108 似危险的保证，这又是多么脱离实际。今天显然不存在这种危险，即仅仅存在于人民记忆中的皇帝称号，会促使德国军事力量违背自身的利益去为外阿尔卑斯山[38]直到阿普利亚[39]的野心效劳。亲王向我表明的那种要求，来源于错误的认识，但据我的印象判断，这种要求却是十分强烈和认真的，并且期望我去将其付诸实践。我反对的借口是：巴伐利亚、萨克森、符腾堡的国王们在此种情况下会和日耳曼人选定的国王或者德意志人的国王同时并存，出乎我的意料，我这样的联系却使他们得出进一步的推论，即上述诸王朝必须停止享有国王称号而重新用公爵称号。我表示坚信，他们是不会自愿同意这一点的[40]。如果人们想动用武力，那么这种事情将永世难忘，并播下不信任和仇恨的种子[41]。

在格夫肯[42]的日记中曾暗示说，我们不认识我们的力量。在当时的条件下，使用这种力量会成为德国未来的弱点。显然，日

记并不是当时写的，但是后来加上了一些词句，宫廷的那些沽名钓誉分子企图利用这些词句，把日记的内容弄假成真。我在已发表的奏折中说明，我确信日记是假的[①]，并对那些阴谋家和阿谀者怒不可遏，因为他们把那位容易轻信、品德高尚的弗里德里希皇帝团团围住。我在写这一奏折时，根本没想到这位汉撒同盟的韦尔芬党人格夫肯自己就是伪造者，他对普鲁士的憎恨并不妨碍他多年骗取普鲁士王储的垂青，以便更有效地损害他、他的家族和他的国家，但是他自己可以显露头角。有一伙沽名钓誉的家伙从1866年以来就满腹怨恨，因为他们认为，他们和他们的作用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格夫肯就是其中的一位。

除了巴伐利亚的谈判者以外，路德维希国王的亲信，御马总监[43]霍尔施泰因伯爵，作为国王的特派代表也在凡尔赛。在皇帝称号问题处于危机阶段和此事由于巴伐利亚的沉默和威廉国王的冷漠而受到失败威胁的关头，霍尔施泰因伯爵应我的请求，答应向他的君主递送我的信件，而我为了不耽搁发信，就立即在刚刚收拾了的饭桌上，用次等纸和劣质墨水写好了一封信。在这封信中我阐明了我的想法：巴伐利亚王权不可能把首领的权利让给普 109
鲁士国王，而不致引起自信心受到损伤的巴伐利亚人的不满，虽然对领导权让步之事已得到巴伐利亚的正式同意。普鲁士国王是巴伐利亚国王的邻居，在部族关系不同的情况下，巴伐利亚所作的和已经作出的让步必定会遭到更为激烈的批评；而由于德意志各部族的相互敌对，这种批评会变得更加敏感。在巴伐利亚境内行使普鲁士的权威，这是一个新的现象，它会使巴伐利亚人的情

① 日记是假的这一假设，没有得到证实。——德文本注

感受到损害。但是德意志皇帝已经不是巴伐利亚的异族邻人，而是同胞；依我之见，路德维希国王可以体面地只对德国皇帝，而不是对普鲁士国王作出为了维护首领权威已经做出的那些让步。在我的论证的主线上，我还加了一些个人性质的论据，使之回忆起巴伐利亚王朝在管辖勃兰登堡边疆行政区时（路德维希皇帝[44]），曾对我的好几代前辈表示特殊的善意。我认为，面对具有这一国王派别的君主提及家族经历的论据是有益的，但我相信，对德意志帝国的领导权和普鲁士王国的领导权的差别进行政治方面和王朝方面的估价，是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的。在两个小时之内，在11月27日，伯爵便动身前往霍亨施万郜，路上走了四天，困难多端，时走时歇。国王因牙痛卧床不起，起初拒绝接见伯爵，但在得知伯爵是受我委托并带有我的信件之后，还是接见了他。接着，他在床上当着伯爵的面，把我的信细看了两遍，要来了笔墨纸张，给威廉国王写了一封书信，这封书信是我请求他写的，并为其拟定了提要。信中以颇有说服力的暗示方式表达了主张皇帝称号的主要论据，这就是巴伐利亚可以只向德意志皇帝、而不向普鲁士国王[45]作出他已许诺的、但尚未得到批准的让步。因考虑到国王不喜欢皇帝称号，我便有意地使用这一说法，为的是对他施加压力。霍尔施泰因伯爵起程后的第七天，即12月3日，便带着这封书信回到了凡尔赛。当天就由当今的摄政[46]卢伊特波尔德亲王将这封书信正式呈交给了我们的国王。因而在顺利完成这项困难工作的过程中，这封书信乃是一个重要因素，而这项困难工作，由于威廉国王的抵触以及直到那时尚未确切判明巴伐利亚的观点，其前景曾不止一次地暗淡起来。霍尔施泰因伯爵
110 废寝忘食，一周之内走完往返路程，并巧妙地完成了前赴霍亨施

万郜的使命，在排除外部障碍来解决皇帝称号的问题，进而实现我们民族统一的事业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在给皇帝称号措词时，又出现了新的困难，因为国王陛下如果接受皇帝称号的话，希望被称为“德国的皇帝”。在这一阶段，早已放弃了关于德国人的国王这一观念的王储和巴登大公，分别以各自的方式支持了我，虽然他们两人对老国王极度憎恶“美妙的头衔”的态度谁也没有公开反对过。王储当着自己的父亲的面给予我消极的支持，通过机会简单地表明了自己的意见，然而这不但无助于我对国王的争辩地位，反而加剧了国王的恼怒情绪。因为国王极为真诚地铭记着立宪誓言和大臣的责任，比较容易地倾向于对大臣、而不是对自己的儿子作出让步。他是从家族长老的立场来看待同他儿子的分歧的。

在1871年1月17日最后一次会议上，国王拒绝接受“德国皇帝”（Deutscher Kaiser）的称号，并声明，他希望当“德国的皇帝”（Kaiser von Deutschland），或者根本不当皇帝。我强调说，用形容词表示的“德国皇帝”和用名词第二格表示的“德国的皇帝”只是语法和暂时的区别。人们都说罗马皇帝，而不是说罗马的皇帝；沙皇不称自己为俄国的皇帝，而称为俄国皇帝或“全俄”皇帝。国王引证他那俄国的卡卢加兵团[47]的报告，对沙皇的称谓进行激烈的争辩说，这些报告总是写成“pruskomu”（“致普鲁士”）。这是国王翻译错了。我解释说，这是形容词第三格，他不相信，只是到后来，他才被一位人们熟知的俄语权威，宫廷顾问施奈德尔说服了。我接着援引说，在弗里德里希大王和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当政时，在塔勒尔银币上铭刻的是“Borussorum rex”（普鲁士国王），而不是“Borussiae rex”（普鲁士的国

王）[48]；“德国的皇帝”这一称号包含着对非普鲁士的领土提出领土主权的要求，对于这一要求，各邦君主是不会同意的；在巴伐利亚国王的书信中提到：“实施联邦的领导权力和德意志皇帝称号结合起来”；最后我说，根据联邦会议[49]的建议，这一称号已被写
111 进宪法第十一条的新版本中。

会议转入讨论皇帝和国王之间，大公[50]、大侯以及普鲁士亲王之间的地位。我主张皇帝在原则上不享受高于各国王的优先地位，但这一主张受到怀疑，尽管我引证了以下的事实：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在同查理六世（他对勃兰登堡选帝侯毕竟具有领主的地位）的一次会见时，以普鲁士国王的身份，提出并坚持要求平等相待，曾为此下令建造了一座亭子，两位君主同时从相对的方向步入其内，以便在亭子中央相会。

王储表示同意我的结论，这就更加激怒了老国王，他向桌子猛击一拳，说道：“如果过去是那样，那么我现在命令：也应当那样。大公和大侯过去一贯对于普鲁士亲王享有优先地位，今后仍然应该如此。”他说着站起身来，走到窗前，转身背向坐在桌子周围的人们。对皇帝称号问题的讨论没有做出任何明确的决议。不过我们认为自己有权规定皇帝登基的仪式，但国王却命令说，到时必须称“德国的皇帝”，而不是“德国皇帝”。

这种事态促使我在第二天清晨，在明镜大厅[51]举行的庆典开始前拜访巴登大公，他是到会君侯中的头号人物，预定在宣读告示之后讲话。我问他准备如何称呼新皇帝，大公回答说：“遵照陛下的旨意，称德国的皇帝。”我认为，不能用这种形式来最后欢呼皇帝“万岁”，为了给这一想法进行辩护，我引证了许多论据，其中最有说服力的是引用了这一事实：关于帝国宪法的未来条文在

法律上已由柏林国会预先作了决议。在他的遵从宪法的思路中这一点涉及到国会决议，从而促使他再次觐见国王。大公和国王的谈话内容我一直不得而知，因此直到宣读告示以前我一直处于紧张状态。大公不是向“德国的皇帝”，也不是向“德国皇帝”，而是向威廉皇帝欢呼万岁，从而摆脱了困境。

皇帝陛下对我安排的这一过程十分恼怒，他从君主们站的高台上下来时，对我不屑一顾，从我身旁走了过去，同站在我身后 112
的将军们握手[52]——尽管当时只有我一个人站在台前的空地上。他的这种态度持续了好几天①，直至我们的相互关系逐渐恢复到以前的正常状态。

① 巴登方面与这一说法有矛盾：皇帝在五时左右举行的庆祝宴会上以特别的衷心的诚意向帝国宰相举杯祝福。当然这也不是不可能的，即在这次宴会后，不满的态度又表现了出来。——德文本注

119

第二十四章　文化斗争[1]

(一)

从11月5日到9日，我同波兹南和格涅森辖区大主教列多霍夫斯基伯爵在凡尔赛举行了会谈。会谈主要涉及罗马教皇[2]的领土权益。由于我一直担心中立国家的干涉会破坏我们的胜利成果，我就像俗语所说的“相互帮助”，向他提议，由教皇本着和约的精神对法国的教会施加影响，以表明教皇和我们之间的关系。列多霍夫斯基，其次还有罗昂的红衣主教[3]—大主教蓬纳绍兹* 都为使教会上层的各方代表在这方面发挥作用而做了努力，但他们能告知我的却只是他们的行动得到冷漠的否定答复。我由此得出的结论是，罗马教廷不是没有力量便是没有诚意在和约问题上给予我们十分宝贵的援助，以使我们可以忍受由于公开维护教皇在罗马的利益而在德国新教徒和意大利民族党中将会引起的不满，以及此种不满情绪对两国人民未来的关系的影响。

在变幻莫测的战争中，在意大利相互斗争的因素中，起初国

---

* 当我进入小小的客厅时，闻到了一股烟香，这股烟香从关得不严的门透到敞开的会议室来。我不知道，这一驱除邪魔是针对我的还是针对那装饰在壁炉框架上的时钟上的以赛亚的肖像的。

王看来可能是我们危险的敌手。[4]战争爆发时加里波第领导的共和党曾许诺支持我们以反对国王[5]的亲拿破仑的游移不定的意图，后来在战场上便反对我们了，其狂热之情与其说有什么实际意义，不如说富有戏剧性，其作战方式使我们的士兵感到震惊。在这两种因素之间的是意大利知识阶层的社会舆论所怀有的和能够持久地保全的对于德国人民在历史上和当前的相类似的努力的同情，还有就是一种十分强烈和实际的民族本能，这种民族本能最终促 120
使意大利和自己过去的敌手奥地利[6]一起加入三国同盟。如果公开站在教皇一边并同意其领土要求，我们就会和意大利的这种民族潮流决裂。我们是否会以此换来教皇对我们内政的支持以及这种支持到何种程度，是值得怀疑的。和教皇无误主义的教义[7]相比，我觉得教皇权力限制主义[8]比我在1870年对它的估计更有力量，比起我认为教皇在德国、法国、匈牙利全部主教中取得的惊人成功时，教皇又显得比较软弱了。在我国，耶稣会中央党很快变得比教皇势力更大了，至少是不依赖于他了。在我国天主教同胞中，日耳曼人的党派精神是连教皇的意志也无力反对的因素。

列多霍夫斯基的谈判失败对同月16日进行的普鲁士邦议会的选举是否产生了影响[9]，对于诸如此类的问题我且置之不论。美因兹主教冯·凯特勒男爵本着同以前有所不同的精神，恢复了谈判。为此目的他在1871年国会会议初期曾几度访问过我。我于1865年同他建立了联系，当时我问过他是否会接受波兹南的大主教职位，我的意图是：表明我们不是反天主教的，而仅仅是反波兰的。凯特勒可能是在征求了罗马方面的意见之后以不懂波兰语而拒绝了。1871年，他向我概括地提出了把普鲁士宪法的一些条

款写进帝国宪法中的要求，这些条款规定了天主教会在国家中的地位，其中三条（15、16、18）根据1875年6月18日法令[10]已被取消。在我看来，我们政策的方向不是取决于宗教信仰的目的，而只能取决于尽可能持久地巩固在战场上争得的统一这种愿望。任何时候，在宗教信仰方面我是宽容的，但是应当在一个国家机体中由于共存的必要性而对每一种宗教的要求所规定的范围之内。然而在一个世俗的国家里，对天主教会用各种内科医疗办法是困难的，因为天主教会如果想要彻底完成自己的教义使命，就必须超出教会的范围而要求参加世俗政权，它是以教会为形式的政治机构，向它自己的神职人员传播自己的信仰，即：天主教的自由寓于它的统治之中；凡在教会不占统治地位的地方，它便有权抱怨这是戴克里先式的残暴迫害[11]。

121 在这种意义上我同冯·凯特勒先生就他明确提出的他的教会（亦即僧侣们）拥有世俗权力的宪法权利的要求进行过几次争辩。在他的许多政治论据中还有多半是从人的感情方面讲的一种理由，即：就我们离开尘世后的命运而言，对天主教徒的保障比对其余的人是要更大些。因为，假定天主教的教义是荒谬的，而福音派新教[12]的信仰是纯正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天主教徒灵魂的命运也不会更坏；在相反的情况下，异教徒灵魂的未来则是可怕的。对此他联系到这个问题："难道您认为天主教徒不能得福吗?"我回答道："未出家的天主教徒无疑是可能的，至于神甫，我是怀疑的；他心中怀有'反对圣灵的罪孽'，《圣经》的经文也在反对他。"对我以戏谑口气说的一番反驳的话，主教微笑着报以彬彬有礼而又带有讥讽意味的鞠躬。

我们的谈判未获结果，此后天主教徒，特别是萨维尼和马林

克罗特愈来愈热衷于1860年创建的而现在称之为中央党[13]的天主教党派的新生。在这一党派身上，我观察到，不论在法国还是在德国，教皇比起他在外表上所显示的要较为软弱；无论如何，他并非强大得足以使我们不惜以拒绝其他实力因素的同情为代价来换取他对我们事业的支持。安东涅利红衣主教于1871年6月5日写给凯特勒主教的信中所持的异议，勒文施坦·韦特海姆侯爵的中央党的使命，中央党在七年法[14]问题上的不屈服态度——这一切给我的印象是：上帝赋予中央党的是党派精神而不是其他民族所具有的民族意识，这种党派精神比教皇的力量更为强大，并且不是表现在没有未出家的教徒参加的会议上，而是表现在德国内部议会斗争和政论斗争的战场上。如果不考虑像耶稣会那样的竞争力量，而教皇的势力能够发挥作用的话，情况是否也会是这样，我觉得这还有待于研究——对于红衣主教—国务秘书弗朗奇[15]的突然死亡且不考虑。谈到俄国，有人说：那是“由于弑君而变温和了的绝对专制统治”。教皇对教会政策方面互相竞争的机构抱以极端轻蔑的态度，难道他比沙皇更不怕教会的“虚无主义者”吗？对于聚集在梵蒂冈的主教们来说，教皇是强有力的；而如果教皇和耶稣会携起手来，那么他就要比在自己的驻地以外企图粉碎通常作为议会天主教代表的世俗耶稣教徒的反抗时更 122
加强而有力。

(二)

对于我来说，文化斗争的开始主要是由它涉及波兰问题这一方面所决定的。从放弃了弗洛特韦尔和格罗尔曼[16]的政策时起，

从拉德齐维尔家族对国王的影响[17]巩固之后，随着宗教事务部内建立了“天主教司”[18]以来，统计材料表明，波兰民族意识靠损害波兹南和西普鲁士德国人的民族意识而得到了毋庸置疑的迅速发展；而在上西里西亚，“沼泽波兰人”[19]的至今仍是地道的普鲁士因素被波兰化了。沙夫拉奈克被选入那里的邦议会，他在议会讲坛上用波兰语讲话，对我们引用了一个谚语说明德国人和波兰人之间的兄弟般的团结是不可能的。在西里西亚只有依仗天主教司的官方权威才有可能产生类似这种情况。由于向侯爵大主教①告了状，才禁止沙夫拉奈克在左侧“就座”。结果，这位粗壮的神甫，就像哨兵似的在左侧席位的板凳前面挺身直立，每次要站五六个小时；而当会议早晚都进行时，则要站上十个小时，因而当他发表反德演说时，也就用不着起立了。在波兹南和西普鲁士，根据官方报告的材料看，成千上万的德国人以及上一代是正式德国人的整个村庄在天主教司的干预下接受了波兰的教育而被正式称为“波兰人”了。在天主教司全权在握的情况下，如不取消这个司，在这里则无论什么办法也是无济于事的。照我看，应当把取消天主教司作为要争取的最近目标。这自然地遭到了宫廷内拉德齐维尔势力的反对，而出乎意料地遭到了我的同僚——宗教事务大臣[20]、他的妻子以及王后陛下势力的反对。当时的天主教司司长是克雷齐希，他从前曾是拉德齐维尔家族的职员，所以即使担任了国家职务，他也仍旧是这样的角色。拉德齐维尔家族势力的代表是两兄弟中的弟弟博古斯拉夫侯爵——柏林市议会的显要官员。兄长威廉及其子安东都是非

① 亨利希·福尔斯特。——德文本注

常诚实的士兵，因而不会参与波兰人反对国王及其国家的阴谋。宗教事务部天主教司原来的宗旨是借助普鲁士天主教徒在同罗马的相互关系中维护本国权利的机关，可是随着其成员的更 123
动而逐渐变成了在普鲁士官僚机构中维护罗马和波兰利益而反对普鲁士的一个官厅了。我多次向国王解释说，这个司比柏林的圣使[21]还坏。这个司按照罗马的指示行事，可能不总是直接受命于教皇，而最近它主要是受波兰的影响。在拉德齐维尔家族中，夫人们以及还怀有普鲁士军官荣誉感的兄长威廉及其子安东都对德国人抱有友好的感情，而且安东和陛下还怀有个人的忠诚。但是作为这一家主要成员的神甫们鲍古斯拉夫侯爵及其儿子所具有的波兰民族感情要比任何其他感情强烈，这种感情是在波兰和罗马教会利益一致的基础上培植起来的，这种基础唯有在和平时期才是容许的、但也是当时十分可行的。可是天主教司司长克雷齐希仿佛是拉德齐维尔家族的奴隶。罗马教皇的使节会认为自己的主要任务是维护天主教会的利益，而不是波兰人的利益。他不像天主教司成员那样和官僚机构保持密切的联系，这些天主教司成员作为敌视国家的党徒而钻进了内阁的要害部门，即我们对付革命发动的防卫体系。最后，罗马教皇使节作为外交使团的成员同所派驻国的君主和宫廷保持并发展良好关系，他相信对他个人是有利害关系的。

我虽然未能消除皇帝对于在柏林的罗马教皇使节大概是表面上的厌恶心情，但他毕竟相信天主教司的危险性，并不顾皇后的反对，表示同意撤销该司。缪勒因受妻子的影响反对其余所有大臣都同意的撤销主张。为了掩饰他的辞职曾利用了博物馆管理人员组成问题上的分歧；实际上他的下台则是由于波兰化和克雷齐

希问题引起的，尽管他和他的妻子由于夫人们的交情而在宫廷里得到支持。

（三）

我从未想到对五月法[22]的细节进行法学上的研究。此项工作离我的管辖范围很远，而监督或纠正法学家法尔克的行为，既不在我的意图之内，也不在我的能力之中。我作为首相，即使身体非常健康，一般说来也不可能同时负起宗教事务大臣的责任来。
124 只是在实际生活中，我才深信，法律细节从心理学角度看是考虑欠周的。当我想像那些诚实而笨拙的普鲁士宪兵穿着带马刺的靴子、佩着叮当响的马刀在各家卧室和后门追逐那些敏捷而又机灵的神甫们时，我觉得这种错误是明显的。谁认为我脑海里出现的这些批评意见可能会在我与法尔克之间很快形成内阁危机，谁就会发现，他对国家机器本身的可操纵的确定性以及国家机器与君主和议会选举在联系上的确定性，缺乏一种只能通过经验获得的正确认识。这种机器不能适应突然的进化，而具备像法尔克这样能力的大臣我们这里也不是俯拾皆是的。让这样有能力和英勇的战友保留其大臣职位，比起通过侵犯宪法规定的他所管辖的部门的独立性而由我来承担管理或者改组宗教事务部的责任要更正确。只要我可以说服法尔克留任，我一直坚持这种看法。只是在事与愿违，他被宫廷妇人势力和国王表示不悦的手谕激怒而不愿留任的时候，我才着手审理他的部门的遗产，而这是我不愿着手办的，因为这样办势必要断绝和他的关系[23]。

法尔克成了同一种策略的牺牲品，此种策略在宫廷里也以同

样的手法在我身上使用过，虽然没有获得同样的成功。他之所以失败，部分是因为他对宫廷印象的感受比我敏锐；部分是因为皇帝的同情没有像支持我那样支持他。皇后反对内阁活动的根由在于她那我行我素的性格。如果政府不完全掌握在她手中，这种性格便使她难以和政府合作，并使她在整个一生中都站在反对历届政府的立场上。她不轻易赞同别人的意见。文化斗争时期，这种倾向受到了皇后陛下周围天主教人士的鼓励，这些人士从教皇权力至上主义者阵营里接受情报和指示。这一势力深知人情世故，擅长利用皇后的宿癖来影响每一届内阁以改善处境。我多次劝法尔克放弃因皇帝手谕表示的不悦（这些手谕大概不是根据君主本人的意愿写就的）以及由于自己的妻子在宫廷中受到侮辱性的待 125
遇而要辞职的打算。我建议他对待那些表示不悦的、可是又未具副署的皇帝敕令不必认真，这些敕令和文化斗争的联系比起和宗教大臣同教会最高理事会、同福音派新教之间的关系的联系要小。无论怎样，我还是劝他向内阁提出申诉，如果内阁的意见是一致通过的，国王一般还是加以重视的。但是由于自尊心受到屈辱这种影响，法尔克最后还是决心辞职。所谓我把他从部里排挤出去的一切说法都是杜撰的。使我感到奇怪的是，虽然他和我的关系一直友好，但他自己却从未公开反驳过这些流言。从决定法尔克离职的许多事件中，我回想起同教会最高理事会[24]以及接近理事会的僧侣们的争论，是他们导致了和皇帝陛下关系的破裂，而且从当时阐述反对法尔克的辩论材料的尖锐性中还可以看出，其中还有比作为总主教[25]的皇帝的正式顾问们所惯有的那种伎俩更为狡黠的手腕和更为微妙的活动在起作用。

（四）

在法尔克离职之后，我面临一个问题：在选择管理宗教事务的新同僚时，是否应当更着重于法尔克的法律方针，而不是他的政治方针；或者完全遵循自己主张反对波兰化重于反对天主教教义的见解。在文化斗争中，政府的议会政策由于进步党的背离和转向中央党而得不到贯彻，因为在国会里由于共同的仇恨而结合在一起的形形色色的民主派的多数，同波兰人、韦尔芬党人、亲法派和教皇权力至上论者联合起来，反对失去保守党人支持的政府政策。我们新帝国统一力量的巩固从而受到阻碍，而且如果这种情况拖延下去或者加剧，那么还将面临危险。这样做就可能使民族蒙受的损失要比废除法尔克的立法中我认为是多余的那部分而受到的损失要大得多。我认为废除宪法中的某些条款、反对波兰化的斗争办法、而首先是国家对学校的管理不是多余的。如果我们取得这一切，我们就会取得文化斗争的巨大胜利，而且在确立和平之后，情况会比斗争开始之前更好。因此，关于我们向罗马教廷让步的界限，我需要和我的同僚们达成一致意见。此时，所有参加斗
126 争的内阁各部的顾问的反对比我直接的同僚们、首先是我向国王推荐的法尔克的继任者冯·普特卡默尔先生的反对更为强烈。如果我不愿引起国王所不悦也为我所不希望的新的内阁危机的话，那么即使在人事变更之后，我也不会很快改变教会政策。回忆物色新同僚的那段时间，那是我公务生涯中最不愉快的时刻。为了取得冯·普特卡默尔先生的同意，我本该争取他的部内那些习惯

于文化斗争的官员们的支持，而这是我的力量所做不到的。不能单单从天主教的教会争论中寻找对法尔克的教会政策的解释；有时法尔克教会政策是和福音派新教的问题纠缠在一起并受其影响的。在福音派新教教会问题上，冯·普特卡默尔先生比法尔克更接近宫廷中起作用的见解；而且我的那种把同罗马的斗争限制在狭小范围的愿望也许不至于受到我的新同僚个人的反对。阻力一方面来自受到文化斗争激怒的官员们的沉重压力（为了他们，冯·普特卡默尔先生甚至认为不得不牺牲我国正字法[26]自然的和传统的发展）；另一方面来自我的其他同僚反对向教皇作任何明显的让步。

我为准备教会和平所做的初步努力没有得到皇帝陛下的赞许。那时福音派新教的高级僧侣们的势力比信奉天主教的皇后势力大，而皇后未得到中央党的鼓励，因为中央党对最初的让步不满意。正像宫廷各方面人物一样，中央党认为反对我比支持我的和解努力更为重要。这种形势引起新的冲突不断发生，而且渐渐变得越来越严重了。

为了不致引起新的内阁危机而能着手审核五月法，还得做多年的工作，因为在自由思想党[27]倒向教皇权力至上论者的反对派阵营之后，在议会斗争中，坚持审核五月法的不占多数。如果能够把在文化斗争时期反波兰化所赢得的这种学校同国家的关系以及宪法中作了某些修改后生效的有关条款作为最后成果而保持住，我便感到满意了。这两项成果在我看来，比用五月法禁止僧侣的活动更有价值，是对付那些进行反抗的神甫的法律上的安全装置。我还认为取消天主教司及其在西里西亚、波兰和普鲁士的危害国家的活动是一个重大的胜利。文化斗争的先锋战士是微耳和 127

及其同党；自由思想党人早先曾经比我更热衷于文化斗争，现在他们不仅放弃了它，而且在议会里和选举中支持中央党。在此之后，对中央党而言政府竟变成了少数派。面对由中央党、进步党、社会民主党人、波兰人、阿尔萨斯人[28]和韦尔芬党人拼凑的多数，法尔克的政策在国会里是没有前途的。当学校已得到保障、宪法废除了无效的条款、国家取消了天主教司时，我认为确立和平就尤为适宜。

在我最终把皇帝争取到我这一边后，在确定什么应当坚持，什么应当让步时，决定因素是进步党和分立主义派[29]的新立场。他们不支持政府，反而在选举和表决中和中央党结成同盟。他们所怀的希望在所谓格莱斯顿内阁（施托什、里克特等）[30]，即自由党—天主教联盟中表现出来了。

1886 年，我顺利完成了反宗教改革，这一方面是我所希望的，另一方面是我认为可行的。我争得了一种可以忍受的共存形式，这种形式和 1871 年前的现状相比依然表明，整个文化斗争的结果对国家是有利的。

这种情况能延续多久以及宗教斗争是否终止，只有时间才能说明。这取决于教会的情绪和历代教皇及其最有势力的顾问们的、还有德国的主教们的好斗的程度，以及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天主教居民中占统治地位的或多或少高级教会的方针的好斗程度。给罗马对信奉福音派新教的地位平等的国家的要求定出确定的界限是不可能的。甚至在纯粹天主教的国家里也做不到这一点。教会和国王之间自古以来就存在的斗争今天不会结束，尤其不会在德国结束。我们在 1870 年以前已经存在这种状况：甚至罗马教廷[31]也承认，正是在普鲁士，天主教会的处境是理想的，而且

比在多数纯粹天主教的国家里更为有利。但是在我们的对内政策特别是议会政策方面，我们感觉不到这种宗教和解的影响。还在1871年之前很久，赖辛施佩格两兄弟的派别[32]对福音派新教王室的政府长时期来采取反对立场，而这些领导人并没有因此落得好 128
争吵者的个人名声。在任何一种可以忍受的共存的形式下，罗马都将认为，福音派新教的王朝和教会是反常的和病态的现象，改变此种现象乃是罗马教会的任务。对这种事态的信念还没有迫使国家主动地起来斗争并放弃对罗马教会采取防卫政策，因为世间的一切和约都是暂时的，只是在形势发生变化之前有效。独立国家之间的政治关系是在不断变化的状况下，或者通过斗争，或者由于某一方不希望恢复斗争而形成的。在德国恢复争论的诱惑力对罗马教廷来说总是在于波兰人的易于激奋、波兰贵族的野心和为神甫们所支持的下层人民的迷信。在基辛根地区的农村里，我遇到受过教育的德国农民，他们坚信，一个神甫站在身有罪孽的即将去世者的床榻前，可以采取拒绝宽恕或者宽恕罪孽的态度而把行将就木的人打入地狱或者送上天堂，因而在政治上人们也应把神甫看作自己的朋友。在波兰，情况也正是这样，或者还要不利一些，因为有人劝没有教养的人相信：德国的概念和路德派新教的概念是相同的，就像波兰的概念和天主教的概念是相同的一样。在这种现成的生活条件下，和罗马教廷的永久和平，就像法国和它的邻国之间的永久和平那样，是不可能的。如果说人类生活一般说来就是一系列的斗争，那么这首先适用于独立的政治强国之间的相互关系，而为调节这些国家的关系则根本没有什么有权威的和有至高无上权力的法庭。可是罗马教廷是一个独立的政治强国，它的不可改变的特点也就是我们的法

国邻邦所固有的那种扩张野心。对于新教，罗马教廷抱着竭力劝诱改宗[33]和夺取统治权的侵略意图，而且与罗马教廷所达成的任何宗教协约[34]都遏止不住这一意图；罗马教廷不能容忍其他神灵和自己并存。

（五）

正当文化斗争激烈之际，维克多·艾曼努尔国王于1873年9月（22日至26日）访问柏林。我通过冯·凯德尔先生获悉，国王授意定制了一个镶嵌钻石的价值五六万法郎的鼻烟壶，它比一般的这类礼物要贵五至七倍。国王派劳内伯爵[①]将鼻烟壶送给
129 我。同时，我听说劳内把这个鼻烟壶给他的邻居、巴伐利亚公使佩尔格勒·冯·佩尔格拉斯男爵看了并告知其价值（此人和我们在文化斗争中的敌手很接近）。这样，送给我的价值昂贵的礼物就会造成这样的口实：即赠送礼物是与意大利国王当时力求在德意志帝国获得支持有关。当我向皇帝说明拒收礼物的想法时，皇帝最初的印象是仿佛我以为接受一个带肖像的鼻烟壶会有损我的尊严；他觉得这样做不符合他早已习惯的传统。我申述说："我并不想拒绝接受一般价值的这类礼物。但在这一件事情上，对评价这一事件具有决定意义的不是君王的肖像，而是可以变卖的钻石。由于冯·佩尔格拉斯的邻居传播，那个不合常情的价值极其昂贵的鼻烟壶已在社会上引起议论，所以我考虑到文化斗争的形势，必须避免造成怀疑的借口。"皇帝最后同意我的分析，并说：

① 意大利派驻柏林宫廷的大使。——德文本注

“您说得对，别接受鼻烟壶。”* 就此结束了我们的谈话。我通过冯·凯德尔先生把我的看法告知劳内伯爵后，鼻烟壶换成了一帧有国王亲笔题词的美好而逼真的国王肖像。这题词使我回忆起我那枚天使报喜节勋章：

俾斯麦侯爵惠存。柏林，1873 年 9 月 26 日。

忠实的堂兄弟

维克多·艾曼努尔。[35]

但是国王仍旧希望向我着重表明他的深情厚意，于是用另一件同等价值的、但是不可变卖的礼物来代替原先的礼物。我除了接受题有赞词的肖像以外，又接受了一个特大、美丽华贵的雪花石膏花瓶。当我的继任者[36]迫使我腾出我的办公室时，为包装和搬运这个花瓶费了不少劲。 130

(六)

根据《德意志评论》所刊登的冯·罗昂伯爵和摩里茨·冯·布兰肯堡之间的通信，1891 年 12 月 6 日的《日耳曼报》[37]推论说，

---

* 哥尔查科夫公爵对接受镶满钻石的鼻烟壶却有不同看法。我和皇帝访问彼得堡时(1873 年)，皇帝陛下问我：“赠给哥尔查科夫公爵什么东西好呢？他什么都有，连我的肖像也有。要不赠送一个半身雕像，或者镶嵌钻石的鼻烟壶吧？”我以哥尔查科夫公爵的地位与财富为理由，表示反对赠送贵重的鼻烟壶。皇帝认为我说得有理。之后，我又私下试探了一下公爵的意见，立即得到如下答复：“让他送给我一个镶满大宝石的贵重鼻烟壶吧。”我因不识人，颇感惭愧。我把这向陛下禀告了，我们两人都不禁哑然失笑。于是哥尔查科夫就得到了鼻烟壶。

我阻止了皇帝对非宗教仪式婚姻法[38]的反对。

布兰肯堡是我的战友。从幼年时代起到他去世为止，我们一直保持着友好关系，我非常珍惜我们的友谊。但是他不把友谊与政治方面的信任或忠诚看作一回事。在这一政治方面我遭到布兰肯堡的政治保护人和教父的反对。他们并不打算对德国和欧洲政治的历史的进展作出判断，而布兰肯堡又没有这种能力。布兰肯堡本人没有野心，也没有旧普鲁士贵族中同一地位的许多人妒忌我的那种毛病；但是在政治见解上他却难以摆脱普鲁士—分立主义的、甚至是波美拉尼亚—路德新教的观点。他那纯朴健全的理智和公正坦率的品格使他独立于正好缺乏这两者的保守政党—思潮之外。但是，由于他对政治格格不入而产生的谦恭谨慎使他这种独立性颇为逊色。他性格温和，易被花言巧语所迷惑，不是我可以依靠的坚定不移的支柱。他一方面对我友好，另一方面又无力排除其他势力的影响，这最终促使他完全退出政治。当我第一次提出让布兰肯堡出任农业大臣的建议时，正是由于从前曾赞同我去聘他的那些同僚的反对而未能实现。是不是我的朋友不愿意长时期在怀有恶意的监视下处于社会舆论中心，从而使我吸收这个保守党人加入内阁的意图归于失败，我姑且不谈。然而他第二次（1873 年 11 月 10 日）和最后的拒绝却无疑是这种状况。1874 年 4 月布兰肯堡在给罗昂的信中同时谈到他自己的拒绝和我放弃法尔克的事情，但说得含糊不清。如果以布兰肯堡和克莱斯特·雷措夫为其当时主要发言人和领袖的保守党表示愿意同我合作的
131 话，那么内阁的组成就会有所不同，而像布兰肯堡信中称之为“法尔克的死胡同”就不存在了。但是正如信件所证实的，布兰肯堡之所以谢绝大臣职位，可能是出于他本人对曾参加过三十

年代的“贫穷的路德教徒”与“旧路德教徒”[39]的斗争记忆犹新之故。当他退出政治舞台时，我的感受是：他抛弃了我。

说我阻止了威廉皇帝对非宗教仪式婚姻法的反对，这也是以《日耳曼报》为代表的民主耶稣会的捏造之一。皇帝的不愿意被大部分当时在柏林的大臣所施加的压力消除了，那时我不在柏林，由罗昂主持内阁。这种压力相当大，使皇帝不得不或接受法案，或重新组阁。根据当时我的健康状况来看，我确实不能胜任这个任务：从敌视我、并且又互相敌视的党派中挑选代表组织新内阁，以便今后在各方面继续进行斗争。如果皇帝在1874年5月8日的信中回顾往事时说，尽管他软弱，却曾两次写信反对过法案，那么这些书信不是写给我的，而是写给在柏林的内阁的。我仅仅向皇帝建议：在强制性的非宗教仪式婚姻法与改组内阁两者之间宁可选择前者。毫无疑问，对非宗教仪式婚姻法，皇帝比我更为反感。根据路德教派的观点我认为婚姻是一种民事，我之所以抵制承认这个原则，与其说我本人对基督教义产生怀疑，毋宁说是出于对现行风俗习惯和民众信仰的尊重。

第二十五章　同保守党人决裂

(一)

136　保守党人和我的决裂，最初1868年辩论汉诺威省的基金问题时已有预兆，而大声宣告决裂则是在1872年[1]。为了履行一年前对汉诺威人许下的诺言，政府向邦议会提出一项法案，这项法案在委员会里遭到保守党成员的激烈反对。在此之后，议员冯·布劳希奇和冯·迪斯特在全体会议上又提出了一项大大压缩这一法案的提案。冯·布劳希奇作为发言人，阐述了保守党不能投票赞成这一法案的理由。我当时作了详尽的反驳，最后说："如果立宪政府在某些也许不完全符合一个大党心意的个别事情上，不能完全可靠地得到该党的支持；如果这个党在权衡得失之后还作不出如下结论：我们总的来说是支持政府的，尽管政府有时干了些蠢事，但迄今为止蠢事比起可以接受的措施来，毕竟还是少数，因而，在这些个别事情上我们准备谅解政府；——那么，这个立宪政府就难以维持了。如果一个政府在国内连一个能接受它的观点和方针的政党都没有，那么政府要实行立宪统治就不可能，然后政府就不得不玩弄权术和订立协定来反对宪法；政府不得不力图人为地制造多数或者争取暂时的多数。于是政府就会处于实行联

合内阁的软弱地位，其政策就会摇摆不定，从而对国家、尤其是对保守党的原则产生极为不利的作用。”

不顾这一警告，这一因为大部分保守党人投票反对而由政府修改变得温和了的法案，于2月7日仅以32票的多数通过。在贵族院委员会上也一再出现了来自保守党人的攻击。以后的事件表明他们当时耍了什么花招。卡尔·冯·博德尔施文格在冲突时期曾任财政大臣，1866年他因拒绝筹划战争所需款项，因而被冯·德尔·海德男爵接替。博德尔施文格在保守党中散布说：我本人认为否决法案是合适的，他准备为此提出证据。辩论开始时，在会议厅里他走到我面前，询问了我妻子的健康状况，扯了一阵闲话，然后他又回到他那些保守党朋友当中声称，和我交谈之后，他对自己的事业信心更足了。

1868年2月在波尔迪格尔[2]的罗昂当时从保守党成员那里得到了一些专门性的报告，这些报告曾于1891年4月刊登在《德意志评论》上。从中可以看出，保守党人曾要求我加入他们的党派。我当时很少余暇，为下面这些问题忙得不可开交：如果博伊斯特领导下的奥地利，为了不重蹈1866年的覆辙而同意法国的军事计划（这是可能的，甚至是几乎可以确定的），那么我们应该预料到法国会干出什么事情；在这种形势下，俄国、巴伐利亚、萨克森会采取什么立场；以及汉诺威军团的继续存在问题。这些忧虑以及随之而来的紧张工作耗尽了我的精力。除此之外，这些先生们还要求我去拜访并劝导他们党派中每位在野的政治家。我甚至曾尽力而为之，但是，由于博德尔施文格的阴谋以及冯·芬克·迪斯特、克莱斯特·雷措夫和其他心怀不满与嫉妒的同侪、党派旧友的意气用事，致使我的尝试都归于失败。

1868 年 2 月 19 日罗昂从波尔迪格写给我的信，表明了他本人对获悉的情势是怎样想的。信中几处最重要的地方如下：

从报上可以看出，您和别人又生气了。这并没有使我感到惊讶，但使我伤心的是，竟然不能避免那些使职业自由党人欣喜若狂，而把职业保守党人弄得比以前更加昏乱的严重分歧，这真令人遗憾。根据《加利尼亚尼》报* 的报道，您真是费尽了口舌！有人答应给我寄来有关的速记报告，可惜目前还没有收到。不管怎样，对于您威胁要辞职这一主要情况我是完全放心的，因为除非是您的体力完全衰竭，我认为
138 这种辞职是绝对不可能的。保守党日益加剧的解体危险正使我焦急不安。如果保守党像自由党人所希望的那样分化瓦解，那么依我看，情况就极其严重了，就会使您和政府必然沦为自由党的驯服工具。诚然，我懂得，如果自由党人还希望助政府一臂之力的话，这对我们的政策是有益的。但是，假如形势发展成使他们的参政成为不可避免的话，对其危害我也是清楚的。您可能会提出异议，说保守党人头脑不清，束手无策，没有主见（更不用说个别人的嫉妒和恶意的傲慢了），凡此种种本身就会造成这种结局，而您对此又毫无办法。但是，这全都是合理的吗？假如您认真地采取有力措施，去教导和整顿保守党（很遗憾，这个党还一直不懂得它现在的任务比 1862 年和近几年来[3] 的任务应当有所不同），假如您今天还想对此着手处理，那么，不仅能够避免同自由党

* 《加利尼亚尼信使》报是在巴黎出版的英文报纸。

人的门户不相当的婚姻，而且能够把经过改组的保守党变成最结实、最可靠的拐杖，拄着它您可沿着困难的、但是经过内部整顿和革新这种使保守党前进所不可避免的道路行进。——当然，一个人不管上帝赋予他多大才能，是不可能亲自完成全部应做的事情的。我说这些，完全排除在上文中所可能找到的对您的任何指责。相反，我愿再一次承认，您的公务上的助手并没有对您和您的目标给予应有的支持。即使我谈到了保守党的改革，那我也认为这种改革首先应当是内务大臣的任务。但是欧伦堡伯爵是否具有解决这一任务所不可缺少的信任[①]呢？您从哪儿会找到另外一些同僚，特别是另一位内务大臣呢？从民族自由党人中去找吗？这是我不能想像的。从保守党人中去找吗？那么是谁呢？组织上的创造性才能，在保守党人中还是一个未知数。虽然我对我们的官僚制度的恶行十分厌恶，我还是认为，为了改革这种制度，有关的人应该了解这制度。

几天之后，2 月 25 日，罗昂在给长子的信中写道：

……根据 9 日寄给我的秘密报告，19 日我写信给俾斯麦 139
伯爵，对事态的如此发展以及其他表示遗憾，此后，我想最好再不要提及政治和冲突了。答应给我的速记报告，大概丝毫不会改变我对事态的看法：俾斯麦无论如何不可能亲自去做一切事。整顿或改组保守党势在必行，但那是内务大臣的

① 俾斯麦补充道："和责任感！"——德文本注

大事，无论俾斯麦、我、布兰肯堡或者其他任何人对此都没有公务上的职责。如果唯一对做这种事情负有职责的人不愿意或者不合适去做，那么这就是说，此人不具备称职的必要条件；由此应该得出应有的结论，并采取相应的行动。俾斯麦对待保守党人的态度以及我或者布兰肯堡的缺席，也许就是对他们没有起良好影响的原因，但这也不能是由此责备俾斯麦的充分理由。凡是像我那样非常清楚俾斯麦应该做而且正在做着多么巨大的工作的人，都不可能摆出公正人士的姿态，责备说他没有做更多的事，并说他对自己同事们的疏忽和无能负有责任。如果能断言他没有尽一切可能去物色更为得力的助手，那才是对他的唯一有理由的指责。也许对这一点是可以做出断言的。尽管我非当事人，但或许我能够比其他任何人更好、更正确地判断这种有关的人事关系，然而我却未必能十分明确地这样断定。不过，决裂会促成愈合，因为它必须愈合。我们根本不能依靠任何其他政党。但是这个党最终应该明白，它今天的观点和任务应与冲突时期有本质的不同；党应该成为并且也将成为进步的保守党，应当放弃那种止车楔的作用，尽管在民主进步影响占优势、从而受到极端蛊惑威胁的年代里，这种止车楔的阻碍作用是非常重要和必不可少的。这就是我对最近形势的概括的看法。当然，这只能告诉最知心的人……

（二）

罗昂的期望并没有实现；保守党依然故我；保守党与我之间

的冲突或多或少以隐蔽的方式继续发展着。我很清楚，通常以《十字报》这一名称为标志的保守党的方针对我的政策采取了 140
敌视态度。一些成员所以抱敌对态度，是出于一些值得尊重的原则性的动机，这些动机对他们行动的影响，胜过了他们（与其说是德意志，不如说是普鲁士）的民族情感。另一些人（我要说的是我的第二类敌手）反对我的原因在于有野心：即除掉你，我取而代之[4]。他们中的典型人物有哈里·阿尔宁、罗伯特、哥尔茨等。我把我那些乡村贵族阶层的同侪列为第三类。使他们感到不愉快的是我的特殊的生活经历，超出了德国的，甚至波兰的乡村贵族的传统平等观念所允许的限度。我由一个乡村容克地主当上了大臣，尚可谅解，但是不能谅解我的是享受津贴，也许还有完全违背我的愿望而赐予我的侯爵称号。“阁下”这个尊称尚是习惯上可以获得和尊敬的称号，但是，“殿下”这个尊称却引起了批评。我能理解这一点，因为这种批评和我本人的见解相符合。当1871年3月21日早晨，皇帝亲笔书信晋升我为侯爵时[①]，我当即坚决恳求皇帝陛下收回旨意，因为等级的晋升会给我的财产和我的整个生活状况带来不愉快的变化。一想到像哈尔登贝格和布吕歇尔这样一些收入不多而他们的子女又未承袭爵位的侯爵们，我越是感到不愉快，我就越是希望自己的子女成为处境舒适的乡村贵族。布吕歇尔家的爵位只是在十年之后（1861年），由于和一个富有的女天主教徒结婚才得到恢复。我一边思考着反对晋升的一切理由（这完全出乎我的欲望之外），一边登上了皇宫楼梯的最上一级，我惊讶地看到皇帝被皇亲国戚簇拥着站在那里，皇帝热

① 《思考与回忆》第2卷第227页。——中文本注

泪盈眶，祝贺我成为侯爵，亲热地拥抱我，并因能够赏赐这一特殊荣誉给我而高兴。在这种情况下，面对皇室对我最热烈的祝贺，我已不可能表示疑虑了。从那时起我便一直感到，作一个伯爵只要家道殷实便足可安乐自在，而作为一个侯爵却必须成为富豪。如果可以以我的思想方法来说明我的旧友和同侪对我怨恨，那么我会比较容易接受。这种怨恨表现在宣布的批评当中并成为
141 其借口。而我的亲戚冯·克莱斯特·雷措夫先生领导下的普鲁士保守党人在1872年学校监督法[5]和另一些问题上对我的政策就进行过这种批评。

保守党人对缪勒提出的学校监督法，在众议院就开始采取了反对立场，他们甚至要求，把地方对国民学校的督察权从法律上转交给当地神甫，在波兰[①]也如此，而当时法案已经授予地方政权自由选择学校督察员的权力。1872年2月13日，我在激烈的辩论中（某些年老的邦议院议员可能直至1892年对这场辩论依然记忆犹新）说：

> 上一位发言人（腊斯克）谈到，保守党在我们声明的对国家安全甚为重要的而且至今仍具有这种意义的原则问题上，公开向政府宣战，这对他和他的同道者来说是不可想像的。我不想拾人牙慧，但是我可以肯定，这个党在政府决意采用一切宪法手段来解决的问题上会背弃政府，这对我来说也是不可想像的。

① 这里用来指普鲁士国家的波兰地区部分。——德文本注

政府同意的法案草案以207票对教权派、保守党人和波兰人的155票被通过了。之后该法案于3月6日提交贵族院讨论。这里我引用我讲话中的一段：

> 这个问题在涉及福音教会的部分，被夸张得令人难以置信，似乎我们现在要把所有的教士免职，造成tabula vasa（一张空白表），并且用我们所要求的两万塔勒尔把福音教会的国家搞乱。假如没有这些夸张的说法，那么由于此法案而引起的令人遗憾的争论和摩擦也就是完全多余的了。法案的重要性所以被大事夸张，仅仅是由于信仰福音教的保守党进行出乎我们意外的反抗。我不想详细地谈论这种反抗的来历，因为如不涉及个人便无法谈论此事。但是这种反抗对普鲁士政府来说，却是令人痛苦不堪的，使人对未来丧失信心。当我直言不讳地（这是保守党人本来不该迫使普鲁士政府所采取的态度）向你们讲述了该法案的来历和倾向之后，你们应该承认，必须让我们那些至今还不讲德语的同胞学习德语。我认为这项法案的主要意义就在于此。

142

贵族院的202个议员中，有76人投票反对这一法案。还在投票的前一天晚上，我尽力向冯·克莱斯特先生解释，他怂恿他的朋友们去奉行的那种政策可能会带来的后果。但是我发现他仍固执己见，其原因我不想去猜测。我们之间已经有了明显的裂痕，这既说明了个人关系方面的，又说明了政治见解方面的偏激。我至今深信，这位和我个人曾经亲近的保守党活动家，给国家和保守党的事业都带来了重大的损失。假如保守党不是和我决裂，不

是对我进行那种冷酷无情和狂热劲头不亚于任何一个敌视国家的党派的斗争，而是同心协力忠贞不渝地帮助皇帝的政府去创建帝国的法制，那么在帝国法制的创建中便不会不留下保守党人同心同德的深刻痕迹。如果我们要保卫我们政治的和军事的成果，防止瓦解和离心倒退，则必需创建法制。

我不知道，我接受保守党人的合作能达到什么程度，但无论如何要比在由于决裂而产生的环境中合作得广泛些。在我国对外战争所造成的危险时刻，我认为，与对外部采用尽可能的民族团结一致的办法以求得到必要的政治保护相比，各党派学说上的差别是次要的。我认为德国的独立自主应建立在强大到足以自卫的统一的基础上，这是首要的条件。我过去信任，现在仍然信任民族的理智和判断能力：即如果不是由于对欧洲其余部分的依赖和对国内各党派和各个分立主义集团的利益的依赖而妨碍了德国民族去医治并根绝民族机构中的弊端和谬误（像1866年以前的状况[6]那样），德意志民族就会去这样做。既然如此，那么我认为主要的就不是有关自由党人和保守党人的问题了，不管是在当时战争和联盟的危急时刻，还是在现今，主要的是民族及其各君主的自由自决权问题。直到现在，虽然信心不足，但我还是希望，在今后的发展中，我们的政治前途仍然不会由于错误和不幸事件而受到损害。

（三）

和保守党人的背离迫使我只有和民族自由党人接触，这成了
143 保守党人士对我更加敌视的原因或借口。从1873年新年起至11

月，我因病把主持内阁的职权交给罗昂伯爵，在这一期间每晚都有我的右派政敌在他家聚会，人数有多有少。哈里·阿尔宁伯爵在柏林休假时经常在这里出入。若没有政治目的，此人是不常在大人先生的交际场合中出现的。罗昂本人用下面的话给我描绘了哈里·阿尔宁给在场者留下的印象："从他身上毕竟可以看出是一个能干的容克地主！"这种评价常常被我的朋友和同僚们反复加以强调，简直有责备我缺少这种特点的意思，言外之意是阿尔宁如果处在我的地位，会更果断更保守地处理国内政策。对阿尔宁这个容克地主的品德，人们曾广为谈论，我从中得到的印象是：连我的老朋友罗昂，由于受到常在他家举行的秘密集会的影响，对我的政策的信任也有点动摇了。

当时在国防部某部门任首脑的冯·卡普里维上校也属于此类人物。我不想判断，他当时是属于我在第 113 页以下所述敌手中的哪一类。我只知道他和《帝国之钟报》[7]的合作者的一些个人关系，例如和枢密顾问冯·勒宾的关系，此人是内务部的人事顾问，并在他那个部门散布敌视我的影响。冯·曼托伊费尔元帅对我说过，卡普里维竭力利用他、即曼托伊费尔对皇帝的影响来反对我，还把我"对军队的敌意"*作为控诉我的理由，并把它说成是一种危险。令人奇怪的是，卡普里维这时竟然忘记，我于1862年就职之前和就职的时候，军队怎样受到了文官的攻击和批评，并且被无理裁减。而在我领导公务期间军队怎样改变了单调的驻防生活，经过 1864—1871 年间进行的杜佩尔、萨多瓦和色当战役三次凯旋进入柏林。我可以毫不夸张地假定，如果我不接受

---

* 关于这个责备请参看第 33 章第 354 页以下弗里德里希皇帝 1888 年 3 月 25 日的信。

对政策的指导，那么威廉国王在1862年就会退位了，为军队的荣誉奠基的政策也就不能实现，或者不会像现今发生的那样实现。如果威廉一世国王竟然接受别人的不同建议的话，难道军队能有机会
144 去建立英雄业绩吗？难道毛奇伯爵又能找到哪怕是拔剑出鞘的机会吗？当然，如果国王因为找不到任何甘心同他风雨同舟、分担风险的人，而于1862年退位的话，上述一切都是不可能的。

（四）

由于谣传我宣扬过议会统治和无神论，《十字报》早在1872年2月11日便向我宣战，并在纳图齐乌斯·卢多姆[①]领导下，以佩罗特1875年写的所谓“划时代的文章”[8]开始了对我的诽谤运动。我写信给我们的高级法律权威之一阿姆斯贝格和司法大臣[9]，问他们，如果我向法院提出刑事诉讼，能否有把握期待对作者判罪。否则，我便作罢，因为宣告无罪的判决会给我的对手造成猜疑的新借口。这两个人和我所咨询的律师都回答说，判罪是可能的，但是，如果文章措词谨慎，则不能保证判罪了。那时关于提出刑事诉讼我还没有制定出明确原则，而在冲突时期得到的经验又决不是令人鼓舞的。我记得有一个地方法院，我相信是在施滕达耳，在判决书说明理由的部分中，固然充分地确认侮辱我的言论是十分严重的，但却以我是一个地道的坏大臣为理由，作出了罚款十个塔勒尔的最低处罚。

当佩罗特的文章发表时，我还不能预见到，来自我以前党内

① 菲立蒲·冯·纳图齐乌斯·卢多姆是保守党人和政论家。——德文本注

的同事、特别是在我同一等级的人士中对我的诽谤运动将会达到何等规模。

(五)

任何一个在当代处在政治斗争中的人都会注意到：政党活动家的良好教养和遵守法理在私人生活中是不容置疑的，可是一旦他们置身于此类斗争之中，便立刻不顾廉耻和礼仪了，而在其他场合他们是承认这种廉耻和礼仪为神圣不可侵犯的。他们还对salus publica suprema lex（公共福利是最高准则）[10]这句名言予以漫画式的夸张，转而为下流言论和无耻勾当进行辩护，而这些言行如果不是在发生政治和宗教争端的场合，甚至会引起他们自己的厌恶的。这种抛弃一切礼仪和廉耻的态度，同下面这种感情有暧昧的关系，即他们由于党派的利益（他们以党派利益代替祖国的利益）而采取了一种不同于私人生活中采取的衡量标准，而对荣誉与教养的各种戒律的解释，在党派斗争中甚至不同于在抗击 145
外国敌人的战争惯例中，并且更为随心所欲。导致违背常规形态和界限的激怒常常不由自主地会变本加厉，这是因为在政治和宗教问题上谁也不能向持不同信仰的人合乎逻辑地证实自己的信念和自己的信仰的正确性，世界上也没有一个法庭能够通过判决而消除分歧。

在政治方面正如在宗教信仰领域一样，除了一种万变不离其宗的论据外，保守党人任何时候也不能以别的论据来反驳自由党人，保皇党人不可能以别的论据来反驳共和党人，信教者不可能以别的论据来反驳不信教者。而这种万变不离其宗的论据就是：

我的政治信念是正确的，而你的政治信仰是荒谬的；我的信仰顺应天意，你不信教必堕地狱。因此，可以理解的是，由于教会的意见分歧便发生宗教战争，而在党派的政治斗争中（只要这种斗争不能用内战来解决）便终究要导致冲破有教养的人士的礼仪和荣誉感在非政治的生活交往中保持的栅栏。一个有教养的彬彬有礼的德国人，能当着成百人的面，用在任何一个体面的社交场合都不用的气势汹汹的腔调向和自己一样在社会上有地位、而又备受尊敬的对手出言不逊，侮辱谩骂，而有哪一位这样的德国人竟然会在个人的日常生活中使用哪怕是其中的极少一部分呢？除了政治性的党派活动以外，有哪一位出身名门望族，希望得到一个高贵地位的人会认为，在自己交往的社会中为了反对同一社交界和同一阶层的人而使自己成为谎言和诽谤的职业传播者是可取的呢？用这种方式没有任何证据便责难那些清白无瑕的人行为不正，有谁会不引以为耻呢？简言之，除了在政治性的党派斗争中，有谁会在其他方面甘心充当一名没有良心的诽谤者的角色呢？但是一旦一个人在自己的良心面前和自己的党派面前能够辩解说，他是在维护党的利益，于是任何卑鄙行为便会被认为是允许的，至少是可以原谅的了。

对我展开的诽谤运动肇始于一家报纸。这家报纸印着基督教的十字架标记，在“和上帝一起保佑国王和祖国”的题词下，多年来代表的不是保守党，更不是基督教，而是体现个别编辑的野心和执拗。当我在1876年2月9日的公开演说中控诉这家报纸的毒害活动时，回答我的是所谓的宣言派[11]的声明，宣言派的学者队
146 伍是由数百名新教派的牧师组成的。这些人以自己的官方身份出来反对我，替《十字报》的谎言作证。他们公开地为该报的诽谤

性声明签了字，以此而完成了作为基督教会及其和平的仆人的使命。我一贯对穿修女式和教士式长袍的政客不信任，而数百名新教牧师的宣言[12]支持对国家首席官员的极为肆无忌惮的诽谤，绝不会增加我对穿教士长袍的（即便是穿新教士长袍的）政客们的信任。宣言派中许多人在此以前都是我的熟人，有的甚至是我的朋友，在他们参与了出自佩罗特笔下损害荣誉的谩骂之后，所有这些人和我的个人交往的可能性便完全丧失了。

同所有的或者几乎是所有的朋友和熟人突然断绝以往的关系，对于一个成年人的神经来说，是一个严重的考验。我的健康在此之前早已受到损害，这并不是由于我所承担的工作，而是由于我不断地意识到对重大事件所负的责任，因为在这些事件发生时祖国的未来处于危急的关头。在我们的政策激烈地、有时是迅猛地发展的时候，自然我不是时时能够有把握地预见我所选定的道路是否正确。但我仍然不得不如此行事，仿佛我能够清楚地预见到即将发生的事件和我个人的决策对事件的影响。关于个人的观察力、政治直觉是否能正确地指导他的问题，对于一个大臣来说是相当地无关紧要的，因为只要有了国王的签字或国会的多数作保障，他的一切疑虑就打消了。人们可以说，一位主张天主教政策而获得赦罪的大臣对于个人良心是否宽恕自己这样一个新教问题已不感到担心了。而对于一个把自己的声誉和国家的声誉完全等同起来的大臣来说，对每一项政治决策能否成功没有把握，则感到十分苦恼。在贯彻一项政治措施所必须的一段时期中，要确有把握地预见政治形势的变化是十分困难的，就如同要根据我们的气候预见最近几天的气象一样。然而，还是必须像能够预见似的采取决策，而且每当采取一项决策时，往往要和习惯屈从的

各种势力做斗争，譬如，在尼科尔斯堡举行的和平谈判期间，我从前和当时都是唯一被责成归根结底要对所发生的事及其后果负责的人，而且根据我国的制度和惯例我确实负有责任。我当时采
147 取决策时，不仅须得同所有军人、即全体出席者发生矛盾，而且也得同国王发生矛盾，并不得不进行顽强的斗争以坚持该项决策。一项决策是否正确？在缺乏认为正确的前提条件的基础上坚持和实施这项决策是否正确？——斟酌这种问题对一个诚实而正直的人来说的确是折磨人的。由于当时设想的和已做的事情，要经过很长时间，往往要经过好多年之后才能从政治上确信其正确与否，因而困难会变得严重起来。折磨人的不是工作，而是怀疑和忧虑，而荣誉感是一种不能依赖其他而只能依赖自身的信念和意志的责任感，这种情况正是在最严重的危机时刻表现得最为明显。

同被认为处于同等地位的人交往有助于克服这些危机。如果这种交往突然中断，其原因不是因为公事关系而是因为私人关系，不是出于正当理由而是出于嫉妒之心，纵然这些原因均属正当，那也完全是庸俗不堪的。如果一位有关的责任大臣突然被他所有的旧友所抵制，被当作敌人来对待，而他自己连同他的思考成为孤家寡人，那么这必然使他职务上的忧虑严重地影响他的神经和健康。

（六）

人们本该认为，由于我庇护民族自由党而招致了保守党内我旧日同事的仇视，民族自由党本该作出表示来支持我，以免我的

声誉遭到粗鲁而卑鄙的攻击；或者至少应该表示，它不赞成这些攻击，也不同意诽谤者对我的中伤。但我想不起民族自由党人当时曾采取过任何措施在报刊上或在其他公共活动中帮助我。恰恰相反，看来因保守党对我进行攻击并和我决裂而在民族自由党阵营内流行着某种满意的情绪，而且他们还在竭力加深这一分裂，并变本加厉地刺激我。自由党人和保守党人各自按照党派的利益，在利用我、抛弃我和攻击我的问题上真是协调一致。

对国家、对共同利益是否有益这个问题，每个党派在理论上都会将其称为占主导地位的问题，并且每个党派都断言，它正是通过党派途径在追求和寻找整个社会的福利。而实际上，我有一种印象，即我们的每个党派都在推行自己的政策，好像除了他们一己之外，世上再没有别人了，它们把自己隔绝在自己党派孤岛 148
之上而不顾及整体和国外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甚至不再能说：由于政治原则和信念的差别，各党派在政治斗争舞台上的不同道路对其每个个别成员来说都会成为良心问题和命运。大多数党派成员的情况和大多数不同宗教信徒的情况相同：如果请他们阐述一下他们的信仰与其他竞争者有什么不同特点，他们便会陷入窘境。我们各党派集结的真正核心不是政治纲领，而是个人，即国会中的雇佣兵队长。

连各种决策也不是从成员们的意见中产生，而是来自领袖或卓越的演说家的意志，两家的意志通常是一致的。个别成员如果试图反对党团领导，反对巧舌如簧的演说家，那么这种尝试便会招惹许多不愉快，招致投票时的失败，并会招来个人日常生活交往中的许多麻烦，所以必须具备高度的独立自主精神才能坚持自己与党团领导不一致的意见；而如果他不具备足够的知识和工作

能力，单有这种精神也是不够的。而具有后一种精神的人日益向左转。支持现存制度的政党，从整体上看，是由心满意足的国民组成的，而攻击现状的政党，自然是更多地吸收了不满现存制度的人们。在造成一些人称心如意的诸多因素中，生活富裕并不是处于最后面的地位。如果不是所有的人，那么至少德国人的特点就是：不满足者比满足者较为勤劳和活跃，怀着渴望的人比酒足饭饱的人更为努力。当然，精神上和肉体上都满足的德国人出于责任感有时也很勤奋，但大多数不是这样。在那些反对现存制度的人中间有时也遇到生活富裕的人，这些人之所以如此，很少是出于信念，而经常是出于野心，希望在这条路上能较快地满足心愿，或者是由于对政治上或宗教上的苦难不满才走上这条道路。总之，我们在攻击现行制度的人当中要比在维护它的人（即保守党人）当中，可发现更强大的勤奋精神。多数人缺乏勤奋精神的这种状况给保守派的领导提供的便利的程度超过了个别人的独立自主精神和顽固态度给保守党领导造成的麻烦。据我体察，
149 各种保守党派对于领导指令的依赖至少和极左派内部的状况一样强烈，也可能更为强烈。右派中害怕决裂的情绪或许比左派中更为强烈，而当时对每个人都有强烈影响的对“入阁派”的指责，在各个右派政党中比在左派政党中造成了更大的阻碍，妨碍进行客观的判断。由于我的辞职，执政者的职位刚一空出来，这种指责对保守党人和其他党派便立刻不起作用，而政党的每位首领因希望重占职位，也变得阿谀奉承并主张入阁，甚至到了无耻诽谤和抵制前任宰相及其政策的地步。

在宣言派活动时期，反内阁的潮流，即与我同一阶层的许多人对我的忌恨，受到宫廷中强大势力的支持。皇帝从未拒绝在事

务中给我以恩宠和支持。然而，这并未阻止皇帝每天阅读《帝国之钟报》。这家仅以对我进行诽谤而生存的报纸由我们宫廷和其他宫廷的王家内阁散发，为数13份，报纸撰稿人不仅有天主教宫廷贵族和乡村贵族，而且还有信奉新教的宫廷贵族和乡村贵族。奥古斯塔皇后不断让我感到她对我的冷落，而她的直属部下、宫廷的高级官员过分缺乏礼节，以致我不得不上书陛下提出申诉。申诉颇有成效，至少他们对我不再忽略表面上的礼节了。此后法尔克大臣提出了辞职，这与其说是由于事务上陷入困境，不如说是由于宫廷内对他和他的妻子的这种类似的不友好之故。

151

第二十六章　阴　　谋

(一)

哈里·阿尔宁伯爵的酒量有限，有一次在进早餐时，他喝过一杯酒之后对我说："每一个官运比我亨通的人，我都把他看作是私人仇敌，都要用相应的办法对付。不过当他还是我的上司时，我努力不使他发觉就是了。"这件事发生的时候，正是他的第一个妻子去世后他从罗马回来，因儿子的意大利保姆在散步时穿一件金红色的衣裳而轰动视听，他在政治性的谈论中又津津乐道地引用马基雅弗利的话和意大利耶稣会教士和传记作者们的著作的时候。当时他摆出一副无耻的沽名钓誉者的姿态，喜不自胜地弹奏钢琴，由于他的外貌俊秀和机敏，对于他向之大献殷勤的女士们来说他是个危险人物。当他还是个诺伊施特丁的中学的学生时，就在流动的艺人剧团的女伶那里学过艺，在这个剧团弹钢琴顶替一个空缺的乐队席位，那时他早就开始学到这种机敏的本领。这是发生在他更早些时候因其品行不端被迫离开凯斯林的中学之后的事。

有人与外国势力一道，与《帝国之钟报》及其贵族与宫廷各界以及我的内阁同僚中的撰稿人一道，与恼怒的容克地主们以及

他们在《十字报》上当时所写的文章一道，竭力打消皇帝对我的信任，在这些人中间，哈里·阿尔宁伯爵的作用最为突出。

1871 年 8 月 23 日，根据我的建议，他被任命为驻巴黎公使，不久又被任命为大使。尽管他有些缺点，我仍然希望他在那里能为公职有效地发挥他的杰出才干。而他却把自己的地位只看作是个阶梯，以便从此出发能更加有效地达到排挤我并成为我的继任者的目的。他在呈送皇帝的许多私人信件中强调指出，就其绵延 152
不断的统治而言，普鲁士王室在目前是欧洲最古老的王室，因此由于上帝的恩典，对于作为君主的首领的皇帝来说，有责任守护并保卫其他古老王朝的正统性[1] 和连续性。触动皇帝的情感中的这根弦，是从心理角度上正确地计划好了的，只要阿尔宁还是皇帝唯一的谋士，他大概就会成功地通过人为地加强的世袭的君主责任感来蒙蔽陛下清晰而又理智的判断力。但阿尔宁不知道，皇帝由于秉性直爽和诚挚，把这些信给我看了，从而使我有了可能向君王的政治判断力，或者可以说是健全的理解力，说明如果我们按照阿尔宁的建议走上恢复法国正统王朝[2] 的道路，那么我们就会遭受祸患和危险。

后来，皇帝允许公布我在这种意义上反驳阿尔宁污蔑的书面意见。在我的一份书面意见中提到，皇帝了解阿尔宁的诚实受到了领导阶层的怀疑，英国宫廷里有人不希望他当大使，“因为人们不会相信他的任何一句话。”①阿尔宁伯爵一再地试图取得英国内阁的证明，以反驳我的暗示，他还试图从那些对他比对我更怀有

① 1873 年 4 月 14 日致皇帝的呈文，俾斯麦《思考与回忆》第 1 卷第 237 页及以下各页。——德文本注

好意的英国政治家那里得到保证：他们对此类事一无所知。然而，我所暗示的对阿尔宁的先发制人的驳斥以一种致皇帝的信的形式取得了成功[3]，使我能够在这件事情上公开援引皇帝陛下的证据。

1873 年，阿尔宁在柏林确信他取代我的职位的希望并非像他所设想的那样大之后，他便竭力想暂时恢复以往的良好关系。他来拜访我，表示遗憾地说，我们之间由于误会和他人的阴谋而发生分歧。他还提起过去某个时期我们之间存在的那种关系，而且他是力求维护这种关系的。对他的动机和他攻击我的严重性我了解得一清二楚，因而我不会上他的当。我直率地和他谈话，指责他错误地打算充当我的继任者，为了动摇我的政治地位，竟和所有敌视我的分子勾结起来。我声明，我不相信他的和解意向。他生性容易流泪，离开我时还挤下了几滴眼泪。从他童年时起我就了解他。

我正式对阿尔宁提出处理是由于他拒绝服从政府的指令而引起的[4]。在多次审讯中我从未提过这么一件事：即他把为了在法国
153 报界维护我国政策而领取的一笔六千到七千塔勒尔的款项用来在德国报界攻击我们的政策和我的立场。《施佩纳报》是他当时的主要报刊，他在这家报刊上攻击我，胜利的信心与日俱增。这家奄奄一息的报纸卖身投靠了他。他在这家报上暗示说，似乎唯有他才知道如何把同罗马的斗争[5]胜利地进行到底，只是我那无法谅解的虚荣心才不让像他这样高明的政治家执掌政权。他从未对我透露过这个秘方。这种秘方在于各个大教堂神甫[6]们提出的一种思想之中，即由于梵蒂冈的各种决议[7]，罗马天主教会改变了自己的性质，成了另一法律主体，并失去了以往获得的财产所有权和协

议规定的权利。这种办法，早在阿尔宁之前我就考虑过，但我并不认为这种办法对争论的结局会比旧天主教会[8]的创立能产生更大的作用，创立旧天主教会的权利从逻辑上和法律上看，较之普鲁士政府所主张的断绝和罗马教会的关系来，更为人所理解，更有理由。旧天主教徒的数量提供了衡量的尺度：这步棋对罗马教皇和新天主教派拥护者的影响会有多大。我更不同意阿尔宁伯爵在一次公布的报告中所提的建议，他建议普鲁士政府派遣演说家到宗教会议上讨论教理问题。我猜想，阿尔宁的这种想法，恐怕是保罗·萨尔皮所著《特利恩特宗教会议史》一书的扉页画引起的，这幅画描绘了此次会议，在单另的一张桌旁坐着的两个人被称为皇帝陛下的演说家。如果我的猜测正确，那么阿尔宁伯爵应该知道，在当时的教堂拉丁语中“演说家”一语的含义是“公使”[9]。

在对阿尔宁的法律审理中，我只追求一个目的：实现我在公务程序上提出而被阿尔宁明确拒绝的要求，即交出大使馆无疑是属于公务性的一定部分的文件。我作为一名长官，至关紧要的仅仅是维护官方的权威。我并没有力求也没有期待对阿尔宁作出刑事判决，相反，在这样一个目的达到之后，那么我会有力地主张赦免他，如果这种赦免通过缺席审判而造成的形势在法律上是允许的话。推动我的不是个人的报复心，毋宁是（如果人们想用一 154
种易受挑剔的说法）威信受到蔑视的一位长官要证实自己有理的一种官僚的辩护。依我之见，如果第一次审讯宣判监禁九个月是过重的话，那么第二次审讯判为五年牢狱之所以可能，只是因为正如犯人自己公正指出的，通常的刑事法庭不可能充分理解地判处国际谈判中外交界的过失。这一判决只有在一种嫌疑得到证实的情况下我才认为是适宜的，这种嫌疑就是犯人利用了自己和希尔

施男爵的关系，为了交易所的投机活动而延宕了执行交给他的各种指令。法庭审理既未对此提出证据，也不打算这么做。认为阿尔宁仅是由于事务上的原因才未执行准确的指令这种设想，仍然可能有利于阿尔宁，虽然我不清楚他在此种情况下的思路。然而，上述嫌疑不是由我说出，尽管这种嫌疑由于巴黎的通讯和来自巴黎的旅游者已为外交部和宫廷人士所知道，并且在这些人士中间广为流传。由于阿尔宁在这一职务方面非凡的才华未能配合以同样程度的诚实可靠的品质，致使我们的外交工作遭受了损失。①

外交界感受到什么影响，从国务秘书冯·毕洛夫 1874 年 10 月 23 日的信中可以说明：

> 在今天的《十字报》上登载着一篇显然是阿尔宁伯爵本人写的卑鄙下流的文章，其主题内容是："我做了什么坏事呢？什么也没有，我只不过是使纯属个人的案卷免遭大使们和公务人员们的轻率对待，如果外交部的态度不是如此无礼和粗暴的话，我早就把这些案卷交出来了。"在调查过程中很难回答这种谎言和歪曲。《威悉报》昨天正好刊登一则有关许多短缺文件的内容的非常有用的简讯。昨天，冯·曼托伊费尔元帅来访问我，主要是来探问有关阿尔宁 causa（案件）一

① 俾斯麦公爵 1891 年 10 月还对一位英国人威特曼先生说过，阿尔宁的悲惨命运使他很痛苦。阿尔宁本人对这件事负有罪责，但是这个判决对于他（俾斯麦）来说是严酷的，超过了期待和希望；毕竟德国的法庭是不依赖于政府的。（威特曼先生：《冯·俾斯麦公爵》第 102 页）——又参看布鲁姆先生：《我对俾斯麦公爵的回忆》（慕尼黑，1900 年，第 211 页）。——德文本注

事。他用恰到好处的方式谈了自己的见解，说事情非这样处理不可，并对不得不在这种情况下领导事务的帝国宰相和外交部表示同情。此外，因为他从小就了解阿尔宁，并且在南锡时而在阿尔宁的领导下时而同他一起共事时吃够了他的苦头，因此对他来说，大祸临头本非意外。阿尔宁是这样一种人，在每件事情上只问：这会给我个人带来什么好处或害处？ 155
奥多·罗素爵士①一字不差地对我讲了同样的话作为他在罗马的生活经验的结果，回忆布鲁塞尔的经历的诺托姆布②，也是如此。最使我注意的是：元帅几次谈起：1872 年夏天阿尔宁开始结党营私反对阁下，1873 年夏天他又在这一方面竭力刺探他即曼托伊费尔的意见；阿尔宁因为自己曾采取反梯也尔的立场，所以他对后者垮台和由此而造成的一切有害的政治后果[10]负有罪责。曼托伊费尔在谴责后一问题时很熟悉事实和人物，暗示了阿尔宁通过煽动反对共和国和拥护王朝正统主义传统这种阴谋的途径，为自己在当时最高首脑机关获得影响。梯也尔垮台的那天，阿尔宁和几个著名的奥尔良分子[11]共进午餐。午餐时他收到了来自凡尔赛的简报，并以欢呼来表示祝贺。这对党是个支持，没有这种支持党可能就不会有道义上的勇气去实行 5 月 24 日的政变[12]。诺托姆布也对我谈了意思相同的话，他说梯也尔去年冬天向他说到了阿尔宁："此人使我吃了许多苦头，比冯·俾斯麦先生知道的和想到的还要多得多。"

---

① 奥多·罗素·阿姆普特希尔从 1871 年 10 月以来是英国驻柏林大使（死于 1884 年）。——德文本注

② 让·巴蒂斯特·诺托姆布男爵是比利时驻柏林公使（死于 1881 年）。——德文本注

1877 年 1 月检察官在审理《帝国之钟报》编辑的诽谤诉讼案[13]时说：

> 我使该报的全体编辑人员以及一切以言论和行动支持该报的人，首先特别是冯·洛埃先生，其次还有哈里·冯·阿尔宁伯爵都对这种犯罪的倾向皆负有道义上的责任。毫无疑问，所有一向旨在对俾斯麦公爵进行人身攻击和贬斥的《阿尔宁反对俾斯麦》这些文章都是为了阿尔宁伯爵的利益而撰写的。

（二）

照我的见解，罗马教廷正如大多数政治家一样，从 1866 年起便认为法国和德国之间的战争是可能的，而且认为普鲁士的失败也同样是可能的。预计到发生战争，教皇[14]当时一定考虑到，法国对于信仰新教的普鲁士的胜利使他有可能把他自己以往借助宗教会议和教皇无谬说对非天主教世界和神经脆弱的天主教徒开展
156 的进攻进行到底。如同帝制法国，特别是欧仁妮皇后当时与教皇的关系[15]那样，无需担当风险便可以推测，如果法国军队胜利地开进柏林，法国在签订和约时是绝不会忽视天主教会在普鲁士的利益的，正如俄国皇帝总是利用和平条约来照顾他在东方的同一信仰者的利益一样[16]。gesta Dei per Francos（法兰西人替天行道）的影响会因教皇权力的新发展而充实起来，而宗教斗争的结局，按天主教作家（如多诺索·科尔特斯·德·瓦尔德加马斯[17]）的意见，归根到底须在勃兰登堡边区的砂地上[18]通过战斗解决，而这一

斗争的结局从各方面来看都将会通过法国在德国的优势地位所促进。欧仁妮皇后偏袒法国政策的好战倾向很难说不与她对天主教会和教皇的忠诚有关。如果法国的政策以及路易·拿破仑同意大利运动的个人联系不容许皇帝和皇后以满意的方式为意大利的教皇效力的话，那么一旦在德国取得胜利，皇后就会向教皇表现出自己的忠心，并会极力在这一方面提供确实是数量不大的赔款，以补偿由于拿破仑的影响和参与给意大利的教皇权力所带来的损失[19]。

如果在签订法兰克福和约[20]之后，在法国仍然由信奉天主教的政党——不管它是保皇的，还是拥护共和制的——执政，那么未必能像现在这样把战争的重新爆发推后如此之久。在这种情况下应当担心的是：这两个和我们敌对的邻国——奥地利和法国——基于信奉天主教的共同立场而会相互接近，一齐反对我们。事实上在德国正如在意大利一样，宗教情感强于民族情感者不乏其人，这一事实可能会有利于加强和鼓励这种天主教联盟。我们是否能找到反对这个联盟的同盟者，尚无法准确预测；无论如何俄国能够任意决定：是通过自己的加入而使奥法友谊成为像七年战争[21]时期那样的极强大的同盟呢，还是使我们在出现这种可能性的外交压力下处于依赖地位。

如果法国建立一种天主教化的君主政体，那么同奥地利一起共同对我们施行报复的诱惑力就会大大增加。因此我认为，促进法国王权的复辟是同德国与和平的利益相矛盾的，于是我便和这种思想的代表人物处于敌对之中。这种矛盾使得我同当时的法国大使贡陶—比隆和我们当时驻巴黎的大使哈里·阿尔宁伯爵的私 157
人关系更加紧张了。前者是按着他天性所属的那个党，即正统主

义—天主教党的精神行事，后者则投机取巧利用皇帝对正统主义的同情以便败坏我的政策的声誉并成为我的继任人。贡陶是一位出身于古老家族的机敏而和蔼的外交家，他在奥古斯塔皇后身上找到了联结点；这一方面在于皇后对中央党内和该党周围的政府与之作斗争的那些天主教徒的偏爱，而另一方面在于她的作为法国人的身份。在皇后的青少年时代，当时还没有铁路，这种身份几乎像英国籍那样在德国各宫廷内受到推崇。皇后陛下的女仆讲法语，她的诵读者法国人热拉尔* 曾为皇家座上客，并和他们通信。外国（除了俄国）的一切，对皇后如同对德国小城镇的许多居民一样，具有同样的吸引力。从前，在旧式的缓慢的交通工具的状况下，一个外国人，特别是英国人或法国人，几乎从来就是德国宫廷中颇受欢迎的宾客，而不用担心会询问他在本国享有什么地位；只要他是“从远方来的”，不是本国人，就足可获准进入宫廷。

由于同样的原因，在纯粹的新教人士中如果异常地出现一个天主教徒，而在宫廷里异常地出现一个天主教会的显贵人士，当时往往引起人们的兴趣。在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时代，如果某人是个天主教徒，这乃是单调划一生活中的破例趣事。人们对信天主教的同学没有任何宗教恶感，而带着几分惊奇把他看作像一种异国现象，且不无满意地发觉，在他身上一点也不带巴托罗缪之夜、宗教裁判所的火刑以及三十年战争[22]的气味。在其妻子是

---

* 此人大概是由贡陶推荐给皇后陛下的。他和甘必大通信往来频繁。甘必大死后信件落入亚当夫人手中而成为《La Société de Berlin》（《柏林社交界》）一书的主要材料。热拉尔返回巴黎后，有一个时期成了半官方报刊的领导人，以后当过驻马德里公使馆秘书、驻罗马和 1889 年驻门的内哥罗的代办。

天主教徒的萨维尼教授家里，孩子们年满14岁时便可以自由选择宗教信仰，他们全部信仰了父亲信仰的新教派，只有我的同辈[23]例外，他后来当了邦联议会的公使，并为中央党的创始人之一。记 158
不清我们是在读中学最后一年还是已经读大学的时候，他曾以不带任何争辩的语调谈到选择宗教信仰的动机，他说：天主教隆重的礼拜仪式令人肃然起敬，此外，天主教徒总的说来要更高尚些，“任何一个混账小子往往都是新教徒。”

这种环境和情绪在最近半个世纪内已经改变了，在此期间，政治和经济的发展已不仅使欧洲的各种不同的民族得以更加密切地接触。如今在柏林的任何阶层内，对于宣称是天主教徒的人，显然再也无人会加以注意，甚至也不会给任何人造成什么印象了。只有奥古斯塔皇后尚未摆脱自己青少年时代得到的印象。她似乎觉得，天主教神甫比同级同职的新教派教士更为高贵。赢得一个法国人或一个英国人的好感这种任务比争取本国同胞的人心更吸引她，而来自天主教徒方面的赞许要比自己教友们的赞许更使她满意。贡陶—比隆便由于出身名门而很容易地在宫廷人士中间赢得了地位，由此而通过不止一种途径建立的与宫廷人士的联系使他接近了皇帝本人。

皇后把热拉尔这个法国密探任用为自己的诵读官，这一情况是不正常的现象。只有贡陶凭着自己的敏捷才干和皇后周围一部分天主教人士的协助而博得信任的情况下，才能理解出现这种事的可能性。让热拉尔这样的人在皇帝的家室中出入对法国的政策和法国驻柏林大使的地位显然是有利的。热拉尔很精明，但不能在公众中压制自己的虚荣心。他喜爱成为最新的巴黎时装的样板，柏林人则认为这种时装是奇装异服，但这一缺点并未使他在

宫廷中受到损害。对奇异样式、特别是对巴黎式样的兴趣之强烈，已超过单纯的嗜好这种意义了。

贡陶为法国效劳的活动并不局限于柏林这块地方。1875 年他前往彼得堡，目的是在那里同哥尔查科夫公爵一起准备一个戏剧性的打击。在亚历山大皇帝即将访问柏林的时候，这种戏剧性打击要使全世界相信：单是哥尔查科夫用“Quos ego!”（我要收拾你们!）[24]这样一句话来抓住我们的手臂，就能使毫无戒备的法国免遭德国的进攻。也就为此目的他才陪同皇帝来到柏林。

我不知道这是谁出的主意，如果是贡陶，那么由于哥尔查科
159 夫有虚荣心，由于他对我的忌妒以及我对于他获取显赫权势的抵抗，贡陶在他身上算是找到了合适的土壤。在一次秘密谈话中我不得不向哥尔查科夫说：“您对待我们不像是对待一个友好国家，而是像对待一个听见铃声不能马上到来的仆人那样。”哥尔查科夫利用自己大于公使雷德恩伯爵和接替他的代办们的权威，他在谈判中宁肯采取和我们在彼得堡的代表机关联络的途径，而避免对驻柏林的俄国大使下达有关和我谈判的指示。俄国人对我说，这样做的原因是因为在外交大臣的预算中拨出一笔款项专用于电报费，因此哥尔查科夫宁愿通过我们的代办让德国破费，而不让俄国破费。我认为这是诽谤。虽然他无疑是吝啬的，但我还是从政治方面找原因。哥尔查科夫是个机智和出色的演说家，喜欢以此炫耀，特别喜欢在派驻彼得堡的各国外交官面前炫耀。他讲法语和讲德语一样娓娓动听，而我作为公使，后来作为哥尔查科夫的同行常常乐意地一连几个小时听他的讲演般的报告。他最喜欢让外国的外交官，特别是有知识的年轻代办们作他的听众。对他们来说，他们所驻国家的外交大臣的显赫地位也加强了雄辩家的印

象。哥尔查科夫的意愿是以使人回忆起“Roma locuta est”（罗马发话了）[25]这种方式传到我这里来。我在私人信件中对于这种公务往来的格式和发表意见的腔调向他直接表示了不满；我要求他不要再把我看成一个外交方面的学生（虽然我在彼得堡时曾甘愿当他的学生），而要考虑到这一事实：我是对本国皇帝和伟大帝国的政策负责的同行。

当1875年驻彼得堡大使的职位空缺，由大使馆的一名秘书代理代办的职责时，当时驻雅典公使冯·拉多维茨先生“为完成特别使命”被派驻彼得堡，以便使人表面看来是以平等的资格处理公务。由于拉多维茨彻底摆脱了哥尔查科夫的专横支配，而招致哥尔查科夫对他强烈不满，虽然他娶了一位俄国夫人，但俄国内阁对他的厌恶可能至今仍未消逝。

在柏林，贡陶—比隆已设计好了一个和平天使的角色。这一 160
角色通过在巴黎为他造成高于一切的影响，非常投合哥尔查科夫的自尊心。这对哥尔查科夫来说高于一切。可以推测，他同毛奇伯爵和拉多维茨的谈话是由他巧妙地引导出来的，目的是为了向欧洲鲜明地展示一幅受我们威胁、受俄国保护的法国的图景。这些谈话后来常被引用来证实我们的军事意图。哥尔查科夫1875年5月10日来到柏林后，便从这里往各处分发通告急电。通告开头说：“现在，即在俄国的压力下，和平有了保障”，似乎原先的情况并非如此。有一位非德意志君主[26]收到了这样一份通告，有机会给我看了电文。

我严厉指责了哥尔查科夫公爵。我说：如果突然跳到一位相信你而又毫无猜忌之心的朋友的肩上，以他为牺牲演出马戏，就决不能把这种行为说成是友好的；我们首席大臣之间出现的类似

事件对双方君主和两国都有损害。如果他觉得在巴黎受到赞誉十分重要，那也无须为此破坏我们和俄国的关系，我很愿意给予他协助，并打算在柏林铸造有“哥尔查科夫保护法国”题词的五法郎硬币。我们也可以在德国驻巴黎使馆上演一出戏，用同样的题词向法国社会展示，把哥尔查科夫装扮成穿着白衣、长着翅膀、在蓝色焰火中的保护天使。

在我的严厉指责下，他相当气馁，于是便反驳那些我认为是无可争辩地得到证实的事实，但没有表现出他平时固有的自信心和辩才。由此我可以断定：他怀疑他的威严的皇帝是否赞成他的行动。当我以同样的坦率在亚历山大皇帝处抱怨哥尔查科夫的不正当的行径时，列举了一切证据。皇帝承认了全部事实，但他吸几口烟，微笑着，只说不必把这种“老年人的虚荣心”看得太认真了。然而这些话所表示的不赞成的意思从来没有以明确的方式表述过，不足以推翻关于我们在1875年有意进攻法国的神话。这种神话当时和以后都和我无关，我情愿辞职，也不愿插手一种目
161 的仅仅在于不让法国得到喘息和恢复元气的战争。我认为，这种战争绝不会造成欧洲长期稳定的局面，而很可能使俄国、奥地利和英国在不信任和必要时积极反对年轻的、尚未得到巩固的帝国上意见一致起来，如果这个帝国推行导致了法兰西第一帝国和第二帝国[27]倾覆的不断的战争政策和维护国威的政策。欧洲会把我们的行动看成是滥用所获得的力量，而且每个人（包括帝国内部的离心力量）都会举起手来或者拿起剑来反对德国。在国家的军事威力经过多次的使人震惊的证实之后，正是德国政策的和平性质才有效地促使外国列强和国内敌人比我们所预料的还要快地同新德意志力量的发展言归于好，至少是可以容忍，并促使他们在

某种程度上善意地看待帝国的发展和巩固，而在某种程度上把德国看作是暂时的可以承认的和平捍卫者。

就我们的理解而言，非常奇怪的是，俄国皇帝虽然对自己的首席大臣评价很低，但仍然让他掌管外交部门的整个机构，从而也就容许他对各使团施加影响，而实际上他也正是这样做了。尽管皇帝清楚地看到了他的大臣被个人动机引入歧途，但他对哥尔查科夫起草写给威廉皇帝的亲笔信稿未予严格审查，而这种审查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可以防止造成一种印象，即亚历山大皇帝的友善态度顺从了哥尔查科夫的骄矜和恫吓的情绪。亚历山大皇帝的字体优雅而清晰，挥笔修书颇为得心应手。虽然君主与君主之间涉及细节的长信通常完全由皇帝亲笔写就，然而根据信件的文体和内容，通常我能够看出是哥尔查科夫拟就的底稿，如同我的君主的亲笔回信是由我起草的一样。两位君主在亲笔书信来往中以决定性的权威论及最重要的政治问题，虽然按照这种方式的亲笔书信没有大臣的副署[28]作为宪法保证，可是大臣有修正的作用，前提是皇帝陛下的书信符合草稿。事实上，起草人对此并没有把握，因为誊清的书信或许根本不会落到他的手中，或许交给他时已经密封了。

贡陶·哥尔查科夫的阴谋之分布之远，从我在1875年8月13日由瓦尔辛写给皇帝的书函中可以看出：

162

> 顷接陛下本月8日[29]从加施泰因所赐御书，我感激万分。首先可欣慰者，阿尔卑斯山之气候虽属恶劣，但对陛下之疗养终有裨益。我谨再次附上维多利亚女王之信。女王陛下如能更详细地叙述当时有关战争谣传之来由，这就会是饶有兴味的了，谣传之来源女王定然认为确凿无疑，否则女

王陛下不会再次引用，英国政府也不会将如此重要且对我们如此不友好之措施与之联结起来。我不知道，陛下是否认为可以这样做，即当维多利亚女王陛下断言她“不费吹灰之力就能证实她之担心绝非夸大”时，陛下趁此抓住她的话柄。查明如此“重大的错误”[30]从何处传入温索尔[31]，当然事关紧要。应视为陛下政府之“代表”者的暗示，显然系指明斯特伯爵。他很可能同毛奇伯爵一样，学院式地空谈及时进攻法国之利，然而我对此一无所知，而且也无人委托他如此行事。甚至可以断言，如果法国认定它无论如何行事，在任何情况下也将免遭进攻的话，那么这无助于促进和平之事业。我今天还像1867年在卢森堡问题上那样，我从来不会以敌人一旦准备充分便立即开战为理由而劝说陛下急速宣战，因为天意难以预卜。但是向敌人保证，人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会坐待他的进攻。这也是没有好处的。所以，明斯特一旦说及此类话语，我将不加指摘，并且英国政府因此也就无权根据一位大使的非官方谈话制订自己官方步骤，并背着我们号召其他强国对我们施加压力。这种严重而不友好的行动总是使人们不得不猜测，维多利亚女王之所以相信这些好战意图，除了明斯特伯爵偶尔说出的、连我也不相信的话外，还必定有其他缘故。奥多·罗素爵士保证说，他一贯向上呈报的是他坚决相信我们的和平意图。与此相反，所有教皇权力至上论者及其友人秘密地和公开地在报刊上指摘我们想在近期内开战，而生活于其中的法国大使则将此谎言作为可靠消息传往巴
163 黎。但是就此一点尚不足以使维多利亚女王如此轻信已被陛下亲口否认的谣言，因此女王六月二十日书函又提及这些谣

言。我对女王性格所知太少，因而不能说明她所谓“不费吹灰之力即可证实”一语是否可能仅仅是为了掩饰曾经发生的一种疏漏，以免公开承认它。

如果说，经过三个月的沉默之后，“本职”的兴趣又促使我广泛地谈论这一如今业已了结的问题，则恭请陛下宽宥。

(三)

弗里德里希·欧伦堡伯爵在1877年夏季宣称他体力衰竭。的确，他的工作能力已经大为降低，但不是由于辛劳过度，而是由于他从青年时代就不知节制，沉溺于享乐之故。他智勇双全，但并非一贯愿意顽强工作。他的神经系统受到了损害，终于时而哭哭啼啼，萎靡不振，时而矫揉造作，兴奋异常。同时，在七十年代中期，如我所觉得的，他渴求声誉，这在他从前身强力壮尽情欢乐的时候是没有的。虽然我们是老朋友，但他的这种转变不是同对我的强烈的妒忌无关的。他参加行政改革[32]，试图以此来满足他追求声誉的渴望。如果行政改革为他带来声誉，这一改革就必须成功。为了确保成功，他在议会就改革问题的讨论中，做了一些不切实际的让步，使我们的乡村行政机构的主要代表即乡长职位官僚化，同时实行新的地方行政管理制度。以往县长这个职位是普鲁士特有的，它是行政官僚等级机构的最后一个分支，而行政官僚等级机构就是通过它直接同民众接触的。按其社会上的威望来说，县长高于同一级的其他官吏。从前，当县长不是为了升官，而是因为有当终身县长的前景。这种县长的威望随其

任职时间而逐年增长。他除了代表本地区的利益之外，别无其他利益；除了竭力满足当地居民的需求外，别无他求。显而易见，这样一种机构无论是对上还是对下来讲，都起了非常有益的作
164 用，以少量的人力和财力就能够管理一个区的事务。此后县长就变成一个纯粹的政府官吏，而他的职位就成为在国家职务中进一步飞黄腾达的台阶，成为帮助竞选国会议员的手段；而作为国会议员的县长如果追求名利，那他一定认为自己同上司的关系要比对地方居民的关系更为重要。同时，新设立的地方长官机构就不再是同城市官厅相类似的自治机构，而变为文牍主义官僚政治的最低的一级；脱离生活现实的闲散的中央官僚机构就是通过这一级机构把所有不切实际的或是无益的主张推行到农村中去，而且迫使那些不幸的自治机构编造报告和表册，来满足官吏们的好奇心，因为他们除公务之外还有更多空闲时间。农场主和工厂主不可能“作为兼作的事务”来应付这样的要求。他们的职位必然愈来愈会由领取薪俸的录事担任，这些录事应由当地居民供养，而且是按上级官僚机构的眼色行事。

我预定将鲁道夫·冯·卞尼格先作为欧伦堡伯爵的继承人，并且在1877年里两次（7月和12月）和他在瓦尔辛谈话。当时看得明显，他力图使我们谈判的基础超越皇帝陛下的看法和我个人意见的范围。我知道，要说服皇帝接受卞尼格先作候选人会是很困难的任务；而他则把事情理解为似乎问题在于由政治形势所决定的一种制度变动，以便由民族自由党接管领导权。这个党热心于实行帝国宰相代理法[33]，表明了它渴望参与执政，它认为通过这一立法打开通向建立同僚共事的帝国内阁的途径；在这个内阁里就如同在普鲁士一样，不是由唯一负责的宰相，而是由各个立法

部门采取会议表决形式作出决议。所以卞尼格先不愿意单纯地成为欧伦堡的继承人，而要求至少有福尔肯贝克和施陶芬堡和他一起参加政府。福尔肯贝克（按卞尼格先的话来说）是管理内政的合适人选，而且他定会像管理布勒斯劳市那样表现得才能出众、精力充沛。卞尼格先本人选择了财政部，而施陶芬堡应当管理帝国金库，以便协同卞尼格先一道工作。

我对他说，除了欧伦堡的职位之外，没有其他缺额。我准备 165
建议国王让他作为此职人选，如果我的这一建议得到实现，我会很高兴。但是假设我还要建议国王陛下主动使两个大臣职位空出来，以便让民族自由党人担任，那么便会给国王造成一种印象，即认为事情已经不是适当的任命职务，而是要变动体制；对此他根本上是不会同意的。卞尼格先根本不应当指望，面对国王和我们的整个政治形势，可能在某种程度上会接受他这一党派进入内阁，而他则能以党派领袖的身份在政府内部起到符合其党派作用的影响，从而建立某种形式的多数派立宪内阁。在我们这里，国王实际上便是首相，这与宪法条例没有矛盾。如果卞尼格先以大臣身份依据上述方针进行活动的话，那么他势必不久就得在国王与自己党派之间进行抉择。他应当明白：如果我成功地使他得到任命，那么他的党就会因此获得加强和扩大自己影响的强大工具；他可以回忆罗昂的例子：罗昂作为唯一的保守党人进入了奥尔斯瓦尔德的自由派内阁[34]，并且以他为核心使内阁转变成为保守派内阁。他不应当要求我做任何不可能的事，我非常了解国王和我的影响的限度。如果不把那些向右直到进步党的公开和隐蔽的共和党人计算在内，那么所有党派对我来说几乎都是一样的，甚至是完全一样的。我的目的是加强我们国家的安全。一个民族只

有在它的统一和从而他的对外的安全得到巩固之后，才会有时间来发展内部体制。目前，在议会中民族自由党是为达到后一目的的最强有力的党派。在议会中，我所属的保守党，目前在居民中可能做到的地理上的扩展已达到了极限，本身不能发展成为民族的多数。它的自然和历史形成的影响范围，它的产生地在我们新获得的省份里是受限制的；在德国的西部和南部它并没有如同在旧普鲁士那样的基础。就是在卞尼格先的故乡汉诺威，也只有在韦尔芬党人与民族自由党人之间可以进行选择，而后者目前是帝
166 国能够依靠的最强大的基础。这些政治上的考虑促使我去迎合当前最强大的党派——民族自由党人，我试图吸收它的领袖当大臣，不论是当财政大臣，或是当内务大臣，对我说来是无关紧要的。我是从纯政治观点来看待这件事的，决定性的观点是：从现在起直到日后重大战争这一期间，关键问题是必须把德国牢固地团结起来，并且通过加强其国防力量来保证国家免受外来威胁，和通过宪法来保障国家反对国内各王朝的分裂活动。至于今后我们国内的制度是比较保守还是比较自由，这是个涉及合适与否的问题，只要大厦能在暴风雨面前巍然屹立，就可以平心静气地加以讨论。正如我说过的，我恳切地希望能够说服他，如我所说的那样，登上我的航船，帮我掌舵，现在我正站在登陆处等待着他上船。

然而卞尼格先还是坚持，如果没有福尔肯贝克和施陶芬堡，他就不愿意参加政府，给我留下的印象是，我的努力不会成功。这一印象由于收到皇帝表示极为不悦的书函[35]而迅速加深。从这一书函中我知道了欧伦堡伯爵曾走进他的房间问道："陛下是否已经听到有关新内阁的事？卞尼格先。"在这一报告之后，皇帝以书面形式怒斥我的独断专行以及要求他不应再"以保守派的方式"进

行统治的期望。通过毕洛夫，我回信给皇帝说，在事先未得证实有关人士接受这一委任时，我是不能够向他推荐什么人来做欧伦堡的继承人的。我认为卞尼格先是适合的，并且试探过他的意向，但他的见解不是我所期待的，我确信，我不能够推荐他做大臣。我所收到的信中所表示的不悦的指责迫使我再次提出我在春天提出的辞职呈文。此后，我感到身体不适，疲劳不堪，皇帝书函文字也好，欧伦堡的攻击也好，都十分刺激我的神经，以致使我又得了重病。这次书函来往发生在1877年的最后几天，而我新得的病恰恰是在新年之夜发作的。

国王在给毕洛夫的信中回答我说，他把事情弄错了，他希望我把他的前一封信当作没有写过。由于这一事件，同卞尼格先的任何进一步的谈判都是不允许的了。但是从我们的政治利益来看，我认为把皇帝对卞尼格先个人和候选一事的评价告诉他是不适宜的。表面上我把我认为已经完全中止了的谈判保持为悬而未 167
决。当我再次来到柏林时，卞尼格先以友好的方式主动把他认为尚未结束的事件予以否定性的结束。他在国会大厦问我是否真的想施行烟草专卖[36]，在得到我肯定的回答时声称，既然如此，他不得不拒绝以大臣的身份进行合作。即使在这时，对同他进行谈判的任何可能性早在新年之后就被皇帝取消一事，我仍然向他保持缄默。也许他通过别的途径已深信，他那种以民族自由党精神制定的对政府政策作原则性改变的计划会遭到皇帝的不可逾越的障碍，特别是在施陶芬堡作了关于必须废除普鲁士宪法第109条（关于继续征税[37]）的讲话之后。

如果民族自由党的领袖们能巧妙地推行自己的政策，那么他们早就该知道：他们要得到委任，就必须有皇帝的签署，可是皇

帝对宪法这一条文比对其他条文都更为敏感，同时使君主疏远自己的可靠办法莫过于强夺他的这一守护神了。当我私下把我和卞尼格先谈判的内容告诉皇帝陛下并提到他有关施陶芬堡的愿望时，由于君主当时还受着后者的演说的影响，便用手指指着自己军服肩上的团队号码说："109 号，施陶芬堡团。"如果皇帝当时就同意让卞尼格先参加我为取得同国会多数派的一致而期望建立的政府，甚至如果卞尼格先会很快懂得使内阁和国王按自己党派的路线走是不可能的，那么如我现在所确信的那样，党派纲领的某些尖锐的教条和皇帝对君主制度信念的敏感毕竟是不能够长期互相容忍的。当时我还不太相信：不应试图使皇帝陛下接近民族自由党的观点。由于欧伦堡的敌对活动而激化了的反抗之剧烈，确实超出我的意料，虽然我知道皇帝对卞尼格先和他过去在汉诺威[38]的活动怀有君主本能的厌恶。尽管民族自由党在汉诺威及其领袖在 1866 年前后的活动极大地有利于汉诺威的"国有化"，并且皇帝也像他父亲在 1805 年[39]那样，无意放弃这块获得物，但皇帝的君主本能甚为
168 强烈，以致他对汉诺威臣民对待韦尔芬王朝的这种行为耿耿于怀。

这是许多荒诞不经的谎言之一，说我想把民族自由党人"逼得走投无路"。恰恰相反，正是这些先生企图这样对待我。由于《帝国之钟报》和《十字报》所造成的整个诽谤时期和由于我那心怀不满的以前的朋友克莱斯特—雷措夫领导的对我的宣战出现的同保守党的决裂，我的同侪容克地主们对我的恶意嫉妒，各方面支持的丧失殆尽，宫廷中的敌意，那里天主教和妇人的影响——所有这一切都削弱了我在民族自由党以外的支持，因而我的支柱现在仅仅在于皇帝个人同我的关系了。民族自由党人并未从中看到通过对我的支持会加强我们的相互关系的机会，恰恰相反，企

图违背我的心愿硬拉我跟着他们走。为此目的，他们与我的许多同僚建立了联系，通过弗里登塔尔和博托·欧伦堡二位大巨（对博托·欧伦堡的话，我的国务副首相施托尔贝格伯爵是洗耳恭听的）他们不通知我便同两个议院的主席团开始正式协商，内容不仅涉及确定会议和延迟会期问题，而且也涉及提案的实质问题，而不顾我的（正如我的同僚们所知道的）反对意见。对我的地位联合发动的进逼，要求共同摄政或在我的地位上实行独裁，这种意图已见诸于设立独立的帝国大臣的计划之中，见诸于上述秘密活动中，明显地表现在1878年6月5日王储作为他受伤的父亲的代表召开的枢密会议上，会议是为了决定诺比林行刺案[40]之后解散国会的问题。我的半数同僚，甚至更多一些，总之内阁和枢密院的多数与我的意见不同，投票反对解散国会。他们对此提出的理由是：现在继赫德尔行刺案[41]之后，又发生诺比林行刺案，现在的国会将愿意改变自己最近的表决而迎合政府。在此情况下，我的同僚们表现出的信心，显然是以他们和有势力的议员之间的默契为基础的；但是，这些议员中没有一个试图同我进行哪怕是一次谈话。看来，已经达成关于瓜分我的遗产的一致意见了。

我深信，即使我所有的同僚持有另一种意见，王储也会赞成我的意见的，更不必说我得到了二十位或更多应邀出席的将军和 169
官吏们的同意，至少将军们是同意的。一般说来如果我仍然想要留任大臣（这是一个公私兼顾的问题，我经过一定考虑之后，我的回答是肯定的），那么我就有能力自卫，而且必须努力改变议会中的形势和改组我的同僚。我想留任大臣是因为：如果身受重伤的皇帝能活下来（在他这样的高龄，由于大量失血，因而对此没有把握），那么我决意不违背皇帝的意愿而离开他；如果他死去，

那么我的良心与责任使我不能拒绝为他的继位人效劳，凭我所获得的信任和经验，我是胜任的。不是我要和民族自由党人争吵，而是他们力图串通我的同僚阴谋逼我走投无路。我不仅没有说过，而且也没有想到过“使之走投无路，直到求饶”这样令人厌恶而又乏味的词句。这只不过是竭力损害政敌的一种骗人的捏造罢了。何况这种词句并非是那些大肆传播的人的创造，而是一种拙劣的剽窃。博伊斯特伯爵在他的回忆录* 中说道：

> 奥地利的斯拉夫人把我从未说过的话“必须逼他们走投无路”强加于我。这句话的来源是这样：以前任大臣、后来任加利西亚总督的戈鲁霍夫斯基伯爵经常同我用法语交谈。在1867年我担任首相职位之后，加利西亚邦议会无条件地投票拥护国会[42]，我们要特别感激他所做出的努力。当时，我对戈鲁霍夫斯基伯爵说：“如果这件事一旦实现，斯拉夫人就处于困境了”，这一说法与上面的说法是截然不同的。

在我主张解散国会的许多理由中[43]，我特别强调的是，对国会来说，只有通过解散才能撤回自己的决议而不损害自己的威信。不能明确断言，当时著名的民族自由党人是仅仅打算成为我的同僚，还是要成为我的继任者，因为前者往往能够转化为后者。但是，我有一种毫无疑义的印象，就是在我的某些同僚、某些民族自由党人与宫廷和中央党内某些有势力的人之间，关于瓜分我的政治上的遗产的谈判已经达成或者几乎达成了协议。这一

---

* 《四分之三世纪忆旧》第1章第5页。

协议提供了建立类似格莱斯顿内阁中自由主义和天主教教义之间
那样的集合体的条件。通过奥古斯塔皇后周围的亲信，包括《帝 170
国之钟报》和宫廷大臣冯·施莱尼茨的势力在内，天主教一直渗
透到老皇帝的宫内，而那里对我的全面攻击找到了冯·施托什将
军这位同盟者。这位将军在王储的宫中也占有良好的地位，这部
分地是由于他个人的才能，部分地是借助于冯·诺尔曼先生及其
夫人的帮助；还在马格德堡时他同诺尔曼夫妇的关系就很密切，
并且帮助他们移居柏林。

（四）

由一种格莱斯顿内阁来替换我的计划是依靠从1878年3月31日起就任内务大臣的博托·欧伦堡伯爵拟订的，亲族关系保障了他的家族和登霍夫家族[44]在宫廷享有的传统影响。他聪明、文雅，比哈里·阿尔宁禀性高尚，比罗伯特·哥尔茨更善于辞令。但是，和他共事的结果是，我曾企图争取的能干助手和可能的继任人对我的好感不能保持长久。

我和他的关系的破裂，首先由于他的满腔怨恨情绪的发作，虽然这种感情表面上为良好教养的无可指摘的彬彬有礼所掩盖，但毕竟尖锐地妨碍日常的互相信赖的公务关系。当时帮助我处理机密事务的枢密顾问蒂德曼在我不在柏林时，对伯爵传达了一项委托的任务，他办事的方式出我意料地惹得伯爵以书信来表达他的盛怒。由于我给他的委托是公务性的，而且现在还没有失掉其意义，所以我把来往书信载在后面。

基辛根，1878 年 8 月 15 日

对于反社会党人非常法草案[45]在提交联邦会议之前便正式公布于《地方通讯》，我请求阁下向欧伦堡伯爵大臣先生和枢密顾问哈恩先生表达我对此事的遗憾。草案的公布对于我们作任何修改都是不利的，还损害了巴伐利亚和其他不同意的人们。在我这里和巴伐利亚人多次谈判之后，我不得不认为巴伐利亚是无条件坚持反对帝国内阁的。符腾堡，我听说
171 还有萨克森，不是在原则上反对帝国内阁，而是适时地通过反对聘请法官的方式来反对帝国内阁。对这种反对意见，我个人只能赞同而已。这里涉及的不是司法职能，而是政治职能，并且普鲁士内阁也不应当在其事先的预备决议中听命于司法同僚，而且在未来的任何时候也不应当在反对社会主义的政治斗争中因此而无所作为。据我的看法，帝国内阁的职能只能够由联邦会议直接地或是通过每年选举的委员会中委派的代表来实现。联邦会议代表德国的全部主权的政府权力机构，在其他情况下大致相当于枢密院。

但是，直到此时我不得不假定巴伐利亚不会同意这一为符腾堡、萨克森和我个人所能接受的出路。第二十三条第三项关于只有失业者可以被驱逐的限制条款，为达到这一目的也是不够的。

其次，我认为法令在涉及公务员方面需要补充，指明参加社会主义的政治活动，后果就是解雇和丧失享受养老金的权利。柏林的大多数薪俸低的下级公务员，还有铁路巡道工、扳道工以及类似的工人，都是社会党人，这一事实的危险性在发生暴动和运送军队时是显而易见的。

再次，我还认为，即使法令生效，也不能使那些在法律

上被证明为社会党人的国民长期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以及享受国会议员的特权。

在各报同时登载了亦即正式公布了比较缓和的法律形式之后，一切严厉的形式在国会中的希望，要比在不予正式公布的较缓和的形式的情况下少得多。

特别应指出，因为无疑国会将会通过协商对任何法律草案作出让步的话，像现在那样的法律草案实际上不会给社会主义带来危害，也决不足以消除社会主义的危害。我感到遗憾的是我的健康状况绝对不允许我立即参加联邦会议的讨论，因而我不得不保留在冬季召开国会例会时向联邦会议提出进一步建议的权利。

冯·俾斯麦　　172

柏林，1878 年 8 月 18 日

殿下：

您委托政府枢密顾问蒂德曼向我和枢密顾问哈恩表示，您对反社会党人法草案未经提交联邦会议便正式公布于《地方通讯》一事表示遗憾。枢密顾问哈恩对此并无任何责任，因为他这样做是得到我的同意的。而我同意他这样做，只是由于在头天晚上出版了载有法律草案的联邦会议的印刷品，而没有指示要谨慎处理。况且，帝国宰相办公厅主任先生[①]告知我，在这种条件下完全可以保证期待次日，即《地方通

① 霍夫曼。——德文本注

讯》出版的那天，由各报公布法律草案。这一推测后来完全得到证实。联邦会议于本月14日下午二时开会，而当天下午《地方通讯》出版。可见，《地方通讯》公布法律草案的内容并没有早于草案提交联邦会议讨论之前。

不在《地方通讯》上公布是否更好，对这个问题我不打算作进一步讨论。聆听殿下的睿智的论断，即令这些论断与我的见解不合，我也一贯感到特别重要。但是，我不能够默许这样一个事实，即殿下通过您的一个部下，对我表示您的不赞同的态度，从而将我置于与我的部下同等的地位，这种做法更加明显地突出了对我的身份的不尊重。这一作法有损于人如此显眼，使人设想这是故意的，而且自然得出与此有关的推论。一俟我证实这一设想确实无误，我便会毫不犹疑地从中得出结论。由于目前尚非如此，我仅恳求殿下不使类似的事件重演。

顺询安好。

欧伦堡伯爵

加施泰因，1878年8月20日

阁下十八日尊函表明，阁下似乎把由枢密顾问蒂德曼的过失所造成的沉痛误会归罪于我，而对我在有效的疗养期间事务
173 工作中的不完善之处不给予谅解。蒂德曼将我私下的和非正式的谈话传了出去，这种不慎重的做法完全出乎我意料。尊函内容给我的印象是您遭到了轻率的对待，为此，我请您原谅，虽然对此我并无过错，至多也只是我使此事成为可能而已。阁下竟认为这是我故意这样做，使我惊讶与痛心。因为

我以为我们之间的友好关系十分牢固，不可能产生这类误解。

顺询安好。

冯·俾斯麦

众所周知，欧伦堡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于1881年2月呈请辞职的[46]，并于当年8月被任命为卡塞尔省长的。

下面引述的我和皇帝陛下的来往信函提到了他的名字。信中谈到的1881年12月17日我的报告的主题，我已不能断定。

柏林，1881年12月18日

我必须告诉您，我昨天晚上作了一个奇怪的梦，我这里描述这个梦，依然历历在目。

在今年假期之后，国会第一次召集会议。在讨论时，欧伦堡伯爵走了进来，讨论便立即停止了。长时间沉默之后，主席又让最后一个发言人讲话。一片沉默！主席宣布闭会。于是立刻暴发出喧嚷和喊叫声。在会议期间不应当授予任何一个国会议员勋章；在会议上不应当叫出君主的姓名！另一天的会议。欧伦堡来了，于是大家仍然以同样的嘘叫声和喧哗声来迎接他。——这时我从梦中醒来，神经异常兴奋，以至久久不能平静下来，从四点半到六点半整整两个小时不能入睡。

所有这一切发生在我出席国会的时候，现在我描述，依然清晰在目。

但愿这个梦不要应验，但毕竟这是奇怪的事。因为这是我在六个小时安静的睡眠之后做的梦，所以不可能是我们谈

话直接引起的后果。

总之，我应当把这件怪事告诉您。

您的威廉

174 柏林，1881 年 12 月 18 日

顷接陛下惠书，谨表最崇敬的谢意。我依然认为，这个梦即使不是我先前所做报告引起的直接结果，那么无论如何也是最近几天来以普特卡默尔的口头报告、报刊上的文章以及我的报告等为基础的综合印象的结果。清醒时的情景并不能立即反映在梦中，而是只有由于睡觉和休息，精神安静下来的时候方才可能。陛下的惠书也促使我叙述在1863 年春天所做的梦，那是在最困难的冲突[47]时期，人们看不到任何出路。我做了一个梦（第二天早晨我立即把这个梦讲给我的妻子和其他证人听），梦见我骑马沿着阿尔卑斯山狭窄的小路走着，右边是深渊，左边是峭壁；小路越来越狭窄，马不愿继续前进，可是要转身回去或是从马上下来，又因地方窄小而不可能；我便用左手中的鞭子照着陡峭的岩壁抽打了一下，乞求于上帝；鞭子变长了，长得看不见尽头，岩壁就如布景似的倒塌了，于是面前展现出一条宽阔的道路，衬托着像在波希米亚那样的山丘和森林景色、旌旗飘扬的普鲁士军队。还在梦中我就想尽快将这一切报告给陛下。这个梦后来应验了；我醒来时感到精神愉快，力量备增。

陛下在焦急不安中醒来后还记得那个噩梦，只是就我们面临着不少激烈而又纷争不休的议会会议而言，它是应验

了，遗憾的是这些会议有损于议会的威信并妨碍国家事务。但是，陛下是不可能在场的；虽然我认为像国会最近的几次例会这类事态作为衡量我们道德和我们的政治修养、可能还有我们的政治才能的准绳是令人遗憾的，但是这类事本身并不是灾难性的，因为物极必反。

请陛下一如既往，宽恕我因受到陛下惠书的感染而道出的这些休假中的沉思，因为从昨天起到1月9日是我们的假期和休息日。

欧伦堡伯爵对蒂德曼的抱怨和其中立即提出的内阁问题，这种作法由于当时我得了一场重病而尤其严重地影响了我的神经，这场重病是由于皇帝两次遇刺的影响，同时又必须在柏林大会主席团担任工作而引起的。职责确实迫使我忘掉了疾病，但是，在 175
加施泰因的治疗与其说是治愈了疾病，毋宁说是加剧了病情。我的同僚、国务大臣伯恩哈德·冯·毕洛夫就是因为这种治疗而于1879年10月20日去世的。这种治疗，如果常常被工作和激动忧虑所干扰，那么对过度疲劳的神经绝不会起到镇静作用。

返回柏林之后，我不得不立即在国会中为反社会党人提案辩护，同时我又证实了这一经验：登台演讲不如修改需代表领导进行答辩的冗长而快速口述的发言稿那样神经紧张。有一次当我忙于修改这种讲稿的时候，几个月来形成的神经危象发作了，幸而表现在我身上只是轻微的荨麻疹。

实行议会制的欧洲强国的首席大臣的任务本身就十分繁重，足以把一个人的工作精力消耗殆尽。当一位大臣，像在德国和意大利那样，应当帮助自己的民族渡过其形成阶段，像在我国那

样，还不得不同各党派和个别分子的分离倾向作斗争，那么任务就会更加繁重。当人们把精力和健康全部用来解决这些任务的时候，便会备感各种困难并非客观必然的。早在七十年代初，我就认为，我的健康永远不会恢复，所以我就把主持内阁的职权交给我同僚中唯一亲近的人罗昂伯爵[48]。但在那时，我还没有被事务上的困难弄得失去勇气。我认为，使我丧失勇气的是我本可特别指望得到支持的那些人士所制造的敌对阴谋。在《帝国之钟报》时代，这种阴谋是以该报所代表的一些人主要同宫廷和保守党人以及同我的许多公务上的合作者的关系为标记的。在同来自《帝国之钟报》集团的宫廷势力及王室势力的斗争中，我没有得到对我十分恩宠的君王的足够支持，这一事实最使我感到沮丧，并使我拿定主意于1877年3月27日呈请辞职。当舒瓦洛夫伯爵1878年要求我召集会议时[49]，我患了腰部丹毒性炎症，这是我的健康遭受损害的后果，是神经衰竭的症状。对此我的某些同事在公务关
176 系中缺乏诚意，比《帝国之钟报》和它在宫廷的追随者起的作用更大。由于弗里登塔尔大臣和后来博托·欧伦堡伯爵的影响，我的代表——副首相施特尔贝格伯爵的活动所采取的形式，使我终于领悟到，他们施行的一套办法旨在对我加以不断排挤，使我脱离政治上的领导地位。这一套办法的象征可以从那一时期内阁的正式通告下面没有我的签字这一事实中看出来。这种现象不是按照我的意愿或者征得我的同意而出现的，而是利用了我对表面形式无所谓的态度，当我尚未怀疑这是有组织的图谋时，我听任这种事情，不加指摘。

根据后来的事件能够说明的细节并不完全归之于1878年6月召开的枢密院开会期间的形势，但是，这些细节回顾起来在某种

程度上可以阐明当时的状况和其内在的动机。博托·欧伦堡伯爵作为内务大臣在邦议会的讲台上故意使人察觉自己对议员里克特的好感，与《北德意志总汇报》上的文章针锋相对。对我来说，则更加明显，因为我不怀疑伯爵将这篇引起他的指摘的文章和我联系起来了。正如暴风雨之夜的每一次闪电清楚地照亮大地一样，我的对手的每步棋让我观察到了由他们实际上抵制而表面上却又表现为毕恭毕敬的个人善意所产生的全部形势。格莱斯顿式的内阁的使命可以由冯·施托什、欧伦堡、弗里登塔尔、康普豪森、里克特以及具有天主教宫廷势力的“文特霍尔斯特”概念中的各种变种这些名字来标志，这一内阁如果得以建立，利益有关人士大概是不会提出这个内阁本身能否站得住这个问题的；主要的目的是否定的，就是要排挤我。而在这一点上，股票持有者对未来的意见暂时是一致的。每一个人在此之后都可能又指望挤掉另一个人，这一点已孕育在我们的花样繁多的联合的体制中，而这种种联合只有在反对现存制度上是一致的。所有这一切阴谋勾当当时没有得逞，只是因为无论是国王还是王储，都不同意。那时以及后来的1888年，我的那些追求名利地位的对手始终错误地理解王储同我的关系。王储和他父亲一样，直到逝世仍然对我保持信任。他的妻子企图动摇这一信任，但从未达到像奥古斯塔皇后那样好斗和坚决，奥古斯塔皇后在选择手段方面也是不受任何束缚的。

除私人性质的折磨人的争斗之外，我还遇到了公务上的困难和紧张的工作，这是由于同自由贸易政策决裂（我写给冯·通根男爵谈到关税保护[50]的信象征性地标志了这一决裂），其次是由于 177
跟分离派的分裂和分离派的转入中央党。我的健康完全损坏了，这使我丧失了活动能力，直到施文宁格医生确诊我的病情、正确

地进行治疗、使我重新感受到我多年来已经失去了的相当程度的健康感为止。

（五）

新纪元时期的外交事务部副国务秘书冯·格鲁纳先生在我接管外交部后不久退职，由冯·梯勒先生接替。早在我担任邦联公使[51]的职务时期，冯·格鲁纳就已属于我的敌对者之列，因为他把这个职位视作是从他父亲尤斯图斯·格鲁纳那里继承的财产；他一直敌视我，在公务上他是平庸无能的。1863 年 11 月他向皇帝陛下呈送了一份有关预算争端[52]的信件，其意向与奥尔本多夫的冯·芬克陆军中校和罗根巴赫一样，这两个人也认为采取这一步骤是好的。这些先生们向国王提出建议时是根据这样一种假想，即：如果国王听从他们的劝告，就一定会向众议院让步，就会委任另一个内阁，至少要委任另一位首相和外交大臣[53]。为此目的，那些处在公共生活之外的势力都行动起来，宫廷大臣冯·施莱尼茨和其他宫廷亲信为这种势力卖尽了力气。冯·格鲁纳先生后来也生活在那些 1876 年庇护和资助《帝国之钟报》的人们中间。

在 1877 年 1 月《帝国之钟报》的编辑被判刑和 3 月我呈递了辞呈却遭到国王陛下的拒绝之后，6 月我在基辛根治疗时，通过事务渠道了解到，冯·格鲁纳先生被委任到宫廷内阁任职，并且没有责任大臣副署就获得事实上的枢密顾问的头衔[54]，而且冯·施莱尼茨先生无理要求《帝国与国家公报》[55]的监护人在官方报纸上公布这一委任。

关于这件事，我于 6 月 8 日致函帝国办公厅长官、枢密顾问

蒂德曼以通知内阁：

我认为，《帝国与国家公报》的国事专栏乃是用以公布帝国和普鲁士的国家事务的，帝国宰相或者普鲁士内阁对这种事务承担责任。如果委任格鲁纳为枢密顾问的消息将公布于国事专栏，那么即使先前提及格鲁纳调任官廷内阁一事也不能排除人们的推测，即：内阁对委任格鲁纳为事实上的枢密顾问已承担责任。社会舆论和邦议会未必会认为：内阁这样地突出对待它的尽人皆知的敌人是符合它的愿望的；毋宁说它们会猜测到事实真相，即：内阁在官廷没有足够的威信，在皇帝陛下那里又没有足够的影响，可以防止这一任命；人们甚至不会怀疑国家公报公布这一委任曾经得到内阁的通常的副署。即使公布了边页上表示不悦的御笔批示[①]和 178

① 1877 年 5 月 22 日的普鲁士内阁报告中请求，考虑到格鲁纳的政治态度，免除内阁对格鲁纳的委任状的副署。国王在内阁的报告上的批注说：

退回内阁。当我出于个人的恩典感到要赐予某个人以提升的时候，我不习惯听到像在这份报告中所具有的异议，这种异议竟至于发展到对这一委任状拒绝副署。我不得不对内阁表示我对这种做法的高度惊讶，不过免除内阁对（委任状）的副署，立即送给我，由我单独去完成。我想，我的签字也有这种效力。

柏林，1877 年 5 月 28 日

威廉

内阁对这一不欢的批注的答复是一份呈文，其中强调：它的意图不是对国王陛下的个人恩典提出反对的异议，而只是说明："冯·格鲁纳先生反对国王陛下政府的态度使得这个政府的代表人不可能在完成这一恩典方面进行合作。"内阁把接受免于副署委任状视作对它的请求的那些理由的尊重；并相信可以希望，陛下的意图并不是通过这一亲笔批示的不悦的措辞表示对在这一事件中指导内阁的整个立场的不满。——国王在 5 月 30 日的答复中"乐意地"证实，他的 5 月 28 日的批注决不是以对内阁的整个政治态度的不满为基础的。——参看蒂德曼：《帝国宰相办公厅长官的六年》，第 148 页以下。——德文本注

内阁对此的答复，对内阁根据宪法有权影响陛下圣裁的信任也不会有所增长。人们将会就其内容及其后果试图同不久前法国发生的导致更换内阁[56]的事件对比。

令我忧虑的是我们应当把格鲁纳的事件看做是冯·施莱尼茨先生及其顾问（而不是皇帝陛下）所放出的探测气球，用来检验人们究竟能要求我们什么，我们对我们的内阁的威望的评价到底有多高。照我的意见，顺从这些对皇帝的决断施加不公正影响的势力，并不是消除这些势力的方法；恰恰相反，这些势力会增长起来，而现在还仅仅只具有表面性质的冲突会很快在情况不妙的地方重复，并引起重大的党派问题。

鉴于我目前的状况，我可以放弃作任何官方声明，但是我感到，这样做对我个人来说如此重要的重新工作的问题，就不照顾到我的健康状况、没有很好考虑地决定了。因为我希望我的健康会好转，因为只有这样我才愿意重新工作，只要这符合陛下的意旨，所以维护大臣职位的威信对我个人来说是休戚相关的，也只有这样，我才可能重新担任这一职位
179 而问心无愧。

据我看来，拒绝由官廷大臣提议的在国家公报的国务专栏中公布，是符合第一个决定的逻辑的正确的解决办法。官方文告上公布就不能防止社会舆论的误解，而且总是《帝国之钟报》集团对现政府的阴谋活动的局部胜利。官廷内阁的通知本身不属于《帝国与国家公报》，即使《帝国与国家公报》此外又是《王室公报》[①]，那么根据我的看法，也不能

① 混淆了。——德文本注

够在国务专栏里刊登对官方刊物内容不承担责任的宫廷大臣的命令。在公布命令之前，宫廷大臣本应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请求责任内阁的同意。在这一事件中并没有请求同意。宫廷大臣要求支配《国家公报》的权力，因此就以此一表面理由也应拒绝他的要求。如果刊登王室事务的命令出自陛下本人，那么执行命令一般不会招致任何疑义，但是甚至在不容置疑的情况下，王室文告和国家文告也应以分别刊登为好。依我看，应该这样划分，即：有关王室的敕令不要和政府的命令混杂地刊登在一起，而是和国家公报两个官方大栏目——《德意志帝国》和《普鲁士王国》并列，最合乎礼仪的是在二者之间，或者在《普鲁士王国》栏目之后加上以《王室》为标记的第三个栏目，用线条与另外两个栏目隔开，正如现在的《普鲁士》和《帝国》隔开一样。这样也就为以后解决了形式上的问题，而这种形式在我看来无损于任何人。

如果要用官方名义发布皇帝陛下的决定，这个决定不顾文件中规定的对对方的保护而公开用宪法的习惯语言宣布君主对大臣不予充分的信任，则另当别论。大臣若想予以反对，当然别无他法，只有辞职。毫无疑义，这一事件（一旦它具有这种性质）更多涉及的是我，而不是我的同僚。我的同僚们或者根本没有遭到《帝国之钟报》和其他一些表达冯·格鲁纳、冯·施莱尼茨、涅谢尔罗迭伯爵和纳图齐乌斯·卢多姆等诸位先生意图的报纸的公开诽谤，或者即使受 180
到诽谤，其程度也显然不及我。

赦免冯·纳图齐乌斯先生、嘉奖涅谢尔罗迭伯爵和冯·格鲁纳先生恰恰是在这些先生们的刊物对我的诽谤引起了社

会舆论和法庭注意的时候，恰恰是在这些先生们和上述报纸的关系已经明显的时候，这种赦免和嘉奖乃是国王对这些人的一种恩泽，而这些人之所以出名，无非是由于他们对政府的敌视和公开诋毁我的名誉而已。然而，只要我还是国王的仆人，我的名誉就应该得到陛下的保护。如果我多少不该得到陛下的保护，那么我认为这纯属个人原因，可以因此命令我辞职，而大可不必顾虑到我的健康状况。这些推论对我来说只涉及个人，但是根据事态的发展，则将成为我能否重新视事的决定因素。

我奉劝我的同僚们：如果陛下无论如何不愿意放弃正式公布格鲁纳的任命的话，为他们内阁的前途利益着想，则请留意公布的形式，使人一目了然其中缺少副署。这可以通过我上文建议的在帝国、普鲁士和王室之间分成三个委任栏的方法做到，特别是如果报纸对此得到一种说明则更好。然而我认为应先在官廷内阁栏目下单独地公布格鲁纳到官廷内阁任职的委任状，而在次日再发出陛下愿意授予官廷内阁这位官员正式枢密顾问官衔的消息；建议无论如何应该选择一种哪怕稍微有别于通常的通告方式。

在给枢密顾问蒂德曼并很快转递到冯·毕洛夫大臣的这封信里，我又给冯·毕洛夫增添了如下一段话，请求秘密地将信内容让我的同僚们周知：

77 年 6 月 10 日

……我认为，我比我的同僚们更强烈地被这一事情所触

动。除我之外，至多康普豪森还受到《帝国之钟报》党的诽谤，但远远不像诽谤我那样下流。对他的攻击事实上采用了卑鄙的手段，但只是涉及他的职务，而并不触及他个人的名誉。当然，内阁从整体来说可以认为自己因为任命格鲁纳的方式而感觉受到伤害，从而对此作出反应，以便今后保障自己的权利和尊严。但是，在委任格鲁纳这一事实中受到伤害本质上只触及我一个人。他唯一能够引人注目的是他多年来 181
对我个人的仇视，因为他既无才能，又无功绩；在外交部由于他在重要时刻近似精神病那样的无能而成为一种障碍；在最近十五年来，他无所事事，只是由于自命不凡又无人赏识而阴狠执拗地发议论，写文章，对我进行阴谋陷害。目前我完全不去考虑正是这些帝国之钟报分子对我制造了如此之多的困难，使我履行自己的职责时力不从心。我现在说的只是他们想通过成功地劝说陛下嘉奖此人一事来打击我个人。如果我在给蒂德曼的信中说：我的同事先生们在格鲁纳事件中没有强制的理由去退职的话，那么我觉得面对这一事件我的状况就截然不同了。

如果您能按照这种意思私下转告康普豪森、弗里登塔尔和法尔克，我将非常感谢您。维尔莫夫斯基[①]的态度出乎我意料之外。直到现在我还把他当作反对施莱尼茨宫廷党的忠实盟友，但是他在这一事件上的行动我不能理解。他同欧伦堡及莱昂哈特一起使政府正在失去自尊的限度，最终还要失去国内尊重的限度，而没有这种限度，在宫廷和国内这种艰

① 威廉一世皇帝的民政厅长官。——德文本注

难的形势下是不可能处理国务的。对欧伦堡只能重复已经说过的话。霍夫曼本人如何对待这一事态呢？

疗养似乎对我是有好处的，但是任何不愉快的情绪波动也会很敏感地影响到我的健康。这使我预料到我的健康状况将很难适宜于工作了。我并不会在单纯地履行公务面前退缩，但是我再也不能像以往那样忍受官廷阴谋的额外负担了，这也许是因为就其规模和影响来说，这些阴谋以令人惊骇的方式在增长。关于我不改变辞职的意图的真正原因，我在三个月前只字未提，虽然基本上就是同样这些原因。鉴于对皇帝的尊敬，即使在今后，除了健康状况之外，我也不能提出离职的其他理由。

事情的结局是，任命格鲁纳为枢密顾问的委任令没有在国家公报上公布[57]。

第二十七章　内阁各部

我经常缺席，在这种时候我同我的一些内阁同僚失去了接触。我多少曾帮助他们中的每个人从低微的职位提升到大臣，而且没有因干涉他们管辖的部门而使之感到为难，这一事实使我过高地估价了他们个人对我的好感。对他们管辖部门的日常事务我很少干涉，只有当我看到因特殊利益而使巨大的公共利益遭受危险时，方才予以过问。例如，我曾反对在莱茵郜[1]附近的莱茵河开凿运河，这条运河是为了航行而设计的，然而30年后就会将两岸和两侧需要建筑的堤坝之间的河床变成沼泽；我也同样反对过把选帝侯堤坝铺设成一条通常宽度的公路并在紧逼旧公路的地面上建筑房屋的计划。在这两件事中我阻拦那些直接管辖这些事务的官厅的意向，而且我认为我由此已博得永久的赞佩。我的赞助也没有使我的同僚和为我所管辖的帝国官吏对我有所讨厌。按照宪法规定我本可以任用邮政、电报和（帝国）①铁路全部官员，并且在帝国管辖的个别部门补充一切职务的空缺。然而，我相信我未曾向冯·斯蒂凡[2]先生或其他任何人为我所推荐的候选人要求过职位，哪怕是一个邮差的职务也罢。我常常反对的只是我的同僚们对建立新的重要法律和组织的癖好，反对坐在办公桌前制订规

① 出版者所加。——德文本注

划的癖好，因为我知道，如果不是他们自己，那么就是他们的顾问们热中于编造法律，而且内务部许多搞报告的顾问们还在考试时代就抱有他们专业的一套方案，以便一旦得到上司的同意，就想方设法以此造福于帝国臣民。

188 尽管我很克制，我的大多数友僚在我辞职之后，都感到如释重负。这在多数情况下就是因为我抵制了他们对我们的立法机构进行不必要的干涉这种过分企求所致。在学校方面，我虽然长期同一种理论作斗争，但收效甚微。按照这种理论教育大臣可以不要法律根据，不顾学校现有资金数额，也不考虑纳税能力如何，而以行政命令方法，确定每个区应当为学校提供的税额。这种在其他任何管理部门中所没有的绝对权力，在某些情况下被任意应用，以致使一些区不能生存下去。这种权力的依据并不在于法律，而是在于前任教育大臣冯·劳麦尔[①]的一项指令，他使学校的预算服从于相应的管理部门的指示，而最后听命于大臣。这种通过法律来巩固大臣的专制政治的企图已成为我在审核向我提出学校法案时给予同意的障碍。

在财政方面我同意税收改革，其前提任何时候都是使不根据纳税人财产而征收的直接税不再被用作今后每年附加税的标准。即使通过对土地和房屋课税而造成的不合理现象不能得到补偿的话，那么也不应该因此以每年的附加税来重复这种不合理现象。我的在财政部的最后一个同僚舒尔茨[②]和我一贯友好相处，他同意我的见解，但是他在补救时，不得不和议会及内阁所设置

① 卡尔·奥托·冯·劳麦尔，从1850年12月19日至1858年任教育大臣。——德文本注

② 阿·亨·威·冯·舒尔茨在1879年7月16日被任命为新设立的帝国中央金库的领导人，1882年离职去任普鲁士的财政大臣，直至1890年6月。——德文本注

的障碍作斗争；与此相反，在我退出内阁之后他的顾问们的争论能力无疑地为能够自由地行动而感到高兴。我的一个要求在财政部多年没有得到赞同，就是：在建议实行自报财产以凭纳税外，对外国珍贵物品课税应高于德国同类物品，这对德国珍贵物品来说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关税保护，也是一种比每年通过劳动所赚的钱更多的流动资金收入。

在农业方面，由于消除了据说是由我造成的农业压力，才能够从根本上给病猪和牛羊家畜病疫带来善意，同样也给那些在议会和国家面前有责任反击关于粮价腾贵这种宣传谎言的高级和低级官吏带来善意。在这方面的让步以及在1891年2月[3]的令人不 189
快的经历之后再次被否决的简化法国和阿尔萨斯之间的铁路交通，我认为这些都共同表现了对斗争的畏惧，这种畏惧表明情愿为了眼前的舒适而牺牲未来。对家畜疫病的危险采取玩忽职守的态度之不可能促进长期得到廉价猪肉这个目的，正如对地方的苦楚及边界纠纷采取沽名钓誉的软弱态度不能使阿尔萨斯脱离法国一样。

至于帝国各部，无论是在舒尔茨时代，或是在马尔察恩时代[①]，我同国库的关系都是很好的。这一部门规定的职能限于支持帝国宰相在与普鲁士财政大臣举行会议和缔结协议时，为宰相提供技术上熟练的工作人员。在财政问题上处于决定性的地位的仍然是普鲁士财政大臣和内阁。这两位先生的性格特点允许平心静气地通过诚挚的讨论来消除意见分歧。不久前[②]在报刊上宣传

① 赫·冯·马尔察恩男爵于1888年9月14日在雅可比辞去帝国中央金库国务秘书之后接任这一职位，直至1893年8月12日。——德文本注

② 指撰写《思考与回忆》的时期。——德文本注

而实际上已实行的关于实施以宰相或是隶属于他的帝国司库为一方，以普鲁士财政大臣为另一方的相互独立的财政政策的见解，在我执政时期被认为是和宪法相矛盾的。这两方的意见分歧在内阁同僚会议上得到了解决，帝国宰相以外交大臣的身份参加内阁会议，没有事先得到内阁同意或公开表示同意，他无权代表普鲁士在联邦会议投票表决或是提出法律草案。

对我说来，同帝国邮局的关系则不太明朗。在对法战争[4]时期发生过一些使我和冯·斯蒂凡先生几近决裂的事件。但是就在那时候，我已经对他不仅在本行方面的杰出才干深信不疑，因而我不顾陛下的不悦而有效地支持了他。冯·斯蒂凡先生给自己的下属分别发了正式通告，命令将某些报纸①供应给在法国的所有军医院，在申明命令的原委时，推说是王储妃殿下的意愿[5]。我不知道他这种作法有多少根据，但是了解年老的君王的人，可以想像他通过军事报告得知这一邮政部的通告时候的心情。单就所推
190 荐的那些报纸的色彩而言，就足以招致威廉一世对斯蒂凡的反感。但是使君王更为恼怒的是提及王室的成员，而又正好是王储妃。我使陛下恢复了平静。对高度赞赏的追求是压在大多数具有杰出才能的人身上的债务之一。我设想斯蒂凡从发迹开始直到晋升到高官要职一直纠缠着他的各种弱点，随着他的年事日高和官职日隆将会逐渐消除。我只能祈望他健康地终老守职，而且认为这样的人如果离去，损失难以弥补②。然而我揣想他也属于在我离职时感到慰藉的人士之列。我始终认为，运输和邮政应当为国

① 正如可从草稿中看出的，这是一些极左派的民主主义报纸。——德文本注

② 斯蒂凡死于1897年4月8日。——德文本注

家作出自己一份贡献，而这种贡献应包括邮政收费和运费支付。斯蒂凡是更为热爱自己所辖部门的人，而且作为这样的人，他不仅对自己部门及其官员大为有益，而且对帝国也是大为有益的，以致他的任何一个继承者未必能够比得上他。由于对他的杰出的才能的尊重，对于他的专断行为，甚至当这些行为已触及了我作为宰相和普鲁士首席代表的职权范围时，或者是当他对豪华建筑的嗜好给财政成就造成损失时，我依然是待之以友好的态度。

191

第二十八章　柏林会议

(一)

1876 年秋，我在瓦尔辛[1]收到我们全权军事代表冯·韦尔德尔将军从利瓦季亚[2]发来的一份密码电报，在这份电报中他受亚历山大皇帝的委托请求告知，如果俄国同奥地利发生战争，我们是否仍将保持中立。在回答这份电报时我就考虑，韦尔德尔的密码在皇帝的宫殿内将不是不能破译的，我毕竟有过这种经验：甚至在我们驻彼得堡的使馆里，能够保守秘密的也不是靠巧妙的锁，而是靠经常变换密码[3]。我深信，向利瓦季亚发出的任何电文皇帝都会知道。一般能够以这种方式提出这种问题本身，其前提便已经违反了办事惯例。当一个政府想对另一个政府提出这类的问题时，正确的途径是通过自己的大使或者在君主们亲自会见时私下地进行口头试探。由于在尼古拉皇帝和西摩之间发生的事件[4]，俄国外交界对通过询问有关国家代表的方法进行试探有疑虑。哥尔查科夫不是通过驻柏林的俄国代表，而是通过驻彼得堡的德国代表向我们拍电报询问的这种做法，使我不得不比对驻其他宫廷的使馆更经常地提请我们驻彼得堡的使馆注意，他们的任务不是代表俄国政府对我们提出要求，而是代表我们向俄国提出我们的要

求。对一位外交官来说，通过为他所驻国家的效劳，以培植自己在职务上和社会上的地位的这种诱惑力是巨大的；而更为危险的是，如果外国大臣善于拉拢我们的代表去做附和于他的意愿的事，而事先这位代表并不知道执行甚至提出这些愿望对他的政府都是不合时宜的全部原因。

但是，驻俄国宫廷的德国全权军事代表禀承俄国皇帝的旨 192
意，用明确直言的文风向我们提出具有重大影响的政治问题，而且是在我不在柏林的时候，这就超越了所有常规、甚至俄国的常规了。尽管我很不满意，但是我不能改变这一旧的习惯，即我们驻彼得堡的全权军事代表不是像其他人那样通过外交部门寄发自己的报告，而是直接用亲笔信件向陛下奏禀。这个习惯的产生是因为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为第一个驻彼得堡的武官、科尔贝格[5]要塞前司令卢卡杜建立了同皇帝的特别亲近的关系。武官在这些信件里自然要报告俄国皇帝在宫廷日常生活的亲密交往中向他讲述的关于政治的一切谈话，而这些往往是比哥尔查科夫对我们大使所讲的要多得多。“普鲁士皇帝的侍从武官”，正如宫廷中称呼他的那样，几乎每天都见到皇帝，无论如何要比哥尔查科夫见到的次数多得多。皇帝同他谈论的不仅是军事事务，而向我们君王转达的委托也不限于家族事务。两国政府之间的外交谈判的重心，如同在劳赫和明斯特时代那样，在很大程度上往往是在全权军事代表的报告中，而不是在官方任命的公使的报告中。在这时期，因为威廉皇帝事后（虽然经常是太晚了些）从未疏忽将自己和驻彼得堡全权军事代表的来往信件交给我，并且不经过官方机关讨论不作出政治决定，因此，这些直接来往联系的不便之处就仅限于这些直接给皇帝的报告中包含的情报和通知的迟误上。所

以，亚历山大皇帝无疑是按照哥尔查科夫公爵的建议，利用冯·韦尔德尔先生作为工具，向我们提出如此重要的问题，这便离开了事务往来的这种惯例。哥尔查科夫当时竭力向自己的皇帝证明，我对他的忠诚和我对俄国的同情是不真诚的，或者至少是“柏拉图式的”[①]；并竭力动摇皇帝对我的信任，后来他竟如愿以偿。

在公正地回答韦尔德尔询问之前，我一直试图拖延答复，说没有陛下授予更高的全权，不可能对这样的问题发表意见。在他一再催促下，我就建议通过正式的、即使是秘密的途径请俄国驻
193 柏林大使向外交部提这个问题。与此同时，我一再收到经由韦尔德尔发来的询问电报，我再不能支吾搪塞了。韦尔德尔在利瓦季亚被人通过外交手腕加以任意利用来为自己的目的服务，而他又不善于给予回击，于是我奏请陛下将冯·韦尔德尔先生用电报召回皇宫，并禁止他接受政治性质的委托，因为这种事情应通过俄国外交部门，而不应通过德国外交部门来办理。皇帝不同意我的请求。亚历山大皇帝凭借我们的私人关系，最后要求我通过驻柏林的俄国使馆说明我个人的见解，所以对这个轻举妄动的问题，我就再也不能避而不答了。我请休假期满的冯·施魏尼茨大使在返回彼得堡之前，到瓦尔辛来接受我的指示。施魏尼茨从10月11日到13日在我这儿作客。我委托他尽快经由彼得堡前去设在利瓦季亚的亚历山大皇帝的皇宫。我给冯·施魏尼茨先生的指示内容是：我们的当务之急是保持两大君主国之间的友谊，两大君主国因革命遭受的损失大于相互之间从战争中赢得的好处。如果

① 意思是“精神上的”。——译者注

令我们痛心，俄国和奥地利之间不能维持和平，那么尽管我们可以容忍我们的朋友在相互敌对的战争中有胜有负，但是我们不能容忍两者之一受到如此严重的损伤和祸害，以致使其独立的、在欧洲具有同样发言权的大国地位受到威胁。哥尔查科夫为了向他的君主证明我们对他仅仅怀有柏拉图式的友爱，怂恿他以毫不含糊的明确方式强迫我们发表这一声明，后果是俄国的暴风雨从东加利西亚转向巴尔干，俄国中断了同我们的谈判，开始同奥地利谈判，并要求对我们保守谈判的秘密。我记得，谈判最初在佩斯[6]根据赖希施塔特协定的精神进行。亚历山大皇帝与弗朗茨·约瑟夫皇帝于1876年7月8日在赖希施塔特会晤[7]。正是这一协定，而不是柏林会议，是奥地利占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8]的根据；而俄国则得到保证，在它与土耳其交战时[9]，奥地利保持中立。

(二)

在赖希施塔特协定中，俄国内阁为使奥地利人保持中立，允许他们获取波斯尼亚。这一情况使人认为冯·乌布里尔先生[10]对 194
我们说的不是实话，当时他保证：巴尔干战争不过是一种军事旅游，是为了使多余的军队有所事事，是为了获得马尾[11]和乔治十字勋章。对此，波斯尼亚是一种过于高昂的代价。彼得堡大概指望保加利亚在脱离土耳其之后会永远依附于俄国。即使圣—斯蒂凡诺和约[12]没有被压灭而得以实现，这种指望很可能也还是会落空的。为了在本国人民面前对这一错误推卸责任，有人就竭尽全力而且成功地把造成战争不利结局的罪责归之于德国的政策，归之于德国朋友的“不忠实”。这是一种无耻的捏造，除了善意的中立

外，我们从未做出任何其他许诺。俄国要求将赖希施塔特协定对我们保密，我们也没有由此而动摇对俄国的信任和友好态度，而是准备满足彼得·舒瓦洛夫伯爵去弗里德里希斯鲁厄[13]转告我的、去柏林召开会议的愿望。由此可见，我们的意愿是多么诚恳。俄国政府借助会议与土耳其签订和约的愿望证明，俄国在延误及时夺取君士坦丁堡之后，感到自己在军事方面还不够强大，不能和英国、奥地利交战。对俄国政策的失误，哥尔查科夫公爵与比较年轻而精力更为充沛的志同道合者无疑都负有责任，但他是不能推卸责任的。哥尔查科夫不顾他所了解的他的君主的意愿，而作为俄国的代表参加了柏林会议[14]。从这件事可以看出，按俄国的传统来衡量，他在皇帝面前的地位是多么牢固。当他凭借宰相和外交大臣的身份在会议上就座时，出现了一种颇为奇异的场面：作为上司的宰相和他的部下舒瓦洛夫大使一起出场，但是俄国的全权代表不是宰相，而是大使。

这件事也许只有从俄国档案里才能得到文件上的证实，也许在档案里也得不到证实，但是根据我的观察，不容怀疑的形势证明，甚至在像俄国这样有绝对和统一领导的政府中，也不能保证政治行动上的一致。这种情形也许在更大的程度上存在于英国，因为在那里首相和他所得到的报告要受公众的评论，而在俄国只有历代皇帝才能根据自己对人们的了解和自己的才能来判断他的
195 提供报告和消息的臣仆中有谁错了，或者欺骗他了，他该从谁那里得到真情。我不想以此说明，伦敦外交部的日常事务比彼得堡处理得更高明，但是英国政府的确很少像俄国政府那样需要采取虚伪的手腕来掩盖下属官员的错误。诚然，1856 年 4 月 4 日帕麦斯顿勋爵在下议院以一种下院议员们可能都不理解的嘲弄说，为

了选择向国会呈交有关卡尔斯的文件，要求外交部的高级官员、而不是下级官员更仔细、更认真些。关于卡尔斯的《蓝皮书》[15]，亚历山大·本斯爵士从阿富汗[16]发回的紧急电报遭到阉割，以及大臣们关于1854年维也纳会议建议苏丹不签署缅希科夫照会[17]而另行签署的那个照会的产生过程的报告，都证明了英国的国会和报刊是多么容易受骗。外交部的档案在伦敦保存得比其他地方都更审慎，可以推测在这些档案中还可能找到其他类似的事例。不过，整个说来，还是沙皇比国会更容易受骗。

在关于履行柏林会议决议的外交谈判中，彼得堡期望，我们毫不迟疑地、甚至在没有柏林和彼得堡之间事先取得谅解的情况下，就支持并实施任何一种与奥地利和英国的观点相对立的俄国观点。我先是暗示、最后说出的要求：私下地然而明确地把俄国的愿望告诉我们并对此进行磋商，这个要求没有结果。我得到的印象是，哥尔查科夫公爵就像一个妇人期待于她的追求者那样，期待我猜出俄国的愿望并把它提出来，而俄国却用不着自己说出这些愿望，也不需要由此承担责任。甚至在我们可以认为已看准俄国的利益和意图所在并相信在无损于我们自身利益的前提下自愿为俄国的政策证实我们的友谊时，我们所得到的不是预期的赞赏，而是表示不满的怨言，据说因为我们行动的方向和分寸不切合我们俄国朋友的期望。即使情况无疑切合他们的愿望，结果也不见得更好。在他们的一切行为中都包含着一种不仅对我们，而且对亚历山大皇帝来说不怀好意的预谋，他们想把德国的政策给亚历山大皇帝描绘成无耻的和不可相信的。你们的友谊过分柏拉 196
图式了，皇后玛利亚用充满责备的口气对我们的一个外交官这样说过。一个大国的政府对另一个大国政府的友谊在一定程度上确

实总是柏拉图式的，因为任何一个大国都不可能完全为另一个大国效劳。它经常要考虑的不仅是与其他大国目前的关系，而且还有将来的关系，还必须尽可能避免与其中任何一国处于长期的根本性的敌对状态。这对于德国尤其适用，因为它地处中心位置，三面受敌。

列强内阁政策中的错误，无论在彼得堡，或是在柏林都不会立即受到惩罚，但是这些错误却不能不带来损害。历史的逻辑的检验比我们的审计院[18]更加精确。在执行会议的决议时，俄国期望并要求，在东方就地方问题进行这方面的谈判时，当俄国代表与其他强国的代表发生意见分歧时，德国代表整个来说应赞同俄国的意见。的确，就某些问题而言，客观地作出决定对我们来说是相当地无关紧要的；对我们来说，重要的仅仅是公正地阐明这些决议，而且不要由于在不涉及德国利益的地方问题上的偏袒态度而破坏我们同其他强国的关系。俄国报刊上那种激烈而刻薄的语言以及检查机关毒化俄国民意反对我们的作法使我们认识到，不要失掉俄国以外的其他强国的我们还可以指望的同情是上策。

在这种形势下收到了亚历山大皇帝的亲笔信[19]。亚历山大尽管对他年迈的朋友和舅父十分尊重，但还是以国际法通用的形式在两处明显地进行战争威胁，声称：如果德国的投票坚持拒绝配合俄国的投票，那么我们之间的和平就不可能持久。这个主题以不同的方式用强硬、明确的言词出现了两次。我从这封信中看出，哥尔查科夫公爵也参与了这封书信的拟写。他于 1879 年 9 月 6 日和奥尔良分子的《太阳报》的记者路易·佩拉蒙谈话时，曾令人注目地向法国求爱。后来有两件觉察到的事实证实了我的推测。10 月份，柏林社交界的一位女士住在巴登—巴登[20]的“欧洲

旅馆”哥尔查科夫公爵房间的隔壁，听见他说：“我本想打仗，但是法国却另有打算。”继而在11月1日《泰晤士报》驻巴黎记者能够向该报报道说，在亚历山大罗沃[21]会晤之前，沙皇给威廉皇帝写信抱怨德国的态度，而且信中用了这样的话：“陛下的宰相忘记了1870年的诺言。”* 197

鉴于俄国报刊的态度，各阶层人民越来越高涨的激奋情绪和直接沿普鲁士边境集结军队等情况，怀疑局势和皇帝对他以前十分尊重的朋友的威胁的严重性，就未免太轻率了。根据冯·曼托伊费尔元帅的建议，威廉皇帝于1876年9月3日前往亚历山大罗沃，亲自对外甥那种书面威胁作出回答，进行劝慰。这是和我的情感相抵触的，也是和我对采取必要措施的见解相违背的。

(三)

七十年代后半期强调甩开奥地利而同俄国友好的呼声高涨，而与此对立的则有类似于反对走同俄国结盟的道路来解决1863年复杂难题的设想。我不了解，在最近一次巴尔干战争[22]开始之前和会议期间明确地授予彼得·舒瓦洛夫伯爵多大的权力来讨论德俄联盟问题。他不是被派驻柏林，而是被派驻伦敦；但是由于他和我的私人关系，不管是在旅经柏林途中，还是在会议期间，他都可以同我推心置腹地讨论一切可能讨论的事情。

---

* 来自波希米亚的布洛维茨的记者奥佩尔特先生尤其乐于传播这个大概是由哥尔查科夫告诉他的消息，因为记者先生自柏林会议时起，就对我怀有怨恨。比康菲尔德想使他保持良好情绪，根据比康菲尔德的愿望我给他颁发了一枚三级王冠勋章。他对此项在普鲁士人看来是很高的奖励仍然不满，拒绝接受而要求二级勋章。

1877 年 2 月初我收到他从伦敦寄来的一封长信[23]。兹将我的答复和舒瓦洛夫伯爵随后的回信附录于下：

柏林，1877 年 2 月 15 日

亲爱的伯爵：

惠赐大札，感谢您对我的良好祝愿。在目前的情况下，明斯特伯爵如此正确地说明了从我们初次结识起建立起来的情感；为此，我应当对他深表谢意，这将比今天使我们联结
198 起来的政治关系更加持久。在我的公务生活结束后的忧伤的感情之中，缅怀同您的交谈将会是我最愉快的一种回忆。

不管我们两国未来的政治前景如何，我在对我们两国以往历史所起的作用，都使我满意地回忆起，在有关两国缔结同盟的问题上我始终与在我的政治上的友人中一位最敬爱的国务活动家和谐一致。只要我在职，我就要忠实于二十五年来我一贯遵循的传统，这些传统符合您在信中所阐述的思想，即俄国和德国可能做的和一百多年来它们相互已经这样做的事情，并无损于两国任何一方的特殊利益。两个比邻的欧洲国家一百多年来从未发生过相互为敌的欲望，仅从这一点便应得出结论：两国之间不存在分歧的利益。这就是我在 1848、1854、1863 年和现在一直遵循的信念。而且我已使这种信念成为我的大多数同胞的共同财富。破坏这一事业可能要比创立这一事业容易得多，如果我的继承者将来不像我这样始终不渝地维护这种关系，则尤其如此。这些人不习惯于这种关系，而为了维护这些关系有时还得放弃自爱，并且必须使自己的感情从属于自己的君主和国家的利益。我懂得在

这方面说了些什么，但是我对我的彼得堡的以前的朋友和监护人[24]对我的嘲弄不予计较，还有关于他与巴黎的“调情”或关于奥尔洛夫之流。像我这样饱经风霜的人绝不会被一场虚惊而脱出常轨。但是对那些将要接替我而我又不能把自己的沉着和经验传给他们的未来宰相们来说，情况也会是这样吗？看来通过半官方杂志、不怀好意的议论和辗转流传的私人信件，似乎很容易把他们的政治判断弄糊涂。一位德国大臣如果发现有人轻易地建立以复仇为基础的联盟，将会由于担心遭到孤立而试图通过建立不成功的、或许甚至是致命的联系来保护自己，而这种联系以后又难于摆脱。在两个帝国的同盟中存在着多么强大的力量和保证，以致一想到这个同盟有朝一日没有丝毫政治上的理由，只是由于某个喜好变换花样或者认为法语比德语更好听的政治家的意志而处于被破坏的险境，就会使我吃惊。这一点我是完全同意他的意见，但是我不会使我国的政策从属于这种见解。只要我还领导我们国家的事务，你们（俄国人）就很难不与我们结盟，但这 199
种局面不会持续很久。我的健康状况正在急剧衰退。我准备再经受一次国会的冲击，国会的例会再过几天就要召开，会期不超过几个星期。会议闭幕后我立即到海边疗养，不再回来处理政务。我有医疗证，证明我“不适合工作”，这是个技术用语，是对不可避免的辞职的必要性的证明，而现在这个术语只是说出了这一令人悲痛的真实情况。

如果上帝允许我还能享受几年安逸恬静的私人生活的话，那么我请求您，亲爱的伯爵，允许我今后与您继续保持由于我的公务活动而建立起来的良好的友谊关系，而现在请

接受我向您表示的真挚感情。

冯·俾斯麦

请原谅我复信迟了。最近两周来，我亲笔写字很感困难，手仿佛有点痉挛，现在还妨碍写字，您从笔迹上就会看得出来。但给您写信，我又不愿请别人代劳。

伦敦，1877 年 2 月 25 日

亲爱的公爵：

尊札充满深情厚谊，使我深为感动，想到您写此信经受的痛楚，想到您为此花费的宝贵时间（尤其是您的时间），我真的感到内疚！

这封信将成为我政治生涯中最美好的一段回忆，我将把它留给我的儿子。

一年来离开了柏林和彼得堡而使我陷入重重疑虑。

我曾想，过去存在的东西，如今或许不复存在。您向我证明，事实正好相反。作为一个善良的俄国人，我为此感到由衷的高兴。

如果我不是又一次遇到像您，亲爱的公爵，这样一位对自己的政策坚定不移，对朋友忠贞不渝的人，那么我就会立即卖掉自己的俄国股票，正如您在三年前想做的那样，因为您对我的评价过高了。

我将尊札中的一些段落抄录下来送呈我的皇帝。我知道
200 他阅读时会感到满意的，每次他与您直接接触，结果都很良

好和有益；皇帝读到您写给有幸承您称为朋友的人的信，这对皇帝来说就好像他（与您）直接来往一样。

无需赘述，我略去了有关哥尔查科夫的一切内容，因为我想，您对我说出涉及他的话语，表明您相信我会保持沉默。彼得堡想要什么，我知之甚少（这有充分理由），在我看来，延期和裁军似是可以肯定的。

据悉，与塞尔维亚和黑山的和约将要签订[25]。土耳其宰相[26]在写给德卡兹和得比的信中向他们声明，苏丹[27]答应自愿实施会议[28]所要求的一切改革。欧洲要求我们给予土耳其以时间。对我们来说，这难道是宣战和进一步使我们疏远欧洲的感情的有利时机吗？

一些特殊事务迫切需要我返回俄国。只要我们采取这种或那种意义上的抉择，我就打算请求短时休假。亲爱的公爵，我希望在我路经柏林时，您能允许我见到您——我渴望如愿。

信文冗长，尚祈海涵，好在毋烦一字作复。

亲爱的公爵，请允许我再一次热烈感谢您的深情厚意和您的来信，只是对您在信中不幸地谈到您的健康的那种措辞，恕我不能同意。我相信，上帝会保佑您，正如它保佑造福于千百万人和有益于维护重大而广泛利益的一切事物一样。

请您相信，亲爱的公爵，您任何时候都可以把我看成是一个崇拜者，您的崇拜者即使除去我，也已经够多了，简言之，我是对您怀有真挚情谊并一心一意忠实于您的。

舒瓦洛夫

还在柏林会议之前，舒瓦洛夫伯爵就谈到并直接提出关于俄德攻守同盟的问题。我坦率地同他讨论了同盟问题以及如果东方三国同盟不能保持的情况下，首先必须在奥地利和俄国之间进行
201 选择在我们这里造成的困难和前景。在讨论中他说："同盟的噩梦压迫着你们。"对此我回答说："不得已。"他认为对付的最好办法是与俄国结成巩固的、不可动摇的同盟，因为如果从我们敌对者同盟的圈子中把后者排除出去，那么任何威胁我们生存的联合都是不可能的。

对这一点我表示同意，但是我说明了自己的顾虑：如果德国的政策把自己可能做的事限于同俄国结盟，并根据俄国的愿望抛弃其他国家，那么德国的政策在同俄国的关系中就会处于不平等的地位，因为俄国的地理位置和专制制度使它始终能比我们更容易放弃同盟，也因为保持普俄同盟的旧传统始终只取决于历代俄国皇帝的看法，也就是说他的内心感情。我们同俄国的关系主要是建立在两国君主的相互个人关系上，建立在通过宫廷方面和外交方面的干练和双方代表的自各的思想意识加以正确维护的基础上。我们有过这样的事例，即虽然驻彼得堡的一些普鲁士公使相当无能，但是由于像冯·劳赫将军和明斯特伯爵这样一些全权军事代表的巧妙斡旋，两国的相互关系仍然保持亲密，尽管双方还有某些有理由的苦恼。我们同样经历过：像布德贝格和乌布里尔这样一些急躁而又易于激动的俄国代表，当他们个人感到不满时，他们在柏林的态度和所作的报告造成的影响威胁到具有一亿五千万人口的两个民族的相互关系。

我记得，在我任彼得堡公使的时候，当时对我无限信任的哥尔查科夫公爵在我等待他的接见的时候，常常把从柏林寄来的未

开封的报告，在他本人尚未过目之前就拿给我看。从这些情报中我吃惊地看到，我以前的友人布德贝格是多么不怀好意地使维持相互关系的使命从属于社交中由某种事情造成的他的感情，有时甚至只是使之从属于向宫廷或内阁报告有关柏林状况的诙谐的嘲弄这种欲望而已。他的报告自然要呈报皇帝，虽然不加任何评论和阐述，但是皇帝的批注（哥尔查科夫有时也同其他公函一起拿来给我看）给我提供了无可置疑的证据，证明布德贝格和乌布里尔的这些使人恼怒的报告对一向对我们持友善态度的亚历山大二世皇帝产生了多么强烈的影响。他得出的结论并不是他的代表的 202
叙述错了，而是柏林的政策缺乏远见和善意。哥尔查科夫给我看这些未开封的情报时，常常卖弄对我的信任，他通常说道："请您忘记您不应当看的这些东西。"而我在隔壁房间里看过电报后，对此我自然满口答应。在彼得堡的那段期间里，我信守了这个诺言，因为我的任务不是通过抱怨俄国驻柏林的代表从而使我们两国宫廷之间的关系恶化，还因为我担心有人为了宫廷阴谋和挑拨而笨拙地利用我的这些报告。

一般总是希望，我们驻友好宫廷的代表是这样的一些外交家：他们在不违背本国总政策的前提下，尽可能维护两个有关国家之间的关系，为此就尽可能对一些不满情绪和流言蜚语保持缄默，克制自己不要嘲弄，而要更强调事情的积极方面。我经常不把我们驻德意志各邦宫廷的代表的报告呈报皇帝，这是因为这些报告更多地倾向于耸人听闻，或者带着偏爱来报告和评论一些使人激怒的言论或现象，而不是改善和维护两个宫廷之间的关系，须知后者（德国的状况始终是这样）正是我们的政策和任务。我认为自己有权不从彼得堡和巴黎报告那些只能使人毫无目的地激

怒或者只适用于写讽刺文章的事件。当了大臣以后，我还认为自己有权不将类似的报告呈送皇帝。作为被派驻一个大国宫廷的大使，他的责任不是把在他官邸发生的所有愚蠢讲话和恶行都机械地报告本国。不仅大使，而且德国宫廷的每一个外交官都不应该写类似布德贝格和乌布里尔从柏林、巴拉宾从维也纳送往国内的那样一些报告，他们指望这些报告会被有兴趣地和自得其乐、兴高采烈地作为一种讽刺来阅读；而是应当（只要两国关系是友好的，而且要继续保持下去）戒绝一切挑拨和谣言。谁只注意事务过程的形式，谁确实会认为，一位公使毫无保留地报告他所听到的一切才是最正确的，而让大臣去酌情舍弃或者去特别强调。但是这在客观上是否合乎目的，则取决于大臣本人。因为我认为自
203 己如同冯·施莱尼茨先生一样有远见，而且比他更深入、更认真地参与了影响我们国家命运的事务，所以我认为自己有权利、有责任不把某些情况告诉他，因为这些情况到他手里可能在政策意义上为宫廷中的倾轧和阴谋效劳，而这种政策并不是国王的政策。

说了这些题外话之后，言归正传，回到巴尔干战争期间我和彼得·舒瓦洛夫伯爵的谈话。我对他说，如果我们为了巩固和俄国的同盟而牺牲我们同所有其他强国的关系，那么在法国和奥地利出现具有复仇愿望的严重事件时，由于我们处在危险的地理位置，我们便会处于依赖俄国的危险境地。俄国同那些没有它的好意就不能存在的国家的融洽关系是有限度的，特别是在像哥尔查科夫公爵所执行的那种有时使我想到亚洲式观点的政策的情况下，更是如此。他常常以“皇帝很生气”为理由压制一切政治上的不同意见；对此我常以讽刺的口吻回答说：“唉，我的皇帝也一

样生气!”舒瓦洛夫对此说道：“哥尔查科夫是个蠢人”，用彼得堡的隐语来理解，这句话并不像“他没有任何威信”那句话那么粗鲁；总之，哥尔查科夫形式上还主持事务只是由于皇帝对他的年龄和从前的功绩的尊重。俄国和普鲁士有什么理由可能发生严重冲突呢？它们之间不存在其重要性足以导致冲突的问题。后面一点我是同意的，然而我想起了奥尔缪茨和七年战争[29]。人们发生争论是出于一些并非重要的原因，甚至是由一些形式上的问题引起的。一些俄国人没有哥尔查科夫也很难承认朋友应该平等和给予平等的礼遇。我个人并不看重形式——但当前的俄国直至以后有变化为止是不仅有哥尔查科夫的形式，而且有哥尔查科夫的贪婪。

我当时拒绝了在奥地利和俄国之间的“选择”，而赞同三皇同盟，或者至少维护它们之间的和平。

209

第二十九章　三国同盟

(一)

三国同盟是三国皇帝的同盟，原先我试图在缔结法兰克福和约[1]后实现这一同盟，并且于1870年9月当我在莫城时已经试探过彼得堡和维也纳方面的意见。这个同盟本想把君主制的意大利拉入，同盟的目的是要参与欧洲两大派之间面临的我所担心的各种斗争，这两大派拿破仑称之为共和派和哥萨克派。按照今天的概念，我可以称它们一方为以君主制为基础的制度和秩序，另一方为社会共和国。在这种社会共和国的政体下，反君主制的发展趋势总是在缓慢地或飞跃地减弱，直到由此造成的难以忍受的状况使失望的人民愿意接受以暴力回复以帝制为形式的君主立宪制度为止。我认为，避免这种恶性循环并尽可能使当代人或其后代免遭此种恶性循环，较之为向居住在巴尔干半岛上各民族的碎片施加影响而进行的角逐，对于还有生命力的君主们来说是更为迫切的任务。如果各君主国政府不懂得为了国家的和社会的制度的利益必须团结起来，而是被本国臣民的沙文主义情绪所指使的话，那么我担心正在进行决战的国际的革命斗争和社会斗争将会变得更为危险，而君主制秩序的胜利也将会变得更为困难。我从

1871 年起就指望三国皇帝的同盟和努力使意大利的君主制原则牢固地依靠这一同盟成为反对这些斗争的最切近的保险。1872 年 9 月三国皇帝在柏林会晤，接着下一年 5 月我国皇帝访问彼得堡，9 210
月意大利国王访问柏林，10 月德国皇帝访问维也纳，那时我不无希望获得持久的成功。由于哥尔查科夫公爵的煽动（他散布谎言说，我们企图在法国治愈战争创伤之前进攻法国），这一希望于 1875 年第一次变得暗淡无光。

在发生卢森堡问题（1867 年）时期，我是坚决反对先发制人的战争的，即坚决反对仅仅由于猜想我们日后将会遇到装备更好的敌人我们就会发动的进攻性战争。照我国军人的见解，我们可能在 1875 年征服法国；然而其他强国会保持中立一事则是不大可能的。如果说在凡尔赛谈判[2]前最后几个月里，欧洲干涉的危险就已每天使我不安，那么仅仅为了不再让法国有喘息的机会我们便发动进攻，这种似是而非的愤恨感，首先给英国人高唱人道主义的陈词滥调提供了求之不得的借口，其次给俄国托辞，以便从两国皇帝的个人友好的政策转变为只顾俄国国家利益的冷冰冰的政策，而这种政策在 1814 年和 1815 年划定法国版图[3]时是起过决定性作用的。对于俄国政策来说存在一种限度，法国在欧洲的重要性不允许被缩小到超过这个限度，这是可以理解的。我相信法兰克福和约是达到了这个限度的，这一事实也许在 1870 年和 1871 年在彼得堡还不像五年以后那样被意识到。在我们和法国交战时，我很难相信俄国政府已清楚地预见到，战后会有如此强大和团结的德国作为它的邻邦。在 1875 年我曾设想，在涅瓦河畔流行某些疑虑，即对于让事态这样发展而不加干预是否正确。亚历山大二世对舅舅的真挚友谊和尊重，掩盖了官方各界人士已感到的

愤懑。如果那时我们仅仅为了不让遭受创伤的法国恢复元气而想重新发动战争，那么在防止战争而进行的几次失败的商谈之后，无疑我们的战争就会处于我曾经在凡尔赛担心过的在久围不决的时候所造成的境地。战争不会以两国缔结和约而告终，而会像1814年邀请战败的法国参加那样的会议上解决，或许我们还要遇到恶意，就像当时处于一位新的达来朗[4]指导下那样。

211 在凡尔赛我就担心，法国出席讨论有关黑海问题的巴黎和约附带条款的伦敦会议，可能像达来朗在维也纳表现的那样，被大胆放肆地加以利用，将德法关系问题硬塞进会议的议程。由于这个原因，我不管来自各方面的呼吁，通过国内外的各种势力阻止了法夫尔参加这次会议。如果人们回忆一下，根据1815年1月3日法、英、奥条约，战败的（部分还被占领[5]的）法国虽然被二十年战争弄得精疲力竭，但为了联合反对普鲁士和俄国，仍然准备立即派出十五万人，而后来竟达三十万人上战场，那么1875年法国在抵御我们的进攻时是否像我们的军人所设想的那样软弱，是成问题的。被我方俘虏的三十万老兵又回到了法国。而俄国的力量当然不会像在1815年1月时那样作为盟友站在我们一边，也不会像在德法战争时期那样采取善意的中立，而可能会成为我们后方的敌人。从1875年5月哥尔查科夫给俄国各个公使馆的通告电文中就可以看出，俄国的外交已被煽动起来，反对所谓我们要破坏和平这种意向。

紧接这一插曲之后，俄国宰相便四处奔波，竭力要恶化我们、特别是我个人同亚历山大皇帝的友好关系，例如他（如第二十八章中所述）通过韦尔德尔将军迫使我拒绝承诺在发生俄奥战争时保持中立态度。后来俄国内阁直接地和秘密地转向维也纳，

这又一次标志哥尔查科夫的政策的一个阶段，这种政策是不利于我对于结成君主制的、保守的三国同盟的努力的。

(二)

舒瓦洛夫伯爵对我说过，我一想到联盟就会引起噩梦，他说得完全正确。我们进行了反对欧洲两大强国[6]的胜利的战争。当时重要的是，至少要剥夺战场上同我们对峙的两大劲敌之一试图与另一劲敌联合起来进行报复的希望。这里指的不可能是法国，任何了解历史和高卢民族性格的人都很清楚。如果一个未经我们知悉与同意的秘密的赖希施塔特条约是可能的话，那么一旦与之 212
相应的在奥地利现居幕后的分子执掌了政权，则法、奥、俄三国重新结成考尼茨老同盟[7]，就不是不可能的了。它们会找到连结点，从这个连结点出发，通过依靠重新复活旧日的敌对，即作为奥地利政策的因素的旧日争夺德意志霸权的努力，或者依靠法国，这在博伊斯特伯爵[8]时代和1867年8月在萨尔茨堡同路易·拿破仑会晤[9]时呈现过；或者亲近俄国，像在赖希施塔特秘密协定中所看到的那样。

在这种情况下，德国可望得到英国什么样的支持呢？鉴于七年战争[10]和维也纳会议的历史，对上述问题我无法立即答复。但是我认为可能的是，不是弗里德里希大帝获得了胜利，那么英国当时早就会不顾普鲁士国王的事业了。

这种局势要求尽力通过至少同大国中的一国建立根据条约的保证关系来限制结成反德联盟的可能性。只能在奥地利与俄国之间进行选择，因为英国宪法不允许缔结稳固持久的同盟，而单单

同意大利结成联盟又不足以抗衡其余三大强国的同盟。即使考虑到意大利未来的行动和形势不仅不依赖法国，而且也不依赖奥地利，那也不能提供这种抗衡。为了缩小结成反德联盟的场地，只剩下上述的选择。

我认为同俄国的同盟在物质方面会更为强大。从前我也感到这一同盟更为可靠，因我认为，传统的王朝的友谊，君主国的自我保存的愿望和政治上历来没有矛盾的状况，比起哈布斯堡君主国中匈牙利、斯拉夫和信奉天主教的居民的社会舆论变化无常的印象较为可靠。不论是就与俄国的王朝关系来说，还是就颇得人心的匈德之间的同情来说，在这两个联系中没有一个是长期绝对可靠的。如果在匈牙利清醒的政治见解总是占上风的话，那么这个英勇、独立的民族就会明白，它作为在斯拉夫居民汪洋大海中的一个小岛，由于它的人数相对地少，它只能依靠奥地利和德国的德意志人，才能保障自己的安全。但是，科苏特插曲[11]和对匈
213 牙利境内忠于帝国的德意志人的压迫以及其他征兆表明，在紧急关头匈牙利骠骑兵和辩护士的自信，胜过一切政治权衡和自我克制。要知道，甚至在太平岁月许多马扎尔人也得意洋洋地听着茨冈人的歌曲："德国人是无赖汉。"

奥地利的德意志人关于未来的德奥关系的考虑缺少在政治可能性方面的眼力。由于这种缘故，他们丧失了和王朝的联系，因而也丧失了在历史发展进程中落到他们肩上的领导地位。此外，宗教问题、对皇族忏悔牧师的影响的回忆以及以天主教化为基础的和法国恢复关系的可能性（只要法国国家领导的形式和原则发生了相应的变化），都是对奥德同盟的前途担忧的缘由。究竟什么时候法国会发生这种变化，则难以预测。

而且，最后还有奥地利政策中波兰的因素。我们不能要求奥地利放弃它手里的武器（它面对俄国照顾在加利西亚的波兰文明就是它所掌握的武器）。1846 年导致奥地利官吏悬赏波兰起义者[12]头颅的政策之所以可能，是因为奥地利以它在波兰和东方问题上的相应行动报答了神圣同盟——东方三国同盟[13]——给奥地利带来的好处，如同给共同事业交纳保险费一样。只要东方大国的三国同盟存在，奥地利就会将自己同小俄罗斯人的关系置于首位；如果这个同盟瓦解，那么一旦同俄国交战，则更为明智的是获得波兰贵族可供支配。一般说来，加利西亚对奥地利君主国的依附，不如波兹南和西普鲁士对普鲁士君主国的依附那样紧密。奥地利东侧这个没有屏障的省份，是从喀尔巴阡山脉外侧人为地粘贴在奥地利的版图上的；奥地利如果以五百万或六百万波兰人和小俄罗斯人为代价在多瑙河流域得到补偿的话，那么它没有这个省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在恢复以一个大公为首的波兰时，拟以加利西亚去换取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居民的计划，在克里木战争时期以及在 1863 年曾由负有使命的和不负使命的方面讨论过。但是，许多旧普鲁士省份没有由天然的境界同波兹南和西普鲁士分开，放弃它们是不可行的。所以，关于波兰的未来的问题，在德奥军事同盟所有先决条件中是特别困难的一个问题。

（三）

214

由于有了这些考虑，亚历山大皇帝的威胁性信件（1879 年）迫使我为了卫护和保全我国的独立自主不受俄国侵犯而作出了果断的决定。和奥地利缔结同盟几乎受到了一切党派的欢迎。保守

党人是出自历史传统，而关于这个传统有人可能怀疑，从保守派的立场看它今天是否可以看作是前后一贯的。但事实是：普鲁士的大多数保守党人认为，同奥地利亲近符合他们的意愿，虽然在两国政府之间暂时发生了某种自由主义的竞走。在这一党派的大多数成员看来，奥地利名声的保守派的灵光胜过在自由主义领域部分已经消失部分是新的推进所造成的印象，也胜过有时倾向于同西方各强国、特别是同法国接近而造成的印象。更进一步的考虑是天主教徒认为，同这一主要信奉天主教的大国结盟是有利的。民族自由党认为，新德意志帝国和奥地利之间用书面条约结成的同盟是接近解决1848年索解无门的问题的途径，而且不会碰到那些不仅阻碍奥地利和普鲁士—德意志之间要求一致的联合、而且阻碍整个奥匈帝国[14]内部的要求一致的联合的诸多困难而遭致失败。因此，除了历来不赞同政府任何一项政策的社会民主党外，在我们议会里谁也不反对，而且非常欢迎同奥地利结盟。

从德意志民族的罗马帝国和德意志邦联时代起，国际法的传统也从理论上被剪裁得适合于认为在整个德国和哈布斯堡君主政权之间存在一种国家法律上的联系；在理论上通过这种联系使这些中欧国家似乎承担互相帮助的义务。确实在以前的历史上实际上它们很少表现出政治上的相属性。但是人们有理由向欧洲、特别是向俄国指出，从国际法的观点看，奥地利与今天的德意志帝国之间建立的持久同盟并不是什么新东西。不过在我看来，关于这一同盟在德国的声誉问题和国际法的问题都是次要的，应该作
215 为可能实现同盟的辅助手段予以考虑。居于首位的问题是应否立即进一步实现这一思想，以及将如何坚决克服威廉皇帝可以预见的阻挠，这种阻挠主要不是基于政治上的考虑，而是出于他个人

的感情。促使我们在这种政治形势下同奥地利结成同盟的理由，我觉得是非常强有力的，即使遭到我国社会舆论的反对，我也仍然要向这方面努力。

（四）

在威廉皇帝赴亚历山大罗沃（9月3日）的时候，我已经在加施泰因开始同安德拉西伯爵会晤（会晤于8月27日和28日举行）。

我向他阐明时局之后，他从中作出了下面的结论："奥德同盟是对俄法同盟的自然的对策。"我回答说，他一语道破了我建议进行这次会晤要商讨的问题。我们很顺利地达成了反对俄国进攻我们双方之中任何一方的纯防御性同盟的初步协议。但是，对于我提出的关于扩大同盟以防备俄国之外其他国家进攻的建议，伯爵却没有什么反应。

经过一番周折获得皇帝陛下授予正式谈判的权力之后，我便为此目的经由维也纳回国。

离开加施泰因之前，我于9月10日给巴伐利亚国王写了下面一封信：

加施泰因，1879年9月10日

陛下以前对于我为使德意志帝国和两大邻国——奥地利和俄国保持和平和友谊所作的努力曾同样仁慈地表示至为满意。但由于俄国政策越来越严重地受到部分是好战的、部分是泛斯拉夫主义的革命的倾向的支配，在近三年中这一任务变得越来越困难了。早在1876年，利瓦季亚方面就不止一次

地要求我们以有约束力的形式声明，一旦俄国与奥地利之间发生战争，德意志帝国是否仍然将保持中立。我们未能回避这一声明，而俄国的军事威胁则目前已转向了巴尔干。遗憾的是，在这次战争中俄国政策所取得的、甚至在柏林会议后
216 也仍然是巨大的成就，未能使俄国政策的那种激烈状态像爱好和平的欧洲所期望的那样平息下来。俄国的意图仍然是不安分的、气势汹汹的。泛斯拉夫沙文主义对亚历山大皇帝情绪的影响加强了，而且舒瓦洛夫伯爵看来已大大失宠，皇帝竟对他的业绩即柏林会议加以抨击。如果说目前在俄国有首席大臣的话，那么首席大臣就是军政大臣米柳京。按照他的要求，在签订和约之后，接着就大肆扩军，虽然当时俄国并没有受到任何人的威胁。不顾战争所要求的财政牺牲，这种扩军在和平时期使俄国军队数量几乎增加了五万六千人，在处于动员状态的西部的作战军队数量几乎增加了四十万人。这些军备只能是规定用来反对奥地利或者德国的，而在波兰王国部署军队正符合这一规定。军政大臣也在技术委员会* 里公然宣称，俄国必须准备“同欧洲”作战。

如果说亚历山大皇帝本不愿意同土耳其交战，可是在泛斯拉夫主义势力的压力下竟然进行了这一战争，这是无疑的话；如果在这时期这个党派由于在幕后大力进行宣传，现在对皇帝造成了比过去更为强烈、更为危险的影响，因而增强了自己的势力的话，那么就有理由担心泛斯拉夫主义势力同样能够获得亚历山大皇帝的批准，在西部进一步从事好

---

* 技术委员会应当执行 1878 年 7 月 13 日柏林条约的某些规定。

战的冒险活动。如果俄国的保守党人担心运动党竭力把俄国拖入沉重的战争主要不是力求俄国战胜外国而是力求俄国国内发生崩溃是真实的话，那么俄国在这条道路上可能遇到来自欧洲的障碍是不能吓倒像米柳京和马科夫这样的大臣的。

在这种情况下，我不得不深信：将来，很可能就在不远的将来，和平将受到俄国，而且只是受到俄国的威胁。根据我们新近的报告所试作的调查：如果发生战争的话，俄国会不会得到法国和意大利的支持。当然调查的结果是否定的。意大利被公认为软弱无力，而法国宣称，它现在不愿意打仗，单独和俄国结成同盟对德国发动进攻战争，法国感到力量不足。

俄国就是在这种状况下于最近几周内向我们提出了一些 217
要求，这些要求归结为：我们必须在俄罗斯和奥地利之间做出选择，指示东方委员会的德国成员在有争议的问题上同俄国一起投票。而在我们看来，构成多数的奥地利、英国和法国对会议决议的理解是正确的。所以德国和它们一同投票赞成，这样俄国时而同意大利一起、时而没有意大利而单独地成为少数。比如锡利斯特利亚桥的位置、柏林会议规定割让给土耳其的位于保加利亚的军用公路、邮政和电报的管理、某些乡村的边界争端等问题同各大国之间的和平比较起来，虽然本身是无足轻重的，然而俄国要求我们在这些问题上投票时不要同奥地利站在一起，而要同俄国站在一起，而且俄国不是一次而是多次毫不含糊地威胁我们说，如果我们拒绝这些要求，我们将对两国国际关系的一切后果负责。这一与

安德拉西伯爵的辞职* 同时发生的引人注目的事件，自然会引起人们的担心：在俄国与奥地利之间举行过有损德国利益的秘密协商。但这种担心是没有根据的。对于俄国政策的反复无常，奥地利也像我们一样感到厌恶。而且，看来奥地利愿意同我们达成协议，以便共同防御俄国对我们两国之中任何一国可能的侵犯。

德意志帝国如能赞成同奥地利签订一项条约，这项条约的目的一如既往地精心维护同俄国的和平关系，但是尽管如此，如果两国之中任何一国遭受侵犯时，则互相帮助。我认为这是欧洲和平和德国安全的重要保证。如果取得这种互相的安全保证，那么两国就可能像从前一样为重新巩固三皇同盟贡献力量。德意志帝国和奥地利结盟，便不需要依靠英国，由于两大帝国奉行爱好和平的政策，又有二百万战斗人员，所以欧洲的和平是可以得到保证的。两大德意志强国互
218 相依靠的纯粹防御性质，对任何人都没有挑衅的性质，因为从国际法观点看来，两大国的这种互相安全保证，在德意志邦联的关系中，从1815年起已存在五十年之久了。

如果不能达成任何此类协定，如果奥地利在俄国威胁的压力下和对德国缺乏信心而最终将寻求或同法国或甚至同俄国的更密切的接触，那么谁也不能责怪奥地利。如果出现后一种情况，那么鉴于同法国的关系，德国在大陆上会处于完全孤立的境地。而如果奥地利像1854年[15]那样同法国和英国

---

* 8月14日，弗朗茨·约瑟夫皇帝原则上接受了安德拉西伯爵的辞职要求，但在作出委任他的继任人的决定之前，皇帝不予明确的免职。伯爵同意留任一段时间，以便完成同德国的结盟。10月8日宣布他离任并委任了海默尔继任他的职位。

亲近起来，那么德国就不能不单独依赖俄国，而且如果不想陷入孤立境地，德国就会被束缚在我所担心的俄国对内对外政策所遵从的错误的和危险的轨道上。

如果俄国迫使我们在它和奥地利之间进行选择，那么我相信，奥地利会给我们宣示一种保守的和爱好和平的方向，而俄国宣示的则是一条不确定的方向。

我深知陛下的政治观点，故此冒昧希望陛下赞许我所陈述的意见。果真如此，我将荣幸之至。

我为自己提出的任务的困难之大是不言而喻的，而且由于必须就这样广泛的和多方面的事情进行书面商谈，而这又只能指望我自己因极度辛劳已经不够使用的精力，这些困难会大大增加。由于顾虑到健康状况，我不得不在这里耽搁，然而我希望在本月20日以后能起程经维也纳回国。假如到那时至少在原则上确定下来也做不到，那么，我担心目前的良机将会错过，而且由于安德拉西的辞职，就更难以预见良机何时再来。

我认为我有责任把我对形势和对德意志帝国的政策的看法敬告陛下，恳请陛下注意这样一个事实，即：安德拉西伯爵和我相互约定，对上述计划保守秘密，因而至今只有两国皇帝陛下得悉各自的首席大臣促使两国陛下之间达成协议的意图。

下面我引述国王的回信以及我的复信作为补充：

亲爱的冯·俾斯麦公爵：

从您本月十日的来信获悉，紧张和辛劳的国务活动影响了您在基辛根和加施泰因的矿泉疗效，对此由衷感到惋惜。我

219 怀着极大的兴趣阅读您对当今政治形势的详尽阐述，向您致以真挚的谢意。如果德意志帝国和俄国之间的关系发展到军事纠纷的地步，那么两大国相互关系的令人深为可哀的变化会给我带来极大的悲痛，但我仍然希望，将能通过向俄国皇帝陛下施加维护和平的影响，可以成功地防止事态的这种变化。无论如何，我保证完全赞同您为德意志帝国与奥匈帝国紧密结合所作的努力，并祝愿您顺利成功。

望您精力充沛地返回祖国，再次高兴地向您致以我始终怀有的崇高敬意。

贝格，1879 年 9 月 16 日。

您的挚友

路德维希

加施泰因，1879 年 9 月 19 日

陛下本月 16 日惠书敬悉，感激之至。陛下对我为同奥匈帝国建立相互依靠关系作出的努力表示同意，我感到十分高兴。至于同俄国的关系，启禀陛下：军事纠纷的危险，无论从政治方面还是从个人方面来看，我都是深为遗憾的。我认为我们并未直接面临使人忧虑的这种危险。这一危险只有在法国准备和俄国共同行动的情况下，才会变得迫切起来。迄今为止情况还不是这样。而且，根据皇帝陛下的意图，我们的政策将是竭尽所能，通过对亚历山大皇帝陛下的影响，一如既往地维护并加强帝国同俄国的和平。关于同奥地利的相互进一步密切结合的谈判只抱有和平的和防御的目

的，同时也是为了发展相邻的交往关系。

我打算明天离开加施泰因，希望星期天到达维也纳。

为陛下对我的健康表示的亲切关怀，我谨致以最诚挚的谢意。谨致最崇高的敬意。

陛下忠实的仆人

冯·俾斯麦

(五)

220

在离开加施泰因经过萨尔茨堡和林嗣的旅途中，各个车站上群众对我欢迎的态度使我深刻意识到，我是在真正德意志的土地上，是在德意志居民中间。在林嗣，群众之多，他们的情绪之兴奋，以致使我担心会引起维也纳各界的误会，于是我把车厢里的窗帘拉了下来，没有露面答谢友好的欢迎，就离开了车站。在维也纳的大街上可以看到人们类似的情绪，拥挤的人群发出的欢呼经久不息，而我因为身着便服，不得不像光着脑袋一样去旅馆，这是令人不愉快的。在旅馆居住期间，我也未在窗口露过面，以免引起在那里等待着的或过路的群众的友好表示。在我非常荣幸地受到弗朗茨·约瑟夫皇帝的拜访后，群众的欢迎集会就更为增多了。所有这些现象都确切表明奥地利首都人民和我经过的那些奥地利的德意志省份的居民都希望同新德意志帝国建立的亲密友谊，将能成为两大强国未来的标志。我不怀疑，由于血亲关系，在德意志帝国这种类似友好情感在南部要比在北部强烈，在保守

党内要比在反对党内强烈，在信奉天主教的西部要比在信奉新教的东部强烈[16]。三十年战争的所谓的宗教斗争、七年战争中的纯政治斗争以及从弗里德里希大帝逝世到1866年[17]的外交上的敌对，都没有窒息这种血亲的情感，虽然往常德意志人在情况允许的条件下喜好对自己的同胞要比对外国人斗争得更激烈。事情可能是这样：以捷克人为代表的斯拉夫人掣入德意志地区，将奥地利本土上的古老德意志居民和西北部同胞分割开来，减弱了邻邦冲突通常对同一种族但属不同王朝臣民的德意志人的影响，并且增强了奥地利德意志人的日耳曼感情，这种感情受到了历史斗争的残渣的掩盖，然而并没有被窒息。

我受到弗朗茨·约瑟夫皇帝的殷勤接待，他愿意和我们缔结条约。为了征得我的仁慈的君主对此事的同意，我在加施泰因时每天就要从治病的时间内分出一部分来在书桌旁度过，写信说明必须限制那些有可能结成反对我们的各种联盟的范围，而达到这
221 一目的最适宜的途径乃是和奥地利结盟。诚然，我并不大指望我行文中的僵死文字会改变国王陛下的见解，因为他的见解与其说是依据政治上的考虑，不如说是感情用事。缔结即使是防御性的、但毕竟具有军事目的的条约，是对朋友和外甥[18]的不信任表现，而皇帝陛下在亚历山大罗沃刚刚诚心诚意、热泪盈眶地同亚历山大二世互相保证要恪守传统的友谊。缔结这样一个条约与皇帝对其门第相等的友人所持的骑士感情是极为矛盾的。虽然我不怀疑亚历山大皇帝对我皇陛下也抱有同样坦率的真挚情感；但我知道，亚历山大皇帝不具备持久地免受周围不良影响的那种明确的政治判断和勤勉精神，同时他也不具有像我的君主在私人关系上的特征那样忠贞不渝。尼古拉皇帝在坏事和好事上所表现出的

坦率精神，并未完全传给自己性格比较柔弱的继承人。至于面对女人的影响，儿子也不如父亲那样具有高度的独立性。然而，当朝皇帝的品格对于俄国的持久的友好关系来说是唯一可靠的保证。只要皇帝的品格的可靠程度不如亚历山大一世皇帝（1813 年亚历山大一世显示了一种在这一皇座上不总是可以预见的对普鲁士皇室的忠诚[19]），那么对于同俄国的结盟，在一旦需要这种同盟时，则并不是任何时候都可以充分地予以指望的。

早在上个世纪，当同盟条约签订后情况已发生变化，还依然指望同盟条文的约束力，这是危险的，那么今天对一个大国政府来说，当人民的信念表示反对，而还要充分使用自己国家的力量来帮助另一个友好的国家，则显然未必行得通。所以使人承担作战义务的条款已经不再提供像以三万至六万士兵进行的内阁战争时代那样的保证。今天很难出现像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为了他在荷兰的妹夫[20]所进行过的那样的家族战争，而且要再产生像尼古拉 1849 年[21]在匈牙利所进行的那样战争的先决条件也不是很容易的。然而，在问题涉及到是发动战争还是避免战争的时刻，明确而彻底的条约的条文，对外交不无影响。只要不可推让的利益这一不可抗拒的力量还没有出现，甚至善于诡辩而又强横的政府通常也不会准备公然背信弃义的。

我在从加施泰因、维也纳以及后来从柏林向当时在巴登的皇 222
帝的报告中的一切考虑和论据，都没有发生预期的作用。为了取得皇帝对条约草案的同意（条约草案是由我和安德拉西协商同意的。弗朗茨·约瑟夫皇帝表示：如果威廉皇帝赞同的话，他便赞同此草案），我不得不采取令我非常痛苦的手段，我提出了内阁辞职的问题。我成功地使我的同僚们同意我的设想。由于最近几周

的辛劳和中断在加施泰因的治疗，我感到过度衰弱，以致不能去巴登—巴登旅行，于是施托尔贝格伯爵去了那里。不顾皇帝陛下的强烈反对，伯爵顺利地结束了谈判。皇帝没有被政治论据说服，他答应批准条约仅仅是由于不愿意变动内阁的成员。王储从一开始对同奥地利结盟就非常同情，但对他的父亲没有影响。

皇帝按照他的骑士精神，认为自己必须私下使俄国皇帝[22]知道：如果俄国进攻两大邻邦之一，那么它将要使两个国家反对自己，以便使亚历山大皇帝不要错误地认为，他可以只向奥地利一国发动进攻。我觉得这种忧虑没有必要，因为从我们对利瓦季亚向我们提出的问题的答复中，彼得堡内阁必然知道，我们是不会抛弃奥地利的。所以我们同奥地利的条约并没有造成新的局势，只不过是使已存在的局势合法化了而已。

（六）

如果考尼茨同盟仍然是团结的并能巧妙地进行战争，那么它的恢复对德国来说就会造成虽然不是绝望的、但毕竟是非常严峻的局面，因而，我们对外政策的任务应当是尽可能地防止出现这种局面。如果联合起来的德奥的力量具有像俄国和法国（就它们单独而言）那样巩固的关系和他们领导的统一的话，那么我便不认为我们毗邻的两大强国的同时进犯是对我们致命的危险，即使意大利不作为第三者加入我们的同盟。但
223 是，如果在奥地利的具有民族或宗教性质的反德意志的派别变得空前强大起来，如果就像在叶卡特琳娜和约瑟夫二世[23]时代那样又有俄国在东方政策方面的诱惑和建议，如果意大利的欲望将威

胁着奥地利在亚得里亚海[24]上的领地，而且就像拉德茨基[25]时代那样吸引了奥地利的武装力量的话，那么我所想像的可能发生的斗争，力量将是悬殊的。如果人们设想，在法国恢复君主制之后，两大国同罗马教廷取得了协议，奥地利也投入我们敌人的阵营之中，并竭力取消1866年的成果，那么，不用说，德国的局面将会何等险恶啊！

这一悲观设想并未超越可能范围，且已为过去事实所证实，这促使我提出一个问题：是否应该建议在德意志帝国和奥匈帝国之间缔结一个有机的同盟？这一同盟不应像一个普通的条约那样可以通告废除，而应列入两大帝国的立法之中，只有通过新的立法才能解除。

这样的保险使人在思想上能得到某种安慰，但是在种种事件冲击之下，它是否可靠，特别是当想到在理论上说负有更为重大职责的神圣罗马帝国的制度，从来也不能保证德意志民族的团结；而且为了确立我们同奥地利的关系，我们也不能找到一种条约模式，使这一条约比以往的那些同盟条约（依据那些同盟条约在理论上凯尼希格勒茨战役是不可能发生的）具有更牢固的约束力的这些事实时，是令人怀疑的。诸大国之间的所有条约，只要它们在经受“为生存而斗争”的考验时，其牢固性就是有限制的。任何时候也不能迫使一个伟大的民族为忠于条约而牺牲自己的生存，如果它不得不在两者之间进行选择的话。超越可能范围，谁也不会承担义务这一原理不会被条约的任何条款所改变。一旦签订条约者的切身利益与签署的条文和过去对它的解释不再一致时，那么同样也就不能用条约来保证履行条约时的认真和努力程度。所以，如果在欧洲的政治中出现一种转变，

那么奥匈帝国把反德政策视为自己的生路也会出现，不能期待为了遵守条约而会表现出自我牺牲，就如在克里木战争时期并未见其偿还报恩债[26]那样，而这一职责也许比国家条约的羊皮纸更有重量。

224 以立法程序保障的同盟，应当实现出宪法思想，这种思想曾萦回在圣保罗教堂[27]里最温和的议员们的脑际。他们是比较狭小的德意志帝国联盟和比较广大的德奥同盟的捍卫者。但是，通过条约来约束相互间的义务恰恰有害于义务的巩固。1850 年至 1866 年期间奥地利的事例对我是一种警告，它说明针对这类状况所开出的蛊惑人心的政治支票，超过了独立国家在自己政治斗争中所能够互相提供的信贷的界限。所以，我相信：即使条约是可以信赖的，政治上的利益及其危险境遇的变化是各种书面条约的不可缺少的衬垫。对于平稳的保持现状的奥地利政策来说，德意志同盟是最有益的。

如果我们在坚定地忠于奥地利的同时，也保持从柏林到彼得堡的道路畅通无阻的话，那么对于我们同奥地利的联合来说，存在于以约瑟夫二世和叶卡特琳娜时代的精神或赖希施塔特协议及其秘密意图所取得的各种俄奥谅解中的危险，则可以消除（一般来说是可以做到的）。我们的任务是保持我们这两大毗邻帝国之间的和平。我们只有保持三大帝国之间的一致，而对于我们东方两大邻国的野心，要么加以抑制要么按照双方协议满足，才能保证意大利第四伟大王朝的未来。两大邻国中的任何一方对我们都是必要的，不仅由于欧洲的均势问题（我们为了自己避免危险，也不能失去他们中的任何一方），而且由于在维也纳和彼得堡保持君主制秩序的要素。并以两国为依据在罗马也保持君主制的要素，

对于我们德国来说这一项任务是和保持我国的国家制度相一致的。

（七）

我们同奥地利签订的共同防卫俄国进攻的条约是众所周知的。而这两个大国之间为了对付法国而签订的类似的防御性条约人们却一无所知。德奥同盟没有包含为防备同法国作战（战争首先会威胁德国）而提供像为防备同俄国作战而提供的那样的保障，对俄国作战对奥地利来说比对德国更为可能。在德国和俄国之间并不存在包藏不可消除的冲突和破裂的不同利益的萌芽。相 225
反，在波兰问题上的一致需要和反对颠覆活动的传统的王朝团结的效用，是两国政府采取共同政策的基础。这种基础由于俄国报界十年来毒化社会舆论而被削弱了。俄国报刊在一部分有阅读能力的居民中对德国的一切事物灌输和培养了人为的仇恨；虽然皇帝愿意和德国保持友谊，但朝廷对这种舆论却不得不估计在内。事实上俄国民众对德意志文化的仇恨像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的捷克人、从前德意志邦联领土上的斯洛文尼亚人和加里西亚[28]的波兰人那样几乎不能更强烈了。简言之，尽管我在同俄罗斯结盟和同奥地利结盟之间宁可选择后者，但我对于给此种选择造成困难的各种疑虑绝对不是视而不见的。我一如既往认为在和奥地利结成防御性同盟的同时，必须和俄国保持睦邻关系，因为德国不能确实地保险它所选定的联盟不会翻车。然而，只要德国的政策尚未给自己破坏通往彼得堡的桥梁以及尚未造成我们和俄国之间不可挽回的破裂，那么就有可能在棋盘上遏止奥匈帝国中的反德

意志的意图。只要这种不可挽回的破裂还不存在，维也纳仍然可能控制住敌视德国或不愿与德国结盟的分子。如果我们和俄国之间的裂痕（已经疏远了）显得无法挽救的话，那么在维也纳将会滋长一种它认为可以向自己的德意志盟邦提出要求的欲望。它首先会要求扩大同盟方案，根据已公布的条文这种同盟迄今只限于保护奥地利不受俄国的进攻；其次要求已制定的同盟方案来代表奥地利在巴尔干和东方的利益，这甚至在我们的报刊上已经有成效地试图这样做了。多瑙河流域的居民有越出今天奥匈帝国境界的要求和计划，这是很自然的；德意志帝国宪法为奥地利在罗马尼亚族东部边界和卡塔尔湾之间的政治利益和物质利益指出了达成调解的途径。但是牺牲自己臣民的财产和鲜血去实现邻邦的愿望，这并不是德意志帝国的任务。德国需要维持奥匈帝国作为一个独立的强大的国家是欧洲均势的需要，为了这种均势，在必要的情况下，可以好心地以国家的和平作赌注。维也纳还是应该放
226 弃超越此种保险而从同盟条约中又提出要求的打算，因为条约并不是为这种要求而缔结的。

直接威胁德国和俄国之间的和平的，除了人为的挑拨或者像斯柯别列夫之流的俄国或德国军人出于想在年迈衰老之前大出风头的虚荣心而希望战争之外，几乎不可能有其他途径。俄国舆论和报刊的愚蠢和谎言已达到异常的程度，竟能相信并断言，德国的政策先后与奥地利和意大利订立防御性同盟[29]，是由侵略意图所指导的。这种谎言更多地来源于波兰和法国，而愚蠢则更多地源于俄国本身。由于俄国的轻信和无知，波兰和法国在灵活机智方面就因我们在这方面之不足而胜过了我们，根据各种情况，德国政策的力量或弱点也就在于此。在大多数情况下，光明正大的政

策要比往昔的密谋巧计更有成效，但要使这种政策取得成功，还需要一定程度的个人之间信任，而这种个人信任容易丧失而不容易获得。

谁也不能够有把握地估计奥地利本身的未来，而这种把握对于缔结持久的和有机的条约来说，却是必要的。在奥地利的发展中起作用的因素，就像它那各民族混杂在一起一样，是多种多样的。教会人士依据罗马影响的起伏，对领导人物所施加的难以预料的影响，也会对这种发展造成腐蚀的和有时是爆炸性的作用。不仅泛斯拉夫主义和保加利亚或是波斯尼亚，还有塞尔维亚、罗马尼亚、波兰和捷克的问题，甚至今天还有在特里恩特、的里雅斯特和达尔马戚亚海岸的意大利问题，都能成为不仅是奥地利的危机，而且也是欧洲的危机的焦点。只要德意志帝国和奥地利结成一种牢固的连结关系，德国的利益就将被证实同这些危机有关系。在波希米亚，德国人和捷克人之间的裂痕在某些地方已渗透到军队里面，以致有些团队里这两个民族的军官互不往来，并且分开吃饭。由于法国人的侵略和征服意向，德国在西部边界更多地有被直接拖进艰难和严重斗争中的危险。这种侵略和征服意向是由查理五世皇帝以来的君主们为了他们国内外的统治欲而培育大的。

在奥地利同法国双方以老方式竭力对意大利施加影响而出现的摩擦[30]已不存在之后，我们在反抗俄国时比在反抗法国时更容易 227
得到奥地利的帮助。对君主制和信仰天主教的法国来说，如果这样一个法国重新出现的话，那么重新和奥地利建立类似七年战争期间以及拿破仑从厄尔巴岛返回之前在维也纳会议上存在的那种关系的希望就不会熄灭，那种关系 1863 年在波兰问题上发生过威

胁作用，而在克里木战争和博伊斯特伯爵时代（自 1867 年到 1870 年）在萨尔茨堡和维也纳都有过实现的前景。如果法国恢复君主制，那么两个天主教大国之间的相互吸引力就不会由于对意大利的争夺而被削弱，这就可能诱使精明强干的政治家们试图复活这种吸引力。

在判断奥地利的政策时，排除实施像图古特、施瓦尔岑贝格、布奥尔、巴赫和博伊斯特[31]所推行的那种敌对政策的可能性今天也仍然是一种错误。施瓦尔岑贝格夸耀的那种以忘恩负义为职责的对俄政策难道不可能在其他方面重演吗？[32]这种政策从 1792 至 1795 年当我们和奥地利一起作战时使我们陷于困境，并且遗弃我们，为的是使他们在波兰纠纷中面对我们保持足够强大的地位。这种政策接近于成功地把我们引入对俄国的战争中去，与此同时我们作为名义上的盟国为保卫德意志帝国而对法国作战。这种政策在维也纳会议上几乎使事态发展到对俄国和普鲁士开战的地步[33]。想走类似道路的尝试现在由于弗朗茨·约瑟夫皇帝个人的诚实和正直而遇到了障碍。在维拉戈什[34]后几年这位皇帝已经不再像当年那样年轻和缺乏经验了，那时他由布奥尔伯爵对尼古拉皇帝的个人怨恨所支配而决定对俄国施加政治压力；但他的保证纯属个人性质，将随着君主的更换而消失；那些在各时代执行敌对政策的人又会重新施加影响。加里西亚的波兰人和主张教皇权力至上论的教会人士对德意志帝国的喜爱是暂时现象并具有随机应变的性质，对依靠德国的好处的理解压倒了纯血统的马札尔人对士瓦本[35]人的那种轻蔑感情也是这样。直到今天，匈牙利和波兰依然对法国怀有强烈好感。而在哈布斯堡整个君主国的教会
228 人士中间，如果天主教—君主制在法国复辟，可能会使在 1863 年

和1866—1870年间表现在共同的外交和或多或少成熟的条约组织中的那种关系重新活跃起来。正像说过的那样，只有当今奥地利皇帝兼匈牙利国王[36]个人才是对付这种可能性的保证，但是有远见的政策应该预见到在可能范围内包藏着的一切意外情况。维也纳和柏林为争夺俄国的友谊而进行竞争的可能性，像在奥尔缪茨时期出现的那样，或者像在赖希施塔特条约时期在对我们十分友好的安德拉西伯爵的领导下存在的那样，重新出现。

面对这种可能性，对我们来说有利的是，奥地利和俄国在巴尔干有利益冲突，而俄国和普鲁士—德国之间不存在足以引起决裂和战争这样强烈的利益冲突。但是在俄国的国家体制下，即使在今天也只要出现个人的不满或执行拙劣的政策，就足以使这种有利条件轻易地消失掉，伊丽莎白女皇就是由于弗里德里希大王的戏言和挖苦话而轻易地加入反对我们的法奥同盟。今天两国宫廷中也不乏像当年用来挑拨俄国的那种谣言、捏造和无稽之谈，但是我们能够在既不刺激俄国的感情也不损害它的利益的情况下，保持我们同俄国关系中的独立和尊严。正如俄国女皇伊丽莎白和英国女王安娜时代那样，一些没有必要而挑拨起来的不满和怒气，在今天也很少不对历史事件产生反应的。但是由此而得到促进的这些事件的反应对各国人民的福利和前途的影响，今天要比一百年前显然大得多。类似七年战争时期那样的反对普鲁士的俄、奥、法三国同盟，可能再同另外一些不满的王朝结成同盟，对我们的生存同样是危险的；如果这个同盟获胜，将会比当时更加严重地危及我们的幸福。因为个人的怨气而毁坏使我们同俄国接近的桥梁，这是不明智的和恶劣的。

我们必须而且能够忠诚地恪守同奥匈帝国的同盟，这是符合

我们的利益、符合德国的历史传统和我们公众的舆论的。由于多民族的复杂性、各民族的不同意图、宗教影响以及存在于巴尔干和黑海地区广阔地带的对多瑙河各国的种种诱惑，维也纳的政策的未来将在这些影响和势力下形成，而这些影响和势力毕竟要比
229 我们这里复杂一些。我们不应该背弃奥地利，但也不能看不到我们被维也纳政策自觉或不自觉地背弃的可能性。德国政策的领导人，如果想尽自己的职责，则对在此情况下显而易见的那些可能性出现之前，就应及早了解并考虑到。他们不应该凭好恶行事，而只应根据对民族利益的客观考虑办事。

(八)

我始终致力于不仅保障德国不遭受俄国的侵犯，而且关心安抚俄国的情绪和维护对我们的政策的非进攻性的信任。由于亚历山大三世皇帝陛下对我的个人之间信任，直到我辞职前，我始终能够消除他由于国内外的曲解以及间或由于我们军界的一些潜流所一再引起的疑虑。当我在但泽港[37]首次会见这位登基后的皇帝以及后来的历次会晤中，他不顾到处流传着的关于柏林会议的谣言，而且尽管他已知道了奥地利条约，对我表示出一种善意，这种善意充分体现在斯凯尔尼维策[38]和柏林[39]的会晤中，其原因就是他信任我。甚至由于在哥本哈根有人给他暗递一些内容厚颜无耻的伪造信件这种阴谋而产生的印象，也在我单纯的保证之后就烟消云散了。同样，1889 年 10 月会晤时我再次顺利地驱散了又是在哥本哈根使他产生的疑虑，只有我是否会留任大臣一事除外。当他问我自己对在年轻皇帝统治下的地位是否完全可靠时，

显然他对情况的了解比我更清楚。我把当时的想法作了回答：我确信威廉二世皇帝信任我，我不相信有朝一日我会在违背我的意愿的情况下被解职，因为我的多年的工作经验，我在德国和各国宫廷享有的信任，皇帝陛下把我看作是难以取代的仆人。我的信心使皇帝十分满意，虽然看来皇帝并不无条件地赞同我的信心。

国际政治是一种变动的因素，它在一定的形势下暂时成为固定的，但是随着气氛的变化会回复到它原先的状态。签订互相效 230
劳的政治条约即暗示着限于事物的现状。三国同盟是一种战略姿态，面临缔结同盟时威胁着的危险，这种战略姿态是可取的，在当时情况下也是可以达到的。同盟的期限一再延长，并希望今后继续延长。但是，大国间的任何条约都不能保持永恒，而且把条约看成是一切可能改变未来的关系、需要和情绪的可靠基础，而条约将在这些条件下实现，这是不智的。条约在欧洲的政治中具有战略措施的重要性，它适合于签订条约时欧洲的情况；但是正如近几百年来的许多以前的三国同盟、四国同盟，特别是神圣同盟和德意志同盟一样，它极少可能成为适合于任何变动的可靠的永恒的基础。它不能免除时刻保持警惕！

237

第三十章　俄国未来的政策

外部战争的危险，即下一次在我们的西部边界发生的战争可能把红旗像一百年前把三色旗[1]那样投入战斗的危险，在施奈贝累[2]和布朗热[3]时期存在过，今天也依然存在。两条战线上作战的可能性由于卡特柯夫[4]和斯柯别列夫的去世有所减少：法国进攻我们，不一定像俄国的进攻确信会召唤法国出兵反对我们那样，会召唤起俄国出兵反对我们；但是俄国是否倾向于按兵不动，不仅仅取决于情绪，而是更多地取决于海上和陆上进行武装的技术问题。当俄国认为它在武器营造、火药质量和黑海舰队的实力等方面都已“准备妥当”之时，那么现在反映俄国政策的变化的调子，就可能会变得更加不受约束。

俄国在完成军备之后，就将利用这种军备，不由分说并且指望法国给予支援，就进攻我们：这是不大可能的。对德战争给俄国带来的直接利益，就像对俄战争给德国带来的直接利益一样，是很少的。至多在索取军事赔款的数额上俄国胜利者可能比德国胜利者处于较有利的地位，然而它也未必能捞回自己付出的代价。七年战争中表现出来的取得东普鲁士的想法，不再有赞同的人了。假如对波罗的海沿岸省份的那一部分德意志居民俄国已经忍受不了的话，那么就难以想像俄国的政策还会努力通过像东普鲁士这样强有力的追加物，来加强这一被认为是危险的少数民

族。对俄国政治家来说，同样不值得希冀的是通过合并波兹南和西普鲁士来增加沙皇的波兰籍臣民。如果孤立地考察德国和俄 238
国，就很难找出这两个国家中的任何一国有无可争辩的、或者哪怕是有道理的发动战争的理由。仅仅为了满足好战的狂热或者防止军队无事生非的危险，人们就或许可能进行巴尔干战争；但是一场德俄战争太严重了，以至无论哪一方都不能把它用来仅仅作为使军队和军官们有所事事的手段。

我也不相信俄国一旦准备完毕就会径直进攻奥地利；直到今天我还是认为：俄国在西部集结军队的意图，并非打算直接进攻德国，而只是在俄国对土耳其采取行动而引起西方国家对它进行压制的情况下，用来保卫自己的。当俄国认为自己的武装已足够充分，而且在黑海已有一支强大的海军舰队时，那么我想，彼得堡内阁就会像 1833 年签订温基亚尔—伊斯凯莱西条约[5] 时那样行事，向土耳其苏丹建议：如果他能把打开俄国门户的钥匙，即通向黑海的博斯普鲁斯海峡上的俄国之锁交给俄国，那么它将对君士坦丁堡和土耳其苏丹保留的省份向他提供保障。普福尔特[6]同意俄国这种形式的保护，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如果处理得巧妙，也是几乎可以确定的。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土耳其皇帝可能认为，欧洲各大国的猜忌给他提供保证去对付俄国。保存土耳其是英国和奥地利的传统政策。但是，格莱斯顿声明[7] 不仅使土耳其苏丹失去了在伦敦的，而且也使他失去了在维也纳的支柱。因为，如果维也纳内阁仍然对英国的支持确有把握，就不能设想它会在赖希施塔特协定中放弃梅特涅时期[8]的那种传统（伊普西兰蒂[9]，对希腊解放运动的敌视）。对尼古拉皇帝的感激的束缚已在克里木战争时期被布奥尔所打破，而在巴黎会议上奥地利的立场

愈加明显地回到了老梅特涅的方针上，这种方针非但没有由于这位政治家和俄皇的财政联系有所缓和，反而因布奥尔伯爵的虚荣心受辱而更为加剧。如果没有英国的笨拙的政策的瓦解作用，那么1856年奥地利就不会以波斯尼亚为代价摒弃英国和土耳其帝国政府。但是，事到如今，土耳其皇帝很少可能期望从英国或者奥地利得到像俄国在不牺牲自己利益的情况下能够答应的并且由于地理上的邻近而有效地给予的那种帮助和保护。

239 假如在俄国充分准备好在必要时从陆地和海上对苏丹和博斯普鲁斯海峡进行军事包围之后，向土耳其苏丹本人提出私下建议，保障他在塞拉尔王宫[10]的地位和使全部省份不仅在防备外国、而且在防备本国臣民方面都得到安全，交换条件是允许俄国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北面入口配备相当强大的防御工事和足够数量的军队，那么这种建议确是极为引诱人去接受的。但是，如果设想土耳其苏丹根据本人或者他人的推动而拒绝俄国的暗示，那么在决定性时刻到来之前，新的黑海舰队就会奉命占领博斯普鲁斯海峡俄国认为需要的阵地，以便掌管自己大门的钥匙。

不管我们所预想的这一阶段的俄国政策是如何执行的，从这种政策中总将形成像1853年7月那种的局势[11]，即俄国取得抵押物，等待是否有人和究竟是谁将再取走它。在这些长期准备的安排之后，俄国外交的第一步可能会是在柏林小心翼翼地试探这样一个问题，即奥地利或者英国在以战争反对俄国向前推进时，是否能够指望得到德国的支持。我深信，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无疑应该是否定的。我认为，如果俄国人用这样或那样的方法，实际上或者在外交上在君士坦丁堡站稳脚跟，并且应当对它加以保护的话，这对德国是有利的。这可以使我们不再被英国、有时还被

奥地利利用作为猎犬来反对俄国在博斯普鲁斯海峡的贪欲，而我们就能够期待奥地利将受到侵略，从而抓住参战理由。

俄国在博斯普鲁斯海峡获得了地盘后就会使得它和地中海沿岸国家，即英国甚至意大利、法国之间的摩擦极度尖锐起来，从而使俄国认为更有必要同奥地利友好地取得谅解。在这之前，奥地利执行的那种防止匈牙利沙文主义兴风作浪的政策是较为正确的。假若我是奥地利大臣的话，我不会阻碍俄国人向君士坦丁堡前进，但是我在他们出兵之后，就开始和他们进行协商。奥地利要分享土耳其的遗产，就只有和俄国达成协议，调整关系才行；而维也纳越善于等待并鼓励俄国夺取一种很远目标的政策，则归于奥地利的份额就越大。如果俄国控制君士坦丁堡，面对英国的 240
俄国今天的地位就能够得到改善；对奥地利和德国来说，只要俄国在君士坦丁堡，其危险性就要小一些。这样一来，普鲁士那种笨拙状态就不可能存在了：像在 1855 年那样奥地利、英国和法国玩弄我们，使我们在巴黎屈辱地出席会议，同时体面地提到我们是欧洲强国。

如果俄国试探：它在向博斯普鲁斯海峡推进而遇到其他国家攻击的时候，只要奥地利不受到损害，是否能指望我们中立；柏林的回答如果是否定的，甚至加以威胁，那么俄国就会立即采取像 1876 年在赖希施塔特那样的道路，重新设法争取和奥地利合作。俄国有不仅在东方以损害土耳其帝国政府为代价、而且在德国以损害我们为代价来提出建议的广阔余地。我们和奥匈帝国结成同盟来抵御这种诱惑的可靠程度，不仅取决于条约的文字，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物的性格以及后来在奥地利起支配作用的政治和宗教的潮流。如果俄国的政策能够把奥地利争取过去，

那么反对我们的七年战争时的那种同盟即可形成，法国必定会反对我们，因为它在莱茵河的利益比在东方和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利益重要得多。

无论如何，我们在将来需要的也不仅仅是作战的军备，而且还需要有正确的政治眼光，以便使德国这条航船通过种种同盟的激流；根据我们的地理位置和我们过去的历史我们会遇到这种种激流。我们给予友好国家的好意和经济上的恩惠并不能防止潜伏于未来之中的危险，而是增强我们的暂时的朋友的贪欲，并使他们估计为我们感到需要这样做。我担心在这条选定的道路上走下去，我们的前途会由于这些微小的、暂时的情绪而牺牲掉。从前的帝王重视自己谋臣的才能，远胜于他们的恭顺。假使恭顺是唯一的标准，那么要求于君主的渊博的才智，恐怕连弗里德里希大王也难以具备，虽然在他那个时代，战争与和平时期的政治并无今天这样复杂。

我们越是避免介入与我们无直接关系的争执，对于激发并利用我们的虚荣心的任何企图越是冷漠置之，那么我们的威望和我国的安全就越能持久。在克里木战争时期在英国报刊和英国宫廷
241 以及我们宫廷中那些依靠英国支持的名利之徒有过这种企图。当时他们有效地对我们以剥夺大国称号相威胁，以至冯·曼托伊费尔先生在巴黎竟使我们蒙受巨大的屈辱，要我们在条约上签字。但是对我们来说，不受这一条约的约束是有利的。如果德国在与自身利益无关的那些有争议的东方问题上比那些有密切利益的其他国家更早采取有倾向的立场，那它即使在今天也是干了一桩大蠢事。在克里木战争时期，就有过这样的时刻，当时力量较弱的普鲁士按照奥地利的要求决定武装起来并且超越这些要求能

够规定实现和平和促成在德国问题上同奥地利达成协议。同样，如果德国善于克制，那么它在未来的东方问题的争执中，就能利用它是在东方问题上利害关系最小的国家这种有利地位。德国不干预的时间愈长，它就愈能可靠地利用，虽然这种有利地位只有在享有较为持久的和平的情况下才能存在。在俄国人进攻君士坦丁堡时，奥地利、英国、意大利必然会在法国人之前采取明确态度，因为对法国来说，东方问题上的利益不大迫切，更多地考虑的是把它和德国边界问题联系起来。在俄国的东方危机中，法国不可能采取一种新的“亲西方强国”的政策，也不可能为了同俄国的友谊，在没有和德国预先达成协议或与德国先行决裂的情况下去威胁英国。

德意志帝国处于中心和无屏障的地理位置，国防线伸向四面八方，反德联盟很容易形成，这些不利因素与在东方问题上没有直接利害关系而给德国政策造成的有利因素形成了对比。同时，没有一种只有通过胜利的战争才能达到的目的可以引诱德国，德国也许就是欧洲这样唯一的大国。我们的利益就是保持和平，而我们所有的大陆邻国则无一例外都怀着只有通过战争才能实现的秘密的或众所周知的贪欲。我们应当相应地调整我们的政策。这就是说：要尽可能地防止战争或限制战争的范围，在欧洲这盘棋上我们要保留最后一步棋，我们不应由于急躁情绪、由于以国家为代价的献殷勤、由于虚荣或友善的挑动使我们过早地从等待阶 242
段转入行动阶段。否则就要遭受阿希维人的惩罚[12]。

我们理智地克制的目的并不是养精蓄锐，以便在其他国家被削弱之后，去进攻我们的某个邻国或可能的敌人。相反，我们应该努力公正地和热爱和平地来运用我们的强大力量，以便缓和因

为我们变成真正的强国所引起的不满情绪，从而使全世界相信，德国在欧洲的领导权要比法国、俄国或英国的领导权更为有益，更为公正，并且对其他国家的自由较少损害。对于其他国家的权利的尊重，法国强盛时是缺乏的，而英国也仅仅是在其利益不受触动时才有所表现，但是德意志帝国及其政策是愿意尊重其他国家的权利的，这一方面是因为德意志人的性格尊重客观情况，另一方面是因为我们不需要扩张自己的直接的领土这一不贪功利的事实，何况不加强本地区的离心因素，恐怕我们也做不到这点。我们在可能达到的境界内实现了国家的统一后，我的理想一向是不仅要取得欧洲弱小国家的信任，而且要取得大国的信任，使它们相信，德国政策在纠正时代的错误、即民族分裂之后，它所要求的是和平和正义。为了培育这种信任，首先需要诚恳、坦率以及在摩擦或意外事件发生时的和解情神。在施奈贝累（1887年4月）、布朗热、考夫曼（1887年9月）[13]事件中，在面对西班牙解决加罗林群岛问题上以及面对合众国解决萨摩亚群岛[14]问题上，我都克制了个人的感情，遵循了这一处理方式。我认为，将来我们也会有很多机会表明我们是满足的和爱好和平的。在我任职期间，我曾经历过三次战争：丹麦战争、波希米亚战争和法兰西战争，但每次我都事先弄清楚：如果战争胜利了，它所带来的成果是否能抵偿每次战争必须付出的牺牲，今天战争的牺牲要比上一个世纪沉重得多。如果我估计到，其中的一次战争结束后，我们会处于想像我们所希望的和平条件的窘境，那么只要我们没
243 有实际上受到进攻，我很难相信这样的牺牲是必要的。我从未以哥廷根大学生通常所持的观点和决斗者个人荣誉的观点来理解只有通过民族战争才能解决的国际争端，相反，我总是权衡这些争

端对德国人民的要求的反作用、同其他欧洲大国一样享有独立自主的政治生活的平等权利（正如在我们民族固有的能力的基础上是可能的那样）来加以理解。

俄国的传统政策部分地建立在共同信仰的基础上，部分地建立在血统关系的基础上，它那把罗马尼亚人、保加利亚人以及以不同名称居住在奥地利—匈牙利边境两侧的信奉希腊—天主教的、间或也有信奉罗马—天主教的塞尔维亚人从土耳其奴役下“解放”出来并且以此把他们束缚在俄国一边的想法，证实是不成功的。在遥远的将来，用暴力手段把所有这些种族并入俄国体制并不是不可能的，但是，单单“解放”还不会使他们成为俄国力量的拥护者，希腊族首先就证明了这一点。从切斯马事件（1770年）[15]以来希腊族就被认为是俄国的支柱，在1806年到1812年的俄土战争中，俄罗斯帝国的政策的宗旨看来尚未发生变化。希腊的秘密组织①的活动在闻名西方的伊普西兰蒂起义（即由范纳里奥特人[16]媒介的希腊化的东方政策的分支）时期，是否还得到过从阿拉克切耶夫②到十二月党人的俄国各种不同派别的一致同情，这是无关紧要的。不管怎样，俄国解放政策的首批产物希腊人给俄国的是失望，虽然还不是彻底的失望。在纳瓦林诺时期以及在这之后，解放希腊人的政策在俄国人的心目中也不再是一种俄国特有的政策了[17]。但是俄国政府却是在过了很长时间之后才从这危难的结果中得出应有的结论。俄国这块未经加工的和不好消化的物质[18]实在太笨重了，对于每种政治本能的察觉过于迟钝。他

① 希腊人在1814年就组织了一种秘密团体，目的是摆脱土耳其的统治。——德文本注

② 阿列克谢·阿拉克切耶夫在沙皇亚历山大一世时期在内政上施加了一种极不幸的影响。尼古拉一世在1825年罢免了在军民中间都不受欢迎的这个人。——德文本注

仍要继续解放别人，而同罗马尼亚人、塞尔维亚人和保加利亚人又重复了同希腊人所做的事。这些民族都很愿意得到俄国帮助，以便从土耳其统治下解放出来；但是在获得解放之后，他们就不表示愿意接受沙皇作为苏丹的继承人。我不知道，彼得堡是否同意这一见解，即：连沙皇的“唯一朋友”黑山公爵[19]也只是指望得到金钱或力量作等价交换才打出俄国旗帜（由于相隔遥远和处境孤立，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原谅的）。然而彼得堡不会不知道，“统帅”[20]过去曾准备，而且现在可能还在准备以土耳其苏丹的元帅[21]身份统治巴尔干各民族，只要这个打算能为土耳其帝国欣
244 然接受并得到有利于黑山的支持。

如果彼得堡愿意从迄今为止的所有误解中得出实际的结论，那么自然不会使自己限于靠军队和大炮的威力才能取得的幻想的好处。叶卡特琳娜女皇给她的第二个孙子命名为君士坦丁[22]，她当时想像中的历史上富有诗意的方面没有得到实践的认可。获得解放的民族不会感恩戴德，反而会有很多要求，所以我认为，在今天这个讲究实际的时代里，俄国政策在对待东方问题上会更多地采取技术性的行动，而不是热情奋发的行动。为了壮大在东方的势力，它的第一个实际需要是保卫黑海。如果能用装有大炮和鱼雷设施的坚强堡垒封锁博斯普鲁斯海峡，那么俄国南方海岸会比波罗的海沿岸得到更好的防卫，而在克里木战争中占优势的英法海军力量并没有使波罗的海沿岸遭受多大损失。

如果彼得堡政府的目的首先是封锁黑海入口，并为此目的企图通过友爱、金钱或武力把苏丹争取到自己这方面来，那么彼得堡政府的设想就会是如此。如果土耳其帝国政府抵制俄国的友好的接近并用剑来对付武力威胁，那么俄国就可能遭到从另一方面

来的进攻。在这种情况下，我以为应当把部队集结在西部边境。如果能用和平方式封锁博斯普鲁斯海峡，那些认为这会给他们带来损害的大国可能会暂时静观，因为每个大国都在等待其他国家的主动，等待法国作出决定。把俄国的军事力量引向南方，和其他国家相比，这更为符合我们的利益。甚至可以说，这样做会促进我们的利益。我们能够比别的国家更久地等候解开由俄国系紧的这个新结子。

247

第三十一章　枢　密　院

依据1817年3月20日法令成立的枢密院[1]，规定给享有绝对权力的国王提供建议。今天绝对权力的国王已代之以按照宪法规定由他的大臣们提供建议的国王，由此内阁随着成为由枢密院在预先讨论时表明的、从前只有国王一人具有的统治的因素。今天，枢密院的建议不仅对国王，而且对各部负责大臣起提供情报的作用；1852年恢复枢密院活动的目的不仅是为国王作出决策做准备，而且也是为国务大臣们的表决做准备。

由国务大臣准备法律草案是不完善的。一位提出报告的枢密顾问在法律公布之前能够决定法律的命运。如果问题困难，章节很多，他可以在草案外侧排除来自内阁或国会讨论的各个阶段的企图对草案内容施加的一切影响。就是在内阁中，主管大臣并不总是精研有关顾问呈报给他的、附有说明的法律草案的材料。如果草案不涉及其他大臣的主管部门，他们便更少花费时间和精力去详细了解新法律的内容和意义了。如果是这种情况，那么内阁八个部[2]中的每个部和每个官员在其活动范围内受到鼓励的独立感和分立主义就得到了助长。由于主管大臣本身就是官僚主义的片面产物，所以连他也不能预先判断所拟定的法律对实际生活的影
248 响，他的同事们要做到这一点就更不可能了。那些意识到自身不仅仅是自己那个部门的主管大臣，而且是对整个政策负有共同责

任的国务大臣，在我所观察到的人当中，所占比例不到百分之五。其余的人只限于努力使自己主管的部门避免受到指摘，从财政大臣和邦议会那里领取拨款并以自己的能言善辩有效地反驳议会对自己主管部门的攻击，甚至在必要时牺牲自己的下属。只要有国王签字和国会批准这样的收据，事情本身是否理智的问题就不会使官僚主义的大臣的良心受到谴责。与其管辖部门没有直接关系的同僚如果提出异议，就会惹起主管大臣的痛苦的感觉，然而，这种感觉通常是受到谅解的，因为人们指望在类似的情况下，他们对自己的建议也采取这种同样谅解的态度。我记得，1848 年以前在旧枢密院（它的一些杰出成员我都认识）展开辩论时，人们对待自己的意见，比在我四十多年来所见到的大臣会议上，更为严格，更为诚挚。

我认为，那种以为内阁的拙劣的法律草案在邦议会上会得到公正的正确的对待的推测，也不过是欺骗而已。这种草案可以希冀的通常是可能并且将会被否决。但是如果法律草案涉及的问题很紧迫，那么就有使内阁的荒谬提案顺利通过国会的各个阶段的危险，特别是如果起草人赢得某个有影响的或能言善辩的朋友赞成他的草案的话。如果司法和行政部门的有学识之士云集一堂，当然有些议员就会不辞劳苦地去阅读或弄懂有一百多条的法律草案；但是只有少数人勤奋和有工作的责任感，而且还分属相互斗争的派别和政党，这些派别和政党的倾向性使他们很难作出实事求是的判断。大多数议员既不阅读，也不考查，而是问那些为了自己目的而活动和演说的派别首领，什么时候来开会以及应如何表决。这一切都可用人类天性来说明，没有人因某人不能脱出俗套而加以指责；只是不该欺骗自己：以为目前我们的法令多少是

经过必要的或者说像1848年前那样的考查和准备工作的成果，这是一种严重的错误。

249 1867年国会在北德意志联邦宪法中就给自己留下了疏忽大意的印记，这种印记又带入了德意志帝国的宪法中。草案中模仿法兰克福联邦议会的一项决议的第六十八条列举了反对联邦而犯的五种罪行，这些罪行应受到的惩处，就好像是因反对某个联邦成员国而犯了罪一样。第五点以“最后”一词开头。以严肃认真著称的特韦斯顿提出了把前三点删掉的修改建议，但是很明显他并未把他自己要修改的条文读完，因而让“最后”一词保留了下来。他的建议被采纳了，在讨论的各个阶段中也都保留了下来；这样，这一条文（即现在的第七十四节）的措辞很特殊：

> 任何反对德意志帝国的存在、完整、安全或宪法的行为，最后还有对联邦会议、国会的侮辱等等。

1848年以前，人们热心于寻找正确的和合理的东西，现在只要有多数票和国王签字就足够了。在准备法律草案中，广泛人士的合作，像枢密院和国民经济会议[3]中出现的那样，由于内阁或君王缺乏耐心而无法充分发挥作用。对此我只能感到遗憾。当我有暇处理这些问题时，我曾向自己的同事们表示，希望他们从开始立法活动时起，就要在报上公布草案，任凭公众批评，尽可能广泛听取熟悉这一问题的专家或对该问题感兴趣的人的意见，即枢密院和国民经济会议的意见，根据情况听取各省议会[4]的意见，最后才在内阁进行讨论。把枢密院和类似的咨议机关排挤到次要地位，我认为主要是由于这些非职业的国事顾问在公共事务中引起

了职业顾问及议院的嫉妒，同时还由于内阁的绝对权威在它的管辖范围内遇到他人干预而深感不快所致。

我参加了1884年在王储弗里德里希·威廉[5]出席下重新召开的枢密院的头几次会议，这几次会议不仅给我，我认为而且给所有与会者留下了一种事务上良好的印象。亲王倾听报告，毫无对报告人施加影响之意。应当指出的是，两位前近卫军军官冯·策 250
德利茨·特吕茨施勒（后来任波兹南省长[6]及教育和宗教事务大臣）和冯·敏尼格罗德的报告造成了这样的印象，好像王储后来任命这两位先生为咨议官是按照会议的精神行事似的，虽然最重要的理论性报告无疑都是出席的专家教授们作的。前近卫军军官对制定法律草案施加的影响使我确信，完全和仅仅由内阁考查草案不是避免这样一种危险的正确途径，这种危险就是不切实际的、有害的和危险的、修辞上不完善的法律草案，出自个别作报告的具有立法偏爱的顾问的笔记，会畅行无阻地或者没有进行充分修正地通过内阁、议会和政府的各个阶段，直至编入法律汇编，然后去作某些补救，形成犹如一种折磨人的病患那样的部分负累。

251

第三十二章　威廉一世皇帝

(一)

七十年代中期皇帝的思考能力开始衰退，他理解别人的讲话和表述自己的思想都非常吃力；他在讲话和听他人谈话时有时思路不清。使人惊讶的是，在诺比林行刺事件[1]之后出现了可喜的变化。上述情况不再出现了，皇帝的举止较为从容和活跃，也较为温和了。我由于他的健康状况好转而流露出来的喜悦，竟使他说了一句诙谐的话："诺比林比医生还知道我需要的是什么：适当放血。"他最后一次生病的时间不长，是1888年3月4日开始的。8日中午我和皇帝进行了最后一次交谈，当时他的神志还清醒，我被授予全权颁布他早在1887年11月17日签署的命令。命令规定，在皇帝陛下认为必要时，委任威廉亲王[2]为代理。陛下希望我留任，并为他的继任者效力；谈到这点时，他显得对我和弗里德里希皇帝之间不够融洽的关系表示关切。我极力安慰他，尽量说些通常适合和临终人说的话，即在他逝世之后他的继任者和我要做的事情。然后，他想到儿子的病况，要求我应允把我的经验都贡献给他的孙子；如果他的孙子像各种迹象所表明的那样很快就要登基的话，要求我支持他。我表示愿意竭尽忠诚为他的继任者们效力，就像为他本人效力一样。他以无力的握手作为对此的唯

一回答。随即他又陷入高烧病人的幻想之中，皇帝的全副心思都集中在孙子身上，他以为这位于1886年9月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拜会过沙皇的亲王，就坐在他床前我坐的位子上，于是他突然用“你”来称呼我，说：“你应该时刻和俄国皇帝保持接触，用不着和他争吵。”接着是长久的沉默，幻觉消失了，他让我走的时 252
候说：“我还要见您。”他确实又看到了我，我是午后去探望他的，以后在9日凌晨4时我也在他那里，但在场的人那么多，他未必能认出我来。还在8日夜晚，他的神志又完全清醒了，并能够清晰而有条理地同在狭小的卧室里围在他病榻周围的人谈话。那是这位刚强和勇敢的灵魂的回光返照。8时30分他停止了呼吸。

(二)

在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统治时期，只有王储受过有意识地作为王位继承人的教育，次子[3]仅受过纯粹的军事教育。自然，在他整个一生中，军人对他的影响要胜过文官。我发现，我自己为了免得每天换几次衣服而总是穿着军服，这使我的影响得到了增强。当他还是威廉亲王时，能够影响他的发展的人首先是那些没有政治职务的军人，如冯·格尔拉赫将军，这位军人一度脱离政治，多年给他当副官。这是亲王的副官中最有才干的人，绝不像他那位任法院院长的弟弟①那样在政治和宗教事务上热衷于抽象议论，却不过是个十足的空谈家，致使在讲求实际的亲王那里得不到像在富于才智的弗里德里希·威廉国王那里那样对他的好

① 路德维希·冯·格尔拉赫。——德文本注

感。由于将军的两位兄弟——一位院长和一位传教士[①]（一部篇幅浩大的有关《圣经》的著作的作者）在政界所起的作用，格尔拉赫这一名字就很容易地和虔信主义这一词语和概念联系在一起了。

我在奥斯坦德[4]和亲王比较亲近，1853 年我在那里同他有过一次谈话，涉及到格尔拉赫这个名字。我之所以记住了这次谈话，是因为亲王对我们国家机关和政治形势的不熟悉使我惊异。

有一天，他有点怨恨地谈到了冯·格尔拉赫将军。这位将军由于意见不一又缺乏谅解，看来有些不满，因而辞去了副官职务。亲王称他为虚伪的虔信者。

我：殿下如何理解虔信者这个词？

他：在宗教方面口是心非，一心想飞黄腾达的人。

我：格尔拉赫决没有这个想法，他能干得了什么？按今天的惯用的说法，人们对虔信者的理解有所不同了，即：正统地信奉
253 基督教的启示录并且不隐瞒自己信仰的人。这些正统派教徒中的许多人和国家毫无共同之处，并不想飞黄腾达。

他：您是如何理解正统派教徒的？

我：举例说是这样的人：他确信耶稣是上帝的儿子，耶稣是为了宽恕我们的罪恶作为牺牲而死的。目前我不可能下一个确切的定义，但这是不同信仰的实质。

他涨红脸说：难道世界上真有这种被上帝遗忘而不相信这一点的人吗？

我：假若殿下当众说出这种话来，那么殿下也将会被算作虔信者。

---

① 奥托·冯·格尔拉赫。——德文本注

后来我们的话题转到了当时正在酝酿的有关县区和村社条例问题上。关于这点亲王大致说了下面的话：

他不是贵族的敌人，但是他不会同意“由贵族们虐待农民”。

我回答道：贵族会这样做吗？即使我想虐待舍恩豪森[5]的农民，那么我要做到这一点也缺乏任何手段，这种虐待的尝试将会由农民或者法律来加以制止。

他接着说：在您的舍恩豪森那里可能是这样，但这是例外。我不能允许在农村虐待普通老百姓。

我请求他允许我向他呈送一份说明我们的农村状况和地主同农民之间相互关系的形成过程的简短报告。对我的请求他欣然同意了。后来我利用我在诺德奈[6]的空闲时间，引用法律的有关章节，向这位五十六岁的王位继承人说明在1853年时贵族地产和农民所处的法律地位。我把这份报告呈送给他时不无担心，亲王会给予一个简短而含有嘲讽的答复，说他没有通过我获知他三十年前所不知道的任何事物。可是相反，他因我整理了对他来说有兴趣的新资料而对我表示十分感谢。

(三)

威廉亲王自从摄政[7]之日起，深感所受事务上的教育之不足，便夜以继日地工作，对此加以补救。当他“主持政务”时，他的工作确实极端严肃认真。他阅读全部呈文，不仅是吸引他注意的 254
那些，而且还研究各种条约和法律，以培养自己的独立判断的能力。没有任何娱乐能够夺去他处理国事的时间。他从不读小说及一切与他君主职责无关的书。他不吸烟也不玩牌。每当在符斯特

豪森打猎后，一同打猎的伙伴们吃过午饭，步入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通常召集“烟友会”[8]的房间时，亲王为了允许在场的人抽烟，就让人给他拿来一根长长的荷兰陶瓷烟斗，吸上几口，皱皱眉头便把它搁在一边了。当他在法兰克福（那时他还是普鲁士亲王）的一次舞会上走进一间正在赌博的房间时，他对我说：“我也想碰一次运气，但没有带钱，请给我一些。”因为我也没有带钱的习惯，便由泰奥多尔·施托尔贝格伯爵帮了他的忙。亲王下了几次一个塔勒尔的赌注，每次都输了，他便离开这个房间。他唯一的休息是工作一天之后在剧院包厢度过一个晚上，但是就是在那里，我作为大臣仍可以在紧急情况下到他包厢前的小屋里向他报告或请他签署文件。虽然他非常需要夜间休息，而且夜里醒了两次他就抱怨没有睡好，醒三次则抱怨为失眠，但是每当有紧急事情请他决定而在半夜两三点把他叫醒时，我从来没有发现他有任何不满的表示。

除了高度责任感所激发出来的勤奋外，他在履行自己的摄政职责时，还显露出异常清晰的、通过学习得来的东西，既不能加强也不能损害的、健康的人类理智和常识。他固执地坚持诸侯的、军事的和地方的传统，而这种固执则成了他对事物理解的障碍。每次放弃这些传统，每次由于事物发展的需要而向新的道路迈出一步，对他来说都很难，都往往视为不能允许和不可取的。如同他眷恋他周围的人和习惯的东西一样，他固守着那些印象和信念，即在回忆的作用之下考虑在类似的情况下他父亲做了什么或会做什么。特别是在对法战争期间，他总是把这次对法战争[9]和解放战争[10]相对照。

有一次在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事件中威廉国王以责备的口吻问我：“难道您不是德国人?”这是因为我反对他由于家庭影响
255 而倾向于在基尔建立一个新的在投票时反对普鲁士的大公国的意

图。在他不被政治上的思考所感染时，他仍然是那样一个听从自己的自然感情支配的君主，他是德意志各邦君主中最坚定的分立主义者之一，富有他父亲时代普鲁士军官们的那种爱国和保守精神。到了比较成熟的年龄，他妻子的影响使他对这种传统的原则持反对的态度，而他那些新纪元时期的大臣们的无能和议会自由派在冲突期间的紊乱和笨拙，又一次在他身上唤起了原来那种普鲁士亲王和军人的气质，尤其是他从来不考虑自己所走的道路究竟是否危险这个问题。如果他确认，职责和荣誉，或者是两者之一，命令他去走这条道路的话，那么他就会不顾政治上和战场可能遭受的种种危险而走上这条路。他是吓不倒的。王后是可以吓倒的，而和她维持家庭和睦的需要具有无法估计的分量，而议会的笨拙或威胁只能起加强他对抗决心的作用。他性格中的这种特点，新纪元的大臣们和他们在议会中的拥护者及追随者从未加以考虑。施韦林伯爵很不了解这位身居王位、无所畏惧的军官的性格特点，以至认为可以用傲慢和无礼的态度来吓住他。所有这一切，对于新纪元的大臣们、老自由派和贝特曼—霍尔维格政党的势力来说成了转折点。从这时起运动进入低潮，领导权落到了罗昂手中，首相霍亨索伦公爵和他的助手奥尔斯瓦尔德希望我参加内阁。1860 年春我在柏林时，王后和施莱尼茨还对此事加以阻挠，但是国王和他的大臣之间的裂痕严重地破坏了他们的相互关系，再也无法将其弥合。

（四）

在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统治期间，奥古斯塔亲王妃通常总是持与政府政策对立的观点，她把摄政年代的新纪元，至少直到

冯·施莱尼茨先生退职以前[11]，视作是她自己的内阁。在此之前以及后来，她时刻感到需要与她夫兄的政府，而后则与她丈夫的政府的每一个行动相对抗。她的影响有变化，而直到她生命的最后几年，她总是同大臣们作对。如果政府的政策是保守的，那么
256 自由派人士及其活动在亲王妃的家族范围内就会得到推崇和鼓励。如果帝国政府在其活动中依照自由派的道路来巩固新帝国，那么皇后便又倾向于对保守派、尤其是天主教分子给以优遇。她对于天主教分子的支持总是心甘情愿，因为在新教王朝统治下天主教徒常常在一定的限度之内处于反对派地位。当我们的对外政策可以和奥地利携手并进的时候，皇后对奥地利的态度是不友好的和冷淡的；但是在我们的政策和奥地利发生冲突时，皇后则对奥地利的利益一直维护到1866年战争发生之前。当波希米亚边境已经发生战事时，在柏林由于皇后的庇护和通过冯·施莱尼茨的机构，两国间令人怀疑的交往和谈判还在进行。自从我担任外交大臣和冯·施莱尼茨先生自己担任宫廷大臣以来，他一直担负着皇后的某种反对派大臣的角色，以便给皇后陛下提供进行批评和对王国施加压力的材料。为此目的，他利用了他是我的前任时期通过私人通信建立的关系，把真正的外交情报网集中到自己手中。这方面的证据我是偶然获得的：有几份从内容可以明显看出是有连续性的报告，由于信使或邮局的误解而交到了我的手中。它们和官方报告非常相似，只是文中提到的个别事才使我感到惊异。我在字纸篓里找出了装报告的那个信封，在信封上看到了冯·施莱尼茨先生的地址。和施莱尼茨保持这种联系的官员中包括一位领事。关于这位领事，1864年1月25日罗昂曾在给我的信中谈及，说他从德鲁恩·德·路易斯那里领报酬，并以齐格菲尔德这一名字为《外交记

事》[12]撰写文章。他在文章中为拿破仑侵占莱茵地区进行辩护，并把这种侵占和我们占领什列斯维希相提并论。在《帝国之钟报》及保守党和《十字报》对我进行恶毒攻击之时，我才得知，《帝国之钟报》和类似的诽谤性的出版物的兜售，是由宫廷内阁办公厅组织的。中间人是一个名叫贝恩哈德的高级僚属，他给冯·施莱尼茨夫人修剪羽毛笔和整理书桌。他只向我们的最高级官员寄送十三份《帝国之钟报》，其中两份送到皇宫，其他的送给某些皇室亲族。 257

一天早晨，当我去觐见满面怒容并因而气病在床的皇帝，向他报告关于宫廷内发生了有利于中央党的示威这一在当时情况下十分紧迫的不能容忍的事件时，皇帝正躺在床上，旁边坐着盛装的皇后。从她的装束可以看出，是在通报了我的来访之后，她才下楼来的。我请求同皇帝单独商谈，于是她便走了，但她没有把门关紧，而且就在门外的一把椅子上坐了下来。她故意让我明白，她能听见一切。这已不是她第一次吓唬我了，然而她的企图并没有阻止我向皇帝报告。当天晚上，我参加了宫中的一次宴会。从皇后陛下和我谈话的方式中，我断定皇帝在她面前维护了我的申诉。谈话一转，我请求皇后保护她丈夫的令人忧虑的健康状况，不要再让他备受各种互相矛盾的政治势力的折磨。从宫廷传统礼仪来看，这个出人预料的暗示发生了值得注意的作用。在奥古斯塔皇后一生的最后十年中，我从未见过她有如此刻这样妙：她挺身直立，目中闪耀着火焰，这在以前或以后都是我从未见过的。她中断了谈话，把我丢下就走了。事后一位宫廷友人告诉我，她当时还说："我们的温文尔雅的帝国宰相今天可真不文雅。"

多年的经验逐渐使我学会了相当准确地判断：皇帝对我认为是合理的、必要的建议提出异议是根据他个人的见解还是出于保

持他家庭和睦的愿望。在第一种情况下，我通常能够指望得到赞同，为此只需等待明智的君主熟悉情况即可。有时，他召集大臣和枢密顾问。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和皇帝陛下之间的讨论总是严肃的。但是如果国王反对大臣的意见是因为他在早餐时应王后要求事先进行过讨论并作了某种允诺，那情况就不同了。如果此刻国王在为此目的而写的信件和报刊文章的影响下仓卒表示反对内阁政策的意见，那么王后陛下通常就会设法巩固她所取得的胜利，因为她怀疑皇帝“面对俾斯麦”能否坚持他曾说出的意图或见解。有时国王陛下反驳我时不是根据他自己的见解，而只是由于妇人的影响，这一点我能从他那不符事实和不合逻辑的论点中看
258 得出来。在这种场合下，当他无法再反驳我时，就总是以这样的话来结束我们的争论：“唉！得啦，我可不得不竭力要求于您。”于是我便明白，我面对的不是皇帝，而是他的夫人。

我在政治斗争的过程中和为了职责上利益，自然在各个领域中都树了敌手。我的所有对手对我的共同的怨恨使他们联合在一起而暂时地压倒了他们相互间的厌恶。为了暂时有助于加强反对我的力量，他们将彼此之间的仇恨搁置一旁。促成这种协同一致的核心人物是奥古斯塔皇后。对于她的禀性，只要她想达到某种意愿，即使考虑到她的丈夫年事已高和健康不佳，也不能加以限制。

在围困巴黎期间，就如同在围困之前和之后经常发生的一样，皇帝忍受了一方面是本人的理智与帝王的责任感，另一方面是需要家庭的安宁和妇人对他的政策的赞同这两方面之间的斗争。他对自己夫人的骑士般的感情，皇后在他内心引起的神秘情感以及他对损害家庭秩序和日常生活习惯的敏感等等，给我造成的阻碍，有时比列强或敌对党派给我造成的阻碍还难于战胜，并

且由于我对皇帝本人由衷的爱戴，所以在我向国王报告时要坚持自己的观点就不得不经受折磨人的斗争。

皇帝感觉到这一点，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内，他对我并不掩饰自己的家庭关系，征询我的意见：采取什么样的途径和形式才能做到既保持家庭安宁又无损于国家利益。“这个急性人”——皇帝由于烦恼、尊重和好意在私下里惯于这样称呼自己的夫人，说这句话时还做着手势，好像想说：“我也无法改变。”我感到这个称呼是非常恰当的。王后是一个刚毅的女人，只要没有生命垂危在威胁，她一直具有崇高的责任感，但由于王权尊严的意识使她只承认自己的权威，而不愿意承认别人的权威。

(五)

普鲁士亲王在开始摄政之后以及后来当皇帝期间，其意志和信念的重心放在非军事方面、即政治方面，是他的刚强和高尚性格的 259
自然产物，这种性格不是来自这位君主所受的教育，而是他天生固有的。“帝王的高尚气度”一语正好说明他的气概。虚荣心可以激励君主为他的臣民的幸福筹划操劳。弗里德里希大王就不乏虚荣心。他那要成就一番事业的夙愿，最初就是出自青史留名这种要求。这里我不讨论这样的问题：在他统治的末期，像人们常说的那样，这种动力是不是退化了？是不是国王内心企望听从后世察觉他自己的政府和后任政府之间的区别呢？他在一封寄出的信中写过注明会战前夕日期的抒怀诗，信中的附言是：决战前夜，情况不太坏。

威廉皇帝没有这类虚荣心，并且十分害怕当代和后世的公正批评。在这个意义上，他完全是一个普鲁士军官，只要上级有命

令，他可以毫不动摇地视死如归。但上司或舆论的谴责也能使他束手无策，犹疑不定，以致使他失误。谁也不敢当面对他大肆奉承。由于意识到帝王的尊严，他可能想到：如果一个人有权当面赞扬我，那么他也就有权当面指摘我。两者他都不能允许。

在严重的内部斗争时期，君主和国会都懂得并学会了相互尊重。王室尊严的声誉和国王的镇静自如最终甚至迫使对手们表示钦佩。国王本人由于具有高度的个人荣誉感而能够公正地判断争执双方的情况。正义感主宰着他，他不仅对他的朋友和他的仆人是如此，就是在对敌斗争中也是如此。他是一位身居皇位的绅士，是一位最佳意义上的高尚的人，他从未倚仗无上权力而对贵人行为理应高尚这种规则加以忽视。他在对内以及对外政策方面的态度总是遵循旧式学校培育的绅士准则，并且任何时候都受一个真正普鲁士军官情感的支配。他不仅对各邦君主，而且对自己的仆人直至近侍都恪守忠诚和尊敬。如果由于一时气愤而情不自禁地损伤了自己微妙的帝王尊严和责任感，则他善于迅速控制自己，而仍然是一个“完完全全的国王”[13]，而且是一个公正而善良
260 的国王，一个洋溢着荣誉感的军官，而这样的军官只要想到自己的普鲁士的剑缨就会保持正确的道路。

皇帝也会激动，但在争论问题时，他却使自己不受对方激烈情绪的感染；遇到这种场合他总是友好地、有礼貌地中止谈话。像在凡尔赛那样他拒绝接受皇帝称号而勃然大怒的情形则属极为少见。如果皇帝激动起来反对他所赏识的人（比如对罗昂伯爵或我），那么这或者是由谈话题目本身所引起的，或者是由于在此之前旁的不涉及公务的谈话中受到了一些难以公正地维护的观点的束缚。罗昂伯爵常常听任皇帝的这种发作，就像一个军人在队列前听

凭长官发出他认为是不应得的训斥一样，但这种场面使他在神经上从而间接地在肉体上忍受痛苦。皇帝对我发怒比对罗昂要少，这种发作对我从未起感染作用，旋即冷静下来。我得出一个逻辑，像威廉一世这样对我如此信任和器重的君主，在他不正常时，对我来说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的性质，我不能加以对抗，如同对暴风雨、海洋或其他自然现象一样，我只能适应。如果我做不到这一点，那就是我没有正确地执行我的任务。我的这种印象不是根据我通常的认识，即国王对他的臣仆来说是具有蒙上帝恩宠的地位，而是根据我个人对威廉一世皇帝的爱戴。对于他，我丝毫没有个人恩怨之感，他可以对我相当不公正，但绝不会引起我的愤懑。对他，就如同对父母一样，不会产生身受屈辱之感。这不排除下述情况：某些事务上的、政治上的利益我得不到君主的理解，或遇到来自皇后陛下或来自宗教的、也可能是共济会的宫廷阴谋家的偏见时，也会由于不断的斗争而感到神经受刺激，从而使我对君主进行消极反抗；如今情绪平静下来，我要全部否定那种反抗，并为之懊悔，就像人们在父亲死后再回想起往昔种种争执而感到痛苦一样。

(六)

由于皇帝对别人诚实、正直善良和心地仁爱，他能很容易和很好地做到立宪君主们和大臣们往往要费尽气力才能做到的成 261
就。有些君主的立宪制度被认为是典范，他们在年复一年的公告中包含着大量娓娓动听的词句。不仅比利时的列奥波特而且路易—菲利普虽然具有巧妙的演讲艺术，但在某种程度上也已用尽了立宪制的陈词滥调，一位德国君主未必能够创造出在写书和印

制上可以使用的更多的词藻。对我本人来说，最伤脑筋、最感困难的差事莫过于为君王的演说和类似的公开讲话寻章摘句。威廉皇帝亲自拟写公告或亲笔写信时，尽管出现文字上的不准确，但总有某种吸引人的、往往令人鼓舞的东西。这些文字热忱可信，使人感到愉快，从这些文字中可以相信，国王不仅要求别人忠诚，而且他本人也对人忠诚。他是可以信赖的；他是一位感情多于理智、身心都很威严的君王，他的这一特性可以说明德意志人的性格中时时出现的臣仆和拥护者的献身精神。从君主主义的观念来看，对于每一个君主的忠诚的程度不是同等的，而是有差别的，其界限各自取决于政治观点还是情感。由法律确定的忠诚是有一定限度的，政治信念形成的忠诚程度就比较大些；凡是超过这些界限的忠诚，就需要相互之间的个人情感了；因此有忠实的君主就有忠诚的臣仆，而臣仆的忠诚还远远超过法律上的考虑。

忠君思想的一个特点就是它的代表人物甚至在意识到自己能影响君主的决策时，在感情上也仍然念念不忘自己是君主的臣仆。有一天（1865 年）国王对着我的妻子称赞我思路敏捷，善于领会他的意图以及——如他稍停片刻又补充说的——引导加以实现。这样的赞扬并没有使他丧失这种感觉，他是人主，而我则是他的臣仆，尽管是有用的、但仍然是恭敬的和忠诚的仆人。甚至在 1877 年，当激烈讨论我的辞职呈文时，他也没有忘记这种观念，当时他大声说："难道我在晚年还得出丑吗？如果你离开我，那就是不忠。"就是在那样的情况下，他也极为看重自己的帝王尊严，并且十分公正，对我从未怀有扫罗[14]般的猜忌之心。他有这
262 样的君王的感情，即他不仅容忍有一个有威望的、享有实权的臣仆，而且觉得提高了自己的威望。同一位不能容忍乡里存在一个富

裕而独立的农民的贵族的感情相比，他的确是位高尚的人。1885年，在我庆祝供职五十周年[①]时，他并没有命令和安排举行庆祝仪式，但他允许举行并参加了这些仪式。这种亲切的态度在公众面前和历史上真正表现了他那高贵的君主风度。庆祝不是按他的诏令，而是得到他的许可并在他的愉快赞助下举行的。在他的意识里没有一刻闪现过嫉妒自己臣民和仆人的念头，但他又没有一刻不意识到他是君主，正如全部恩典、即令是过分的恩典也不会打消我的观念、并且是愉快的观念——即我是这位君主的仆人一样。

这种关系和我的爱戴之情是建立在我的刻骨铭心的忠君观念的原则基础之上的。然而像现存的这样的忠君思想只有在君王和他的臣仆之间相互有着相当程度的美好感情的作用下方为可能，正如我们的采邑法[15]要求双方都要“忠诚”一样。我和威廉皇帝的这种关系不单纯是君主和他的臣民或者君主同他的藩属之间的法律关系，它带有个人性质，并且为了使其发挥作用，要求君王和臣仆都持有这种态度。这种关系通过个人渠道比依赖某种逻辑更容易传给下一代。但是在现今的政治生活中，要使这种关系具有长期性和原则性那是不符合德意志人的观念的，倒是更符合罗马人的观念。波旁王朝的 porte-coton[16]（官衔制）难以传入德国人的观念中来。

（七）

皇帝的下列书信比我的记述能更生动地表明他的某些性格特征。

---

① 按照皇帝的意愿，这一庆祝将同庆祝七十岁诞辰结合起来。——德文本注

柏林，1870 年 1 月 13 日

很抱歉，我一直忘记把完全应该由您首先获得的胜利奖章交给您，现在寄送给你，作为您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业绩的凭证。

您的威廉

当天我写信给国王：

英明的国王，

仁慈的君主：

263 我满怀敬意和谢意地铭记陛下赏赐给我的胜利奖章和这具有历史意义的纪念品中所赋予我的光荣地位。由于陛下在授予我奖章的同时又恩赐御书，因而对我和我的亲属来说，这件为子孙后代永志不忘的大事将具有特殊的意义。

如果我有幸在为德国指明道路的国王的庇护下得以将自己的名字传诸后世，从而使我的自尊心得到高度的满足，那么从我内心来说，更为满意的是我意识到，在上帝的明显保佑之下我是在为一位世袭君主效劳，对于这位君主我满怀爱戴之情，而得其赞许乃是我一生中所渴求的最大报酬。陛下，请接受我崇敬的、至死不渝的忠诚的表白。

陛下的忠诚仆人

冯·俾斯麦

柏林，1871 年 3 月 21 日

德意志帝国重建之后第一届德国国会今天开幕，国会的国务活动随之开始。普鲁士的历史和命运早已安排了这一事件，正如今天它负有领导新建立的帝国的使命时，它便告完成了。普鲁士之有今日，与其说是有赖于它领土之辽阔和它的力量（虽然二者都同样地增长了），不如说是有赖于它精神上的发展和它的军队组织。最近六年间我的国家以惊人的速度成功地达到了今天所享有的光辉地位。十年前我召您到我这里所从事的活动都发生在这一时期里。全世界都清楚，您怎样地没有辜负我的信任，根据什么当时我让人召您来。普鲁士和德意志因为今天在我驻跸之地体现出来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事件，应当对您的建议、您的远见卓识和孜孜不倦的活动表示感谢。

尽管给这样的业绩的报答对您是应得的，但是我仍要迫切地并有责任公开和永远表示祖国和我个人对您的谢意。为此，我晋升您列入普鲁士侯爵等级，并规定由您的家族的长子世袭这一爵位。

愿您将这一表彰视为您的皇帝与国王对您的永不消失的谢意。

威廉

柏林，1872 年 3 月 2 日　264

今天我们庆祝光荣的和约[17]缔结一周年，这一和约是我们通过英勇奋斗和种种牺牲而争得的，但也是通过您的远见和毅力才取得的意料不到的成果！今天我再次衷心地向您致

以诚挚的谢意；我曾经当众用铁和贵金属表示过这种谢意，可是还没有用一种金属——青铜。因此我今天给予您用这种金属仿照一年前您使之沉默的那个物件的式样制作成的纪念品；我已决定，授予您几件从敌人那里缴获的大炮，由您自己挑选，将其放置在您的庄园里，以永恒纪念您对我和祖国所作出的崇高功绩！

对您忠实和感谢的威廉

科布伦茨，1872 年 7 月 26 日

本月 28 日您将庆祝上帝恩赐的美好的家庭节日[18]。对于参加这个节日庆宴我是不允许也不可能落在后面的，因而值此佳节来临之际，请您和公爵夫人接受我真诚和热烈的祝贺。上帝赐予您们的如此众多的幸福中第一位的是家庭幸福，为了这一幸福您要虔诚地祈祷感谢上帝。但是我和大家感谢上帝的祈祷，其意义更为深远，我们感谢上帝，因为上帝在那样决定性的时刻派您来辅佐我，从而为我的政府开创了超过所能想像和理解的道路。而您也应感谢上帝，因为上帝加惠于您，使您得以成就丰功伟绩。在您操劳之时和之后，在家庭里总是能得到休息和安宁，这也有助于您完成繁重的使命。为了这一使命，我切望您多加保重；从伦道尔夫伯爵转给我的您的信中我高兴地看到并亲自听他说到，您今后将更多考虑自己，而不是公文。

为纪念您的银婚，着人送给您一只画有感恩的普鲁士形象的花瓶，尽管制作花瓶的材料容易破碎，但是即使这样连花瓶的每块碎片也能对子孙后代表述普鲁士对您的深厚谢

意，因为正是您把普鲁士提高到它现在的高度。

您的忠实的和满怀谢意的

国王威廉

科布伦茨，1878 年 11 月 6 日

由于您的才识、远见和勇敢，您得以在三个月内有时恢复了、有时维护了欧洲的和平，而在德国您则以合法的途径同以毁灭来威胁整个国家秩序的敌人进行斗争。这两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事件曾受到了一切善良的人的理解并且部分地得到他们对您的赞扬，我也曾有机会为上述第一个事件——柏林会议——向您表示我的赞扬，现在由于您坚决维护了我们的法律基础，我认为需要公开地向您表示我的赞许。法令* 的使命是维护和保障包括普鲁士在内的德意志各邦现在的法律观点，我怀有这一法令的意向，这一法令是从使我的心灵和情感备感痛苦的事件[19]中产生的。

为了赞扬您为我的普鲁士所建树的巨大功勋，我随信寄来由标志着普鲁士威力的王冠、王笏和宝剑组成的勋章，还有您经常佩戴的红鹰大十字勋章。

宝剑表示着您在捍卫和维护我的王笏和王冠时的勇气和才识。

愿上帝赐予您精力，以便您今后长时期里还能把您的爱国精神献给我的政府和祖国的幸福。

您的忠实的和满怀谢意的

威廉

---

* 1878 年 10 月 21 日公布的镇压社会民主党企图危害治安法。

柏林，1879 年 4 月 1 日

很遗憾，我不能亲口向您表示我对今天这个日子的祝愿，因为虽然今天我应该第一次出门，可是我还不能上楼梯。

首先愿您健康，因为一切活动都有赖于健康，而您现在
266 正比过去更多地在开展活动，这证明活动本身也能保护健康。为了祖国的幸福（不论从狭义上说还是从广义上说），愿事情继续这样发展。

趁今天这个日子，我任命您的女婿兰曹伯爵为公使馆参赞，因为我相信此举将使您感到愉快。

为纪念今天这个日子我还寄给您一帧我的伟大祖先、伟大的选帝侯站在大桥上的肖像的摹本，但愿今后许多年中您和我们一起还能一再庆祝这个日子。

感谢您的

威廉

1883 年过圣诞节时，皇帝赐予我一个在尼德瓦尔德的纪念碑的复制品，并附便笺如下：

圣诞节

1883 年

您的政策的拱心石，主要为您举行的，而您，可惜*，未

---

* 因患病。

能亲临的庆典。

威

柏林，1885 年 4 月 1 日

我的亲爱的侯爵！值您七十寿辰之际，整个德意志大地和人民怀着真诚的愿望向您表明，您为祖国的强盛所建树的一切已铭刻在如此众多的感戴的心灵之中，今天我深切地感到必须向您表示举国上下对您的这种感谢和尊敬之情，这多么使我深感欣慰。我为您而高兴，因为您真正地、完完全全地应该得到这种赞扬。我愉快地看到，这种意识正在广为传播，如果一个民族表示出对真理和伟大的理解，并且对建立巨大功勋的人物深表尊敬和颂扬，则意味着这个民族现时是美好的，也标志着它增强了对未来的希望。参加这样的庆典对我和我的王室来说乃是一种非常的喜悦；现寄去一幅画[20]，我们想以此向您表示我们的感激之情。因为这幅画显现了霍亨索伦王室历史上最伟大的时刻之一，想起这个时刻不能不同时联想到您的功绩。

您知道，亲爱的公爵，我将永远对您怀着最充分的信任、最诚挚的善意和最热忱的谢意！在这封信里我说的没有不是我曾经多次对您说过的话；我想，这幅画将在以后向您的子子孙孙展示，267
您的皇帝和国王以及他的王室完全懂得：他们感谢您的原因何在。

我是怀着这种意识和感觉结束这几行字的，这种意识和感觉是永存的。

您的满怀谢意的和忠诚的皇帝与国王

威廉

亲爱的公爵，您正在庆祝今年9月23日这个日子，廿五年前的这一天我召请您到我的内阁中来，不久就把它交与您主持。迄今为止您在完成各种各样最重要的委托时为祖国所作出的杰出贡献，证明我把这个最高职务交付给您是合适的。本世纪最后二十五年的历史证明，我选择您是正确的。

不论战时还是和平时期，您常常毫不顾惜自己的健康，始终关注着往往是堆积如山的困难问题，并且总是顺利地加以解决，从而表现出您是衷心热爱祖国和孜孜不倦地工作的光辉榜样。您使普鲁士在尊敬和荣誉方面获得了它在世界历史上人们想像不到的地位！您这样的业绩使我完全有理由以向上帝作感恩祈祷来庆祝9月23日这个廿五周年纪念日，因为上帝是为了在人间实现自己的意志才派您来辅佐我的。

请您记住我现在再次向您表示感谢，尽管在我过去的言行中已不止一次地对您有过这种表示。

为庆祝这样一个日子，我满怀感激之情祝您幸福，并衷心祝愿您为王室和祖国的利益长久地保持您旺盛的精力。

柏林　永远感谢您的国王和朋友

1887年9月23日

威廉

又及：为了纪念过去了的二十五年，我寄给您一幢大厦的图像，在这座大厦中我们曾经讨论和实施十分重要的决定，这些决定一直为普鲁士，而现在又可望为德意志获致荣誉和幸福。

皇帝的最后一封信我是在1887年12月23日收到的。同以往的书信相比，从这封信的文体和字迹上可以看出，近三个月来皇帝要用文字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和亲自写信是困难得多了；但这种困难并不妨碍他那清晰的思考、对有病的儿子的慈父般的顾虑和对孙子应受教育的君主般的关怀。在引用这封信时，如把某些地方加以修饰，是不妥当的。

柏林，1887年12月23日

268 随信附寄任命您儿子为享有“阁下”尊称的正式枢密顾问的命令；请将这一委任令——这一我想您不会拒绝的喜讯——转达给您的儿子。我想这是对您、对您的儿子以及对我的三重喜讯。

我利用这个机会向您〔解释〕①为什么我至今没有答复您提出的、让我的孙子威廉亲王更多地参与国家事务的建议，原因在于我的儿子王储的不幸的健康状况！原则上我完全同意应该这样，但是实行起来却极其困难。您当然知道，我根据您的建议采取了本身是很自然的决定，即在我有困难的时候，让我孙子威廉签署民政和军政内阁[21]的例行公文，并在“遵圣旨”字样下面签上自己的名字——这个决定已使王储非常恼怒，似乎柏林已经有人在考虑要替换他！通过较为冷静的思考，我儿子的情绪安定了下来。如果让他知道，他的儿子被准许更多地参与国家事务，甚至给他派去了文职副官——如同我当年对我的作报告的顾问的称谓，那他对此

① 补充，原文缺。——德文本注

更难忍受。可是那时候的情况完全〔不同〕①，因为国王——我的父亲有理由为当时的王储指定一个代理人②，虽然早就清楚由我继承王位，然而只是到我44岁，当我以普鲁士亲王的称号由我哥哥任命我为内阁成员的时候，我才行使这一职务。这个职位需要一位有经验的人来帮助我准备内阁例会。我每天同时要处理一些紧急的政治报告，根据盖在上面的印章来看已经是经过四、五、六道手了！如您建议的那样，只是为了交谈而把一位国家大臣调派给我孙子，这会使我失去准备达到既定目标的理由，并且毫无疑问会又一次更加激怒我的儿子，而这是必须绝对避免的。因此我建议还是维持先前研究—熟悉处理国家方针的方式，就是说，把个别部委派给他，或者可以增加到两个部，如同今年冬天我孙子开始自愿去走访外交部和财政部那样，从新年开始这种走访可定为必行，或许换上一个内务部，并且在某些个别的sanglanten[22]事件中让我孙子去熟悉外交部的事务。现在这种
269 做法的延续可能对我儿子的刺激会小些，尽管您记得，即使对这种作法他也是激烈反对的。

请告知您在这方面的意见。

祝您们大家节日愉快。

您的满怀谢意的

威廉

---

① 出版者补充。——德文本注

② 当皇帝写到“一个代理人”这一句话时显然出现过忧虑。——德文本注

随信附去的委任状，在转达之前，请您副署。

威廉

我很少收到奥古斯塔皇后的信。她在草拟最后一封信时，大概跟我读这封信时一样，想起了我同她之间的斗争，内容如下：

口授写成。　　巴登——巴登，1888 年 12 月 24 日

亲爱的侯爵！我给您写这几句话，只是想在严重的一年即将过去的最后时刻，表示我的感激之情。您曾忠实地为我们永志不忘的皇帝服务，并履行了我要求您关照他的孙子的请求。在艰难的岁月您对我表示了同情，因此在今年结束之前我认为有责任再次向您表示感谢，同时还期望今后在我们这个变幻莫测的动荡年代能继续得到您的帮助。我打算在同家人团聚的宁静之中庆祝新年，向您和您的夫人致以友好的问候。

奥古斯塔

签名是亲笔写的，但同皇后以前所特有的刚健的笔锋很不一样。 270

272

第三十三章　弗里德里希三世皇帝

曾经广为流传过一种误解，认为威廉皇帝的政府由弗里德里希皇帝的政府所接替必然和大臣更迭以及为我指派继承人联结在一起。1848 年夏天我第一次有机会同当时年仅 17 岁的王储相识，并且有迹象表明，我获得了他本人的信任。在 1866 年以前这种信任偶尔有过动摇，但 1863 年在加施泰因处理但泽事件[1] 时，这种信任却公开证实是坚定的。在 1866 年战争时期，特别是在同国王和高级军官们关于在尼科尔斯堡签订和约的时机的争论时，王储不理会政治原则和观点上存在的分歧意见，依然信任我，对此我感到很高兴。有人企图从各个方面、包括从极右方面，动摇这种信任，并为此目的制造了各种借口和谎言，然而，其成效都转瞬即逝。从 1866 年以后，王储和我之间只要进行一次私人恳谈，那些借口和谎言便会烟消云散。

1885 年，当威廉一世的健康状况引起了人们的严重忧虑时，王储把我召到波茨坦并且问道：如果王位更迭，我是否将继续留任。我声明我准备这样做，但有两个条件：不允许议会统治，政策上不受任何外来的影响。“不用担心!”王储一边回答，一边作了个相应的手势。

从他夫人那儿我不能期望得到这样的赏识。她对她的祖国[2] 所怀抱的那种自然的与生俱来的热烈感情从一开始就表现为竭力

使普鲁士—德意志对于在欧洲结成各种集团的重大影响之作用有利于她的祖国，而她从未有过一刻不认为英国是她的祖国。意识到英国和俄国这两个欧洲强国的利益不同，她力图在它们两国一旦决裂之时为了英国的利益而利用德国的力量。由于这种国籍不同而产生的不同意见，皇后陛下和我曾不止一次就东方问题，包括巴滕贝格[3]问题在内，进行过辩论。她对她的丈夫的影响一直很大，并且与时俱增，在她丈夫当皇帝期间，这种影响达到了顶点。然而连她也确信，为了王朝的利益，在更换君主时我应该留任。 273

我不打算驳斥每个奇谈和恶毒的谎言，况且这也是办不到的。当时有一种传说：王储在1887年从埃姆斯返回后签署了一个文告，内中声称：如果他的寿命比他父亲长，他将为了威廉亲王而放弃统治。这种传说竟写进了英国一本有关威廉二世皇帝的书中。在这里我可以证明，此事在历史上连一点真实的影子都没有。还说什么一个患有不治之症[4]的王位继承人，根据我们的王室法律没有资格继承王位，1887年有些人就这样断言，而另一些人则信以为真。这同样是无稽之谈。无论王室法令，还是普鲁士宪法条文，都没有这样的规定。但是涉及国家法治的一个问题确实一度使我不得不干预病人的治疗，而且当时病人的病情涉及到了医学。1887年5月底，几位主治大夫决定对王储施行麻醉和摘除喉头手术，而事先并不将他们的意图告诉病人。我提出异议，并坚持只有得到病人的同意后才能这样做，又因为事关王位继承人的问题，所以还必须征求家长的同意。皇帝经我报告当即谕示，没有征得他儿子的同意不得做手术。

在弗里德里希皇帝在位的短暂时期中，我同他发生过不多几

次争论，其中我只追述与研讨帝国宪法有关的一次争论。早年我曾参与制订这一宪法，并于1890年3月再次参与此事。

弗里德里希皇帝倾向于不赞成把帝国和普鲁士立法机构的有效期限从三年延长至五年。在论及帝国议会时，我对他解释说，皇帝本身不是立法因素，他仅仅作为普鲁士的国王通过普鲁士的投票权才能对联邦会议施加影响。帝国宪法并没有赋予他否决两个立法机构所作的一致决议的权利。这一解释本来足以促使皇帝
274 陛下签署颁布1888年3月19日帝国法令[5]的文件。

对于陛下提到普鲁士宪法在这方面有什么规定的问题，我只能回答说，国王像邦议会两个议院中的每一个那样，享有批准或否决法律草案的权利。于是国王陛下便暂时拒绝签字，留待以后决定。这样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呈请国王批准法令的内阁该怎么办？我坚持并得到内阁的同意，暂时不同国王争论，因为国王是在行使他那无可争辩的权利；因为法律草案是在王位更换之前提出的；最后因为我们应该避免因内阁危机而加剧由君主患病引起的本来就够困难的局面。事情是这样结束的：5月27日国王陛下主动给我发来的文件中也有这项有他签字的普鲁士法令。

在实际生活中，人们习惯于把宰相看作应对帝国政府的整个立场负责。但这种责任只有在下述情况下方可说是适宜的，即承认他有权以拒绝副署的方式搁置皇帝交下的文书，因为各邦政府的法律草案（第16条）就是通过皇帝的这种交下的文书转达帝国议会的。宰相本人假若同时不兼任普鲁士出席联邦会议的全权代表，根据宪法条文，他甚至无权亲自参加国会辩论。假若他如迄今为止那样同时持有出席联邦会议的普鲁士的委任状，那么根据第9条他便有出席国会和随时发言的权利；而作为这样的帝国宰

相本身，宪法中没有一条规定赋予他这种权利。这样，假若不论普鲁士国王或联邦的任何其他成员都不授予宰相在联邦会议作为全权代表，那么宰相就没有参加国会的宪法依据；虽然根据第15条宰相主持联邦会议，但没有表决权，而且普鲁士的代表和其他各邦的代表一样都不从属于他。

依据现存的规定，宰相的责任限于实施皇帝的行政权力，这些规定还剥夺了他出席国会和参加讨论的职权，更谈不上义务了。很显然，如果改变这种现存的规定，那就不仅仅是改变一种形式，而且也会在实质上改变我们社会生活诸种因素的重心。对于这样的可能性是否应该加以探讨的问题，在那个时期已摆在我们的面前；那是在1884年12月，当时我所面对的是由各种不同分子联合组成的国会多数派——社会民主党人、波兰人、韦尔芬 275
党人、来自阿尔萨斯的亲法分子、自由主义的隐蔽共和党人，间或还有在宫廷、国会和报界的心怀不满的保守党人——也就是不同意给外交部副大臣拨款的那个联盟。面对这一反对派，我在宫廷以及在国会内外获得的支持不是无条件的支持，也免不了有心怀不满和敌对的钻营家的合作。我在几年里虽然对这一问题的紧迫性的看法变化不定，我仍一直在思考并同其他人讨论这一问题：我们所取得的这种程度的民族统一，为了使它有一种安全地位，是否需要一种不同于现行的从过去继承下来并通过多次事变以及同各届政府、国会妥协而发展了的形式。如我所认为的，当时我还在公开讲演中暗示说，如果国会超越君主体制的范围，给普鲁士国王行使皇帝职权带来困难，那么国王将被迫更为强烈地依赖普鲁士王位和宪法所赋予他的权力支柱。在制订帝国宪法时我曾担心，对我们民族统一的威胁首先是来自王朝分立

主义这种危险，因此我抱定宗旨，要以诚实和友好的态度尊重各王朝享有的合乎帝国宪法的权利，以取得各王朝的信任。我还感到满意的是，特别是一些杰出的德意志王朝在他们的民族意识和各自的需求方面都得到了满足。我始终认为鼓舞威廉一世皇帝对各盟邦的荣誉感是对于政治上的需要的一种理解，而这一理解最终是比强烈的王朝情感更为重要的。

另一方面我期望在共同的公共机关，即在帝国国会以及财政部门中建立维系手段，这些财政部门是以间接税和专卖权为基础的，这种专利的收入款项只能在持久的和巩固的联系中才能得到。我希望这种维系手段能有足够的力量对抗个别邦政府的离心倾向。尽管我不得不同在国会、宫廷和保守党及其“发言人”中所表露的恶意作斗争，但直到七十年代末我还不相信我在这方面
276 就弄错了，即我对各王朝的民族感情估计不足而对德意志的选民或国会的民族感情估计过高。现在我要请求各王朝原谅。各党派领袖们该不该对我认错，历史总有一天会作出裁决的。我只能提供证明，给我们的前途带来危害的过错应归咎于国会各党派，不论他们中的消极分子还是控制着自己的追随者及其表决权的野心家们，他们的罪愆比他们自己所意识到的还要严重。科里奥兰[6]说过：“滚回家去吧，你们这些流氓。”只有中央党的领导我不能称之为无能，然而它打算破坏它所不合意的具有新教帝制政体的德意志帝国；中央党领导在选举和投票时接受任何一个对他本来怀有敌意的、但是最近在相同的方向上进行活动的党派的支持。这类党派不仅有波兰人、韦尔芬党人、法兰西人，而且还有自由思想党人。有多少成员是有意识地反对帝国，有多少成员又是由于头脑不清醒才反对帝国，则只有领袖们才能够判断。文特

霍尔斯特在政治上是个能忍让的人，又不信教，只是偶然事件和官僚主义的笨拙才把他推入了敌对阵营。虽然如此，我仍然希望，在战争时期民族情感总会高涨起来，达到足以戳穿谎言的高度，而这些谎言则是党派领袖、逐名求利的演说家和党派报纸善于在和平时期用来笼络民众的。

如果人们想起中央党拥有反对皇帝和各邦政府的稳定而强劲的多数的那个时候，这个党它依靠的主要不是教皇，而是耶稣会、韦尔芬党人，而且还不仅是汉诺威的韦尔芬党人，还有波兰人、亲法国的阿尔萨斯人、人民党成员、社会民主党人以及自由思想党分子和分立主义分子。中央党所依靠的这些人都只是由于对帝国和帝国的王朝的仇视才在那个文特霍尔斯特本人的领导下联合起来的，而文特霍尔斯特在生前与死后都被列为民族圣人。想起那个时期，那些凡是熟谙当时形势和来自西方和东方的威胁的人，都会认为对于结局负有责任的帝国宰相很自然地考虑去对待可能的外来干涉和这种干涉同国内危机的结合、同这样一种独立性的危机的结合；波希米亚战争时对于这种独立性没有取得一致意见，甚至是与各种政治潮流相矛盾的。

为了弗里德里希皇帝，也为了我之故，我从他的私人信件中公布一封信，很能说明他的见解及其文字上的表达，同时借以消除所谓我是“军队之敌”的传说。

夏洛滕堡，1888 年 3 月 25 日

277 亲爱的侯爵，今天我和您一起纪念您献身军队五十周年纪念日，感到由衷的高兴，因为一位当时的近卫猎骑兵能够以多么欣慰的心情来回顾已往的半个世纪。今天我不想多谈

使您的名字和我国的历史永远联系在一起的国务活动家的功绩。但是有一点我必须强调：每当需要完善军队的给养、防卫力量及其作战能力的时候，您总是当仁不让地为之奋斗和实施。因此，军队和在那位为军队的利益而不倦地操劳的人逝世后接任其职务仅几天的统帅感谢您为它争得的许多福利，并对此永志不忘。

您的诚挚的弗里德里希

注　释

第十九章

1　事实不准确：是从1854年起。

2　丹麦问题是指丹麦与德国之间关于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施坦归属问题上的争议。从十八世纪末开始，丹麦的历代国王不断地试图直接管辖两地以代替丹麦与两公国之间的君主国体制。根据维也纳会议（1814—1815）的决议，霍尔施坦（以及劳恩堡）仍归丹麦所有，但与什列斯维希不同，霍尔施坦当时已加入德意志邦联。十九世纪上半叶，在两公国中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的德意志居民展开了反对丹麦政权的斗争。这场斗争是与争取统一德国的整个运动联系在一起的。在表面上，这场斗争和关于王位继承权的争论交织在一起。按照丹麦的法律，在没有男性继承人时，王位就按女性谱系往下传。然而霍尔施坦的继承权却是按照男性谱系往下传的，哪怕传给旁系亲族亦可。1848年王位继承问题特别尖锐起来。这一年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八世去世了，身后只留下独子弗里德里希七世。克里斯蒂安八世死后不久，欧洲兴起的革命也传到了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在两公国中成立了以奥古斯滕堡亲王为首的临时政

府；根据霍尔施坦的继承权，他曾觊觎公国王位。临时政府宣布两公国加入德意志邦联。由此爆发的普鲁士与丹麦的战争以签订1850年7月2日的柏林和约而宣告结束。在包括沙皇俄国在内的各列强的压力下，普鲁士被迫同意在两公国恢复战前的局势。制定了丹麦和两公国共同的王位继承法。根据这一继承法，按照丹麦的坚决主张，承认了克里斯蒂安·格吕克斯堡为王储。1852年英国、俄国和法国根据所谓5月8日的伦敦议定书承认了丹麦对两公国的统治。1863年11月13日丹麦通过的宪法规定什列斯维希完全并入丹麦。随着弗里德里希七世之死（11月15日），丹麦王族的主系中断了。弗里德里希九世·格吕克斯堡成为丹麦国王。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则承认弗里德里希八世·奥古斯滕堡为自己的大公。奥地利和普鲁士按照1852年的伦敦议定书要求奥古斯滕堡亲王退位，随即又在1864年1月向丹麦提出了关于废除不久前才通过的宪法的最后通牒。丹麦的拒绝引起了战争。战争以签订1864年10月30日的维也纳和约而结束。根据这一和约，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成为普鲁士和奥地利的共有领地。普鲁士政府成立的委员会曾确认，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的历史继承权属于丹麦国王，而不属于奥古斯滕堡家族，但是普鲁士和奥地利却靠战争获得了这一权利。根据1865年8月普鲁士与奥地利之间签订的加施泰因协定，霍尔施坦归奥地利管辖，而什列斯维希则归普鲁士管辖。一年以后，1866年，关于两公国的问题又成了奥普战争的导火线。

3 安东·冯·施梅林（1805—1893）曾任奥地利国务大臣，即1860年12月到1865年7月的奥地利政府的首脑。

4　1863 年奥地利提议改革德意志邦联，目的在于大力加强奥地利在德意志各邦中的作用。为此，根据奥地利的倡议，于 1863 年 8 月 17 日在美因河上的法兰克福召开了德意志各邦君主大会。由于俾斯麦的坚定主张，普鲁士国王拒绝参加大会。在普鲁士拒绝参加代表大会的邀请以后，其他与会者都采取了审慎的立场。结果奥地利在与普鲁士争夺德意志霸权的斗争中的又一措施惨遭失败。

5　1850 年 10 月 11 日在奥地利的布雷根茨城举行了奥地利皇帝与巴伐利亚国王以及符腾堡国王的会晤，他们决定联合反对普鲁士所企求的“联盟”。

6　1859 年 11 月在巴伐利亚的符茨堡举行了德意志中小邦代表会议。会议制定了改革以奥地利为首的德意志邦联的方案；这个方案没有实行。

7　“一年之前”，即 1862 年。这里指的是 1862 年到 1866 年普鲁士政府和议会之间的“宪法冲突”。冲突的导因始于 1859 年的军事改革，改革的内容包括把服兵役的期限延长到两年。(详见第一卷第十四章)。

8　1863 年波兰起义期间，普鲁士是唯一坚决支持沙皇政府的欧洲强国。根据 1863 年 2 月签订的“阿尔文斯累本协定”，普鲁士有义务给予俄国军事援助以镇压起义。普鲁士必须在整个东部边界集结军队，军队有权在必要的情况下越过俄国边界；俄国军队也同样有权越过普鲁士边界以追击波兰起义者。协定实际上没有实行。

9　卡尔·亨利希·路德维希·普福尔滕男爵（1811—1880）是巴伐利亚驻法兰克福邦联议会的公使，科堡是恩斯特第二，萨克

森·科堡·哥达公爵（1818—1893），都是反对普鲁士的二等德意志邦国的代表。

10 运动党，即进步党，是1861年成立的普鲁士资产阶级左派政党，坚决反对俾斯麦的政策。进步党人的基本要求是：普选权、责任内阁制、每年批准军队数额。1866年该党分裂：一部分采用民族自由党的名称，支持俾斯麦的对外政策；另一部分在德意志帝国建立后还仍然采取反对俾斯麦的立场。

11 指1848年到1849年的革命时期，黑森的政治家、德意志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主席亨利希·威廉·加格恩男爵（1799—1880）提出的，依据帝国宪法和以称帝的普鲁士国王为首统一德国的方案。拟定的帝国不包括奥地利，仅限于和它结成紧密的联盟关系，1859年奥意战争以后加格恩改变了自己的立场，开始投靠奥地利。

12 即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大公。

13 指整个德意志，即所有德意志邦国。

14 即奥地利。

15 弗里德里希·斐迪南·博伊斯特伯爵（1809—1886）是当时萨克森的首相。莱因哈德·达尔维克男爵（1802—1880）曾任黑森大公国的首相、外交大臣和内务大臣。这两人像上面提到的普福尔滕和科堡一样，都是敌视普鲁士的德意志邦国的政治家。

16 指拿破仑法国崩溃以后在维也纳召开的欧洲国家代表会议（1814年11月—1815年6月）上所通过的决议。会议制定了在欧洲统治了几十年的反动政治制度的原则。会议以德意志邦联这一组织固定了德国在领土上和政治上的分裂状

态。在谈到“对于许多诸侯的不公平”等情况时，俾斯麦指的是许多执政的德意志小邦君主按照维也纳会议决议，被迫把土地转让给了比较大的邦国而遭受的损失。

17　鲁道夫·冯·叙多夫是普鲁士驻法兰克福邦联议会的公使。

18　哥尔茨对这封信的复信及页边上附有的俾斯麦的批语刊于《俾斯麦年鉴》第5卷第238页及下页。

19　丹麦国王弗里德里希七世死于1863年11月15日。

20　巴克斯是希腊和罗马神话中的酒神（希腊人一般称作狄奥尼斯）。

21　弗里德里希·奥古斯滕堡亲王的父亲克里斯蒂安公爵（1798—1869）依照1852年列强伦敦会议的决议（见注释2），被迫根据1852年12月30日的移交书以二百二十五万普鲁士塔勒的代价，把自己的领地转让给丹麦政府。移交书包括下列条款：对于以女性谱系传位的丹麦法规为基础的王位继承法，克里斯蒂安不得阻挠。上述继承法使克里斯蒂安·格吕克斯堡在后来（1863年）登上丹麦王位。被迫签订的移交书的效力是有争议的。公爵的兄弟和儿子弗里德里希王储，以专门抗议书的形式捍卫自己的权利。1863年弗里德里希七世死后，克里斯蒂安·奥古斯滕堡于1863年11月16日和12月25日两次下逊位诏书，把自己对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的全部权力让给觊觎弗里德里希八世王位的长子。

22　1865年2月，普鲁士向从前曾由邦联议会推荐并在当时得到奥地利和普鲁士支持的丹麦王位追求者奥古斯滕堡亲王提出了建立独立的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邦的条件以及在它加入德意志联邦的情况下承认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公爵的主权

的条件。这些条件规定了普鲁士的一系列特权。这样一来，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就和普鲁士结为牢固的攻守同盟；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的军事力量归普鲁士支配，而海军则加入普鲁士的海军编制。在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的领土上普鲁士获得一系列战略据点。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永远加入普鲁士的关税体系，邮电机构也合而为一。

23 路德维希·冯·格尔拉赫（1795—1877）是列奥波德·格尔拉赫将军的弟弟，反动的《十字报》的创始人之一。俾斯麦称他为院长，是就格尔拉赫担任马格德堡法院院长时的官方地位而言。

24 1850 年 11 月 29 日在奥尔缪茨城（摩拉维亚）普鲁士、俄国和奥地利三国缔结了一项协议。在俄国的压力下，普鲁士被迫放弃了把德意志统一于自己霸权之下的尝试，并同意恢复于 1848 年中断了的邦联议会。

25 “新纪元”指由霍亨索伦·西格马林根公爵领导下的内阁在普鲁士执政的时期。这个内阁成立于与确立威廉亲王（未来的普鲁士国王和德国皇帝威廉一世）为摄政的 1858 年的同一年，执政到 1862 年“宪法冲突”时为止。

26 丹麦战争是指 1864 年普鲁士和奥地利反对丹麦的战争。俾斯麦把 1866 年的奥普战争称为波希米亚战争，因为战争的军事行动是在波希米亚的领土上展开的。

27 杜佩尔是什列斯维希的一个村庄，也是普鲁士军队于 1864 年 4 月 18 日占领的一个戒备森严的阵地。阿尔森是小贝耳特海峡中的一个岛屿，1864 年战争时期丹麦人的一个重要军事基地，1864 年 6 月 29 日被普鲁士军队占领。阿尔森岛陷落后，

丹麦政府于1864年8月1日被迫签订了预备和约。根据这一和约，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和劳恩堡割让给普鲁士和奥地利。

28　指1866年奥普战争。

29　1721年由于丹麦的掠夺，奥古斯滕堡公爵丧失了领地；1852年奥古斯滕堡公爵放弃了自己的领地（参看注21）。

30　依照1814年到1815年维也纳会议的决议，丹麦国王作为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的统治者加入了1815年成立的德意志邦联。所以在驻德意志邦联唯一的共同机构邦联议会的德意志各邦的公使中，也有丹麦的代表。

31　更为正确的应是1864年1月2日和3日。

32　德国亲王亚历山大·巴滕贝格（1857—1893）于1879年在俄国政府的协助下被立为保加利亚国王，并借助俄国将军们的势力进行统治。人们对他在保加利亚的政策产生了不满情绪，在这种影响下，他不得不改变政策，于1883年恢复了被他在两年前废除的宪法。在俄国政府的压力下，亚历山大·巴滕贝格于1886年逊位。亚历山大·巴滕贝格在德国的某些人士中颇得好感。俾斯麦认为，对亚历山大·巴滕贝格和波兰民族解放运动（俾斯麦称之为波兰主义）表示同情是不符合德国利益的。

33　歌德悲剧《浮士德》中的引文，第一部第二场。

34　俾斯麦把以摩里茨·贝特曼·霍尔维克（1795—1877）为首的一伙接近奥古斯塔王后的人称作野心勃勃的贝特曼—霍尔维克党。摩里茨·贝特曼·霍尔维克是个有时候倾向于迎合自由党人的政治家。俾斯麦不仅是按照通用的意义，而且还照

宫廷官员党派和别的党派的意义来使用“派”和“党”这些术语的。

35 《周报》党是指1851年到1861年聚集在柏林出版的极温和的自由主义的机关刊物《普鲁士政治时事评论周报》周围的一些人。

36 指1866年6月11日发表的拿破仑第三在写给外交大臣的信中所作的纲领性声明。

37 阿尔伯特·伯恩施托尔夫伯爵（1809—1873）是出席1864年5月伦敦代表会议的普鲁士代表。在这次会议上，列强由于担心普鲁士和奥地利力量的增强，在丹麦战争时期对调停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问题作了毫无成效的尝试。

38 普鲁士和奥地利反对丹麦的战争以1864年10月30日签订维也纳和约告终。

39 1865年8月14日至20日普鲁士与奥地利在加施泰因（奥地利的疗养地）签订了瓜分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两公国管理权的协定。这两个公国是他们依照1864年10月30日与丹麦签订的和约而获得的。按照上述协定什列斯维希归普鲁士管理，而霍尔施坦则归奥地利管理。基尔城成了邦联的港口。小公国劳恩堡完全归附普鲁士，为此普鲁士向奥地利付出二百五十万丹麦克斯达勒。

40 科布伦茨是位于莱茵河和摩泽尔河汇合处的普鲁士莱茵省的主要城市，那时候它主要是奥古斯塔王后的府邸。

41 英国女王维多利亚的女儿也叫维多利亚，1858年嫁给普鲁士王后奥古斯塔的儿子弗里德里希王储（未来的普鲁士国王和德国皇帝弗里德里希三世）。

42　魏玛是萨克森—魏玛—埃森纳赫大公国的主要城市。巴登是巴登大公国的主要城市。

43　古斯塔夫·布洛姆伯爵（1829—1906），奥地利外交家，于1865年领导了谈判并参与签订加施泰因协定。

44　萨尔斯堡是奥地利的一个省，加施泰因就位于这个省的主要城市萨尔斯堡附近。

45　卡尔·韦尔特尔男爵（1809—1894），普鲁士驻维也纳公使，1864年10月30日以奥地利和普鲁士为一方同以丹麦为另一方在维也纳签订和约时，他是普鲁士的全权代表。

46　拉策堡是一座有古代城堡的城市，劳恩堡诸公爵的府邸。

47　指拍卖1848年革命后开始建立的全德国的舰队舰只问题。1851年恢复的邦联议会在1852年委托奥尔登堡的枢密顾问汉尼拔·费舍拍卖船只。

48　参看1865年6月1日的讲话，见《政治演说集》，Ⅱ，356（第二版第374页）。

49　参看普卢塔克著《恺撒传》，第十一章。

50　指962年建立的日耳曼—罗马帝国初期皇帝时代发生的巴伐利亚、弗兰克尼亚等地公爵举行的地方起义。这些起义旨在反对德意志的中央集权。

51　帝国诸侯、帝国城市、帝国农村、天主教修道院、骑士都直接由德意志—罗马帝国皇帝管辖，而不受帝国个别诸侯管辖。他们享有许多重要权利，在帝国议会有发言权等等。

52　雇佣兵队长是中世纪意大利的雇佣军官。他们带领自己的军队有时受意大利的这一城市或公爵雇佣，有时受意大利的另一城市或公爵雇佣。

53 保守党人（“德国保守党”）和自由保守党人（“帝国党”）是十九世纪后半叶和二十世纪初的德国政党。1866 年自由保守党人脱离保守党人。保守党人多半是东普鲁士占有土地的大贵族。他们在萨克森的地主、南德意志的富裕农民和部分破产的小手工业者中间以及在福音教派中有影响（其中央机关报《十字报》即由此而来）。自由保守党人依靠西里西亚的大地主和企业主，此外，追随他们的还有部分官吏和军官。由于在社会基础方面的区别如此微不足道，自由保守党人反对保守党人的斗争以及前者与后者的分裂不可能具有深刻的原则性质。他们的分裂是由于建立北德意志联邦和 1866 年的战争造成普鲁士合并领土等问题引起的。自由保守党人与保守党人的分裂，只是使自由保守党人放弃了反映在《十字报》中的反对俾斯麦的右倾反对立场。

54 《十字报》是《新普鲁士报》的通用名称。该报报头上刊印着铁十字架的图形，是保守党的中央机关报，于 1848 年在柏林创刊。

55 引自《新约》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十二——十三节。矶法和保罗是圣徒。俾斯麦所提到的一小段是圣徒保罗的一封信：“我的意思就是你们各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矶法的，我是属基督的。基督是分开的么？保罗为你们而钉在十字架的么？你们是奉保罗的名受了洗么？”

56 1866 年 6 月 1 日奥地利声明，它把它与普鲁士的争执交由邦联议会审查。普鲁士宣布这和加施泰因协定相矛盾，便用强力把奥地利军队从霍尔施坦赶了出去。6 月 10 日俾斯麦向德意志各邦政府散发了德意志邦联改革方案，其中占第一位的

问题就是把奥地利开除出邦联。6月14日奥地利要求由邦联议会向普鲁士宣战，因为后者违反了加施泰因协定。于是普鲁士宣布德意志邦联解散。与奥地利结盟的中等德意志各邦支持奥地利。普鲁士则占领了汉诺威、萨克森、库尔黑森和拿骚的领土，并出击奥地利。奥地利于6月17日向普鲁士宣战，普鲁士和支持它的意大利于6月18日向奥地利宣战。

57　韦尔芬党人是德意志—汉诺威的法制党，于1866年汉诺威合并于普鲁士之后成立。该党的宗旨是恢复汉诺威王室的权力（汉诺威王室属于韦尔芬人古代德意志氏族的汉诺威分支，该党由此而得名）和汉诺威在德意志邦联中的独立作用。

58　根据欧洲国家维也纳会议（1814年—1815年）的决议，德国的版图遭到根本性的改变。普鲁士的领土由互相隔绝的两大部分组成：汉诺威和库尔黑森的土地把威斯特伐利亚和莱茵省同其他普鲁士领土分隔开。俾斯麦谈到关于不利的版图，指的就是这种分隔状态。俾斯麦论及“普鲁士得到的‘这种’报酬”，是为了追忆普鲁士在与拿破仑的斗争中所建立的功劳。

59　在七年战争（1756—1763）中汉诺威与库尔黑森站在普鲁士一方。

60　阿道夫·普拉滕·哈勒蒙德（1814—1889）是汉诺威的外交家。

61　位于普鲁士威斯特伐利亚东北部的明登州与汉诺威的领土接壤。

62　卡塞尔是黑森—卡塞尔选帝侯的府邸。

63 《汉诺威王国陆军少将达默尔生平回忆》，汉诺威，海尔文出版社，1890 年，第 94—95 页。

64 比阿利茨是法国的疗养地，位于比斯开湾海岸，当时拿破仑第三正在此地。

65 济贝尔著《德意志帝国的建立》，第三卷，第 337 页及下页。

66 卡尔·卢齐安·萨姆韦尔（1819—1882），是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的政治活动家、法律家和记者，弗里德里希·奥古斯滕堡公爵的顾问。

67 于 1 月 16 日由莱希贝格（奥地利）和韦尔特尔（普鲁士）签订。

68 伦茨堡是埃得河上的要塞，位于未来的基尔运河地区。

69 德意志关税同盟，建立于 1834 年，除了奥地利外，几乎包括了所有的德意志邦国。这个同盟实际上是处于普鲁士霸权的控制之下。

70 济贝尔著《德意志帝国的建立》，第三卷，第 337 页及下页。

71 普法战争时期，在色当战役中普鲁士军队于 1870 年 9 月 1 日打败法国军队，拿破仑第三和军队一起被俘。

72 从北海到波罗的海的运河，即基尔运河，1895 年开航时被正式命名为威廉皇帝运河，流经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施坦的领土。1887 年到 1895 年开凿成功，具有很大的战略意义。

73 即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初期。

74 《毛奇演说集》，《全集》，第七卷，第 25 页及下页。

75 即 1866 年奥普战争和 1870 年至 1871 年的普法战争时期。

76 沙地是分布于北海德国沿岸广阔的地势略高的沙质荒地的名称。

77　即1890年德国从英国获得赫尔果兰岛之后。

第二十章

1　大本营是军队的最高统帅及其所属全部机关和人员的名称。

2　赖兴贝格（捷克的利贝雷次）是波希米亚的一个城市。

3　1866年7月3日在波希米亚的凯尼希格勒茨城堡附近，普鲁士军队取得了对奥地利—萨克森联军的重大胜利。凯尼希格勒茨之役（亦称萨多瓦之役，因凯尼希格勒茨附近一小村名称而得名）决定了普奥战争的结局。

4　霍日茨（捷克名霍日采）是波希米亚的一个小地方。

5　威尼斯省是奥地利在意大利的最后一块大领地。1866年7月4日凯尼希格勒茨战役失败之后，奥地利为了遏制意大利对其采取的军事行动，希望得到拿破仑的协助，因而建议把威尼斯省割让给拿破仑。拿破仑又应将其归还意大利。但是，意大利已于1866年4月8日与普鲁士结成同盟，所以拒绝了关于停战的建议，意大利军队于7月8日开进了威尼斯省。

6　奥地利将军冯·加布伦茨在奥地利军队于凯尼希格勒茨失败后同普鲁士大本营举行了关于签订停战协定的谈判。

7　1814—1815年维也纳会议之后建立的德意志邦联包括了全部德意志邦国，其中也包括南德意志诸邦——巴伐利亚、巴登、符腾堡和黑森·达姆施塔特。当德意志邦联不复存在时，这些邦国未加入1866年建立的北德意志联邦。在谈到普鲁士未来的盟友时，俾斯麦指的是北德意志联邦成员各邦国。

8 大本营于7月18日转移到尼科尔斯堡。这个问题最初不可能在尼科尔斯堡向毛奇提出来。毛奇回答的内容与他在1866年8月8日给俾斯麦的信中所述内容一致。此信促使俾斯麦建议国王建立匈牙利军团。7月14日便发布了关于此事的命令。请参看冯·莱托夫·弗尔贝克的《1866年战争史》第二卷，第597页。

1866年7月26日在尼科尔斯堡缔结了预备和约，同年8月23日在布拉格缔结了最后的和约。

9 即支持匈牙利和捷克反对奥地利政府的民族斗争。

10 即应奥地利的请求抗击普鲁士的德意志邦联军队。

11 佛罗里达斯多夫村，现为维也纳市区，在1866年奥—普战争时曾被当作桥头堡。奥地利人在凯尼希格勒茨溃败后，驻扎在意大利的阿尔布雷希特大公的部队曾被调往佛罗里达斯多夫。但在佛罗里达斯多夫未发生战斗。

12 普累斯堡（布拉迪斯拉发）是莫拉维亚境内的一个城市，普累斯堡和维也纳之间是马赫菲尔特平原。

13 第一次西里西亚战争是在1740—1742年间进行的，第二次西里西亚战争是在1744—1745年间进行的，第三次西里西亚战争通常称为七年战争（1756—1763年），战争结果西里西亚仍归普鲁士所有。

14 指莱茵河一带的领土。7月26日法国大使贝内代蒂要求俾斯麦割让这些地区，以作为法国同意普鲁士大幅度扩张其领地的补偿。

15 拿破仑第一曾两度占领维也纳：一次是从1805年11月到1806年1月，一次是从1809年的5月到10月。

16　参看冯·济贝尔著《德意志帝国的建立》一书第五卷第220页，根据国王的亲笔记录。这里还提到下列要求：由奥地利赔偿军费和承认普鲁士对于继承不伦瑞克王位的要求；在应移交的地区中未提到奥地利的西里西亚。此外，普鲁士反对承认汉诺威国王乔治五世为不伦瑞克公国的继承人，乔治五世是普鲁士的死敌。1866年在不伦瑞克发生了王位继承权问题。由于当时年迈的威廉公爵的去世，应当终止不伦瑞克·沃尔芬毕特尔一系，按古代传下来的规矩，应由氏族中最后一位公爵的最近的亲属即位。

17　安斯巴赫公国和拜罗伊特公国在中世纪加入法兰克尼亚公国，从十四世纪起归属勃兰登堡选帝侯（勃兰登堡边疆侯国后来并入普鲁士王国，而勃兰登堡的诸边疆行政长官于十八世纪初先后当了普鲁士的国王）。1791年12月，安斯巴赫—拜罗伊特边疆侯将两个公国让给了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普鲁士于1806年被迫将该两公国移交拿破仑，拿破仑又把这些公国让与巴伐利亚（安斯巴赫是在1806年让与，而拜罗伊特是在1810年让与的）。根据1815年维也纳和约，这些公国仍为巴伐利亚国王的领地。

18　在1792—1800年间卡尔·奥古斯特·哈尔登贝格公爵以普鲁士大臣身份管辖过安斯巴赫和拜罗伊特两公国。

19　当时任巴伐利亚议会主席和邦联议会公使的路德维希·普福尔滕曾是一个法学教授。

20　莱茵联邦是拿破仑第一于1806年创立的，它包括巴登、符腾堡、巴伐利亚以及南德意志和西德意志的其他一些邦。萨克森、威斯特伐利亚和另外六个邦于1807年加入莱茵联邦，许

多德意志小邦被联邦成员国瓜分。拿破仑被称为莱茵联邦的保护人。这一联邦完全在法国势力控制之下，实质上它已是德国境内的法国藩属。莱茵联邦于1814年解体。

21 弗里德里希·卡尔是普鲁士亲王（1827—1885）。

22 阿洛伊斯·卡罗利伊伯爵（1825—1889），是奥地利驻普鲁士大使，曾在尼科尔斯堡主持会谈。

23 指靠近普鲁士—西里西亚边境的布劳瑙。

24 马赫菲尔特是大平原，维也纳就位于此平原上。

25 布卢美瑙是奥地利境内普累斯堡西北方向的一个村庄。1866年7月22日普鲁士军队进攻维也纳时，一支由弗兰泽茨基将军率领的普鲁士部队与蒙代尔的奥地利旅在该村附近进行了一场战斗。在该地区，直至当天十二点签订停战协定时，普鲁士人还未能取胜。

26 这时普鲁士大本营设在莫拉维亚的小镇茨维陶。

27 冯·莱托夫·弗尔贝克（《1866年战争史》第2卷第636页）认为这些资料与贝内代蒂7月15日的报告不符（《我在普鲁士的使命》第186页及下页）。他忽略了俾斯麦在此谈的只是谈判的最后阶段，当时贝内代蒂保证可望法国同意普鲁士在德国境内的兼并。布卢门塔尔在7月24日的信中（《日志》第47页）也同样把增加四百万居民以及在北德意志联邦的霸权视为有保障的战利品。俾斯麦在其发给哥尔茨的电报中在放弃普鲁士对于南德的霸权的情况下把这一点作为普鲁士的要求提了出来（济贝尔：《德意志帝国的建立》第5卷第277页）。7月18日贝内代蒂从维也纳返回尼科尔斯堡，他转达了拿破仑对这一要求的同意。

28　俾斯麦利用对奥地利的胜利来消除同普鲁士邦议会的冲突。8月5日开幕的邦议会以相当的多数通过一项决议，解除了俾斯麦对不经法律批准预算就开支经费、改编和扩充军队一事的责任。

29　指弗·席勒的三部曲《华伦斯坦》中的一个人物。三部曲的主人公，阿尔布雷希特·华伦斯坦（1583—1634），是三十年战争时期奉行不依附于皇帝的独立政策的著名统帅。投奔他的奎士登贝格侍臣在华伦斯坦营房里听到这样的讽刺话：

> 我荣幸地向大家介绍：
> 这是侍御兼军事枢密官奎士登贝格，是钦差大臣，
> 是军人的大拥护者和恩人。
>
> （全体均沉默着）（郭沫若译）

30　部分印在冯·济贝尔《德意志帝国的建立》第5卷第294页及下页和冯·莱托夫·弗尔贝克《1866年战争史》第2卷第679页及下页。

31　侵入革命法国边境的普鲁士军队在瓦尔米一带作战后（1792年9月20日）被迫撤退。

32　指奥地利和俄国在巴尔干的矛盾。

33　即普鲁士粉碎奥地利军事力量之后。

34　由于1866年7月26日在尼科尔斯堡签订的预备和约。

35　根据罗马历史学家提屠斯·李维（第5卷，第48页）的记载，这些话是高卢人领袖布来诺讲的；讲话时他把自己的剑扔到称黄金的天平上，黄金是准备献给战胜了罗马人的高卢

人的。这句话成了谚语，其意思是：失败者的命运只得听任胜利者摆布。

36 斯图加特是符腾堡王国的首都。

37 符腾堡国王威廉一世的女儿索菲娅是荷兰国王威廉三世的妻子。

38 俾斯麦从1851年到1859年在法兰克福任普鲁士驻邦联议会公使。

39 意大利战争（奥意战争）是奥地利和撒丁王国于1859年4月29日到6月11日进行的战争，意大利以撒丁王国为中心重新统一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在这一战争中法国站在意大利一边。战后法国得到了萨伏依和尼斯，而意大利的伦巴迪亚地区则从奥地利统治下解放了出来。

40 欧也尼·鲁艾（1814—1884）是法国著名政治活动家，曾任大臣，绰号为“副皇帝”。

41 须德海是北海的一个海湾，深入到尼德兰（荷兰）领土中。这是荷兰语名称。

42 爱德华·德鲁安·德·路易斯（1805—1881），是拿破仑第三时代的法国政治家，外交大臣。根据他的倡议，1866年法国要求普鲁士对于法国在奥—普战争中保持中立态度给予补偿。德国出版家科尔教授指出：“德鲁安·德·路易斯在多大程度上可信是荷兰人，我尚未查明。他生在巴黎，1833年到1836年任法国驻海牙大使馆秘书。”

第二十一章

1 由于1866年的奥—普战争的结果，汉诺威王国、黑森—卡塞尔选帝侯国、拿骚大公国、美因河畔法兰克福自由市和整个

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自此以后都归并于普鲁士。巴伐利亚和黑森—达姆施塔特割让给普鲁士的领土不多。归并以后，普鲁士领土达到3475000平方公里，人口两千四百万。

2　北德意志联邦是普鲁士在1866年战胜奥地利后成立的一个联邦国家。1866年8月10日由22个德意志邦组成的北德意志联邦是在普鲁士霸权支配下德国走向统一的一个重要阶段。北德意志联邦宪法赋予普鲁士在联邦中的领导权，这个宪法后来成为制订德意志帝国宪法的蓝本。随着德意志帝国的建立(1871)，联邦便不复存在。

3　路易·拿破仑（拿破仑第三）曾在巴伐利亚的奥格斯堡市一所中学读过几年书。他的母亲，荷兰王后奥登斯·鲍哈奈和丈夫离婚后便住在瑞士，而让儿子寄居奥格斯堡，因为娶了巴伐利亚公主的、王后的哥哥欧也尼·鲍哈奈在此居住。

4　普鲁士兵役制和其他德意志各邦的兵役制不同之处，是普鲁士1814年的法律已经确立了义务兵役制。从那时起普遍义务兵役制就成了补充普鲁士兵力的依据。和当时实行的雇佣制或强行招募制比较，这种办法保证了兵力每年定期得到补充。

5　南德意志各邦——巴伐利亚、巴登、符腾堡和黑森—达姆施塔特没有参加像北德意志联邦那样的联邦。不过俾斯麦立即和它们之中每个邦都订立了秘密的攻守同盟。

6　克里木战争是1853—1856年间以俄国为一方，英、法、撒丁和土耳其为另一方的东方战争的主要战役。战争的结果是俄国败北，1856年签订了巴黎和约。

7　亦即通常称为1859年奥—意战争的时期。法国军队积极参加了这一战争。

8 指普鲁士和奥地利军队 1792 年侵入革命法国的领土和 1814 年侵入拿破仑法国的领土。1814 年欧洲各国联盟已完成了反拿破仑的斗争。

9 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是十八世纪初以英国和奥地利为首的欧洲各国联合反对法国和西班牙的战争。起因是 1700 年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告终，继而发生了西班牙王位继承权的争论。战争以缔结乌得勒支和约（1713）和拉施塔特和约（1714）告终。参战的还有：战后获得普鲁士国王称号的勃兰登堡选帝侯和著名的奥地利统帅欧根·萨伏依。战争中军事行动有时曾在法国领土上进行。

10 亦即 1866 年同奥地利战争之后归并于普鲁士的地区。

11 从 1839 年起，卢森堡大公国的一半属比利时，而另一半由同时为卢森堡大公的荷兰国王统治。大公国在 1866 年前参加了德意志邦联。德意志邦联解体之后，法国向荷兰国王提出把卢森堡卖给法国的建议。但是普鲁士坚决反对这种做法。普鲁士和法国之间的冲突有演变成为战争的危险。1867 年大国伦敦会议宣布卢森堡永久中立。

12 靠征召应征年龄义务兵的办法。

13 豁免责任法是规定对某一违法行为免于负责的法令。此处是指普鲁士邦议会作出的免除普鲁士政府对预算之外重新装备、改组以及扩充军队花费资金应负的责任。邦议会于 1862 年拒绝，而且以后四年中继续拒绝给予俾斯麦政府军费。正是这个问题成了所谓 1862—1866 年间“宪法冲突”的原因。这一冲突于 1866 年结束。在经过改组的普鲁士军队战胜奥地利后，邦议会通过了豁免责任法的决定。

14　为了在法国帮助下报复1866年普鲁士的打击，奥地利皇帝弗朗茨·约瑟夫采取的步骤之一是和法国皇帝拿破仑第三于1867年8月18日—23日在萨尔茨堡（奥地利城市）进行会晤。

15　1866年10月冯·博伊斯特男爵放弃在萨克森的职位，做了奥地利的外交大臣。在贝尔克莱迪1867年2月7日退职之后，他担任奥地利首相，主持奥地利政策（1867年6月23日被授予宰相称号）直到1871年11月8日。

16　意大利将军朱塞佩·戈沃内于1866年3月被派往柏林，据说是为了研究普鲁士军队的防御工事体系，事实上是为了订立反奥攻守条约，该条约于1866年4月8日签订。

17　俾斯麦指责意大利的原因是，尽管意大利遵守1866年4月8日签订的条约（据此条约，只要普鲁士出击奥地利，意大利便有义务出击奥地利），但意大利继续保持和拿破仑第三的接触。战争前夕和战争期间，法国皇帝和奥地利就威尼斯地区的问题进行过秘密会谈。为了从奥地利得到这个意大利地区并把它还给意大利，他打算唆使奥地利和意大利单独达成协议并使意大利摆脱普鲁士的政策。意大利遵守了和普鲁士签订的条约：它没有停止军事行动，而且就是在拿破仑直接建议意大利获取威尼斯时，也没有和奥地利单独媾和。相反，普鲁士却违背条约，背着意大利在尼科尔斯堡签订了停战协议，在布拉格签订了和约，根本没有考虑意大利对特里亚斯特和特里恩特的要求未得满足。

18　在1853—1856年间进行的东方战争时期，虽然普鲁士和俄国关系友好，普鲁士也没有给俄国以积极的支持。但是俾斯麦

却为俄国做出了一项可贵的贡献，他利用了1854年4月20日签订的普—奥条约来反对奥地利，而按奥地利的设想，此条约则正好是针对俄国的。普鲁士因不希望奥地利强大，先是拖延条约的签字，后又将其变为实际上是纯防御性的条约，提出附加条件说：只有在“全德意志利益”被触犯时，它才给奥地利提供援助；这样一来，便找不到干预巴尔干事务的理由了。尽管条约在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这两个多瑙河公国问题上协助了奥地利反对俄国（俄国不得不于1854年从那里撤出自己的军队），而条约最终结果成了对俄作战各国的障碍：它破坏了法国经由德意志诸邦领土把军队调往多瑙河的军事计划。

19 1859—1862年间俾斯麦是普鲁士驻俄国的公使。

20 指所谓阿尔文斯累本协定。

21 爱德温·卡尔·曼托伊费尔男爵（1809—1885）是普鲁士陆军元帅，1866年8月被派往彼得堡，他的特别使命是说服俄国政府相信改组德意志邦联是适宜的和必要的。

22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结束了的意大利统一过程是在年轻的意大利王国反对觊觎世俗政权的罗马教皇（梵蒂冈）的激烈斗争中进行的。

23 老皮特，或威廉·大皮特，恰塔姆伯爵（1708—1778）是英国政治家，在1756—1761年间（中间有几次短期离任）主管过国防部和外交部，是实际上的首相。在此期间发生的七年战争（1756—1763）中大皮特利用普鲁士的军事力量反对法国。皮特的儿子——同样叫威廉，以小皮特（1759—1806）知名，从1783年起（1801—1804除外）至死一直担任首相职

务。他同革命法国和拿破仑法国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在他的领导下，1805 年成立了所谓第三次大国同盟。奥地利也是成员国之一。

24　亨利·乔治，帕麦斯顿子爵（1784—1865）曾多次任大不列颠外交大臣职务，即在 1830—1834 年间，1835—1841 年间，和 1846—1851 年间。乔治·威廉，克拉伦登伯爵（1800—1870）在 1853—1858 年间，即 1853—1856 年东方战争期间任英国外交大臣，当时，英、法是以盟友身份参战的。在此期间帕麦斯顿任首相（1855—1858）。1846 年由于西班牙女王伊萨贝拉和她的妹妹路易莎·费南达公主当年酝酿的两件婚事问题，英法两国之间的关系冷淡了。对这两件婚事的结局所有欧洲各王室都很关注。英国提出让萨克森·科堡的列奥波特、英国女王维多利亚的丈夫阿尔伯特亲王的堂兄做西班牙女王的追求者。法国则坚持要从波旁王朝的亲王中来选伊萨贝拉的未来丈夫。在旷日持久的谈判过程中使出了许多错综复杂的阴谋伎俩。结果伊萨贝拉和自己的堂兄弗朗西斯科·阿息斯，加弟斯公爵结了婚，而路易莎·费南达和法国国王路易·菲利普的儿子安东安·蒙潘西公爵结了婚。

25　1866 年 6 月 10 日的这个通电包含有在普鲁士保护下德意志诸邦组成新联邦的体制方案。方案的基础是 1849 年法兰克福议会制定的帝国宪法。1849 年这个方案规定，议院须由从居民中经过普遍、直接和秘密投票选出的代表组成。但是俾斯麦方案中没有规定秘密投票。

26　1867 年 3 月 11 日的讲话，《政治演说集》第三卷第 184 页。

27　众所周知，秘密投票只是根据弗利兹的提议才被订入法律

中，而政府方案规定的是公开选举。

28 1789 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

29 约瑟夫二世（1741—1790）从 1765 年开始和他母亲即罗马—德意志帝国女皇玛丽亚—特莱西娅共同执政，从 1780 年起登皇帝位，是所谓“开明专制制度”最典型的代表之一。提到约瑟夫二世所说的“足资警戒的先例”时，俾斯麦指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封建反动势力迫使约瑟夫二世后来废除了很多他所进行的改革，而普鲁士弗里德里希二世所创立的诸侯联盟迫使约瑟夫二世放弃了对德意志领土的要求。

30 宫廷党（来自西班牙语 camarilla ——小屋）是些没有职务的宫内侍臣，但他们接近君王，对君王有很大影响。

31 1866 年 8 月 4 日俾斯麦随国王一起从尼科尔斯堡来到柏林，7 月 26 日在尼科尔斯堡和奥地利签订了预备和约。

32 指 1862—1866 年间的“宪法冲突”。

33 亦即恢复不是由居民整体而是由各个等级产生的代议制邦议会。即采取在 1850 年普鲁士宪法通过之前实行过的方式。

34 第 118 款规定：“假如由于根据 1849 年 5 月 26 日草案应该为德意志邦联制定的宪法，使现行宪法有必要做某些修改时，须由国王下令并在最近召开的议会两院会议上将命令通知两议院。由两议院审核这些预定的修改是否和德意志邦联宪法相适应。”

35 参看俾斯麦 1888 年 2 月 6 日的讲话——《政治演说集》第 7 卷第 451 页。

36 威·莎士比亚著《哈姆雷特》，第三幕第一场。

37 威廉一世国王的夫人奥古斯塔王后是俄国大公夫人玛丽娅·

巴甫洛夫娜的女儿。

38　三皇同盟即德国皇帝、奥—匈帝国皇帝和俄国皇帝的同盟，存在于1872—1878年间。该同盟于1881年再行恢复。

39　1807年亚历山大一世于提尔西特和拿破仑订立同盟时同意割取普鲁士一半以上的领地。其中易北河左岸的几省拿破仑划给他的哥哥热仑，过去属于波兰的各省划给萨克森国王。1850年3—4月间在埃尔富特召开的普鲁士、萨克森和汉诺威代表会议的目的就是奠定在普鲁士领导下统一德国的基础。由于奥地利依仗俄国的支持，结果使得所谓埃尔富特议会被迫解散，因而埃尔富特议会未产生任何结果。来自俄国的直接威胁迫使普鲁士在奥尔缪茨退却。1850年11月在奥尔缪茨签订了一项协定，根据这一协定，普鲁士不得开展以普鲁士为首的统一德国的斗争。

40　引自贺拉斯《书简》第一卷第1行、第74行。

41　1814年普鲁士提出对整个萨克森的要求，虽然得到俄国的支持，但是并未实现。至于波兰，它的大部分领土则以立宪自治王国的形式（波兰王国）归附于俄国。

42　关于斯特拉斯堡成为德意志联邦城堡的问题在1815年11月20日巴黎和约签订之前曾以谈判方式讨论过。但是有关于此的提议被否决了，于是斯特拉斯堡仍属法国版图。

43　看来俾斯麦担心威廉二世皇帝会销毁文件。威廉二世一登基就和俾斯麦之间产生了严重的分歧，他可能为了报复而销毁证明俾斯麦对德意志帝国有功的文件。

44　德绍离柏林不远，是安哈尔特公国的主要城市，位于当时普鲁士被隔离的两部分之间。俾斯麦以德绍为例指出，他反对

报界的措施，在连和柏林毗邻的德绍都不归他管辖的条件下，效果是不大的。

45 1866 年的奥普战争在德国以这一名称知名。

46 指 1831 年比利时宪法。

47 自由思想党是进步党和自由联盟于 1884 年合并后成立的。

48 弗里德里希（王储）是威廉一世皇帝的儿子，以后的弗里德里希皇帝三世。

49 亦即以不要领土合并为交换条件在正在拟订的德意志联邦宪法中获得比其他德意志邦国更大的权利。

50 旧邦联议会是指 1815 年成立的全德意志邦联唯一共同机构——德意志邦联的邦联议会。它既不是代议机关，也不是政府机构，而是在奥地利代表主持下在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市举行的德意志邦联各成员国外交代表参加的代表会议。1848 年的革命使邦联议会不再存在，1850 年又恢复了。但是随着 1866 年德意志邦联的瓦解邦联议会也最终解体。

51 汉诺威王国和黑森·卡塞尔选帝侯国都是 1866 年战争结束后被普鲁士合并的领土。

52 汉诺威参加了 1866 年的奥普战争，站在奥地利一边，但不是战争一开始就立即参加的。

53 指冲往东南企图和巴伐利亚军队会合的两万名汉诺威军队。

54 汉诺威国王乔治五世属于汉诺威王朝。

55 富尔达和哈瑙都是 1866 年归并到普鲁士的黑森—拿骚的城市。

56 吕内堡是汉诺威的公爵领地，韦尔芬王室的古老遗产，该王室的很多谱系都称做吕内堡。这样，汉诺威诸王就是韦尔芬

王朝两系之一的吕内堡系的代表。所以，后来在1884年，随着不伦瑞克大公威廉去世韦尔芬老系中断之后，1878年死去的汉诺威国王乔治五世的儿子恩斯特·奥古斯特·库姆贝兰大公宣布了对不伦瑞克遗产的继承权。但根据受到不伦瑞克邦议会赞同的俾斯麦首相的建议，德意志帝国联邦议会认为，由于库姆贝兰公爵对参加联邦的普鲁士王国的敌视态度，他在不伦瑞克公国的统治是和联邦条约和帝国宪法的基本原则相矛盾的。

57　拿骚公国在1866年奥普战争中站在奥地利一边。

58　科布伦茨是莱茵河上的一个古城，是普鲁士莱茵省的主要城市。

59　俾斯麦称拿骚居民为“从前的拿骚臣民”，因为拿骚公国在1866年归属普鲁士。

60　在符腾堡军队于1866年7月24日在陶贝尔比绍夫海姆附近被普鲁士军队粉碎之后，符腾堡王国就有被普鲁士占领的危险，符腾堡宫廷和外交大臣万布勒来到普鲁士大本营签订了停战协定。

61　普鲁士一个不大的省霍亨索伦位于德国南部，东、北、西三面被符腾堡领土所环绕。1866年战争中，被符腾堡军队轻易地占领。

62　弗朗茨·罗根巴赫男爵（1825—1907）是巴登政治家，从1865年起就已经退职。在俾斯麦所说的那个时期，罗根巴赫做弗里德里希王储的谋士，同时是王储的一个密友。

63　黑森在美因河以北的一部分加入了北德意志联邦。

64　根据1866年8月22日的和约，巴伐利亚只丧失了赫尔斯费尔

德法院区和奥尔巴周围的地区，因为为了保证战略上和商业上的利益，必须对国界进行某些调整。

65 韦尔芬军团是指汉诺威国王乔治五世（韦尔芬王朝）于1867年汉诺威归并于普鲁士之后建立的志愿部队。韦尔芬军团在法国找到了栖身之地，其任务是同普鲁士进行武装斗争，但不久就被解散。

66 韦尔芬军团并未参加1870—1871年间的普法战争。

67 只是在1866年10月21日和萨克森才签订了和约。

68 约翰和阿尔伯特。

第二十二章

1 在1868年9月开始的西班牙革命时期，女王伊萨贝拉二世被逐出国。政权转入资产阶级右翼各政党手中，这些政党通过国会颁布了1869年6月6日的君主制宪法。普里姆将军内阁提议让查理·安东·霍亨索伦·西格马林根亲王的儿子列奥波特·霍亨索伦即位。列奥波特属于霍亨索伦家族旁系，是扎格马林根的继位亲王。1849年列奥波特的父亲查理·安东·霍亨索伦·西格马林根把扎格马林根公国割让给普鲁士。

2 查理五世是属于哈布斯堡家族的西班牙国王（1516—1555），称查理一世。他于1519年被选为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曾把德意志、西班牙、荷兰和美洲辽阔的领地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

3 1870—1871年普法战争期间，西班牙形式上保持中立。可是

这种中立态度对法国比对普鲁士更为友好。1870 年 10 月西班牙有意要同法国国防政府签订协定，但是半官方的谈判没有取得任何结果。

4　熙得是西班牙骑士叙事诗中的主人公。

5　当时古巴岛是西班牙的殖民地。1868 年在古巴开始了起义，口号是要求从西班牙统治下获得解放。迟至 1878 年，在西班牙做出部分让步之后，起义才告结束。

6　谈话是在 1870 年 3 月 15 日午饭之后进行的，当时在场的有国王、王储、查理·安东亲王和他的儿子列奥波特、俾斯麦、罗昂、毛奇、施莱尼茨、梯勒和德尔布吕克。参阅《罗马尼亚国王查理生平》（1894）第 2 卷第 70、72 页；那里谈的不是内阁—枢密院会议，而只是宫中在国王主持下的一次讨论和与会者的一致决定。

7　列奥波特亲王的父亲查理·安东亲王是卡尔·霍亨索伦亲王（1785—1853）和安德列·缪拉特亲王的女儿玛利娅·安东尼特（1793—1847）的儿子；缪拉特亲王的母亲约瑟芬亲王夫人是查理·路德维希·弗里德里希巴登大公与夫人斯蒂凡尼娅的女儿。斯蒂凡尼娅是拿破仑第一的养女。

8　1885 年 8 月德国企图侵占加罗林群岛，而西班牙则认为群岛是自己的领地。这场冲突以西班牙和德国请教皇仲裁斡旋告终。教皇承认西班牙拥有对加罗林群岛的主权，条件是德国获得自由贸易权。

9　指冯·达尔维格男爵（黑森大公国的大臣）。参阅 1870 年 7 月 19 日格腊蒙的照会（国家档案第 57 卷，第 10772 号，第 333 页）："黑森大公（路德维希三世）让人通知我们，如果没有

美因河的炮火使他不安的话，他就会完全听从我们的命令；他只期待在皇帝重新使他获得独立之后，他能够向我们表示同情的那一天到来。”

10 教皇权力至上论者（来自拉丁词 ultramontes —— “在山外”，意即在阿尔卑斯山外，在意大利）是加强罗马教皇世俗权力的支持者。在德国这个词通常指所有的天主教徒，其中包括天主教“中央”党的拥护者。

11 《gesta Dei per Francos》——是指 1611 年出版的法国学者雅克·邦加尔编纂而成的一部著作的标题。作品是献给法国十字军远征的参加者（作者称他们为法兰克人）。在邦加尔的心目中，法国人是上帝的选民。

12 梵蒂冈是罗马的宫殿，天主教首领、罗马教皇的官邸。

13 拿破仑第三派军队驻扎在罗马，一方面是为了增强其在法国天主教徒中的威望，同时也是为了保护罗马教皇的官邸，以免罗马并入意大利王国。另外，为了实现其对外政策方面的计划，他又需要同统一的意大利结成联盟。

14 立法院在法国拿破仑第三帝国（1852—1870）时期是一个权力极为有限的立法机关。

15 埃姆斯是德国西部的疗养区，离前面提到的科布伦茨不远；在俾斯麦所谈及的事件发生期间，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正在这里疗养。威廉一世给俾斯麦打的电报因发自埃姆斯，后被称为“埃姆斯电报”。

16 系指北德意志联邦的国会。

17 1870 年 7 月 12 日列奥波特亲王放弃继承西班牙王位的要求。

18 1806 年 10 月 14 日耶拿战役中拿破仑的法国军队粉碎了普鲁

士军队。拿破仑胜利后，法国于1807年7月7日同俄国、7月9日同普鲁士签订了提尔西特和约。战败国普鲁士根据和约失去了易北河以西的全部领土，被迫赔款、裁军，参加对英国的封锁等等。

19 所指的是奥地利，它是德意志民族中世纪神圣罗马帝国（从十世纪到1806年）的继承者。

20 根据基督教传说，迫害基督教徒的狂热的犹太人扫罗在去大马士革（叙利亚的一个城市）的途中遇到了耶稣显圣，结果他便成为虔诚的基督教徒，并改名为保罗，成了基督教的圣徒。

21 万布勒男爵（1809—1889）是德国南部邦国之一符腾堡王国的外交大臣和宫廷大臣。

22 根据维也纳会议的决议，普鲁士于1815年首次获得威斯特法里亚的部分领土，所以俾斯麦要把威斯特法里亚人与旧普鲁士地区的居民加以对比。

23 俾斯麦在这里所谈的是1812年拿破仑入侵俄国失败之后，欧洲大国联盟粉碎拿破仑法国一事。德意志各邦参加这次反抗法国统治的斗争发生在民族解放运动高涨期间，暂时把德意志各邦各朝廷和各邦领土的争端放到了次要地位。1813年10月16日—18日在莱比锡附近以及1813年10月30日—31日在哈瑙附近都发生过会战，从而迫使拿破仑撤出德国领土；在拿破仑从厄尔巴岛逃跑并在法国短期恢复帝国（“百日”）之后，于1815年6月18日在比利时的贝尔—阿里扬斯附近发生了一场激战，通称滑铁卢战役，彻底粉碎了拿破仑。

24 大学生卡尔·桑德杀死在俄国外交界供职的德国反动作家和政论家奥古斯特·科策布（1819 年 3 月 23 日）之后，根据梅特涅的倡议，德意志各邦大臣会议作出了一系列反对革命运动的决定。措施之一是在美因兹召开了中央特别调查委员会，目的是追捕革命和自由民族运动的活动家。

25 杰出的普鲁士政治家亨利希·施泰因男爵（1757—1831）恰好在 1814 年之前进行过一系列重大的资产阶级的改革。正是在 1814 年猖獗起来的反动派强迫他脱离了政治活动。

26 雅科布·哥雷斯（1776—1848）起初是十八世纪末法国革命先进思想的信徒，后来是通过资产阶级改革恢复德意志帝国这一主张的拥护者，而最终他又是气势汹汹的天主教保卫者，是中央党的活动家。俾斯麦所谈及的时期，正是哥雷斯于 1814—1816 年在科布伦茨创办具有很大影响的《莱茵的商业之神》报的时期。该报因刊登了反对神圣同盟的首脑——俄国皇帝亚历山大一世的文章而被封闭。

27 弗里德里希·路德维希·雅恩（1778—1852），著名的德国教育家，反对拿破仑的民族解放运动的积极参加者，体育教育与民族自觉性培育相结合的教育体系的创造者，俾斯麦曾在实行雅恩教育体系的学校里学习过（见俾斯麦：《思考与回忆》第一卷，第一章）。

28 瓦特堡，德国图林根的一个城堡。1817 年 10 月 18 日，为纪念路德反对天主教会三百周年，以民族自由为口号的群众性的大学生政治示威游行在此举行。

29 在 1813 年 10 月 16—18 日的莱比锡战役中，加入了拿破仑军队的萨克森部队突然转到反拿破仑的欧洲大国联盟方面

来。这对战争结局的影响颇大。

30　1815 年 6 月 18 日在贝尔—阿里扬斯（滑铁卢）战役中，盟国军队在英国元帅威灵顿的最高指挥下进行战斗。

31　由于普鲁士 1866 年战胜了奥地利，所列举的领土都归属于普鲁士。

32　二十年后，也就是九十年代初期写作本书的时候。

33　在十九世纪，汉撒城市指曾加入过中世纪商业城市汉撒同盟而形式上保持独立的德国城市不来梅、汉堡和卢卑克。这些城市的公民与北德意志联邦成员一起参加了 1870—1871 年的反法战争。

34　这就是著名的“埃姆斯电报”，1870—1871 年普法战争爆发的借口。当时，特别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威廉·李卜克内西）就怀疑俾斯麦蓄意篡改原稿，但只是在俾斯麦的《思考与回忆》问世后，篡改一案才真相大白。密码电报是 1870 年 7 月 13 日午后 3 时 50 分在埃姆斯发出，6 时 9 分于柏林收到，译出的电文如下：

国王陛下有手书给我：“贝内代蒂伯爵在散步时向我走来，以最后的强迫的方式要求我：我应当授权他立即发出电报说，如果霍亨索伦家族重提自己的王位继承权，我有义务在将来永不予以同意。最后我相当严肃地拒绝了他，因为人们永远不允许，也不应该承担类似这样的义务。自然，我曾对他说，我什么消息也未得到，因为他能比我更早地得知有关巴黎和马德里的消息，他可以看出，我的政府再度持不参与的立场。”此后国王陛下收到了亲王的信。因为国王陛下曾

对贝内代蒂伯爵说过，他在等待亲王的消息，所以国王陛下考虑到上述要求，根据我和欧伦堡伯爵的报告，决定不再接见贝内代蒂伯爵，而只是吩咐副官告诉贝内代蒂说，对他从巴黎得来的消息国王陛下已从亲王那里得到证实，所以已不再有其他事情通告大使了。是否立即把贝内代蒂的新要求和对新要求的拒绝通知我们的公使并在报刊上公布，国王陛下听凭阁下斟酌处理。

电报译文根据德国出版者科尔注释中的原文。

35 无法翻译的双关语 sprengen 在德语中有两个意思："炸毁"和"喷洒"。

第二十三章

1 雅努斯两面脸神像，刻画在古罗马通往集会场的拱门中央。拱门的两扇门只在和平时期锁着；因此有"关闭雅努斯神殿"一说，意为停止战争。

2 普鲁士驻伦敦公使本生男爵，在1854年给曼托伊费尔的意见书中，提出了牺牲俄国的利益以复兴波兰、扩大奥地利等要求。

3 由1815年维也纳会议规定其边界，并加入俄国的波兰王国，称为会议桌上的波兰。

4 Hôtel des Réservoires（后备员旅馆）是凡尔赛的一所府邸。

5 1870年10月12日博伊斯特电文中的话。

6 "巴黎城下无变化"这句话在长时期内多次见于前线的正式报道。

7 被德国人围困在麦茨要塞（在洛林，摩塞尔河畔）的、由巴

赞元帅统率的法国军队（总共十七万三千人），于 1870 年 10 月 27 日向德国人投降。麦茨的投降是法国人在整个战争中最惨重的失败之一。

8　引自 10 月 12 日致霍特克伯爵的电报。博伊斯特：《四分之三世纪的回忆》第 552 页。第 2 部分第 397 页。

9　法国政府从巴黎撤退（1870 年 9 月）后，迁往图尔，而后从 1870 年 12 月 9 日至 1871 年 3 月间又设在波尔多。

10　利津是法国东部杜柏河流域的一条小河，1871 年 1 月 15 日—17 日普鲁士军队和法国军队在这里会战（也称为贝尔福战役或蒙贝利亚尔战役）。

11　是指 1870 年 8 月 6 日的维尔特（下阿尔萨斯）战役或朗斯霍劳战役；同日进行的斯皮歇恩（法国的斯皮克朗，在洛林）战役；以及 1870 年 8 月 16 日的马尔斯—拉—土尔战役或维昂维耳（默尔大和英泽尔省）战役；战争初期，在法国东北部的上述战役中普鲁士军队都取得胜利。

12　佛罗伦萨从 1865 年至 1869 年为意大利王国的首都。

13　即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他是亚历山大二世的母亲亚历山大·费多罗芙娜的哥哥。

14　1866 年奥普战争结束之后汉诺威王国被并入普鲁士。汉诺威王后玛丽亚的姊妹亚历山大公主嫁给尼古拉一世的儿子康斯坦丁大公。

15　1866 年奥普战争后，站在普鲁士方面作战的奥尔登堡大公获得霍尔施坦的领土阿伦斯贝克。奥尔登堡大公家族和罗曼诺夫家族的亲属关系起源于彼得一世的第二个女儿安娜·彼得罗芙娜（1708—1728）与霍尔施坦—戈特尔普公爵的联姻。

16 1853 年至 1856 年东方战争结束后，1856 年巴黎条约规定了以俄国为一方同以英国、法国、撒丁和土耳其为另一方的媾和条件。除了其他条件外，条约宣布黑海为中立区。各大国，首先是俄国，失去了在那里保持海军舰队的权利，沿岸工事应予拆除。1870 年 10 月，俄国政府通知欧洲各大国，拒绝接受巴黎条约的这一条款。1871 年 1 月至 3 月间举行的伦敦会议，不顾英国的反对，同意废除巴黎和约中的与此有关条款。

17 限制一国在自己领土上行使主权以利于另外某一国，在国际法中称为地役权。

18 《莫斯科日报》是 1756 年至 1917 年间发行的报纸。十九世纪六十—八十年代，在米·尼·卡特科夫主办《莫斯科日报》期间，该报在对外政策方面激烈反对与德国接近。

19 1878 年 3 月 3 日在圣斯蒂凡诺与土耳其签订的和约是由伊格纳季耶夫伯爵代表俄国方面签字的。

20 亚历山大·巴滕贝格的母亲尤利·豪克出身于波兰贵族。

21 贝肯斯菲尔德（迪斯累里）勋爵是当时英国的首相，出席柏林会议的英国代表。

22 伊丽莎白·彼得洛夫娜。

23 伍斯特豪森，普鲁士小镇，靠近波茨坦。普鲁士国王的猎宫就设在这里。

24 萨克森的卡尔·亚历山大大公（1818—1901）。

25 1870 年 9 月 18 日普鲁士军队包围了巴黎；1871 年 1 月 29 日巴黎投降并签订停战协定。

26 结束普法战争的法兰克福和约是 1871 年 5 月 10 日签订

的。主要条件为：把阿尔萨斯和洛林的大部分割让给德国，法国支付当时闻所未闻的为数达五十亿法郎的巨额赔款。对于德国本身而言，战争的主要政治结果是德国将各个单独的邦统一为以普鲁士为首的德意志帝国。

27　凡尔赛于1870年9月19日被普鲁士军队占领，而后成为大本营所在地。

28　指1870年12月4日的奥尔良战役；第戎西面的战役则在1870年10月30日。

29　朗尼是马恩河左岸的一个小城市，是巴黎——马恩河畔夏龙铁路上的一个车站。在1870年内各次战役期间，它是德国人控制的通向巴黎的唯一铁路线的终点，因而显得重要。

30　即北德意志联邦的金库。

31　蒙特—阿韦龙，巴黎东面的一个高地，经过两天炮轰，1870年12月29日被德国人占领。炮击蒙特—阿韦龙意味着进而炮轰巴黎。

32　阅读下文，可参阅冯·科伊德尔著《俾斯麦公爵和公爵夫人》（第468页及以下页）和冯·布卢默的对立观点：《1870—1871年炮轰巴黎及其延宕的原因》（1899年柏林出版）以及勃鲁门塔尔的日记摘录《1866年和1870—1871年冯·勃鲁门塔尔伯爵元帅日记》。——为了说明情况，这里从俾斯麦在1870—1871年战争期间写给夫人的信中摘引以下段落（1903年，斯图加特和柏林）：

“凡尔赛，10月23日：巴黎城前的战事看来还要拖延下去。不知总参谋部的将军们是否有别的打算和别的事情，但

攻城炮尚未运到，看来在11月以前我们无法射出一发子弹攻城。”——“凡尔赛，10月28／29日：对于我在信中曾告知你的、并为许多报纸刊载过的见解，我今天要以书面形式表达我的愤慨。那种见解认为似乎我在阻碍我方的炮火向巴黎进攻，因而我必须承担使战争拖延的罪责。几周来，每日清晨我都期待着由大炮的轰鸣声把我唤醒。现在已有200余门大炮，但是就是不射击，并且受命对准的不是巴黎，而只是某些要塞。在这件事情上有一种由娘儿们、大主教和学者们安排的阴谋，一些著名的上层权势人物参与了，他们担心不这样就会影响国外的夸奖与赞许。大家都在这里抱怨一种性质诡秘的障碍，一个人说运炮列车在铁路上耽搁了，运不来，另一个人则责骂战前的准备不充分，第三个人说，弹药还是太少了，第四个人说，装备尚不齐备，第五个人说，一切齐备，只是没有开炮的命令。与此同时，将士们在受冻、生病。战争拖延着，中立国干涉我们的事务，因为他们对这种事态感到厌倦；而法国正在用英国和美国的大量武器装备起来。这一切我每天都在鼓吹，可是此后却有人断言，仿佛是我应对可能招致许多忠诚战士死亡的拖延时间负有罪责，目的只是为了博得国外因我们保护‘文明’而来的赞美。”——“凡尔赛，11月16／17日：在我方已运到比同时发射使用量多两倍以上的大炮后，我们的大炮仍然沉默着。从一开始起，即两个月之前，我就根本不主张围困巴黎，而主张采取其他的战争方法。但是，两个月来我们的大军在这里按兵不动，士气日益低落，而法国人却在武装起来。在此形势下，围困也不得不进行到底。但是看起来似乎

有人要把400门重炮以及一万生特（每生特五十公斤）炮弹放置不用，直到缔结和约，而后再运回柏林。在这种情况下甚至谈不上炮轰巴黎城，只能轰击一些分布周围的要塞了。对此，那些应对此种迟延负有责任的势力可能一无所知。”——“凡尔赛，11月22日：罗昂被策划反对炮轰巴黎要塞的阴谋气病了。如果有朝一日弄清了为什么我们优良的士兵不得不如此长久地在手榴弹的火光下睡觉而不能发动进攻，定会引起强烈的愤慨。而这是一定会真相大白的，因为相信这一点的人非常之多。国王是知道此种情况从而容忍，还是受了欺骗呢？这个问题尚有争论。我宁愿相信后者。如果有阴谋的话，一定要闹到总参谋部去，而我对这个总参谋部除了善良精明的老毛奇外，是一概不喜欢的。胜利已经使他那帝王般的狂妄达到顶点……而别人以毛奇的名字掩护着自己……”——“凡尔赛，12月7日：在卢瓦尔河上和北方取得辉煌胜利后，我们围困巴黎的大军一直像块石头一样四平八稳地动也不动，或者说，军队就像托尔神（斯堪的纳维亚人的雷神）一样，被‘女人的连衣裙裹住了双膝’，妨碍走动，天晓得……毛奇也——自然以更坚决的语调——反对进攻……而善良的罗昂由于对我们的消极态度以及让我们转入进攻的努力全部落空而感到懊丧，完全病倒了……”——“凡尔赛，12月12日：罗昂终于受命运输弹药了，他希望在八天之内得到一切必需品。要是在两个月之前这样做该多好啊！”——“凡尔赛，12月24日：炮轰巴黎城终于有指望了，我们希望除夕之前进行。罗昂和我几个月来的操劳未曾做到的事，看来被柏林几家报纸掀起的风浪及其在国会里引起的反响完成

了。毛奇在报纸上看到了匿名诗，表明他所采取的办法（仿佛事情与他个人丝毫无关）并未得到舆论的好感。从此之后，他显然也改变了看法。”——“凡尔赛，1871 年 1 月 1 日：蒙特—阿韦龙在一天之内被摧毁并被我占领，且无伤亡。在此之前曾反对进攻的人都改变了主张，几乎酸溜溜地看待炮兵的巨大战绩，因为每个人心里都在想：如果不是十来个有影响的人由于种种原因从中阻挠的话，这本来在两个月之前我们就能做到。”——“凡尔赛，1 月 4 日：如果早些用大炮轰击的话，形势早就可能不同了。在攻城炮初战取得辉煌成功之后，没有人再对此提出异议了，而且很难找到一个会承认曾反对过炮击的人。岂知仅仅在三周前，在参加军事委员会的所有人当中，罗昂还是唯一信仰正教的人，而且‘具有将军衔的侍从武官长’博伊恩还企图使国会的老爷们相信：罗昂由于智力不足和我由于怨恨总参谋部，是两个仅有的要求进攻的人，说什么我们两人在此问题上一窍不通。博伊恩的其他关系你是知道的，在某种意义上说，他是在此地宫廷的‘公使’。”

33 麦加是阿拉伯的一个城市，伊斯兰教徒的“圣城”。

34 可以有把握地说，人们的指摘没有错。威廉国王于 1870 年 10 月 22 日答复了王后的信，意思正是这样：“他们（人道主义的代表者，他们的希望王后已经转达了）可能认为，不应炮轰巴黎。对此，我们回答说：那好，我们开始让他们挨饿。于是有人又发表意见：可别让饿坏。这样，我们别无他法，只有开拔，恢复 1815 年边界并放弃阿尔萨斯—洛林。但

是这样办也不行，于是就得在从矛盾到矛盾的恶性循环里兜圈子。”

35　俾斯麦是指中世纪德意志罗马帝国。

36　“大选帝侯”指勃兰登堡选帝侯弗里德里希·威廉（1640—1688）。

37　主要指古斯塔夫·弗烈伊塔格。

38　外阿尔卑斯山的，即位于阿尔卑斯山另一边的——意大利的。

39　阿普利亚，是意大利南部的一个省。

40　在草稿中此处有后来加上的一段：“王储承认这一点，但对此无意加以重视并打算在必要时实行强制。这一题目在我们之间商谈过两次：一次是在骑马行路时，另一次是色当战役之后，在室内。这两次商谈中，我们的胜利远远还没有成为定局，因此我把自己的反对意见同最近的、王储最易理解的问题即军事因素联系起来，指出法国人的兵力尚未被摧毁到这种程度，以至我们有把握取得与我方战绩相称的和平。如果现在我们造成拿破仑发动战争时所希望的形势，亦即破坏普鲁士和德意志联邦的其他各邦的关系，则战争获得满意结局的前景将大为暗淡。各邦君主面对他所提出的奢望，就可能召回他们的军队，而军队也只能服从。”

重要的是应该看到：根据其他现有的材料（俾斯麦公爵1888年9月23日的个人报告、1896年11月7日公爵给奥托卡尔·洛伦茨的信〔参阅奥托卡尔·洛伦茨著《威廉皇帝与帝国的建立》，耶拿，1902年，第617页〕以及王储和内阁顾问阿贝肯的日记和姆·布什的札记）来看，1870年9月3日在顿舍里王储的官邸以及以前在一次几小时的骑马行路

时，“大约在波蒙和色当附近”王储和俾斯麦伯爵就进行过两次详细的谈话，谈到新德国的建立和对南德诸邦的关系以及新选的最高首脑的称号，应是“皇帝”还是“国王”。也就是1870年9月3日在顿舍里王储的住所和早些时候在一次长时间的骑马路上。“可能在波蒙或在色当。”但是这两位贵人这种长时骑马行路不论在波蒙附近还是在这之前都不可能，而是在9月2日下午当他们陪同国王骑马巡视战场时进行的。因此在文中写道：“这一题目在我们之间商谈过两次：一次是在骑马行路时，另一次是色当战役之后，在室内。”此外，关于第二次谈话俾斯麦1870年9月6日写给夫人的信中说：“在顿舍里我和王储进行过一次我感到很满意的谈话。”从此信以及写给洛伦茨的信中可以看出，《思考与回忆》中所说到的一场激烈的谈话是在长时间的骑马行路时进行的，而在顿舍里则满意地解决了前一天没有得到调解的分歧。——参阅根据赫·俾斯麦公爵提供的情报为1902年8月7日的《汉堡报道》（第184号）撰写的文章：《王储、俾斯麦公爵与皇帝问题》。

41 在草稿中此处后来加上了以下几行：“对于血腥的赞德林圣诞节（1705年）的回忆，至今仍像一个幽灵在巴伐利亚和奥地利之间徘徊。我们勃兰登堡人不应忘记，在一千年中的不多年前，边疆侯爵希罗邀请三十个温德侯爵做客并下令杀死他们，结果在两百年间德国人被赶出了他们定居的地方。贵族不能下手干这种事。”

42 1888年9月，在国会选举前，格夫肯教授公布了弗里德里希王储（后为弗里德里希三世皇帝）的日记。在这部有关1870—

1871 年间普法战争的日记中，弗里德里希重复了他的亲信(格夫肯本人、施托什等）的思想，这些人被俾斯麦称之为“自由派”和“天主教徒”。柏林的报纸《交易所时报》写道：“自由主义党”不要求有别的选举号召。虽然日记是可靠的，但俾斯麦在上奏威廉二世的书面报告中，宣布日记是伪造的。格夫肯被逮捕并被羁押三个月，后来被帝国法庭刑事审议会宣布无罪。

43　御马总监是一种宫廷官衔。

44　中世纪德意志罗马帝国的皇帝巴伐利亚的路德维希四世(1314 年到 1347 年执政的皇帝）于 1324 年将勃兰登堡边疆行政区赐给他的儿子巴伐利亚的路德维希公爵。

45　由俾斯麦起草、由国务大臣德尔布吕克于 1870 年 12 月 5 日在国会例会上宣读的路德维希二世致威廉国王的信中说：“在南德意志加入德意志立宪联邦之后，赋予陛下的最高权力将扩大到所有的德意志各邦。我已声明愿意加入联邦，我深信，这符合德意志祖国和联邦各君主的整体利益，同时也完全相信：由于恢复了德意志帝国和德意志皇帝的尊称，根据宪法属于联邦主席团的权力，将成为陛下在各邦君主联合的基础上以整个德意志祖国的名义行使的权力。因此，我建议德意志各邦君主和我一起请求陛下将实施联邦的领导权力和德意志皇帝的称号结合起来。一旦陛下和各邦君主将自己的意向通知我，我即责成我的政府采取为达到联合所必需的进一步的行动。”文中提到的“有说服力的暗示”包含在“完全相信……”等话中。

46　卢伊特波尔德亲王因为他的侄子路德维希二世国王得了精神

病，于1886年受命在巴伐利亚摄政。

47 威廉一世皇帝曾是俄国军队卡卢加第五步兵团的名誉团长。

48 Borussia（勃鲁西亚）是普鲁士的拉丁名称。

49 按照德意志帝国宪法（1871年）规定，参加帝国的各邦的代表协议会称为联邦会议。

50 大公是奥地利帝国对亲王的称号。

51 1871年1月18日在凡尔赛宫（巴黎附近）明镜大厅里举行了宣布威廉一世为德意志帝国皇帝的隆重仪式。

52 这可由投寄到《普鲁士公报》的报告证实。报告谈到和王储、巴登大公以及其他站在旁边的君侯们互相握手的情况，还谈到各军事代表团的祝贺，但是对联邦宰相未表示丝毫谢意。

第二十四章

1 文化斗争指七十年代初俾斯麦政府为反对普鲁士和德国的天主教会而开展的斗争。进步党领袖微耳和取的这一名称，可能对这一斗争的真实目的造成某种错觉。实际上，俾斯麦政府力图打击分立主义倾向，这种倾向在信奉天主教的居民占多数的地区特别强烈；力图阻止天主教会及其首脑罗马教皇对德国事务的干涉；力图阻止敌视德国的天主教强国在宗教的口号下联合起来。文化斗争的主要措施如下：1872年把耶稣会教士驱逐出德国，1873年颁布“五月法”（见后），停止拨付天主教会需用的经费，改变地方教会及其财产的管理制度（1875年至1876年）。但是政府的迫害却只能使天主教中

央党的地位得到巩固，他们在国会中的席位大大增加。为了首先同社会民主党作斗争而需要得到中央党的支持，俾斯麦在七十年代后期做了一系列让步。在文化斗争期间颁布的几乎所有反对天主教会的法律都逐渐废除了。

2　1870 年以前，罗马教皇不仅是天主教的首领，而且也是世俗的国君：甚至在 1870 年，包括罗马城在内的意大利中部领土还都归他管辖。只要教皇依然是世俗的国君，依然统治着这个国家的最大城市和历史中心，意大利的统一就不可能实现。但是，把教皇的领地，首先是罗马并入意大利王国却遭到在罗马驻有卫戍部队的拿破仑第三的坚决反对。拿破仑第三皇帝在法国一垮台，罗马教皇所管辖的全部领土立刻就被意大利王国军队占领（1870 年 9 月 19 日至 20 日），并且不顾教皇的抗议将其并入意大利王国。

3　红衣主教是天主教会的高级神职，罗马教皇是从红衣主教中选出的。

4　指意大利在统一过程中各种派别的斗争。大资产阶级和自由派贵族依附居于撒丁王国王位的萨伏依王朝。共和派是小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者，其最著名的代表是加里波第和马志尼。这一派遭到自由保皇党的迫害，虽然在为国家统一事业斗争中往往起决定性作用的正是他们。另一方面，意大利统一事业的所有反对者都依附于罗马教皇。

5　维克多·艾曼努尔二世。

6　1882 年意大利加入 1879 年结成的奥德同盟。

7　教皇庇乌九世为宣布教皇绝无罪愆的教义，于 1869 年 12 月召开了梵蒂冈宗教会议。在拖延十个多月之久（会未开

完，因意大利王国军队占领罗马而中辍）的会议过程中，教皇的意图遭到了强烈的反对。但是，教皇终究还是赢得了大多数票，教皇绝无罪愆的教义得到承认。

8 教皇权力限制主义（由法兰西的古称“高卢”一词而来）是宗教政治学说，产生于中世纪，要求法国教会在对罗马教廷的关系上有自治权。

9 1870 年 11 月 16 日进行的普鲁士邦议会选举结果如下：保守党——134 席；自由保守党——37 席；民族自由党——99 席；进步党——43 席；其他自由党派——30 席；天主教徒——57 席；波兰党——17 席。这样，无论是保守党人，还是自由党人都未能取得绝对多数，他们都有赖于天主教徒和波兰人的选票。这次选举，天主教徒获得了空前的胜利，在莱茵省和威斯特伐利亚两地特别明显。

10 1875 年 6 月 18 日法令废除了 1850 年普鲁士宪法中保证国家不干涉宗教事务的第 15 条、第 16 条和第 18 条。

11 戴克里先是公元 284 年至 305 年的罗马皇帝。戴克里先迫害基督教会，认为基督教会的发展是削弱罗马帝国的原因之一。

12 这里所说福音派新教的信仰是指十六世纪从罗马天主教会分裂出来的基督教徒各种信仰的统称。这里所说的基督教徒属于路德信徒的福音派新教改革会。德国大部分的教徒都信奉福音派新教。

13 1860 年普鲁士邦议会的代表赖辛施佩格兄弟在邦议会中组织了天主教代表团，取名“中央党”。1871 年 3 月 3 日第一次德国国会选举后，在文特霍尔斯特和赖辛施佩格兄弟等领导

下，63 名天主教代表成立了中央党（因该党代表的座位居于国会会议大厅中间而得名）。1871 年 1 月起《日耳曼报》成了中央党机关报。1871 年 6 月中央党在该报上发表宣言，宣告自己的任务是："……维护并有组织地扩大一般的宪法权利，特别要维护教会的自由和独立……"

由于反对普鲁士在德意志帝国的中央集权势力，中央党在天主教的旗帜下，团结了主要是德国西部和南部社会地位不同的人士。中央党在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天主教阶层中，在农民和部分落后的工人阶层中，都具有影响。在文化斗争时期，中央党采取反对俾斯麦的立场。

14　七年法——原文字面意思是"七年为期"。1874 年德国国会通过的军事拨款法叫做七年法。按照此法，这些军事拨款应提前七年批准。1874 年通过七年法之前，俾斯麦同国会进行了长期的斗争。国会不愿放弃每年批准军事预算这样一种对政府施加压力的重要监督手段。1880 年七年法被国会以 186 票对 128 票的多数重新开始。教皇利奥十三世企图与俾斯麦和解，要求中央党投票赞成政府的法案，但中央党却投票反对七年法。

15　红衣主教弗朗奇是主张天主教会与俾斯麦和解的拥护者，并积极支持教皇利奥十三世在这方面的努力。1878 年教皇任命他为国务秘书之后没过几个月他即暴卒。

16　弗洛特韦尔曾于 1830 年至 1841 年任波兹南总督。他和格罗尔曼将军一起推行强烈的反波政策，并大规模地实行德国的殖民化政策。

17　波兰大地主拉德齐维尔公爵家族在宫廷中有很大势力。博古

斯拉夫·拉德齐维尔被认为是教皇权力至上论者的首领之一。威廉·拉德齐维尔和安东·拉德齐维尔是普鲁士的将军。后者曾任威廉一世的侍从武官和贵族院议员。

18 普鲁士宗教事务部天主教司成立于1841年2月14日，维持到1871年6月。该司的成立被认为是对天主教徒的让步。

19 “沼泽波兰人”是对上西里西亚某些地区德意志化的波兰人的称呼。他们操波兰语，但夹杂着相当多的德语。

20 冯·缪勒是1862年起任职的宗教事务大臣。

21 圣使指罗马教皇的使节。

22 “五月法”是1873年5月11日至13日普鲁士政府通过的反对天主教的法律，由宗教事务大臣法尔克施行。“五月法”限制教会对俗人进行宗教惩罚；要求对神甫进行大学课程的专门考核；由国家监督教会学校；授权省长可以过问委派神甫事宜；简化退出天主教会的手续（退教只需本人向世俗法官声明即可）。“五月法”大大地缩小了教会对神甫的奖惩权，并建立了作为上级诉讼审判机构的“王国宗教事务法院”。后来，随着文化斗争政策的废止，“五月法”的大部分法令均被废除。

23 普鲁士宗教事务大臣法尔克于1879年7月退职。

24 普鲁士最高教会理事会为旧普鲁士各省路德派新教教会的最高机构（1866年后划定的某些省最高教会理事会的权力未曾行使）。它于1848年成立，于1876年改组。它不隶属于宗教事务大臣，而直接隶属于国王。

25 总主教（summus episcopus），即福音教会的首领，由国王担任。

26　俾斯麦指的是1880年1月21日普特卡默尔关于改革德语正字法的命令，即在学校中采用简化的、所谓“普特卡默尔”的正字法。

27　自由思想党为德国自由资产阶级政党。1884年由进步党和部分民族自由党“分立主义派”成员组成（见注29）。该党采取反对俾斯麦的立场，在国会中支持中央党。

28　阿尔萨斯人是国会中的一个派别，它将1871年并入德国的阿尔萨斯人的代表人物联合在一起，一贯采取反政府立场，是国会中数量占第二位的民族党团（仅次于波兰人），在国会中约占15席。

29　“分立主义派”是指1880年由于不同意俾斯麦的政策而从民族自由党分化出来的一批议员。1881年国会选举时分立主义派得46席。1884年与进步党合并，组成“自由思想党”。

30　“格莱斯顿内阁”是指自由党—天主教联盟。1877年俾斯麦对该联盟的产生感到担忧，因为以里克特为首的部分民族自由党党员采取反对俾斯麦和文化斗争政策的立场。里克特的拥护者与施托什缔结联盟的危险性在于施托什是普鲁士亲王弗里德里希·威廉的亲信。一些相当有权势的宫廷集团是他的后盾。俾斯麦把施托什的拥护者称作“格莱斯顿内阁”，因为这和依靠爱尔兰天主教徒和英国自由党人的英国首相格莱斯顿相类似。

31　罗马教廷是以罗马教皇为首的罗马天主教中央管理机构。

32　奥古斯特和彼得·赖辛施佩格两兄弟是普鲁士邦议会天主教派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以后是国会中中央党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33 劝诱改宗一语是使异教徒转信本教的意图。

34 宗教协约指罗马教廷与某一国家所订的协定，其目的是调整天主教会在该国的地位。

35 凡天使报喜节勋章的获得者皆被称为“意大利国王的堂兄弟”。

36 即1890年接替俾斯麦任帝国宰相职务的卡普里维。

37 《日耳曼报》是1871年起发行的一家日报，为中央党的机关报。

38 1875年正当文化斗争紧张的时刻，通过了非宗教仪式婚姻法。该法的施行遭到了保守党和中央党的强烈反对。

39 1817年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企图把路德派新教和其他革新派教会合并。反对这一企图的人被叫作“旧路德教徒”。以农村僧侣为基本力量的“旧路德教徒”要求无条件地忠于十六世纪路德所制定的福音教派宗教改革的原则。在三十年代，旧路德教徒采取了特别激烈的行动，以致政府不得不动用军队来对付他们。

第二十五章

1 1872年保守党发生分裂。分裂出来的一部分（所谓“新保守党人”）支持俾斯麦的政策并基本上赞同文化斗争的措施。保守党留下的核心（“老保守党人”）在后来几年内继续持激烈反对俾斯麦的立场，特别是在文化斗争政策方面。俾斯麦谈的“和保守党人决裂”，指的就是这些老保守党人。

2 波尔迪格尔是意大利北部的疗养地。

3 指1862年至1866年普鲁士政府和普鲁士邦议会之间发生的

所谓“宪法冲突”。

4　引自圣西门所著《企业主手册》一书（见《全集》第8卷，1875年巴黎版第53页）。

5　普鲁士的“学校监督法”于1872年3月11日通过。此项法令是文化斗争的首批措施之一。

6　暗指普鲁士邦议会反对改革军队，这一事件成为“宪法冲突”（1862—1866）的原因。

7　《帝国之钟报》创刊于1870年，曾支持阿尔宁伯爵反对俾斯麦。

8　1875年秋刊登在《十字报》上的佩罗特的文章指名反对俾斯麦及其几个最亲近的同事（如德尔布吕克和康普豪森），对俾斯麦提出控告，说他参加了交易所的投机活动等等。

9　当时（从1867年到1879年）普鲁士司法大臣是阿道夫·莱昂哈特。

10　引自西塞罗：《论法》第3卷，第3章第8节。

11　宣言派是指一批保守党人，他们在《十字报》上签名抗议俾斯麦1876年2月9日在国会所发表的讲话。俾斯麦在这篇讲话中宣称，《十字报》的全部读者都是该报对帝国最高级官员进行诽谤的间接参与者。

12　“宣言”此词（Pronunciamento）原文系西班牙语词汇，意思是军事政变；此词有些讽刺意味，俾斯麦所用的正是此意。

第二十六章

1　正统性（出自法语légitme——合法的一词）是一种政治和法

律学理，根据这一学理，只有王朝的“合法的”继承人才有继位权，据此，任何其他立为王位（例如通过选举）的行动都是无效的。

2 法国波旁“正统”王朝于1830年被七月革命推翻。

3 这一来源是维多利亚女王给皇帝写的亲笔信，皇帝将信的内容告知了俾斯麦公爵。

4 哈里·阿尔宁伯爵（1824—1881）在1874年由俾斯麦从驻法国特使职位上召回，不久因被控告隐匿并攫取他从巴黎大使馆办公室盗窃的外交文件而被交付法庭。他被柏林法庭判决三个月监禁，但由于上诉，增加到九个月。由于阿尔宁拒捕，对他进行了纪律追究。波茨坦的国家纪律法庭于1876年8月27日判决将阿尔宁革职，从而被剥夺了爵位和退休金。阿尔宁出版了一本小册子，泄露了秘密文件内容，并对俾斯麦进行猛烈的攻击。后由于被指控叛国和侮辱陛下、帝国宰相和外交大臣即俾斯麦，他再次被交付法庭，在缺席判决的情况下（阿尔宁当时在国外），阿尔宁被判处五年苦役。

5 “同罗马的斗争”（即同罗马—天主教会的斗争）指“文化斗争”。

6 天主教大教堂的神甫是天主教作为褒奖授给神甫的教职。

7 指1869年12月8日至1870年10月20日在梵蒂冈召开的高级神职人士会议。根据梵蒂冈会议的决议，教皇被认为是绝对无谬的，他的一切决定今后不需要会议承认。梵蒂冈会议确认了教会高于国家。天主教和教皇的这些政治贪欲引起了法国和奥匈帝国政府的反对。

8 旧天主教会是梵蒂冈会议之后，为了表示不同意这一会议上通

过的决议而分裂出来的罗马天主教派。旧天主教会提出了恢复旧的教义和教会体制的任务。这一运动在德国出现后，在“文化斗争”年代中，由于反对罗马教皇和加强俾斯麦的政治作用而受到俾斯麦特别的赏识。

9　保罗·萨尔皮的著作《Istoria del concilio Tridentino》（《特里腾蒂诺宗教会议史》）于1619年在伦敦出版，是叙述在特利恩特城（拉丁文：特里腾蒂诺）召开的天主教特里腾蒂诺会议（1545—1563年）的。在中世纪将外交官员命名为演说家起源于古希腊的惯例。希腊的各城邦早在公元前六世纪就派遣自己最优秀的演说家作为使者。这是因为使者的任务在于面对别的城邦或联盟的民众会议为本城邦的利益辩护。

10　阿道夫·梯也尔（1797—1877），镇压巴黎公社的刽子手，从1871年2月起为法国政府首脑，1873年5月24日被迫辞职，因为法国国民议会大多数维护君主制度的议员认为他在同资产阶级共和派的斗争中不够坚决。在毕洛夫看来，新上任的总统麦克·马洪带来了“有害的后果”，因为麦克·马洪是个顽固的天主教徒，千方百计地支持天主教会同俾斯麦所推行的“文化斗争”作斗争。

11　奥尔良分子是要求恢复奥尔良王朝的法国王位（由此而得名）的保皇党徒，该王朝为1848年革命所推翻。

12　1873年5月24日梯也尔在奥尔良分子的压力之下被迫提出辞职。

13　根据这一诉讼案被控告的《帝国之钟报》的编辑是格尔森。

14　庇乌九世是这个时期（1846—1878年）的教皇。

15　路易·拿破仑早在1852年政变成为拿破仑第三皇帝以前，为

了在信教的法国农民阶层中获取声誉，便明显地支持了法国的天主教会。当拿破仑任法兰西共和国总统的时候，便在1849年将军队派往罗马恢复教皇权力。后来他支持教皇。出身于西班牙蒙蒂霍家族的法国皇后欧仁妮是天主教徒，也利用自己的势力支持教会。

16 对于土耳其领地基督教徒的保护，在十九世纪不止一次地成为大国同土耳其斗争的正式借口。

17 瓦尔德加马斯1849年为西班牙驻柏林的公使（卒于1853年）。

18 即在普鲁士领土上。

19 拿破仑第三不允许彻底取消教皇的世俗权力。但这一政策不可避免地与拿破仑第三对撒丁王国的支持有些矛盾，撒丁王国当时正为重新统一意大利而同奥地利进行斗争。由于这一支持，拿破仑在1860年从意大利获得了萨伏依和尼斯。在拿破仑的协助下，1860年将罗马教皇在意大利中部相当多的领地合并到撒丁王国。俾斯麦说的正是指这一“损失”。

20 1870—1871年的普法战争以1871年5月10日的法兰克福和约告终。

21 七年战争（1756—1763）是在两个国家集团之间进行的：普鲁士和英国的同盟同奥地利、萨克森、俄国、法国、瑞典和西班牙的同盟相对峙。

22 巴托罗缪之夜指1572年8月24日（巴托罗缪圣徒日）夜巴黎天主教徒对法国宗教改革派信徒（胡格诺教徒）的大屠杀。火刑是中世纪时期耶稣会教徒用来惩治天主教敌人的一种常见刑法。三十年战争（1618—1648年）是德国天主教邦国与新教邦国之间的战争，瑞典、法国、丹麦和许多其他国

家参加了这一战争。

23　卡尔·弗里德里希·萨维尼。

24　引自罗马诗人维吉尔的长诗《伊尼德》第2章，第135页。

25　拉丁文语句，引自4—5世纪基督教作家奥古斯丁的著作。这句话的意思是这样的：只要罗马教皇发话，一切争论都应当停止。

26　瑞典国王奥斯卡尔二世。

27　第一帝国指拿破仑第一帝国，从1804年起（实际上是从雾月18日政变，即1799年11月9日起）到1814年，以后又于1815年存在一段短暂时期（“百日”）；第二帝国指路易·拿破仑（拿破仑第三）帝国，存在于1852年至1870年间。

28　副署是在国家元首发布的法令和命令下面大臣的签字。副署使法令在法律上生效，并使副署者为此行动承担责任。

29　实际是“本月6日”，参看《思考与回忆》的附录，第1卷第256页以下。

30　引自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第十一节。现引全诗：“故此，神就给他们一个生发错误的心，叫他们信从虚妄。”

31　温索尔，伦敦附近的城堡，是英国国王的夏宫。

32　弗里德里希·欧伦堡伯爵（1815—1881）从1862年起担任内务大臣。他曾企图实行旨在建立地方自治制的行政改革。他开始在1864—1866年同丹麦及奥地利战争之后合并到普鲁士的那些新省份进行改革，后来又在一些旧的省份进行了一系列改革（1872年行省组织法）。但是，他遇到俾斯麦的反对，于1878年退休。

33　帝国宰相代理法于1878年3月17日由国会通过。根据这一

法律，皇帝按帝国宰相的建议可在宰相丧失履行自己职务能力时给他委派一个代理人。代理人既可被任命代理帝国宰相的全部职务，也可代理宰相管辖的个别部门和职务。

34 罗昂是从1859年12月5日直到1862年9月的俾斯麦任职前的“新纪元”内阁中的军政大臣。他是这一内阁中唯一的保守派代表，在1862年夏天关于宣誓问题的冲突期间和“宪法冲突”酝酿期间唯一全力支持国王的大臣。他在俾斯麦内阁中保持大臣职位直到1873年。

35 1877年12月30日的信，参看《思考与回忆》的附录，第1卷第277—278页。

36 德国政府在这期间打算施行国家烟草专卖法案。1878年进行了关于这一措施的专门的民意调查，但由于得到否定性结果，专卖法案未能施行，1879年帝国政府仅实行了烟草征税法。

37 1850年普鲁士宪法第109条内载：“继续征收现行的各种捐税，所有与本宪法不相抵触的现行法典、各项法律与命令的规定在未颁布专门法令前，仍然有效。”

38 指卞尼格先在积极参加50—60年代汉诺威政治生活时，虽然捍卫过在普鲁士霸权下统一德国的主张，但是他一直坚持自由资产阶级的立宪主义立场。

39 在1805年的奥斯特利茨战役之后，拿破仑第一将汉诺威选帝侯国转交给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

40 诺比林行刺威廉一世皇帝事件发生在1878年6月2日。皇帝受了伤。俾斯麦利用这一行刺事件作借口，对社会民主党进行坚决的攻击，并公布“非常法”来反对社会党人，虽然社

会民主党与此行刺事件毫无关系。

41　马克斯·赫德尔是个白铁匠学徒，1878 年 5 月 11 日行刺威廉一世未遂，同年 8 月 16 日被处死刑。

42　邦议会为奥地利领土内的地方等级代表会议；国会为奥地利的代表会议。奥地利总督戈鲁霍夫斯基是波兰小贵族阶级最著名的代表，推行旨在同奥地利中央政府达成协议的亲奥地利的方针。

43　指 1878 年夏天解散国会，其目的在于选举能通过俾斯麦拟定的反对社会民主党措施的新国会。

44　博托·欧伦堡伯爵的母亲是这个家族的成员。

45　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它的正式名称是“镇压社会民主党企图危害治安法”）是在 1878 年 10 月根据俾斯麦的提议由国会通过的，后来此法又延长至 1890 年。这一法令实质上除了与选举运动有关的活动外，禁止社会民主党进行任何活动。

46　由枢密顾问罗米尔在贵族院宣读的俾斯麦的声明，在欧伦堡看来，是对他本人的侮辱。参阅《政治演说集》，第 8 卷，第 287—288 页。

47　即在 1862—1866 年“宪法冲突”时期。

48　1873 年 1 月 1 日。

49　1878 年的柏林会议（参阅第二十八章）。

50　从 1879 年 4 月 16 日起实行。见《政治演说集》第 8 卷第 54 页。

51　1851 年俾斯麦被委任为出席德意志邦联议会的普鲁士公使，他担任此职直至 1859 年。

52　“预算争端”指普鲁士邦议会与政府关于军事预算款项的斗争，这一斗争成为所谓的 1862—1866 年“宪法冲突”的原因。

53 俾斯麦在“宪法冲突”时期任首相兼外交大臣。

54 委任枢密顾问是依照4月20日的内阁指令，国王敕令的标注日期是1877年3月22日。

55 《帝国与国家公报》是德国政府刊印命令和国务文告的官方刊物。

56 俾斯麦指的是引起1877年5月16日茹尔·西蒙内阁解散的事件。由于阻碍恢复罗马教皇世俗权力的维护者的宣传，茹尔·西蒙这个右翼共和党人和温和的反对教权主义者引起了法国总统、反动分子、君主主义者、教权主义者麦克·马洪的不满。总统给西蒙写了一封语气极为激烈的信，结果西蒙迫不得已立即提出辞职。

57 6月12日内阁一致决议，简单地拒绝接受关于委任格鲁纳的文告，其原因是：陛下免去了内阁参与任何这种委任的负有责任的合作，而按通常的方式发布文告则会造成一种印象，似乎内阁曾参与过这一合作。参看蒂德曼：《帝国宰相办公厅长官的六年》第174页。

第二十七章

1 莱茵郜位于莱茵河右岸，离美因兹不远的一个地区。

2 亨利希·冯·斯蒂凡（1831—1897）在这时期是德意志帝国邮政长官。

3 1891年2月德国皇后同女儿访问了巴黎。她的巴黎之行遇到情绪敌视的示威游行。在此之后，帝国政府取消了简化阿尔萨斯及法国之间来往手续的让步。但是1891年9月21日通

过国境的手续又大大简化了。

4　1870—1871 年的普法战争。

5　王储妃维多利亚是王储弗里德里希三世之妻。

第二十八章

1　瓦尔辛是俾斯麦在波美拉尼亚的庄园，有古老的花园和城堡，俾斯麦经常来此地休养。

2　利瓦季亚是克里木南岸的一所宫殿，当时是沙皇的庄园，常作为俄国皇帝的夏季行宫。

3　参阅第一卷第十章第三节。

4　1853 年 1—2 月，尼古拉一世试图通过驻彼得堡的英国公使乔治·汉密尔顿·西摩爵士与英国签订关于共同瓜分土耳其领土的协定。这一图谋结果适得其反：沙皇的倡议促进了英法的接近，巩固了土耳其的地位。英法站在土耳其一边参加了 1853 年爆发的东方战争。战争期间尼古拉一世与西摩所进行的谈判已在外国报刊上公布。

5　科尔贝格是普鲁士波美拉尼亚省的一个城市，距波罗的海海岸很近，1873 年前是一个要塞。

6　佩斯是匈牙利的主要城市，1872 年与布达市联合，取名布达佩斯。

7　1876 年 7 月 8 日在赖希施塔特（捷克扎库培的）亚历山大二世与弗朗茨—约瑟夫为讨论巴尔干问题举行会晤。俄、奥两国皇帝商定，如果土耳其战胜 1875 年夏季在土耳其帝国巴尔干地区起义的基督教居民，两大国便出面反对土耳其；如果土耳

其帝国瓦解，奥地利就得到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部分领土，俄国收回1856年失去的比萨拉比亚那部分领土，而保加利亚和鲁米利亚获得自治。在巴尔干建立大斯拉夫国家的可能性将被排除，君士坦丁堡则成为自由市。这些条件是俄国和奥匈帝国1877年1月15日在布达佩斯签订的秘密协定的附加补充协定规定的。布达佩斯协定正文中最重要的是第二条，根据这一条在俄国同土耳其发生战争时奥地利必须对俄国保持善意的中立。

8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为巴尔干半岛西北部南斯拉夫各民族居住的地方，从十五世纪起受土耳其人统治。十九世纪斯拉夫居民曾多次起义反对土耳其统治。根据1878年柏林会议决议，奥地利有权暂时占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直到在那里建立起秩序为止”。1908年奥地利宣布并吞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9 1877—1878年的俄土战争是1877年4月24日由俄国宣战的。俄国部队在开始几个月取得胜利后，便被阻遏在被他们包围的土耳其要塞普列夫纳前面。普列夫纳于1877年12月才告投降。俄国军队在冬季越过巴尔干山区，于1878年1月底到达马尔马拉海岸。土耳其军队被击溃。1878年1月31日达成了初步的和约，3月3日签订了圣—斯蒂凡诺和约。

10 冯·乌布里尔伯爵在1871—1879年任俄国驻德国大使。

11 马尾（旌节）是系在木杆上的一种马尾状的装饰，曾流行于土耳其军队，也用做哥萨克首领的权力的标志。

12 圣—斯蒂凡诺是位于马尔马拉海欧洲海岸君士坦丁堡附近的一个不大的港埠。1878年3月3日在这里签订了俄土和

约。条约的主要内容是：从前属于土耳其的塞尔维亚、罗马尼亚和黑山独立；建立从黑海到爱琴海的保加利亚独立公国，而在名义上主权仍属土耳其；比萨拉比亚归还俄国；卡尔斯、巴统、阿尔达汉和巴亚泽特并入俄国；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和克里特岛实行改革。圣—斯蒂凡诺和约没有得到英国和奥匈帝国的承认，因为他们担心俄国在巴尔干的势力过分强大。这两大国以战争威胁迫使俄国同意重新审议圣—斯蒂凡诺和约的条款。柏林会议就是为此而召开的。

13　弗里德里希斯鲁厄是1871年威廉一世皇帝赏赐给俾斯麦的庄园。

14　大国柏林会议于1878年6月13日—7月13日召开。这次会议是为重新审议圣—斯蒂凡诺和约的条款而召开的，会议主席是俾斯麦。俾斯麦声明，他愿做一个“公正的调停人”，而绝不偏袒任何一方。但在大部分问题上他都支持了俄国的对手。俄国出席会议的代表是宰相哥尔查科夫公爵、驻伦敦大使舒瓦洛夫和驻柏林大使乌布里尔，会议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已由1878年5月签订的英俄协定预先决定了。会议的主要决议如下：保加利亚分为三部分，其中两部分——东鲁米利亚和保加利亚的马其顿仍归土耳其完全管辖。由保加利亚北部组成的保加利亚公国实际上转交俄国政府掌管，但形式上还算是土耳其帝国的附属国。根据圣—斯蒂凡诺和约让给俄国的小亚细亚的阿拉什克尔盆地和巴亚泽特要塞归还土耳其帝国。柏林条约（1878年7月13日）——通常如此称呼由64项条款组成的柏林会议决议——只审议了土耳其和俄国的圣—斯蒂凡诺和约而未涉及到1878年6月4日签订的土耳

其—英国协定，该协定授权英国占领塞浦路斯岛和保卫土耳其亚洲部分的海岸。

15 “蓝皮书”，有关某些问题的文件的正式书册在英国称为“蓝皮书”。在1853—1856年的东方战争期间，英国工程师加强了卡尔斯的防御。卡尔斯经长期围困后于1855年11月6日被占领，英国军官威廉斯当时在这里被俘。

16 亚历山大·本斯爵士（1805—1841）是英国陆军上尉、著名的中亚细亚考察者，曾任英国驻阿富汗沙赫宫廷的政治代表。

17 苏丹应签署的缅希科夫照会是作为特别使团首领的缅希科夫海军上将于1853年2月28日来到君士坦丁堡向土耳其政府以最后通牒形式提出的一个方案。苏丹如果签署此项文件，就必须承认俄国长期干涉土耳其帝国内政的权利。1853年7月末在维也纳召开的欧洲各大国大使会议制定了妥协性的照会的方案，但苏丹仍未签字。

18 审计院，在德意志各邦中那些检查国家机关收入和支出并监督管理国家财产的国家机关称之为审计院。

19 俾斯麦对亚历山大来信的内容叙述得不确切。这封用法语写的信由科尔发表在《俾斯麦〈思考与回忆〉一书阅读指南》第168—170页上。

皇村，1879年8月3／15日。亲爱的舅舅和朋友……在您对我怀有的始终不渝的友谊的鼓舞下，我请求您允许我向您谈一个经常盘桓在我脑际的百思不解的问题。我所谈的是关于德国驻土耳其的各种外交代表的立场问题，很遗憾，一个时期以来他们的立场明显地与俄国敌对起来了，这种状况

和相互间的友好传统背道而驰，而这种友好关系一个多世纪以来一直指导着我们两国政府的政策而且完全符合两国的共同利益。我对这些传统的态度没有改变，我坚持这些传统，希望您也持同样态度。但是公论自有事实为依据。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解释德国在东方的代表们对我们所持的越来越敌意的态度呢？用俾斯麦公爵自己的话来说，德国在东方没有需要保卫的切身利益，而我们在那里却有这类相当重要的利益。我们刚刚胜利地结束了战争，战争的目的并不是要征服，而只是为了改善土耳其基督教徒的状况。不久前我们归还了战后我们占领的省份就是明证。但是我们坚持，我们用鲜血和金钱的代价取得的成果不能停在纸面上。这里所谈的只是执行柏林会议的决议，但是应该认真执行。英国人和奥地利人现在还依然牢固地占据着土耳其的两个省，他们在和平时期加以占领的目的就是永远不将其归还给合法的君主，而土耳其人在他们这些朋友的支持下不断地在枝节问题上设置障碍，而这些问题无论对保加利亚人还是对光荣的黑山人都是极端重要的。罗马尼亚人对保加利亚人的态度也同样如此。这些争论应当由欧洲委员们多数人的意见来解决。法国和意大利的全权代表几乎在所有的问题上都和我们一致，然而德国的全权代表仿佛得到了命令似的，总是支持奥地利一贯敌视我们的观点；而且在与德国完全无关、但对我们是特别重要的问题上也是如此。

亲爱的舅舅，请原谅我说话坦率，我的话都是有事实根据的。但我认为有义务提请您注意，正如两国的舆论界已开始做的那样，挑动我们一个民族去反对另一个民族，这一切

对于我们的睦邻关系可能引起令人忧虑的后果。我认为这是我们共同的敌人、即那些对三皇同盟不能容忍的人的伎俩。您一定还记得，我不止一次跟您谈过这个问题；您一定还记得，当我确信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是一致的时候，我感到多么欣慰。我十分理解，您希望你们同奥地利保持良好关系，然而，我不明白，牺牲了我们之间的良好关系对德国有什么好处。当情况涉及到两个伟大国家的利益时，一个真正的政治家以个人意气用事是适当的吗？这两个国家一向和睦相处，而且其中一个国家曾在1870年给予另一国家以巨大援助，用您自己的话说，您永远也不会忘记这种援助。如果情况不是变得如此严重，我是不愿意向您提起这些话的，我不能再对您隐瞒这些使我坐卧不安的危险，因为后果对我们两国都可能极其有害。愿上帝保佑我们免遭此难，并给予您启示！……

亲爱的舅舅，请您不要为此信的内容而生气，请相信完全忠于您的外甥和朋友对您始终不渝的情谊和真挚的心怀。

亚历山大

20 巴登—巴登是德国西南部的著名疗养地。

21 亚历山大罗沃是位于当时俄普边界的一个小镇，这次会晤就是于1879年9月3日在这里举行的。

22 指1877—1878年的俄土战争。

23 指发表在科尔的《俾斯麦〈思考与回忆〉一书阅读指南》第171—172页上舒瓦洛夫伯爵下面的一封信。

伦敦，1877 年 2 月 3 日

亲爱的公爵，明斯特伯爵曾多次把您对我善良而友好的忆旧情谊转达给我，为此请允许我向您表示热烈而诚挚的谢意！

请您相信，我的信仰根深蒂固，任何时候不会动摇，旨在迫使我将其抛弃的一切努力均属徒劳。

我一直认为，我们两个帝国的紧密同盟会造成巨大的力量，任何别的强国，不管是单个地还是与任何国家结成同盟，都不能有效地与这样的力量相抗衡。而且，这个力量会使欧洲其他国家都感到惊恐。

1872 年三国同盟的初步基础在柏林奠定时，依我看这个同盟的第三个成员只是嫁接在我们这棵古老友谊的强壮而结实的树干上的一根嫩枝；让这条新的嫩枝成长吧，我不会说“不行”，但是不能让它为了自己的利益把这棵树的所有汁液都吮吸干净。总之，我认为我们两国的协定的主要目的应是：

如果德国不得不在西方采取某种措施的话，俄国将不允许并永远不容忍建立反对德国的同盟；在东方，德国也将以同样的态度对待我们。

如果类似的做法能够使欧洲信服，那么将来就可以避免不少麻烦！

亲爱的公爵，正因为我有如此坚定的信念，所以我始终感到遗憾的是，在目前的危机时期，三国宫廷之间的团结显得并不巩固。我们的同盟不仅在实际上，甚至在表面上也是不为人知的。

如果英国相信这个同盟，它就会对土耳其持更强硬的政策。

如果土耳其政府相信这个同盟，它就绝不会固执己见并采取对抗的态度。

最后，如果组成这个同盟的三个帝国对它不加丝毫怀疑，那么“一切早就顺利解决了”。

亲爱的公爵，请原谅这个于您无所裨益的自白。虽然您并不是天主教的神甫，我还是感到有必要向您忏悔的。亲爱的公爵，请接受我的真诚的爱戴和万分的敬意。

舒瓦洛夫

24 俾斯麦指哥尔查科夫。

25 1876—1878 年塞尔维亚与黑山为争取独立和土耳其进行了战争。1877 年两国与土耳其签订了为时不久的和约；同年底战争重又爆发。

26 土耳其宰相为土耳其帝国的政府首脑，这里指爱德姆·巴夏。

27 阿卜杜尔·加米德二世。

28 1876 年 12 月到 1877 年 1 月欧洲各国大使在君士坦丁堡举行会议，会上提出了改革土耳其对巴尔干地区信奉基督教各民族的关系的要求，这里指的就是这些改革的要求。但是会议没有取得任何实际成果。

29 在 1885 年奥尔缪茨谈判期间，和在 1756—1763 年的七年战争期间一样，俄国都反对普鲁士。

第二十九章

1　1871 年 5 月 10 日法兰克福和约结束了 1870—1871 年的普法战争。

2　凡尔赛谈判是在签订法兰克福和约之前进行的。

3　在 1814 年和 1815 年反对拿破仑战争的欧洲国家联盟中，起主导作用的是俄国、英国、奥地利和普鲁士。后三国力主保持法国受到严重削弱的现状，并要求大大缩小它的领土。但是亚历山大一世坚决反对这一意见。他认为，作为与英国抗衡的一支力量，相对强大的法国的存在是必要的。依照亚历山大一世和他的顾问们的见解，俄国和英国在近东必然会发生冲突。

4　1814—1815 年维也纳会议期间，在会议上起主导作用的国家，最初打算排除作为战败国的法国参加解决任何重大问题。但是法国参加会议的代表、外交大臣达来朗非常巧妙地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主要表现在波兰和萨克森前途问题上），不仅使法国成了参加会议的平等的一员，而且成功地瓦解了俄、英、奥、普反法联盟。在英、奥破坏普、俄联合的企图失败之后，达来朗使法、英、奥三国于 1815 年 1 月 3 日缔结了这次旨在反对俄、普两国的新同盟。因此出现了欧洲新战争的威胁，只因拿破仑（1815 年 3 月）从厄尔巴岛逃出并在法国短期（“百日”）恢复了他的政权，才再一次使得各大国之间相对地团结起来。

5　括号中的话不准确。第一次巴黎和约签订后，法国领土上的盟国军队很快就撤走了。第二次巴黎和约签订后，法国的部分领

土被占领了五年。第一次巴黎和约于1814年5月30日签订；第二次巴黎和约于1815年11月20日签订。

6 反对奥地利（1866年）和法国（1870—1871年）。

7 奥地利宰相考尼茨（1753年起任职）为了协助法、俄来遏制普鲁士日益增长的军事威力，在七年战争期间，于1756年和法、俄结成同盟。

8 作为萨克森内阁首脑的博伊斯特伯爵，为了和奥地利结成联盟，推行了使萨克森站在奥地利一边参加1866年战争的政策。奥地利失败后，他又坚持萨克森参加南德同盟。因为俾斯麦知道他对普鲁士怀有敌意，不愿接受他参加谈判，博伊斯特被迫辞职，以后便在奥地利任职，于1867年担任了奥地利内阁首相和外交大臣。

9 路易·拿破仑和奥地利皇帝弗朗茨·约瑟夫于1867年8月18—23日在（奥地利）萨尔茨堡进行了谈判。

10 七年战争（1756—1763年）中，英国是普鲁士的盟国，但在1762年以前，英国拒绝恢复有关资助普鲁士的条约。结果普鲁士陷于格外困难的境地，直到伊丽莎白·彼得罗芙娜去世和彼得三世即位时俄国退出战争，才使普鲁士摆脱困境。

11 俾斯麦把与匈牙利民族解放运动的领袖路德维希·科苏特之名（1802—1894年）相联系的匈牙利人反对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统治的民族解放斗争的整个时期称为科苏特插曲。1848年科苏特成为革命政府首脑，在革命失败后仍继续斗争。为争取匈牙利的独立，他曾想依靠波拿巴法国的帮助。科苏特反对1867年奥匈协定。科苏特在拒绝大赦后客死外国。

12 1846年发生了所谓的克拉科夫起义。根据1814—1815年维也

纳会议决议，克拉科夫成为一个独立的共和国，它是波兰民族革命活动中心。克拉科夫加入了1830—1831年波兰起义以后，曾被俄国占领，而在1836年又被奥地利和普鲁士军队占领。克拉科夫起义仅仅是预定在1846年2月21日举行的全波兰（即波兰各地区：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占领地区）起义的一部分，它被奥军残酷地镇压了。克拉科夫不再是一个共和国（自由市），它被划为奥地利领地。

13　俾斯麦在这里把神圣同盟称为“东方三国同盟”，因为这个同盟的核心是俄、奥、普三国。

14　指统一德国的所谓“大德意志”计划，即统一包括奥地利在内的所有德意志人居住地区的计划。实际上在十九世纪实现了把奥地利排除在外的统一德国的“小德意志”计划。

15　1853—1856年东方战争期间，奥地利向英、法靠拢，甚至在1854年把自己的军队集结在与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交界的边境上，以此迫使俄国从这些多瑙河公国撤出它的军队。

16　天主教居民占优势的地区主要在德国西部和南部，新教居民占多数的地区在德国东部和北部。

17　在三十年战争（1618—1648年）、七年战争（1756—1763年）和1866年的战争中普鲁士和奥地利是敌对国家。

18　德皇威廉一世是亚历山大二世的母亲亚历山大·费多罗芙娜的哥哥。

19　1813年俄国帮助普鲁士从法国统治下解放出来，后来又联合普鲁士粉碎了拿破仑帝国。

20　1787年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派遣二万士兵去荷兰恢复了威廉五世即弗里德里希·威廉的妹夫的政权。其

实，普鲁士在荷兰的利益在18世纪末绝不只取决于亲属关系：推翻威廉五世就意味着法、英在荷兰的影响急剧增强并造成对普鲁士的威胁。

21 1849年尼古拉一世派兵去匈牙利，1848—1849年匈牙利的革命主要就是被这支军队镇压下去的。俄国出兵干涉的根据是应奥皇的请求，当时奥皇因起义者军事上的胜利而处于危急状况。

22 下面摘引这封信以及亚历山大二世复信中的最重要部分，载于H.科尔：《俾斯麦著〈思考与回忆〉阅读指南》第178—182页。

柏林 1879年11月4日

致亚历山大皇帝，亲爱的外甥和朋友：

多年来，诚挚的友谊把我们连接在一起并且作为指导我们政策的基础，所以我有责任写信给您，并附上俾斯麦公爵和安德拉西伯爵在加施泰因和维也纳口头会谈结果的备忘录。伯爵到加施泰因来是为了解释他辞职的原因，他辞去了由于领导出色而获得整个欧洲敬仰的工作。两位宰相的会谈主要涉及了1848年以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中的德奥关系。战争的命运决定从现在起将由普鲁士来领导统一的德国。既然德意志邦联解体了，奥地利同原来的德国就不再有条约关系，但是普、奥和德意志诸邦之间的同盟在德国社会舆论中继续存在着，这种舆论极力以两个帝国精神上的统一来代替这种同盟，人们则认为这两个帝国爱好和平的精神就是维护欧洲和平的保证。我这里尚未谈及您极力维护这种和平所运

用的才智，虽然近二十年来欧洲一直是几次战争的舞台。事态的这种进程正是安德拉西伯爵个人所支持的，他辞职将会产生严重的后果，不管他的继任者是谁，因为威信是不能继承下来的。因此两位宰相同意以德奥两国新的团结来填补由于德意志邦联的解体而形成的空白，因为半个世纪以来，德意志邦联一直就是普、奥和德国各诸侯的同盟。这种团结在所附之备忘录中已经阐明。我不揣冒昧地希望，在这个重要文件中所阐述的原则将得到您的赞赏，并希望欣然同意这些原则，以便加强自1873年以来对欧洲作出如此卓越贡献的三皇同盟。我不无欣慰地注意到，自从我们在亚历山大罗沃会晤之后，我们两国的报界已平静下来。不过在莫斯科一家报纸中我看到一篇文章，它公开叫嚷要对德国发动一场似乎已成定局的泛斯拉夫主义战争，而且总督并未禁止这份报纸，尽管他的职权完全允许他做到这一点。使我担心的是虚无主义者的政党，它和泛斯拉夫主义者一个腔调，用敌视邻国的语言说话，其目的无非是利用一切冲突来实现他们的破坏计划而已。

假如这些革命性的计划能够以自己的压力牵制政府，或者在政治问题上损害政府的名誉，那么我不能向您隐瞒，亲爱的外甥，政府将会遇到各邻国强烈的反对。威胁的言词，再加上在战争获胜之后引人注目地扩大您那似乎旨在维护和平的军队，将会使欧洲惊恐不安；反之，您那爱好和平的坚强意志则能消除惶恐，顺遂人心。

亲爱的外甥，这就是我怀着您所熟悉的诚心和信赖的态度要对您说的话。但我还应该附带表示纯粹是我个人的遗

憾，因为我们的友好会晤和由于安德拉西伯爵突然辞职而加速到来的事态以及上述状况不期而遇，真令人扫兴……

摘自亚历山大二世的复信：

利瓦季亚，1879 年 11 月 2／14

亲爱的舅舅和朋友：

顷接 11 月 4 日来函，我无法充分表达对您的衷心感谢。您随函附来了在维也纳签署的备忘录副本，又一次向我证实了您的诚挚情谊。您深知我心中急欲消除您我关系中最微小的猜疑的热切愿望。毫无疑问，俾斯麦公爵的维也纳之行促成了上述文件的签署，在某种意义上看来是和我们在亚历山大罗沃的会晤相抗衡的，这不能不造成难堪的影响，足以使社会舆论大惑不解。我本人的信念绝不因此而有所动摇，现在我有幸确认，在这个协定中绝对没有同我的愿望相抵触的东西。这个协定力求巩固大德意志国家的强盛，德国的统一是我深表拥护的；这个协定试图用和平的方法来实现柏林条约的决议，而认真恪守柏林条约则一贯是我的政策的基础。

所以，我完全同意承您盛情转给我的备忘录中所阐明的原则。这样，我不但赞同德奥两国达成的协议，而且很满意地把这一协议看作是三位皇帝之间业已恢复最充分的谅解。正如您非常正确地指出的那样，这个协议为欧洲作出了极大的贡献。

再者，亲爱的舅舅，您一定知道我是多么欣然欢迎这一

协议的，而且您也肯定了解，我一直在试图通过我们完全一致的观点来达成协议。为了便利由此而产生的谈判，我已决定将我在柏林的现任公使调任他职，由萨布罗夫先生接替，萨布罗夫不久前和俾斯麦公爵的谈判确定了他目前的任务。这一选择如蒙准许，请即赐复。我希望萨布罗夫不辜负这种信任。我愿我们两国的关系应以这种信任为基石。

从这一观点出发，我不能对您，亲爱的舅舅，隐瞒自己的想法，我甚感遗憾的是，您竟把我为了改组我的军队所必须采取的一系列军事措施，视作具有威胁性质。我认为，我的口头解释以及我的国防大臣米柳京伯爵在亚历山大罗沃荣幸地向您所作的说明，业已表明这些建议的和平性质，这足以彻底阐明这一问题。

同样感到遗憾的是，您认为在报刊评论中出现的泛斯拉夫主义倾向和其他的倾向会给我的政府带来压力。某个作家的谬见，尽管其背后有或多或少的一些人捧场，但它在俄国却永远不会具有政治纲领的意义。所以，如果报刊的越轨行为滑过了我的政府的检查，那么这种事之所以发生，正是因为政府意识到，它本身的力量在缩小着类似的越轨行为的意义。

至于虚无主义政党的破坏活动，您知道，一旦情况需要，我会毫不犹豫地采取最有力的措施加以镇压。这些措施是决不会徒劳无益的。在这一点上可以向您保证，我的坚强意志在任何时候都不会容忍任何导致秩序与和平受到威胁的微小图谋。我只希望我的这些保证能够消除您的疑虑。

23 约瑟夫二世皇帝的对外政策，是在反对土耳其的共同斗争的基础上，遵循与俄国联盟的方针，甚至在1787—1791年俄土战争时期也站在俄国这一边。当时约瑟夫二世和以普鲁士为首的德意志诸邦联盟非常敌对，因为这些邦反对约瑟夫二世加强帝国中央集权的图谋。

24 在意大利恢复统一后，奥地利手中还留有意大利所要求的伊斯特利亚地区和亚得里亚海及达尔马戚亚海沿岸的一些地方。

25 即1848—1849年意大利革命时期。驻意大利奥军司令官拉德茨基伯爵指挥了当时奥地利人反对意大利人的军事行动。

26 俾斯麦是指奥地利由于在镇压1848—1849年匈牙利革命时尼古拉一世所给予的帮助而对俄国欠的“报恩债”。在1853—1856年东方战争中，奥地利不仅不支持俄国，反而准备反对俄国。

27 1848—1849年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市的圣保罗教堂召开了全德国民议会。俾斯麦此处是指在1848—1849年革命时期统一德国的尝试。在统一德国运动中当时分为两派：主要把奥地利排除在统一的德国之外的“小德意志派”，和认为这种统一是不完全的“大德意志派”。

28 波希米亚、摩拉维亚、加里西亚为斯拉夫人居住的地区，当时（19世纪）属于奥匈帝国。

29 1882年5月20日意大利加入1879年的奥德同盟条约。

30 在意大利为争取成为统一的独立国家的斗争中，奥地利和法国在意大利的利益一直发生冲突。斗争的结局是奥地利在1866年前丧失了它在意大利的主要领地，法国对意大利的支

援在这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

31　在奥地利和普鲁士争夺德意志各邦霸权的紧张斗争时期，他们都是奥地利对外政策的领导人。图古特男爵是考尼茨的学生，从1793年起任外交大臣，执行敌视普鲁士的政策。施瓦尔岑贝格公爵在积极参与镇压1848年革命之后，成为内阁首脑和外交大臣，极力恢复奥地利在德国的霸权。在施瓦尔岑贝格的领导下，1850年恢复了由奥地利操纵的德意志邦联议会。布奥尔伯爵是1852年施瓦尔岑贝格死后的继任者，担任内阁总理和外交大臣职务。巴赫是1848年革命的参加者，后来转入反动阵营，1849年起任内务大臣十年。关于俾斯麦在上列诸人中提到的博伊斯特，可参阅前面注释8。

32　俾斯麦所提及的施瓦尔岑贝格的“忘恩负义”，是指由于俄国沙皇的军事援助，奥地利帝国于1849年得以镇压匈牙利革命。但是过了几年，在1853—1856年东方战争期间，奥地利对俄国却采取了极为敌对的立场。人们把施瓦尔岑贝格对俄国发表的声明“我们还将以自己的忘恩负义使欧洲大吃一惊”，赠给在东方战争前一年去世的奥地利内阁首相兼外交大臣施瓦尔岑贝格公爵。

33　维也纳会议初期，英、奥企图在波兰和萨克森问题上挑起俄、普之间的冲突，但这些企图以失败告终，于是英、奥、法三国就签订了旨在反对普、俄两国的同盟条约（1815年1月3日）。

34　1849年8月13日在匈牙利小镇维拉戈什，匈牙利起义者的领袖戈尔盖向俄军投降，这标志着1848—1849年匈牙利革命的失败。俾斯麦所说的“政治压力”，是指在1853—1856年东

方战争期间奥地利向俄国占领的摩尔达维亚公国和瓦拉几亚公国的边境示威性地派遣军队一事。

35 士瓦本人是士瓦本（在德国西南部）的居民。“士瓦本人”有时用来指“德国人”。

36 在奥匈帝国，奥地利皇帝同时又是匈牙利的国王。这里提及的那个时期，皇帝是弗朗茨·约瑟夫，他在位的时期是1848年到1916年。

37 1881年9月9日。

38 1884年9月15—17日，在小镇斯凯尔尼维策，俄、德、奥三国皇帝会晤。

39 1887年11月18日亚历山大三世皇帝离开（丹麦）哥本哈根，路经柏林稍作停留。

第三十章

1 三色旗是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旗帜。

2 法国警察头目施奈贝累于1887年4月21日在德国境内被德国警察逮捕。他是为处理边界问题被召去德国的。法国对此提出强烈抗议。两国军国主义的宣传都广泛利用了这个所谓的“施奈贝累事件”。这一事件通过外交途径得到了调解，施奈贝累被释放。

3 布朗热是1886—1887年法国军政部长。八十年代后半期，法国反动沙文主义和复仇主义运动就是与他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即布朗热主义。

4 米·尼·卡特柯夫是俄国的反动政论家，《莫斯科新闻》的编

辑，死于1887年。米·德·斯柯别列夫是俄国的将军，死于1882年。两人都极力维护建立俄法同盟的政策。

5　1833年7月8日俄国和土耳其签订了温基亚尔—伊斯凯莱西条约。一项秘密的特别条文规定：在俄国和任何一国交战时土耳其应关闭海峡，而俄国必须在土耳其同外国发生冲突时以及镇压国内反对苏丹的运动中给予军事援助。

6　普福尔特（Pforte）为当时土耳其帝国政府的正式名称。

7　威廉·格莱斯顿（1809—1898年）是英国自由党领袖，1880—1885年第二次担任首相。1880年7月23日格莱斯顿在下议院的讲演中宣称："尽管我们很想避开由于土耳其帝国的崩溃而出现的麻烦，但是土耳其政府履行它对臣民承担的义务不会是次要的问题；这是头等重要的问题，是我们努力的目标。如果土耳其没有决心履行自己的义务，它就应该自己尽可能拯救自己的完整和独立。"

8　梅特涅公爵（1773—1859年）是十九世纪前半期奥地利政策的决策人，欧洲反动势力的支持者。在希腊1821年到1829年的起义问题上，特别明显地暴露出他对革命的恐惧和维护"法定制度"的忠心。梅特涅认为，无论如何也不应当鼓励臣民暴动以反对自己的君主。因此，对希腊人争取独立的斗争，他持敌对态度，并且阻挠其他各国对起义者的支援。

9　亚历山大·伊普西兰蒂（1783—1828年）是希腊人，俄国军官。1820年成为希腊秘密团体核心的领导人。该秘密组织是为争取民族解放斗争于19世纪初在希腊以及希腊国外的希腊居民中建立的。1821年3月伊普西兰蒂领导的反对土耳其的起义很快被镇压下去了。

10 塞拉尔是土耳其苏丹的王宫。

11 1853 年 7 月俄国军队占领了当时属于土耳其的摩尔达维亚公国和瓦拉几亚公国；但因奥地利强烈反对，俄国不得不于 1854 年 8 月撤出它的军队。

12 贺拉斯《书简》，第 1 卷第 2、14 页。

13 1887 年 9 月 24 日德国士兵考夫曼在守卫一个与法国边界毗邻的森林时打死了一名由于狩猎而越境的法国护林员（这位护林员没有注意到德国边防战士要求止步的喊声）。德国政府给死者的遗孀赔偿了损失。这样，一场在沙文主义的报刊上引起很大风波的纠纷才平息下来。

14 萨摩亚群岛为太平洋波利尼西亚的一组岛屿。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德国和美国争夺在这些岛上的优势地位。在英国的压力下，德国被迫让步，并把萨摩亚群岛问题交付 1889 年 4—6 月在柏林召开的大国会议解决。

15 在 1768—1774 年俄土战争期间，在爱琴海东岸的切斯马港，土耳其舰队于 1770 年 6 月 24 日被阿列克谢·奥尔洛夫（后来的奥尔洛夫·切斯马斯基伯爵）率领的俄国舰队消灭。俄国军队占领了希腊群岛的许多岛屿。此后，爆发了希腊人反对土耳其统治的起义。但是在军事行动以及和谈期间起义很快被政府残酷镇压下去。

16 范纳里奥特人为希腊旧贵族在君士坦丁堡的代表人物，都出身于大实业家、金融家、商人。土耳其政府委派范纳里奥特人担任重要职务，其中包括外交职务。大发横财的范纳里奥特人的各家族（伊普西兰蒂家族就是其中的一个）是土耳其最高当局在当时属于土耳其的多瑙河公国摩尔达维亚和瓦拉

几亚的代表（公侯）。许多著名的范纳里奥特人积极参加了1821年反对土耳其、争取希腊民族解放的斗争。

17　西欧各国担心俄国的势力在希腊过于强大，1827年它们转而积极支持希腊为摆脱土耳其而争取独立的斗争。1827年7月6日英、法、俄在伦敦签订了“关于调停希腊问题”的协定。为了实现这一协定，英、法、俄三国的联合舰队于同年10月20日在纳瓦林诺湾击溃了土耳其舰队。

18　引自奥维德著《变形记》第1卷第7页。

19　1889年亚历山大三世在欢迎黑山公爵尼古拉访问彼得堡的祝酒词中，把公爵称做“俄国唯一忠实的朋友”。

20　1852年前，在黑山把掌管宗教和军事最高权力的人称为统帅。俾斯麦用这个词是为了突出自己对黑山公爵尼古拉的讽刺。

21　在中世纪欧洲的许多国家中，元帅是一种最高的军衔。

22　君士坦丁是保罗一世皇帝的儿子，生于1779年。俾斯麦要说明，他的祖母叶卡特琳娜二世给新生儿选用罗曼诺夫家族中不曾用过的名字，表明她要实现把土耳其人从欧洲赶走并恢复拜占庭君士坦丁堡帝国这一计划，预定继承这一帝国王位的就是她的孙子君士坦丁。

第三十一章

1　普鲁士王国枢密院成立于1817年3月20日。1848年1月枢密院的职权大大地缩小了。它不参与立法与其他法令的筹备工作。到3月，它实际上已不再存在了。根据1852年1月12

日的国王指令，重设枢密院，1854 年 7 月恢复活动。

2 俾斯麦指的是普鲁士内阁。如果不包括和帝国有关部门联合起来的外交部，则总共有八个部：财政、贸易和工业部；宗教事务部；国民教育和卫生部；内务部；农业部；军政部；司法部和公共工程部。

3 国民经济会议为 1880 年 11 月 17 日由威廉一世下令在普鲁士成立的咨询机关。会议由政府任命的七十五名成员组成，负责讨论贸易、工业和农业方面的法律草案。然而国民经济会议成员的任命工作在它成立后十年（1890 年 1 月 14 日）才告完成。

4 普鲁士王国各省的代表会议称为省议会，由县议会选举产生。

5 1884 年枢密院进行了某些改组，成员人数增加了，而且分为若干部。王储（未来的皇帝弗里德里希三世）被任命为主席。

6 省长是普鲁士王国各省的地方行政机构的首脑。

第三十二章

1 诺比林行刺威廉一世皇帝事件于 1878 年 6 月 2 日发生于柏林。皇帝被散弹打伤。

2 未来的威廉二世皇帝，是威廉一世的孙子。

3 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国王的长子是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是 1840 年至 1861 年的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的次子是威廉一世，从 1861 年开始任普鲁士国王，1870 年至 1888 年任皇帝。

4 奥斯坦德是比利时的疗养地，在北海岸。

5　舍恩豪森是俾斯麦的世袭领地。

6　诺德奈是北海岸的一个同名岛上的疗养地。

7　由于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国王患精神病症，1857 年 10 月 23 日指定威廉亲王摄政。

8　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的为数不多的几个亲信被叫做“烟友会”；他们随随便便、不顾礼节地聚集在国王身边谈话和用传统式样的烟斗吸烟来消磨时间。

9　1870—1871 年普法战争。

10　“解放战争”指 1813 年到 1814 年反对法国统治德意志的战争。

11　施莱尼茨于 1861 年 10 月辞职。

12　《Mémorial Diplomantique》（《外交记事》）是 1859 年在巴黎发行的文学和政论报纸。

13　引自莎士比亚的《李尔王》，第四幕第六场。

14　扫罗，犹太国王。据圣经记载，扫罗对大卫的猜忌是由于后者瞒着扫罗接受君主登极涂油式而引起的。

15　采邑法是确定领主和他的家臣，也就是高级和低级封建主之间关系的法规总和。在规定服役的条件下，赏给家臣但应交租的地产叫做采邑。

16　应为：葡萄牙语 porteur du coton（内侍官）。——porte-coton（官衔制）在葡萄牙宫廷里是陌生的。他属于波旁宫廷高级官位等级。德文本注：porte-coton（内侍官）官衔最初是侍候国王穿戴的宫廷职务。

17　1871 年 3 月 2 日举行了预备和约批准证书互换仪式，这一预备和约于 2 月 26 日在凡尔赛签订，法国方面是梯也尔和法夫

尔，德国方面是俾斯麦。正式条约是1871年5月10日在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签订的。

18 指银婚。

19 赫德尔（在1878年5月11日）和诺比林（在1878年6月2日）行刺威廉一世皇帝未遂。这些恐怖活动与社会民主党没有关系，而俾斯麦却利用来作为颁布反对社会党法令的借口。

20 指安东·维尔纳的绘画："在凡尔赛宣布帝国成立"。占据中心位置的是俾斯麦的形象。

21 普鲁士直至君主政体后期，还保留着古老的用词习惯，把内阁一词理解为国王的个人办公处。在普鲁士设有民政和军政内阁，根据国王的安排通过它们来处理事务，因此不产生大臣向邦议会负责的问题。

22 威廉是想说 éclatantes。法语里的 sanglant 意为"血腥的"，éclatant 意为"光辉的、卓越的"。

第三十三章

1 1863年6月1日，正当"宪法冲突"炽热的时候，威廉一世国王颁布了一项出版法，旨在反对反对派的出版物。根据该法令，经两次警告后，即可取缔对政府不利的刊物。弗里德里希王储于1863年6月5日在但泽市政厅举行的招待会上致答词时，批评了国王的法令。有关被称为但泽事件的详细情节，见《思考与回忆》第一卷第十六章。

2 指英国。弗里德里希三世的妻子是英国女王维多利亚的女儿。

3　指维多利亚皇后（弗里德里希三世的妻子）想使前保加利亚公爵亚历山大·巴滕贝格同弗里德里希三世的女儿联姻。

4　1887 年王储得了严重的喉头病。围绕着诊断和手术问题爆发了一场激烈的斗争。斗争表明，某些政界人士想取消王储的王位继承权。他们引用了普鲁士宪法第五十六条，该条规定，在出现妨碍国王尽职的“长期病患”时，可以任命摄政王。弗里德里希三世在 1888 年 3 月 12 日即位后（即位后 99 天逝世），为安抚他的对手，允诺将按父亲的精神治国，并在给俾斯麦的专门信件中表示希望他继续为帝国服务。

5　1888 年 3 月 19 日国会通过一项关于把选举国会期由三年延长为五年的法令。

6　引自莎士比亚《科里奥兰》第三幕。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正文